

4222
2.2

社会主义思想史

第二卷

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1850—1890

[英] G. D. H. 柯尔 著



商务印书馆





社会主义思想史

第二卷

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1850—1890年

〔英〕G·D·H·柯尔著

何瑞丰译

俞大畏校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务印书馆

1978年·北京

A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Volume II
SOCIALIST THOUGHT
MARXISM AND ANARCHISM
1850—1890
By G. D. H. COLE
LONDON, 1957

内部发行

社会主义思想史

第二卷

[英] G·D·H·柯尔著

何瑞丰译 俞大畏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14印张 335千字

1978年9月第1版 197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9,500册

统一书号, 2017·204 定价, 1.55元

目 录

前 言	3
第一章 导言：1848年以后的社会主义	6
第二章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德国社会主义—— 洛贝尔图斯和马洛	18
第三章 俄国社会主义的曙光——别林斯基、赫 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	35
第四章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比利时社会主义 ——柯林斯、卡茨和德·凯色尔	61
第五章 拉萨尔	75
第六章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第一国际	91
第七章 巴黎公社	136
第八章 第一国际的衰亡	175
第九章 巴枯宁	214
第十章 拉萨尔以后的德国社会主义——“基督 教社会主义者”和“国家社会主义者”—— 文化斗争与反社会主义者法	237
第十一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资本论》与《反杜 林论》	267
第十二章 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 ——克鲁泡特金	314
第十三章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美国社会主义——	

	亨利·乔治和丹尼尔·德·里昂.....	359
第十四章	英国社会主义的复兴——威廉·摩里斯.....	376
第十五章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社会主义	
	——结束语.....	422
附：主要人物表		

前 言

有几位书评家对本书第一卷的编排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内容的安排应该以思想或者思想总动态为中心，而不宜以某某思想家的态度和计划为中心。这些书评家大概会比较喜欢第二卷，因为本卷比较接近他们所属意的那种布局。但是，还不能说是他们说服了我，因为这第二卷在第一卷的书评出现以前就已经安排就绪，并已写出大部分。我认为，在讨论 1848 年以前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时，有必要围绕思想家本人和他们所鼓动起来的运动来叙述，因为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实际上并不存在看法一致的围绕一个核心的社会主义运动。只是到了 1848 年以后，而且主要是到了 1860 年以后，随着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随着本卷所述的协会内部各个对立派别之间的斗争的展开，这样的运动才出现。事实上，协会内部的斗争是社会主义——作为影响一切经济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国际力量——诞生前的阵痛。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斗争，实际上是许多对立倾向之间的一场混战，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居于关键地位；同时，德国的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之间的斗争（尽管争执的焦点完全不同），在法国的社会主义在巴黎公社起义中受挫以后，又使马克思主义者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新兴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形成过程中居于领导地位。有关这些事件和支配这些事件的思想的记载，有助于作出条理分明的叙述，而在处理 1848 年以前那些头绪纷纭的理论和运动时，研究社会主义的学者就远远做不到这一点。

当然，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主义运动在十九世纪 vi

六十年代的复兴过程中,第一次明确地成为工人阶级运动,支持这个运动的是由工厂、矿山、铁路以及其他较大行业中人数众多的产业雇佣劳动者所组成的强大无产阶级。理论家们不再在真空中创造理论了,也不再为基本上还没有组织起来的大批被压迫者创造理论了。他们不得不越来越多地考虑已获得巩固地位的工会以及某些政党的作用;这些政党在选民人数增加的推动下,倾向于参加议会活动,而不再从事组织群众暴动或革命密谋。他们也不得不更多地注意把大工业置于社会控制之下的问题,注意利用议会作为新的宣传工具或用来争取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内部进行改革的问题。这种“改革乎?革命乎?”的问题一直到后期才得到彻底解决;关于这个问题,主要将留待本书第三卷再作讨论。但是,在六十年代,这个问题已经在英国、美国和瑞士提了出来,虽然在法国、比利时或德国简直还没有出现,在意大利也几乎没有出现,而在西班牙则根本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以及五花八门的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和社联主义基本上仍然作为一种革命力量同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相抗争,后者包括从基督教社会运动一直到资产阶级领导的激进主义和“自由党劳工派运动”。但是耐人寻思的是,在第一国际中,马克思主义者已不再是极左翼了。

在撰写本卷时,我再一次受到语言的限制,我不懂俄文,德文所知极少,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几乎不懂。这就是说,我只好尽量依靠英法文资料(包括译文在内),特别是有关俄国和西班牙的资料大部分都是间接得来的。本书第三卷已经作出全面规划,并已写出部分草稿,第三卷所涉及的时期大致是从1889年第二国际诞生起一直到1917年俄国革命为止。我打算最后再写一卷来收尾,到那时可能再回过头来叙述1789年以前的社会主义先导思想。

vii 本卷多承各方帮助,深为感谢。艾塞亚·伯林先生再一次慷慨相助,特别是关于俄国的部分。H·N·布雷斯福特先生和莫里

斯·珀尔先生提出的批评和建议使我受益良多，他们两位都读了本卷的全部打字稿，并提出了极其宝贵的改进意见。约翰·普拉门纳兹先生读了本卷中的三章，即第六章到第八章，并提出有益的建议，盛情可感。关于比利时的一章，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的阿瑟·勒宁先生和吕特尔博士曾在著作引证方面惠予协助。承H·N·佩林先生厚意，惠借其当时尚未问世的大作《工党的起源》一书的清样。内弟雷蒙德·波斯特盖特和H·L·比尔斯先生，还有珀尔先生和詹姆斯·约尔先生，赐借藏书，特此再次志谢。还有我的秘书罗莎蒙德·布罗德利再一次卓越地完成了颇为艰巨的工作。

G·D·H·柯尔

1953年9月

第一章

导言：1848年以后的社会主义

就社会主义思想来说，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简直是死一般沉寂的时期。1848年欧洲各国的革命均告失败，欧洲大部分地区随之又重新建立起暴虐的警察政权，有一个时期几乎没有进行公开鼓动的可能，甚至也没有自由讨论社会主义思想的余地。凡是确有言论自由的地方，如英国、美国和瑞士的部分地区，都有法国、意大利、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流亡者在避难；正如在流亡者之间所习见的那样，他们内部意见分歧。他们大多数人都孤苦伶仃，潦倒不堪——至少大多数留在欧洲而又没有一技之长可以谋生的人是这样。有一个时期，他们中的许多人只肯承认革命只是暂时失败了，因而殷切地等待并进行策划，以期重新出现爆炸性的局面，使他们可以重返祖国，继续战斗。当这种情绪持续不衰的时候，他们是不气馁的，但是这也使他们动辄斥责他们中间那些怀疑革命即将来临的人。随着希望的日趋黯淡，越来越多的流亡者或则在可能的情况下暗自妥协，悄然回国，或则离开欧洲前往美国，在那里他们更有机会得到温饱，并可以作为新国家的公民定居下来，如果愿意，还可以主要在本国移民中为“事业”进行宣传。

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其他一些成员也都是在伦敦避难的流亡者。同盟在德国本土也曾短期秘密存在，至少在莱茵兰是这样，在革命时期这里是同盟的中心。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还能够通过汉堡的一个出版商出版了几期《新莱茵评论》，在这个刊物上他们开始对革命及其失败原因进行分析。他们已经明

显看出,希望革命运动迅速恢复是没有根据的。“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象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 1848 年的革命是经济萧条促成的,因而宁可等待下一次经济危机到来以后再发动新的革命起义。他们很快就愤怒地谴责同志中耐心较差的人,这些人已经在发表新的宣言,号召发动新的起义。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时并不知道需要等待多久,此后他们毕生一直在密切注视着经济方面的发展,渴望进一步出现毁灭性更大的资本主义矛盾。然而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及时地领悟到必须有一个等待时期,虽然连他们也没有立刻就认识到革命已经失败了。1850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在伦敦重新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草拟了一项宣言,宣言以这样的假定为出发点:新的革命高潮正在到来,并将汹涌向前,足以使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取得政权。宣言号召工人帮助“民主派”争取胜利,然后又告诉无产阶级要是获胜的小资产阶级在于己有利的时机遏止革命应当如何采取行动。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证说,面对这种企图,无产阶级的任务是“不间断地进行革命”^②,直到把一切有产阶级赶下台、政权归于无产者为止。他们说,这就需要“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

① 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8页。——译注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5页。——译注

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① 我们可以看到，这段话预示了 14 年后马克思着手建立国际工人协会时所抱的那些希望。

政治逆流和经济复苏共同起作用，把各主要国家革命运动的残余部分摧毁无遗，而革命的希望也就随之很快黯淡下来。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委员会里能够控制多数，但是在 1850 年 9 月，他们在同盟里却面对一个仍然号召再次发动革命并对大部分共产主义流亡者具有更大吸引力的少数派。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使用了 20 多年以后他在第一国际使用的同一战略，即利用他所掌握的微弱多数把共产主义者同盟总部从伦敦迁往科伦。留在伦敦的一伙又分裂为二，以奥古斯特·维利希（1810 年—1878 年）^② 和卡尔·沙佩尔（1813 年—1870 年）为首的分裂派成立了一个对立的组织。不久以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伦敦区部就成了一个无所作为的小组织，形同虚设。

在德国，共产主义者同盟面对着越来越严重的迫害，只能进行地下活动，不久全部活动都停止了。它的一个主要成员裁缝彼得·诺特荣克于 1851 年 5 月被捕，普鲁士政府根据从他身上搜出的文件逮捕了中央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他们未经审讯，在监狱里一直被关到 1852 年 10 月。在此期间，一些流亡巴黎的德国人也被法国警方逮捕，以参加法德两国人共同策划的叛乱阴谋罪被判处徒刑，这一罪名看来基本上是法国警方捏造的。巴黎的这个团体同
4 科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并没有联系，普鲁士警察当局企图证明它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85 页。——译注

^② 维利希原是普鲁士炮兵军官，曾参加 1848 年的德国革命斗争，1849 年逃到伦敦。他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积极成员。1853 年，在他的再次起义的计划失败后前往美国。他在美国参加了南北战争，为北方作战，后来当了将军。

们之间有联系的伎俩并未得逞。马克思曾亲自进行部署，揭发警察当局为陷害科伦共产党人而捏造证据的罪行，但是这一揭发并没有能够使他们得救。审讯几经拖延以后终于举行。虽然当局不得不承认文件是捏造的，而大多数被告还是被判处了长期徒刑。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了；背叛同盟的反对派也消声匿迹了。维利希移居美国；沙佩尔重新加入了伦敦那个仍然接受马克思领导的小组。

马克思用德文写了《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这本篇幅不长的书，揭发警察当局的伎俩。这本书在瑞士付印，打算秘密运往德国，另一个版本差不多同时在美国问世。但是瑞士版在德国被警察查获，因而进入德国的为数很少。即使马克思的这本暴露性著作流传得更加广泛，那也无补于实际，因为反动派的地位十分稳固，即使是最有说服力的揭发也无法动摇它的权力。早在1851年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把坏事当作好事，彼此庆幸自己的孤立，因为这样就完全不需要修改自己的理论去迁就他们原先被迫一道采取行动的那些人的不成熟见解或理想主义缺陷了，同时还可以充分掌握时间和资料去制定更加完整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早已希望尽快出版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可是其中的第一部分（《政治经济学批判》）事实上直到1859年才问世。他们的重大障碍是马克思生活非常贫困。正是为了能够帮助自己的朋友，恩格斯才勉强回到曼彻斯特，重新到自己家庭企业所属的英国公司中任职。由于他们分居两地，后人才得以继承两人之间来往的大量信札；他们持续不断地通信，直到恩格斯将近20年后回到伦敦居住时为止。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英国在工业发展方面稳执牛耳。举凡大规模生产、工厂制度以及运输工具都远远超过其他国家所达到的阶段。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并有大量资本和作为资本的商品——

特别是铁路设备——输往海外进行投资。棉纺织业在输出价值方面仍稳居第一位——约为同钢铁业争夺亚军的毛纺织业输出价值的3倍。但是钢铁和其他金属品——机械、金属器具、工具等等——的输出量也正在迅速增长。在进口方面，食品特别是谷物的输入增长迅速，而肉类、黄油、干酪和果品等也有增无已。轮船的数目和吨位大幅度地增加，而帆船的数目和吨位并没有减少。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固然发生过经济衰退，其中包括1857年（即上次危机发生后的10年）的金融危机，然而总的趋势却是在蓬勃发展，而且1857年的危机就其社会影响来说，比1847年触发欧洲革命的那次危机的危害性要小得多。1857年的危机也是国际性的，发端于美国，但是没有10年前那场危机所具有的那种政治影响。不论在法国还是德国，上层资产阶级都已经不再是潜在的革命力量了；当然，英国的上层资产阶级在1832年就已经不扮演这种角色。并没有迹象表明小资产阶级会采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所希望的那种主动行动。工人基本上没有组织起来，而且从任何角度来看，力量都太薄弱，难以单独采取行动。在英国，熟练工人忙于组织工会，而在五十年代后期也确实开始了那场导致他们在1867年取得选举权的议会改革运动；约翰·布莱特所领导的中产阶级激进派也开始活跃起来。

本书第一卷已经谈过，甚至在1848年以前，宪章运动就已经开始消逝，尽管厄内斯特·琼斯曾力图挽回颓势，但在整个五十年代它一直在日趋末落。在这10年终了的时候，作为一个运动它已经不复存在了，代之而起的是以熟练工人的新兴工会为骨干的比較温和的新改革运动。为成年男子选举权而再次触发的骚动直到六十年代才真正活跃起来或蔓延各地。在五十年代，虽然工会迅速发展，但是工会领袖全神贯注的仍然是巩固他们在某些行业中的地位，而不是在更加广泛的领域采取一致行动。1851年成立的

机器工人联合会由于 1852 年普遍出现闭厂拒工的情况而几乎解体，需要时间来恢复元气。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壮大起来的全国矿工工会经过 10 年不断的斗争已经精疲力尽，矿工们一直到六十年代才发动一个新的全国性运动。棉纺业工人部分由于出口兴旺，获益不浅，在各区相继争取到集体谈判权，并根据 1847 年的十小时工作日法确立了熟练工人的地位。棉纺工人也许是各主要行业技术工人中组织力最强的工人，他们同熟练的机械工人一起成为大工业中的贵族。最后，到五十年代终了的时候，伦敦工联理事会成立了，这是承认有必要在更大的范围内采取行动的第一个迹象；其成员有若干主要工会的主要工作人员。理事会主要是从 1859 年帮助伦敦建筑工人进行斗争的临时机构脱胎而来的，它的主要目的是在劳资纠纷中互相支援。但是理事会从一开始就具有更广泛的职能，部分地起了中央机构的作用，始终为工人阶级的要求和疾苦而工作，直到六十年代建立起全国改革联盟和职工大会为止。这两个机构是出于加强同北部和中部工业中心的联系的需要而成立的。

新工会运动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机械工人和其他工人中得到迅速发展，在六十年代又大大扩展了活动范围。当时它主要是熟练工人的运动，这类工人终于开始从英国的高额生产率中得到一些好处。然而他们争得的利益是没有保障的，似乎取决于他们能不能防止资方招收太多的新工人进入他们所从事的行业，或防止资方找出办法取代他们的技术。因此，技术工人工会往往采取限制性的方针，设法严格控制学徒制或变相学徒制，并且拒绝接纳非熟练工人参加工会。这并不是说他们不准备在政治方面为整个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因为到了投票的时候，它们显然需要非熟练工人的帮助。但是就工业而言，这也确实意味着他们往往并不同情基础广泛的组织，因为他们害怕被淹没在不掌握技术的群众之中。发

展中的合作运动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在合作运动中，消费合作社很快超过了所有其他类型的合作社。如果认为罗契台尔先驱者合作社或者是 1844 年以后按照“罗契台尔的方式”成立的许多社团在工人阶级工资最低的工人中间有大批追随者，那是错误的。这类合作社主要吸引的是经济比较富裕和节俭的人，这些人可以用现钱买东西，并把每周收入的小量节余储蓄起来。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消费合作社之所以迅速发展，正是因为工厂工人、矿工和其他熟练工人阶层中，收入比较正常的人数大增，他们除了用现款购物外，还可以进行小额投资，同时也是因为消费合作社为来源方便的节余提供了出路，为工人阶级中克勤克俭的工人提供了最可靠的保障。这就难怪第一国际的社会主义者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讨论应该如何对待日益发展的合作运动时，曾有很多人表示疑虑说，消费合作社正在帮助培养脱离无产阶级主体的工人贵族，它们支付股息和买货分红的做法是在把资本主义的生财之道教给这批贵族，使之成为“劳动力”剥削制的保卫者。

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虽曾竭尽全力，设法通过工业和勤俭会社法案使各种类型的合作社取得牢靠的法律基础，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同样心怀疑虑，因而把他们的热忱主要倾注在生产合作社上，⁸ 他们打算在基督教事业的基础上创办这种生产合作社。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组织劳动协作社的试验大多数已告结束，生产合作社从此衰落了，直到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的大兴旺时期才恢复过来。另一方面，消费合作社则大有发展，但它们同创立罗契台尔先驱者合作社的欧文派社会主义的一切联系却完全中断了。参加消费合作社的新社员越来越多，特别是在北部和中部，主要原因是能够获得直接利益：货真价实、买货分红、为小额储蓄提供了有合理保障的投资机会，而不是出于任何理想主义的动机，也不是因为他们在合作社中看到新社会制度的

任何端倪。理想主义者如爱德华·范西塔特·尼尔、乔治·雅各布·霍利约克和威廉·库柏以及其他许多人仍然很活跃，但是在运动的实际工作中，他们的意见却被讲求节俭而日益支配董事会和季度会议等决策机构的新人物淹没了。

因此，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国看来已经坚决背弃社会主义和革命，并决心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了。与此同时，大陆上的人们越来越把合作运动说成是一种手段，可以使工人——不如说其中的勤俭者——摆脱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想法，并能赢得机会改善经济地位和扩大自由，而不致威胁或者损害已经确立的社会秩序。在法国和德国，特别是在德国，关心社会问题的保守分子和重视社会问题的“开明”进步分子中间都有提倡合作运动的人：保守分子希望旧秩序和头脑清醒的工人结成联盟以抵制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鼓吹合作运动的开明人物则相信，出现不难驾驭的工人阶级企业家队伍会加强“自由企业”的力量，工人中的合作运动者在争取建立立宪责任制政府的斗争中能够成为资产阶级的同盟者。在德国，维克多·艾梅·胡布尔(1800年—1869年)代表保守派；海尔曼·舒尔采-德里奇(1808年—1883年)代表提倡合作运动的“开明派”，鼓吹这是一种旨在改善工人阶级状况而不危及社会安宁的自愿运动；而美因兹地区主教、基督教社会党人威廉·伊曼纽尔·冯·凯特勒(1811年—1877年)则尽其全力争取天主教会站在合作运动这一边起阶级调和的作用。在消费合作运动的力量很薄弱的法国，拿破仑第三政府对于赞助生产合作社很不热心，要求它们脱离工会和革命组织，作为国家生产机构，在同其他商业企业竞争中承包数目有限的合同，为国家服务。

总之，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英国和欧洲大陆上的合作运动在各种影响之下，都同社会主义中断了联系，而且还有人在某种范围内进行怂恿，企图利用合作运动把工人阶级活动引入非革命性和

非政治性的轨道。在大多数大陆国家，工会运动由于政治失败而陷于分裂；设法保留下来的地方性行业工会也发生根本变化，仅仅从事互助会社的工作，或者是通过到处流浪寻求就业机会的工匠维持松弛的联系。只有在英国，工会运动才得到稳步发展；不过这种发展也只限于熟练工人而已，而且到了六十年代工会运动的生存权利也受到进一步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便嘎然而停了。1848年，乌托邦设计师的伟大时代无疑已经结束，虽然在美国仍有遗风流韵；在那里，傅立叶主义仍然是一支活跃的力量，卡贝以及傅立叶的弟子孔西得朗都在设法证明乌托邦社会是切实可行的。美国当时仍然处在一个有可能创建这种公社的阶段，它的疆界不断扩大，在已开发地区之间的空隙地带仍然纷纷出现新移民区。而在旧世界，创建公社实际上已经行不通了，只有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俄国、西班牙和葡萄牙除外。在这些国家，傅立叶主义多少还有立足的余地。但是，就是在这些国家也象在西欧一样，1848年以后的政治条件对于乌托邦实验也非常不利，除非有地主竟然愿意完全按照家长制来经营他的地产。在西欧，1848年以后就不大可能再从事这种实验了。最大的尝试也只是一种分红制，这方面的先驱者是埃德梅·让·勒克莱(1801年—1872年)，他是巴黎一个白手起家的油漆匠，早在1842年就已开始同手下比较熟练的工人分红了。勒克莱的实验直到1850年他出版了小册子《贫困与摆脱贫困的方法》，才为世人所知。法国警察给了勒克莱不少麻烦：他希望同自己的雇工签订一纸约束自己的明确的分红合同，但是没有获准，因为法律禁止老板同工人签订合同。于是，勒克莱便不得不越出法律的范围办事，而且坚持了下来，并逐步把分红制推广到手下的全部雇工，同时又保持了以技术和劳绩为基础的差别工资制。继勒克莱之后，让·巴普提斯特·安德烈·戈丁(1817年—1888年)

也采用了同样的做法，他也是一个艰苦创业而有所成的人，后来成了傅立叶的追随者。戈丁曾给维克多·孔西得朗 10 万法郎，帮助他在美国建立傅立叶主义移民区；他又着手把自己在古兹制造火炉、炉栅和其他金属器具的工厂变成一个家长制的公社，以合作的方式来满足公社的需要。在他的主持下，住宅、娱乐场所和公共服务事业、商店管理和其他活动都组织起来，并逐步改变成合作形式。这一试验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仍然处于草创阶段；著名的古兹法米利斯泰尔（Famillière of Guise，古兹家庭协作社）1859 年才具备正式的组织，到七十年代才成为一个完全的合作事业，直到 1880 年才最后定型，股金成为工人的财产。但是在五十年代，勒克莱和戈丁的事业已经出了名，并且赢得了支持。在法国，沙尔·罗伯是在理论上提倡分红制的主要人物；在德国，传播这种理论的是维克多·波美尔特（1829 年—1918 年），六十年代他在苏黎世担任教授，后来回到德国，继续宣传分红制。耶拿¹¹地方著名的蔡司工厂实行劳资合伙制是后来的事，而且一直到 1896 年才完全采用这种经营方式。但是负责进行这种引人注目的试验的老板厄内斯特·阿伯（1840 年—1905 年）却是按照戈丁的传统起步的。

分红制和完全的劳资合伙制当然是两回事，因为劳资合伙制无论如何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把所有权交给工人，而分红制则不然。五十年代的实际发展很少有越出分红制范围的，而且上面谈过，即使是这样，在法律上还是遇到了麻烦。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这两个运动才扩展到英国，当时它们一同出现在英国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和旧欧文派力图挽回颓势的活动中，与工会恢复合作生产的运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分红制和劳资合伙制在七十年代初期发展得很普遍，只是几年以后就被经济大萧条扼杀了。^①

^① 关于这个运动的情况，参看拙著《合作运动一百年》。

上面所说的就是 1848 年欧洲各国革命运动结束后的形势；比较先进的国家都在反动的政治统治下（欧洲大陆国家的工人阶级组织则更是在严酷的镇压下），平静下来，进入一个经济发展非常迅速的时代。在 1848 年革命运动以后，曾出现一段空白，直到六十年代，革命势力才再次抬头，建立了第一国际；填补这段空白的是大量的社会主义和接近社会主义理论的探讨思索，德国的情况尤其是这样。而且也主要是在德国，还兴起了一种新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一度似乎有可能按照开明的天主教方针发展，但是正如我们将要谈到的，后来却基本上变成了一种反动力量。在法国，工人阶级运动经过一个消沉时期以后，主要在蒲鲁东的影响下又复兴起来。蒲鲁东死于 1865 年，留下了《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一书，这是一笔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影响的遗产。马克思在 1847 年用《哲学的贫困》来回答《贫困的哲学》，自以为已经清算了蒲鲁东的谬误。但是，蒲鲁东决不是就此被一笔勾销。五十年代，蒲鲁东的互助论远比任何其它形式的社会主义理论更能适应第二帝国的限制重重的环境。法国的工人阶级以各行各业的互助会社为主要基础重新掀起的运动主要就是在蒲鲁东的影响下壮大起来的。下面将要谈到，参与组织第一国际的法国工人代表主要是蒲鲁东主义者以及反对政治和经济力量社会化和集中化的人物。关于这一点我们要留待以后讨论；总之在五十年代，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虽然已经活跃起来，但毕竟是处于开始形成的阶段^①。

从上面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是停滞不前的；马克思被剥夺了一切行动机会，只好在英国博物馆里消磨岁月，为日后发表的伟大著作积累资料，这部巨著后来为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使之成为一种科学的理论。《共产党宣言》是一个行动的号召，而不是一篇有系统的论文。如果说《宣

^① 关于蒲鲁东，请参看本书第一卷第十九章。

言》既号召战斗，也阐述了一种理论，那么，它并没有使这种理论得到证明，也留下了许多令人费解之处。在采取实际行动的革命时期，它对事态的发展几乎了无影响；随着革命的日趋消沉，它似乎也被完全忘怀。今天回顾往事，我们很容易认为，自 1848 年以来，《宣言》曾为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新的基础和新的理论。但是明显的事实却是，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外，不论是在 1848 年，还是在此后很长时期，谁也没有这样来看待它。即使在第一国际时代，也没有人把《宣言》奉为经典。直到 1872 年第一国际已经陷于崩溃的时候，《宣言》的德文版才再次付印；直到社会民主党的兴起使《宣言》几乎在世界各地都有了读者的时候，《宣言》才成为一本畅销书。

如果说空想社会主义已经在 1848 年欧洲的燎原大火中化为灰烬的话，那也就可以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并没有立刻取而代之。因为不管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实际上存在着什么新的社会主义思想，就其绝大部分来说，都出人意外，没有受到马克思的影响。产生五十年代社会主义思想的源泉，就象《宣言》斥之为陈腐的空想社会主义一样，也完全是伦理性的。可以公允地说，当时就没有一位观察家猜想到——或能够猜想到——一个世纪以后欧洲革命起 13
义中最有生命力和常被援引的文献，竟会是大多数人——甚至大多数革命者——连听都没有听说过的一个默默无闻的德国小宗派发表的那本小册子。

第二章

14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德国 社会主义——洛贝尔图斯和马洛

1848年革命运动失败以后，德国有一段时间不再可能掀起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运动。1848年积极从事活动的领袖不是流亡国外，就是身系囹圄，而马克思本人则已经同那些认为应该立即再次进行革命尝试的人分道扬镳。1848年的运动就这样无声无息了；正是因为实际参加运动的人从来就不是很多的，这就使运动更加易于遭到失败。德国的哲学家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并不乏人，但是他们简直就找不到任何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运动可以与之建立联系，即使他们有此心愿的话。当时的运动主要是由那些属于小手工业者会社的工匠发起的，而这种会社的大多数，就其性质而言，与其说是工会还远不如说是互助会。

因此，当那场自始至终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运动归于失败的时候，德国的社会主义思潮便相当轻易地回到哲学冥想的老路上去了。本书第一卷已经谈过，这是1848年以前的普遍情况，而且往往发展到这样的地步：甚至连那些受到社会主义理想熏陶的人士也拒不参与目的仅仅在于社会改良而不在于全面变革的实际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所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其他著作中曾抨击了这种倾向，并力促社会主义知识分子行动起来，认为行动是创造性思想不可分割的部分。但是除了共产主义者同盟那个小圈子以外，他们并没有取得多大成就，而且即使在这个小圈子里，他们在革命失败以后也发现，以《共产党宣言》的学说教育盟

员的效果并不理想。

因此,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德国简直就没有社会主义运动可¹⁵言。但是德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分子(从社会主义者一词的任何通常意义说来,他们都不是道地的社会主义者)却充分认识到,德国存在着一个有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并且感到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从圣西门和傅立叶到路易·勃朗和蒲鲁东——更不必提拉梅耐——至少已经找到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方略。他们读过罗仑兹·冯·施泰因的《法国社会运动史》,这本书最初在1843年以另一书名出版,1850—1851年增订再版。他们中的一些人还读过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以及在四十年代各种《年鉴》上发表的许多论战文章。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德国资产阶级力量的日益壮大深感不满,对工业主义影响德国生活方式的后果疑虑重重。他们认为,工厂制度的兴起使得妇孺离家就业,破坏了家庭生活的基础;而且看到,由于新兴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不稳定性,大型采矿业和制造业的发展正在造成工匠的贫困,破坏安定的经济局面。诚然,在五十年代,这些情况在德国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但是已经可以看出日趋严重的后果。

当然,并不是德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对这种趋势感到不安。事实上,德国有一批人把自由放任主义学说引伸到了极端的地步,比“曼彻斯特学派”的鼓吹者走得更远,坚决反对国家对“经济法则”的自然作用进行任何干预。这一派人在普鲁士和德国大多数小邦中都得到了“进步”团体的有力支持;但是他们也遭到了知识界的强烈抵制,特别是在普鲁士。不仅仅是在维护专制制度和宗法地主制度的保守派中间,而且在“青年”和“老年”黑格尔派中间,在那些与其说是信奉黑格尔不如说是信奉费希特的人中间;对国家的信念和对国家所负的统一使命的信念都是根深蒂固的。不论是黑格尔的还是费希特的国家观,或者是同这两种观点中的¹⁶

任何一种稍稍沾边的看法，也都象封建君主主义一样，同如下理论无法相容：国民经济生活应该听之任之，让它受同国家法律毫不相干的经济法则去支配。这种概念认为，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是彼此分立的，是在本质上不同的原则支配之下起作用的。这种想法不仅同德国的哲学和法学思想的一般发展趋向背道而驰，而且也同根深蒂固的民族统一的愿望相抵触，人们认为，民族的统一既需要政治统一，也需要社会统一。

此外，早在俾斯麦同罗马天主教会发生激烈斗争以前，天主教会的社会倾向就同曼彻斯特学派的学说针锋相对，天主教会反对曼彻斯特学派的激烈程度并不亚于“国家集权经济统制论者”，不过对后者的观点，天主教会也同样持反对态度。德国的天主教人士担心，国家的权力正在日益加强，特别是在新教势力强大的地区，但是他们也看到，只要在宗教和社会问题上把人民中的大批拥护者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之下，就能同国家分庭抗礼。他们认为，如果支持工人们日益上升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提出的某些要求，就可以利用“社会问题”树立自己的势力。我们以后会谈到，这种争取普遍支持的做法，是怎样在一时被称为“基督教社会主义”的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不过从社会主义一词的任何现代意义来看，这个运动都丝毫没有社会主义的成分，而且很快就同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形成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发生激烈冲突。在讨论“基督教社会主义”（不论是冯·凯特勒主教及其追随者莫方所创的天主教社会主义，还是托特牧师和斯托克牧师所搞的新教赝品）以前，我们必须较详细地考虑洛贝尔图斯和马洛主要在五十年代作过系统论述的“国家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为所谓的“讲坛社会主义”（或称“教坛社会主义”）运动铺平了道路，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讲坛社会主义运动在知识界有广泛的影响。

我们在第一卷中已经谈到，费希特在十九世纪初曾创立一种

社会学说,主张国家积极参与经济生活的组织工作,这是他主张按¹⁷职能把社会组织成一个统一的体系的总理论的一部分。实际上,费希特的学说原先是以社会中的个人权利为中心的,并没有涉及黑格尔所宣扬的极权主义国家的概念。但是在后期的著作中,他几乎象黑格尔一样,把国家提到了最高实体的地位,同个人相区别,认为离开了国家,个人的生命就毫无意义。黑格尔还把国家和“市民社会”明确地区分开来,认为国家的使命就是统一这个社会,使之具有更高的实在性。这样,黑格尔的理论便留下了余地,让那些基于功利主义因素的实际做法在“市民社会”中起作用,这些实际做法只服从于国家,国家有权强迫其符合国家本身至高无上的权益。当黑格尔从“市民社会”出发论述经济问题时,他用了许多使人联想起古典经济学家的用语;因此,在这个水平上,黑格尔的信徒也就可能同时是李嘉图的崇拜者,只是要永远服从如下论断:“经济法则”对于以国家为代表的“整体”的需要是起不了作用的。因此,黑格尔和费希特的理论同经济个人主义是互相矛盾的,同为自由放任主义起而反对专制国家的资产阶级进步分子的“自由主义”也是互不相容的。

实际上,“国家集权经济统制主义”是德国——尤其是普鲁士——知识阶层大部分人的基本哲学的一部分;这就为接受下面两种建议敞开了大门:其一是国家应该作为阶级关系的调节者而干预经济事务;其二是国家应该作为经济发展的计划者,甚至作为生产资料实际公有制计划的制定者而过问经济事务。关于为民造福(这种福利是同整个社会的福利一致的)而治民的宗法制国家的观念是广得民心的;这种观念具有这样的含意:国家有权根据整个社会的利益来决定私人所掌握的一切财产的用途。当时认为这种追求社会利益的主张同维护和加强专制统治的做法是完全一致的,其中丝毫不存在公民有权通过民主投票来确定什么是大众利

18 益的信念。这个问题由国家来解决,解决的方式是由统治者同忠心耿耿的臣民进行磋商;国家的权力极广,足以对付任何可能破坏其传统准则的因素,保障整个社会的团结一致。当时普遍认为,资产阶级企业的发展以及常常随之而来的个人主义—自由放任主义观念的滋长就包含着这种破坏传统准则的危险。于是人们认为,国家为防止这种危险而享有进行干预和控制的一切权力是完全合法的。威胁来自两个方面:掌握新的银行业务和大规模生产技术的资产阶级日益发展的金融势力;上升的资产阶级强加于工人的就业条件所引起的反抗。因此,人们认为如下两点是正确的:一方面,国家有权节制资本主义企业,抵制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提出的建立责任制政府的要求;另一方面,国家也有权尽可能规定工矿企业的就业条件,并给予各行业就业者某种虽属低微但有保障的地位,以保护工人阶级不受资产阶级的剥削,这样就能把各行业同旧秩序连系起来,使它们站在专制政体一边以对抗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的经济暴政。正是本着这种精神,俾斯麦才首先在北德意志联邦,后来又在德意志国会实行成年男子选举权,以对付资产阶级进步分子提出的同时实行有限选举权和建立责任制政府的要求;也正是本着这种精神,俾斯麦兜售这样的主张:由国家帮助工人的生产协作组织,以防止工人运动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攻击专制政治和旧贵族制度。于是,一个叫作“封建的”或者“保守的”社会主义的奇特流派便产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8年就在《共产党宣言》中特别抨击了这个流派。

同这种“封建的”社会主义同时并存的还有另一种思潮,它既
19 批判工业和金融资本主义,同时也批判地主制度,而“封建的”社会主义则只反对资本家,而拥护地主,因为在那个应该加以维护以防止资产阶级攻击的传统制度中,地主贵族及其特权被目为必不可少的部分。上述思潮来自立宪民族主义运动,或者说同这一运动

有密切的关系，但其倡导者同敌对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学派发生了冲突，因为他们否定上升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上述思潮的代表人物象“封建社会主义者”一样，反对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甚至更加强调工业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地位和经济状况的恶劣影响。但是他们也看到了地主制度的恶劣影响，而且相信随着商业主义的发展，农民和产业工人苦于银行家的巧取豪夺和“自由”市场经济的越来越不稳定，这种恶劣影响将日益严重。这些“国家集权经济统制主义派开明人士”认为国家是负责全体人民的安全和福利的权威机构，指责敌对的自由放任主义者，并且要求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必须使生活条件得到保障和趋于稳定。这个流派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建议由人民用民主方式来控制国家，但是他们的确认为，国家如果不能控制社会的生产力，就无法履行它对人民的职责；他们中的某些人甚至断言，只有使国家成为必要的生产资料的实际主人，而不是外来的调节者，才能作到这一点。一般说来，他们的建议并没有涉及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基础的任何革命性变革。实际上，他们大部分人都坚持说，不要急于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他们所提出的，与其说是立即供采用的计划，倒不如说是对他们那个时代的社会实际情况的批判以及有关社会组织为适应不断变化的生产状况所必须经历的长期变革的理论，前提是只有逐渐扭转社会态度，才能实现必要的变革而不致引起灾祸。比如洛贝尔图斯就认为需要好几个世纪——他在常被引用的一段话里说：需要“五百年”——来实现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他认定为使社会安排符合 20 现代条件，这种经济结构的变革是必需的。他简直就没有考虑到，这几个世纪的工艺发展和经济发展会使他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在付诸实施以前早就过了时。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那些以上述思想为基础鼓吹某种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中，最重要的是洛贝尔图斯和那位用卡尔·马

洛的笔名写文章的心地善良的教授;而在这两人中,洛贝尔图斯则又重要得多,因为他在世时的影响就已经相当大了,而马洛原是默默无闻的,直到1870年奥地利人沙弗尔把他的学说重新介绍出来才为世人所知。

卡尔·约翰·洛贝尔图斯(1805年—1875年)是一位法学教授的儿子,他本人曾在戈丁根大学和柏林大学攻法律;有时候他又叫作洛贝尔图斯—贾奇佐,这个名字来自1835年他在波莫瑞的贾奇佐地方购置的地产。在修完法律后,他又到海德耳堡研究哲学。然后他遍游荷兰、法国和瑞士,接着便回到新买的田庄上定居下来。1837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著作,这是一本很厚的小册子,名叫《工人阶级的要求》。在这本小册子中,他条理分明地勾画出有感于国外所见所闻而得出的许多主导思想。在贾奇佐,他从事科学种田,并开始搞政治活动,支持以君主立宪为基础的统一德国的事业。1842年,他发表了第二本著作《论关于我国国民经济状况的说明》。1847年,他担任州议会议员,翌年他在争取立宪政府的全国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并曾短期出任普鲁士公众信仰和教育部部长,但不久就由于跟同事意见不合而辞职。在立宪运动崩溃后,他就退隐家园,以著述和务农终其天年。他的著作除了系统地阐述他的经济理论以外,还包括关于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社会
21 经济基础的研究,以及拟定一种社会发展综合理论的尝试。此外,他还同一些同时代人士有频繁的书信往还,从中可以找到他的许多富有意义的思想。同他通信最频繁的人士中有斐迪南·拉萨尔。

洛贝尔图斯在1850年和1851年发表了致友人冯·克尔希曼的《社交信札》,这批信札,再加上另一封于他死后才发表的致同一人士论《资本论》的信,最清楚最全面地表达了他的思想。这些信件分别在1875年和1885年以《社会问题的曙光》的书名分两卷再

版。这些信件写作时间十分重要，这主要是因为关于他对卡尔·马克思的学说是否产生重大影响这一问题争论很多。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反复断言，马克思的思想有很大一部分是从洛贝尔图斯那里剽窃来的。这种说法遭到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有力驳斥。看来，提出这种说法的人似乎首先是那些对于这两个人早期所共同依据的资料来源很少了解的著述家。有某种理由相信，马克思在发展自己的主要思想方面虽然丝毫没有得益于洛贝尔图斯，但是在他后期的著作中，特别是在涉及“生产过剩”和商业危机的问题上，其主要思想的形成是受到洛贝尔图斯的影响的。可以完全肯定的是，洛贝尔图斯对拉萨尔影响很大，对拉萨尔提出“铁的工资规律”尤其如此；可以同样肯定的是，马克思同拉萨尔派在这个问题上最尖锐的分歧恰恰就发生在拉萨尔追随洛贝尔图斯而反对马克思的那些论点上，在与此紧密相关的工会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资发生影响的力量这一问题上，情况也是这样。

洛贝尔图斯的经济理论是从这样的观点出发的：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和真正的衡量标准。但是，他提出这种理论的方式不同于马克思，而是按照威廉·汤普森和约翰·弗朗西斯·布雷之类的早期著述家所主张的、又为蒲鲁东所附和的方式。这就是说，他宣称：为了公平合理，每个人取自社会的应该同他对具有价值的产品的共同储存所作的贡献完全相等；而马克思则论证说，在现代的经济条件下，个人一般是没有可以确定的产品的，只能以整个劳 22
动阶级的名义，而不是劳动者个人的名义，对“总产品”提出要求，而且还必须为资本积累、公共服务以及无力为生的人从中扣除必要的费用。洛贝尔图斯在制订自己的劳动学说时，建议以社会所需的劳动时间为基础发行的劳动券来代替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当然，罗伯特·欧文在他的《致拉纳克郡报告》（1820年）中早就提出过这种主张，而且后来得到了许多著述家的响应。事实上，洛贝尔

图斯曾对这个建议作过比任何前辈都更深刻的发挥，但是他最充分地发挥这一主张的著作《标准劳动日》直到 1871 年才公之于世。大致说来，他的建议是人为地规定一个标准劳动日，这种劳动日所包括的实际工时数目不同，工时的多寡按不同行业的劳动强度而定；这样一来，一个矿工的标准劳动日的工时就会比一个纺织工人少。他建议根据一个普通或正常工人在每个正常劳动日所能生产的产品数量，计算出这段时间的标准产量。付给工人的工资应根据实际产量和标准产量这两个因素来计算，个人的报酬则按其产量或高于或低于标准付给。标准工资应由法律予以固定，原则是必须确保工人从日益提高的生产率中得到好处。洛贝尔图斯认为，在现行制度下，这种好处都为资产阶级所占有。洛贝尔图斯还坚决主张修改法律，使劳动者有更大的就业保障。他论证说，在现存的条件下，工资已经降低到仅够维持生存的水平，提高生产率的好处工人并没有得到，而且随着产量的增加，工人在全部产品中所占的份额还有不断下降的趋向。他认为工人的购买力因此而受到的限制是商业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他看来，商业危机是由于把生产过剩的商品送往有限的消费场所造成的。因此，他指望他的调

23 节工资的计划可以使得工人从日益发展的生产力中得到好处，从而结束危机，结束为非生产者的利益而剥削劳动力的现象。他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主张国家向农业生产者发放信贷，以解除他们受地主和高利贷者剥削的压力，使他们能够得到他们劳动的全部产品。

这些都是洛贝尔图斯提出的能够分阶段实行而不致引起任何革命动乱的改革建议。此外，从长期着眼——从非常长远的将来着眼，他还指望实行更加广泛的改革，其中包括把进行生产的土地和资本工具变为公有，只把用来购买消费品和劳务的“劳动时间”的收入留归私人。正是在这一点上，洛贝尔图斯的经济理论同他

的历史发展观联系起来。按照他的看法，人类历史分为三大阶段，每一阶段又可以分为若干小阶段。在第一阶段，不仅是财货，就连人也是私有的，他称这个阶段为“野蛮的古代”。第二个阶段，即“基督教日耳曼”时代，保持着土地和资本的私有制，但是舍弃了人占有人的制度。这是一个当代社会仍然在通过、而且还需要一个时期才能走完的阶段。继之而来的会是“基督教社会”阶段，在这个阶段，土地和资本将归集体所有，唯一的私有形式将是劳动力的私有。在这个阶段，唯有劳动才有权分享一份产品，每个劳动者都将按照自己的生产劳务分得一份。

正是这样，洛贝尔图斯展望将来会有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他决不愿进行任何尝试，通过鼓动工人举行暴动的做法以加速那个社会的到来。我们已经谈过，他相信人类需要好几百年时间才能为那样一个社会的顺利运行作好准备，目前只能由国家采取调节措施来改善工人的地位，从而逐步走向那个社会。由于洛贝尔图斯认为国家没有进行干预，工资被无情地压低到仅够维持生存的水平，而工会又无力制止这种剥削，于是他便把法律看作是唯 24
一可以利用的解救办法，因为法律可以强迫雇主阶级把生产率日益提高的利益交给雇工。他还认为，由于“铁的工资规律”在无情地起作用，合作社并没有多大办法来改善工人的状况，不论这些合作社是象舒尔采—德里奇所主张的在自愿的基础上创办起来的，还是象拉萨尔所要求的得到国家信贷的帮助。他认为，不管是哪种安排，资本主义工业的竞争都将继续使工人的工资保持在仅够糊口的水平上。只有国家采取固定工资和限制利润的措施才能取得实际效果。

此外，洛贝尔图斯所设想的把这种利益给予工人的国家是君主政体的国家，由君主继续控制行政权。他赞成发展一种同君主政体相辅而行的代议制，并且希望君主政体同人民站在一边来反

对寡头政治。但是他不相信人民本身已经作好掌握自己命运的准备。因此他的著作符合俾斯麦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而不符合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政策。他拒绝参加拉萨尔的德国工人协会。他在 1863 年写给协会一封《公开信》，一方面陈述了他的反对意见，同时又表示了他的同情。他同拉萨尔一样，不相信成年男子选举权能够打开实现社会主义的大门，甚至连加速向社会主义推进都办不到。在 1848 年的幻想破灭以后，他对政治运动已不抱什么信心；他成了一个超然物外的观察家，引颈展望将来，并力图说服有识之士认识世界大势之所趋，竭尽所能，在不过分扰乱现存秩序的条件下，朝着一个比较公正的社会制度前进。他不愿同煽动或阶级斗争有任何干系。他指望用理智而不是暴力使人们接受他的思想。这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恩格斯如此严词驳斥人们所说的他本人和马克思曾经受洛贝尔图斯的影响；这也构成了双方观点的本质区别。把阶级当作历史的推动力的观念是同洛贝尔图斯的思想格格不入的，而这种观念早在《共产党宣言》写就以前就已经是马克思学说的中心内容了。

- 25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德国另一个同任何工人阶级运动都毫无联系的社会主义理论主要代表人物是科学家和技师卡尔·格奥尔格·温克尔布莱希(1810 年—1865 年)，他用卡尔·马洛的笔名写作。马洛是卡塞尔高级商业学校的化学教授，生平只写过一部书，而且没有写完就去世了。在 1850—1859 年间，他实际发表了三卷书，总名称为《关于劳动组织的探究，或世界经济制度》。这三卷书包含了他的全部理论，但是并没有提出实现他的建议的详细步骤。这部书传阅并不广，而且在奥地利经济学家阿尔伯特·沙弗尔在其 1870 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书中加以赞许以前，马洛的著作似乎已经被人遗忘了。此后，在社会主义史著作中都简要地提到马洛的观点，比如埃米尔·德·拉夫勒伊和约翰·雷在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就曾提到过。但是马洛既没创立任何学派,也没有产生洛贝尔图斯那么大的影响。他从事著述纯粹出于博爱主义精神,他在挪威偶然同一个德国工人谈起了工人阶级生活贫困和没有保障的情况,这使他决心亲自研究一下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他的结论似乎完全是独自得出的,很少受到当代思想家的影响。他对工业和上升的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后果进行了考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个“无产阶级化”的过程正在迅速发生作用,小企业主受到大资本家的排挤;在工业制度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工资被压低到仅够维持生存的水平,工人日益遭受周期性失业的威胁。他还着重指出,在工厂中干活和在拥挤不堪的肮脏住房中生活对健康发生了恶劣影响,在日益膨胀的工业城市中酗酒和不道德行为有增无已,妇女离家就业对家庭生活和社会道德都产生了严重后果。他说,机械化也使得工人的工作变得更加单调乏味;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一种病态,并以暴动和革命的形式表现出来。

尽管如此,马洛却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相信 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是人类前进的新纪元的起点。事实上,他笼统地把人类的全部历史分为两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不过刚刚开始。他认为,1789 年以前,人类的整个历史被“异端”或“垄断主义”的原则支配着。在那个时代,多数人成为少数人的牺牲品,少数人“垄断”生产资料被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这种垄断制度相继表现为奴役制、农奴制和雇佣劳动制,这些都是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形式。基督在许多世纪以前就已经宣告了与此相对立的人类平等的原则;但是直到法国大革命宣布了“人权”以后,这个原则才变成能够实现的政治术语。因此,就应该把《人权宣言》看作是真正的基督教纪元的开端;十九世纪的使命就是要贯彻基督教原则的社会含意。马洛认为,自 1789 年以来,这一原则已经成为社会良知可以接受的东西,而没有社会良知的认可,这一原则是无法贯彻的。但是即使

这条原则在理论上已经变成可以接受的，要把它付诸实施还有待人们找出适当的手段。迄今贯彻这一原则有两种对立的做法，即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但是二者都有严重的片面性，因而是无法接受的。所谓“自由主义”，马洛主要是指具有欧洲大陆色彩的经济自由主义，即自由放任主义：坚信只要国家和其他管理机构不进行干预，一种“自然秩序”就会随之实现。马洛说，从这种意义来说，自由主义已经表明是“财阀政治之父”，它决不会导致平等，而只是把剥削权转移到另一批人手里罢了。另一方面，共产主义——他所谓的共产主义主要是指巴贝夫和卡贝的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也同样离开了正道。它会灾难性地削弱人们勤奋工作的动力，并且会在平均人的权利过程中使人民贫困。

马洛把自己设想中的制度称为“兼容主义”(Panpolism)，旨在调和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它的双重目的是使所有的人都能得到最大的自我发展和最大的幸福。“兼容主义”追求的是自由和富足。它的基础是每个身强力壮的男子都有从事劳动的义务，也都有权掌握生产资料，这一点将由国家给予保证。每个劳动者都不受地主、雇主和信贷垄断资本家的剥削，将以完全相等于他对公共积蓄所作的贡献的形式享有其全部劳动产品。为了做到这一切，国家将接管全部主要公用事业的直接经营和控制权，其中马洛列举了铁路、港口、自来水、煤气、银行和教育事业等项；除此以外，国家也直接掌握其他大规模的经济活动，包括林业、采矿、渔业、对外贸易、各种原料和半成品的批发业务以及各种既非从生产者直接转到消费者手中、也非从生产者转到零售商手中的制成品的批发业务。马洛建议把农业、小规模生产、零售贸易和地方运输业留给私人经营，但是他建议，所有这些行业都在国家管理下组成基尔特。他准备不去触动目前已有的私人资本积累，听任它自生自灭。一切新的资本积累应为法律所禁止，生产资料应成为公共财产。为了保

障这样组成的社会并保证向生产者支付充分的报酬，将建立保护性关税制，防止从国外输入在非对等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货物。

马洛认为，除非能够使人口增长率稳定下来，以防止其超过或至少抵销生产力的增长，否则他所提出的计划就会落空。他希望对结婚的权利规定严格的限制，认为事实可能证明马尔萨斯的“谨慎的抑制”和“道德的节制”很可能是无济于事的。他说，除非能够证明养得活孩子，不然就不准生男育女。他还建议以乐捐的方式筹措基金，建立一种综合保险制，以便为疾病、意外事故、老年和孤儿寡妇提供保险。他说，结婚的权利应该以缴纳会费成为社会保险基金会的会员为条件。这样，马洛便提出了一个附有结婚条件的强制性保险计划，同俾斯麦后来实行的计划并无二致；但是马洛的计划当然要全面得多。 28

就马洛的整个态度来说，他是一个博爱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具有强烈的平均主义的同情心，但是他并无意于提倡用激烈手段来实行他的计划。在这方面，他和洛贝尔图斯一致严厉抨击上升的资本主义制度，并且都相信国家必须采取行动使工人能够过温饱的生活。就经济意义来说，他们都是“反自由主义者”，而在政治意义上他们则是自由主义者。他们两人都把个人享有获致幸福和享受的手段的权利放在首位，唯一的条件是个人必须愿意承担责任，通过劳动对公共积蓄作出贡献。在实行这些原则时，他们都主张把包括货币资本和信贷来源在内的生产资料实行公有；他们两人都是从广大人类而不是从某一特定阶级的要求出发来考虑问题的。就他们彼此确实有所不同而言，他们的不同就在于：马洛不象洛贝尔图斯那样谨慎保守，后者认为从现行制度向新制度的转变需要持续好几个世纪。事实上，马洛对发生转变的速度并没有作出十分明确的估计，这也许是因为他始终没有写出他那部著作的最后一卷；或者说，他之所以没有能够写出这一卷，也许正是因

为在这个重要问题上该怎么说还拿不定主意。

我们将要谈到，马洛和洛贝尔图斯所代表的那种超然的社会主义理论后来在德国引起了许多共鸣。它是十九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讲坛社会主义”的先河，它对正统的政治经济学提出质疑，并且宣布国家的职能包括管理国家的经济生活。但是在五十年代，经济学家对自由放任主义提出挑战的不仅有“国家社会主义者”，而且还有所谓“历史学派”的领袖。这个学派的创始人威廉·罗雪尔(1817—1894年)早在1843年就发表了《政治经济学基础》一书；他的主要支持者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和卡尔·克尼斯两人最富挑战性的著作分别在1847和1853年出版。洛贝尔图斯和29 马洛的著作中所体现的运动，实际上只不过是同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争一日之长而范围远为广泛的大运动中的一部分。正如西斯蒙第早期的批判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在德国找到适宜土壤的运动也是以抨击若干“经济法则”的整个概念为出发点的，这些法则是从交换过程的根本性质推断出来，作为其本身就绝对正确的规律而提出的，显然不承认同时间、地点等条件有相对关系。“历史学派”人物反对这种绝对的演绎方法，与其说他们否认有绝对经济法则存在，倒不如说他们否认人们能够从这种法则推断出绝对的实际概念。他们论证说，经济因素只不过是特定的社会在塑造其集体生活方式时始终必须考虑的若干因素之一，不论是什么法则，社会都能够按照它用来管理其本身工作的制度而使法则起完全不同的作用。当然，这种从制度和历史出发去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并不一定会得出任何社会主义的结论，这种治学方法同那种相信阶级应有差别以及不同社会集团应有不平等的权利的信念是完全可以调和的。但是，这种方法的确排除了任何有利于自由放任主义的总前提；实际上，十九世纪采用这种方法的人从中得出的通常既有社会主义的结论，也有保守派的结论，后者还常常兼具帝国主义

性质。

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还要谈到,目前我们只想指出:象洛贝尔图斯和马洛这样的人的理论尽管同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毫不相干,然而正当资本主义风靡一时,急骤发展的时候,倒确实起了削弱其思想基础的作用。他们两人忧时伤世的思想表达了一种深刻的³⁰不满情绪,对上升的资本主义制度给人类带来的影响深为不安。他们的思想不同于英国的托马斯·卡莱尔和约翰·腊斯金的预言,也不同于塞缪尔·泰勒·科勒里季和罗伯特·骚锡在更早的时候所作的推测,但是影响却是类似的。马克思专心致志于证明他把阶级当作进行社会革命的动力的理论,除了必要时偶尔借用他们的论点以外,根本就用不着这些从道德观点出发去反对资本主义的人。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欧洲大陆大多数知识分子也不大乐意听取这些评论家的意见,因为随着革命运动进入低潮,他们发表言论的迫切性实际上好象也化为乌有了。只是到了六十年代,当工人阶级开始重整旗鼓,再一次打乱更加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升平局面时,这些评论家才恢复了昔日的地位。

与此同时,这些对于上升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人道主义批评的人士起了双重作用。他们强调了福利国家的要求,从而在理论上起了限制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所提出的相反要求的作用;此外,他们还提供了一种关于计划经济理论的新说法,这种理论十九世纪早期圣西门和他的学派曾宣扬过。在经济问题上,洛贝尔图斯和马洛都毫不含糊地站在工人一边,明确表示资本主义使它的受害者蒙受剥削和生活贫困,从而陷于祸患无穷、朝不保夕的境地。他们两个人都希望建立一个有计划的社会,在那里全体人民的福利将是公共政策的主要准则。他们两个人都主张社会化,但是这并没有使他们成为通常所谓的社会主义者,因为在他们的头脑里,福利国家的存在并不一定要依靠政治民主。他们都认为国家是促

进社会福利的伦理性工具，而不是由劳动者自己掌握的工具。正是由于这一点，他们的理论便不但为民主主义者所利用，而且也同样为专制的或贵族的宗法主义信徒所利用；洛贝尔图斯对俾斯麦的影响之大至少不下于他对拉萨尔的影响。罗雪尔及其“历史学派”人物比起洛贝尔图斯来，甚至更不足以称为社会主义者；他们的学说的重要性主要在于促进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促进国家社会主义；在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为了国家或帝国的发展工业必须接受国家的管理。在十九世纪五十和六十年代的德国，这两个学派在思想界都有相当强大的力量，足以防止自由放任主义成为德国雇主的共同信条，并为俾斯麦推行帝国政策铺平了道路。正因为如此，社会民主党人就更加不愿意承认洛贝尔图斯作为社会主义思想家的重要性；但是他的贡献决不是无足称道的，他和马洛都是伦理社会主义思想之链中的环节；尽管在六十和七十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曾一度把这种思想推向一边去了，但在社会民主主义的队伍中它仍然不断冒头，而且是今天西方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第三章

32

俄国社会主义的曙光—— 别林斯基、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

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几乎完全是西欧的理论。诚然，访问欧洲的美人以及移居美国的欧洲人都曾把社会主义带过了大西洋，但是美国人自己对这种学说却没有特殊的贡献，除非我们把约·弗·布雷也算上，他的名著是在英国写的^①。罗伯特·欧文和傅立叶在美国是有信徒的；1848年埃蒂耶纳·卡贝从法国来，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建立了“伊加利亚”公社。在美国，创建宗教性质和社会主义性质公社的大不乏人，但是他们基本上都是根据外来的思想而且同外来的人一道工作的。1848年以后，寻求得以安居乐业享有自由的新世界的移民不绝于途，人数大增。但是社会主义并没有在美国土地上扎下深根，实际上，由于往昔的乌托邦热潮日趋消沉，而欧洲的社会主义在惨遭失败以后又一蹶不振，社会主义本身的影响也就不如以前了。

然而，正是在西欧的这个死气沉沉的时期，第一次有迹象说明社会主义将成为俄国的一种力量——这倒不是说成为一种人民的运动，而是成为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憧憬对象。1855年尼古拉一世的死亡和亚历山大二世的即位，使得自1825年十二月党人密谋被粉碎之后就雷厉风行的高压统治一度缓和下来。报章杂志的数目 33

^① 这是指1839年出版的《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布雷生于美国，幼年随家移居英国，写这本书时，他在里兹当排字工人。参看本书第一卷第十二章。

大大增加；人们一度可以在文学或哲学批评的幌子下比较公开地发表关于社会问题的文章。偷运外国书报杂志入境也比较容易。亚历山大·赫尔岑在伦敦出版的著名俄文刊物《钟声》在俄国知识分子阶层中广泛流传，这是俄国公众所能接触到的第一种没有经过检查的杂志。尽管，《钟声》只能秘密流传，但是在1863年以前它毕竟还相当广泛地流传过几年；1863年，波兰民族起义，波兰农民也企图高举义旗，因而帝俄当局几乎又象过去一样，实行高压统治。

当然，在这个时期以前，俄国早就有过自由主义的思想运动。叶卡德琳娜二世就曾鼓励以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为基础的探讨，直到普加乔夫农民起义和法国大革命使她惊恐不已，她才不进行这种鼓励；再者，要想防止法国大革命的思想传播国外，不让它对俄国知识分子产生某种影响也是办不到的。但是这种影响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并不深入；而且俄国同拿破仑的苦战以及1815年以后亚历山大一世在神圣同盟中所起的作用，都使这种影响不能持久存在。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影响以在俄国南部为最显著，这里的领导人是巴维尔·伊凡诺维奇·彼斯特尔(1793—1826年)。在尼古拉一世即位时参加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军事领袖和贵族中，彼斯特尔是激进派的鼓舞者。他主张解放农奴，把俄国的一半土地授予他们，其余一半则归国家所有，佃给进步的农业企业家。他鼓吹实行成年男子普选权，建立中央集权的民主共和国。他的观点远比以尼基塔·穆拉维约夫为首的北方十二月党人先进，穆拉维约夫希望建立地方分权的君主立宪政体，实行有限的选举权。彼斯特尔的观点也远比经济学家尼古莱·伊凡诺维奇·屠格涅夫(1789—1871年)先进，屠格涅夫是帝俄官员，一直要求亚历山大一世解放农奴，在赋税和行政制度方面进行大规模改革。屠格涅夫——他是经济学家而不是那个以小说著称的屠格涅夫——在十二月党人

起义时幸好在国外，他同十二月党人的公开领袖一道被判处死刑，在国外度过他以后的岁月。他在亡命国外期间对土地改革问题的见解逐渐接近彼斯特尔。但是，他又不同于彼斯特尔：建议只授予个体农民以小块自由土地，认为不得不靠工资过活的农业无产阶级必然会发展起来。他认为，必须有这样一批农业劳动者为利用先进的资本主义技术改进土地耕作打下基础；就俄国说来，他们会形成一个相当于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这些观点是他在流亡中形成的，1847年发表于巴黎（《俄罗斯和俄罗斯人》，三卷本）。³⁴

在十二月党人运动被粉碎以后，就再也没有什么自由可以发表民主主义或自由主义意见了。但是在“斯拉夫派”和“西欧派”这两个敌对流派之间，也就是在那些指望根据俄国人民以往的历史传统和明显的民族特性来发展俄国社会的人，同那些认为只有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化俄国才能走向更高文明的人之间，在文学和哲学方面都仍有辩论的余地。这两个对立的流派又衍生出各种不同的见解。于是，在“西欧派”中间，以彼得·恰达耶夫为代表的思想流派，在冯·巴德尔、博纳德以及德·梅特尔的影响下，希望天主教成为强大的统一和开化的力量；而其他人，比如维·格·别林斯基和亚历山大·赫尔岑等，则都分别受到西方激进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至于在斯拉夫派中，观点也是形形色色的，其中包括这样两种看法：一种是竭力鼓吹专制政体和东正教，彻底否定西方的代议制政府和民主观念；另一种则持开明的观点，主张进行土地改革和解放农奴，同时要求保持和发展传统农村经济制度中的公社因素。此外，斯拉夫派虽然摒弃西方生活方式，认为它不适合俄国的特性和传统，但是又深受西方哲学的影响。他们作为依据的是赫德和谢林的学说，特别是黑格尔的学说。他们在黑格尔的学说中看到了适合为专制政体作辩护的国家观念，又在黑格尔关于

35 “市民社会”的阐释中发现了坚持“伦理”(sittlichkeit)作为民族社会关系的基础、作为国家有责任加以统一并提高其理性现实水平的要素的极端重要性。当然，斯拉夫派并没有接受黑格尔的如下见解：由普鲁士国家统一起来的日耳曼文化代表最高理性。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在俄罗斯民族的生活中也同样存在着取得最高成就的神秘基础，并且认为(更确切地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俄罗斯民族幸而避免了正在使西方文化遭到毁灭的那种污染。他们中的许多人非常敌视工业主义和立宪政府，认为这是西方文明的孪生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更赞扬正教的神秘美德，认为这不同于天主教的那种偏激的唯理智论，也不同于讲求功利的个人主义，他们认为后者是新教教会的特色。

上面谈过，斯拉夫派受了黑格尔的影响，赞成沙皇的专制政体，反对任何形式的代议制政府。然而，他们决不赞成国家采取行动。他们从宗法性的神秘主义的角度来看待沙皇与其臣民的关系。在他们看来，这种神秘主义同政治活动风马牛不相及；实际上，他们着重指出，政治活动同人的内在生活的自由相比是不值一提的。斯拉夫派运动跟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完全不同，后者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它使俄国人梦想在统一斯拉夫各民族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庞大的斯拉夫帝国。斯拉夫派运动则是一种文化运动，而不是政治运动：它之所以具有政治性只是因为它反对政治，斯拉夫派在尼古拉一世统治下还是受到了不那么严厉的迫害，尽管它是支持沙皇制度的。

1825年以后的一个时期内，斯拉夫派的学说并没有发展成熟，但已经在传播中。这一派的学说同早期和后期的泛斯拉夫主义运动都不能混为一谈，泛斯拉夫主义运动虽同斯拉夫派的学说是同时发展起来的，但它主要起源于奥地利或土耳其统治下的斯拉夫民族。泛斯拉夫运动者虽把希望寄托在俄国，却有一种明显的

民主色彩，因为他们所关心的是从异族的羈轭下争取民族解放的问题，而且发现在许多地方遭到那些跻身于执政权贵之林的贵族的反对。斯拉夫派事实上分为两支：一支赞助俄国境外的斯拉夫国家的解放运动；另一支把俄国看作是斯拉夫精神的代表，主张在“大俄罗斯”统一的事业中，使沙皇统治下的各族人民——包括波兰人在内——俄罗斯化。1848年，在欧洲革命的热潮中，巴枯宁参加了在布拉格举行的第一次泛斯拉夫代表大会。而赫尔岑则由于为1863年的波兰起义辩护而在俄国知识分子中声誉大落。斯拉夫派的各种思想倾向是可以同当时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各种不同立场结合起来的。这些思想倾向之间唯一共同的特点是坚信斯拉夫人必须根据自己的文化历史进行自救，因而对资本主义、自由主义—议会制的西方政治和社会制度极为厌恶，而且往往也极为轻视。

最早在俄国鼓吹某种社会主义的三个宣传家是别林斯基、赫尔岑和巴枯宁。他们都生于拿破仑战争的末期，在十二月党人密谋时期，都还是十多岁的少年。在青年时代，他们都是“西欧派”，都受到当时蔚为时尚的德国哲学的影响。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他们都受到黑格尔主义、特别是费尔巴哈的左倾倾向的影响；他们一方面通过德国的著述家，一方面直接地同法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发生接触。特别是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1811—1848年)，在他作为文艺批评家和哲学家的短短一生中，从浪漫主义开始，通过一种左倾的黑格尔主义很快转变为唯物主义的激进主义，这使得苏联的著述家推许他为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先驱者。对他的思想立场作这样的解释，根据是很不够的，至少也是可疑的。毫无疑问，别林斯基之成为唯物主义者 and 决定论者，其含义大致同费尔巴哈之成为这两者的情况相同。但是这并没有使别林斯基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在任何真实意义上使他成为任何类

型的社会主义者。他主要是一个西欧派,反对沙皇制;作为一个激进的文艺批评家,他在短短一生的最后一两年里对“社会问题”日益关注。他在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下从事写作,不得不避免公开议论政治,而是在文艺批评的幌子下,抒发己见,针砭时事。他的早期作品几乎纯粹是黑格尔主义的。“人不是一个抽象概念:人是千差万别而又殊途同归的活的个体。人是象单个的人那样的个体。”因此,代表这种统一体的国家“是集体生活的最高形式,也是它的唯一的理性形式。只有成为国家的成员,一个人才不再是自然的奴隶,只有成为国家的成员,他才能表现为真正理智的人”。但是,在他接触到法国的社会主义以后,他的论调就变了。这时“社会问题”开始在他的著作中占突出地位,他热烈地论证说要评价艺术和文学,就不能不考虑它们的社会内容。不过在艺术和文学评论方面他始终没有陷入车尔尼雪夫斯基所持的那种极端功利主义的论点中。别林斯基说,作家是人民的良知的化身,作家的任务是启发广大人民的社会觉悟。他说,文学必须是现实主义的;他对果戈里推崇备至,认为果戈里是现实主义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并说文学对于现实的描述必须有明确的社会目的。正是别林斯基著作中的这一面使得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多大根据就推许他为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别林斯基还没有来得及对自己已经改变了的观点作进一步的勾画就去世了,不过即使假以天年,这些观点是否会使他形成任何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先于马克思主义的任何社会主义理论),也是很成问题的。别林斯基是一位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赞扬西方的激进主义,希望发展工业和形成一个工业中产阶级,把俄国人从野蛮状态中拯救出来,并为人民暴动创造条件。正是因为他持有这种态度,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才得以编出一套别林斯基传奇,把他从来不曾有过的思想加到他身上。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1812—1870年)比别林斯

基小一岁,从气质和教养上来说,他受法国思想的影响比受德国思想的影响大得多。他是一个富有的俄国贵族的私生子,母亲是德国人,他在他父亲的伏尔泰理性主义及其必然结果——1789年大革命——的影响下长大。德国的形而上学虽然一度影响过他,但并没有真正吸引住他。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倒是使他心向往之。这两种思想一旦具备任何政治形式就立刻遭到当局的禁止; 赫尔岑在莫斯科大学被开除并被放逐到弗拉基米尔城,在那里留居3年,不准参加学生政治活动,在这期间他同堂妹(也是私生的)纳莎莉结了婚。3年以后,他仗着父亲的势力获准回莫斯科,当上了公务员。他在莫斯科一直呆到1841年,这一年他被撤职,并被送到诺夫哥罗德住了一年。他并没有设法去恢复官职。1846年,他父亲去世,给他留下一笔巨大的遗产。第二年,他阖家永远离开了俄国,定居在他所向往的城市——巴黎。他说,“就象人们进入耶路撒冷和罗马时一样,我怀着敬意走进了巴黎。”

赫尔岑一家从巴黎到意大利去旅行了一次。1848年革命爆发时,他全家正在意大利。赫尔岑匆匆赶回巴黎,正好目睹布朗基和巴尔贝斯在五月遭到的失败以及卡芬雅克将军在“血腥的六月”对工人的镇压。这时,他对巴黎产生了彻底幻灭的感觉,实际上,也是对自己过去在遥远的俄国曾仰慕不已的西方文明的许多事物感到彻底幻灭。他憎恨巴黎在路易-菲力浦的“资产阶级君主政体”统治下的气氛,他更不喜欢代之而起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赫尔岑具有贵族的气质和理想主义的信仰,讨厌西欧的上升的资本主义,指责它所标榜的自由和民主只不过是掩饰卑鄙的自私动机的骗人货色。正当西方的革命暂时遭受彻底的失败时,他成了一个反对西方改良主义和俄国的高压政治的革命者。

此后几年,他的个人生活充满不幸: 他的夫人不安于室,夫妇争吵不已,一直到她1852年去世时才罢休。前此他一直卜居瑞

士,此后就迁居英国。尼古拉一世死后,高压政策在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有所缓和;赫尔岑在英国同学生时代结下友谊的终生知己尼古拉斯·奥格辽夫在1857年共同创办了《钟声》,最初是月刊,后来改为双周刊。刊物在伦敦用俄文印行,然后秘密运进俄国,不久偷运数量就达几千份之多,成了俄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主要鼓舞力量;当时尼古拉的暴政已成过去,这批知识分子便拭目以待,准备干一番大事业。赫尔岑的一些读者寄希望于革命,而另一些读者则希望在新沙皇的领导下进行改革,把解放农奴、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和取消政治迫害作为改革的起点。我们知道,亚历山大二世有一个时期确曾以改革者的姿态出现,尽管他并没有表示准备改变专制政权的基础。解放农奴的计划开始了;解放的条件可望相当开明,能够使农民有一个不错的开端,而且还有采取其他开明措施的希望。赫尔岑从一开始就非常不信任这样一些俄国人:他们从痛恨沙皇制出发,寄希望于盲目的农民起义,并渴望一举摧毁残暴的旧制度,深信在旧制度的废墟上会建立起较好的社会制度。赫尔岑虽然憎恨暴政,但不相信对压迫者采取大规模暴力行动会带来什么好处,不管采取这种行动多么有理由。赫尔岑在那个一切革命希望似乎都已付诸东流的西欧居住了多年,很可能更加深了这种不信任心理。无论如何,他欢迎新沙皇的登极,并且准备推崇亚历山大是同特权和官僚的顽固堡垒作斗争的伟大改革者。《钟声》一期又一期地呼吁新沙皇领导俄国人民厉行改革,并且按照俄国人民的民族天才和牢固的公社传统引导他们走向一种完全不同于资本家横行、醉心金钱的西方的生活方式。

《钟声》1857年创刊,1868年停刊,1865年从伦敦迁到日内瓦,但这时已经失去早期的大部分支持者。1861年解放农奴时对地主支付偿金的条件十分苛刻而给予农民的土地又少得可怜,以致最热心支持农奴解放事业的人也感到失望;1863年的波兰起义以

及随之发生的农民起义使得改革者统一战线陷于瓦解，赫尔岑曾⁴⁰成为这个统一战线的代言人。主张效法西方的俄国开明人士基本上是满意改革的，他们认为这种改革为整个政权逐步走向开明铺平了道路，同时也使更接近于西欧的社会制度得以发展。由于赫尔岑为波兰的叛乱分子辩护，那些赞成解放的斯拉夫派大部分人都跟他疏远了。此外，由于骚乱蜂起，高压政策又恢复了，而且沙皇也放弃了他在即位初期所扮演的改革者的角色，这就迫使激进分子再次转入地下，并去物色比赫尔岑更富有革命性的新领袖和先知。

赫尔岑之所以声誉日替，是因为他不能适应俄国的今非昔比的局面，或者是因为他不同意重新回到他早在1848年以前就不信任的认为会带来破坏的革命道路。在俄国国内的激进分子看来，他好象是故步自封，甚至是玩世不恭的，他们不再理会他，而去追随别的先知。此外，赫尔岑这时已疾病缠身，《钟声》停刊两年后便去世了。

E·H·卡尔先生在其所著《浪漫的流亡者》一书中对赫尔岑的私生活未免渲染过甚，否则我在这里就无需多说了。这本书以耸人听闻的笔调大谈不幸的赫尔岑好容易了结了他同海尔维格的争吵以及同第一个纳莎莉的纠葛，却又马上同第二个纳莎莉纠缠不清，而这个纳莎莉比前者更加一言难尽。更为不妙的是这个身为赫尔岑的情妇的纳莎莉竟是赫尔岑最亲密的朋友和合作者奥格辽夫的妻子。由赫尔岑、奥格辽夫和纳莎莉组成的三角家庭相安无事的局面当然是很奇怪的，但是必须理解这样两点：赫尔岑时代的俄国进步知识分子认为对婚姻关系信守不渝是一种专制行为；奥格辽夫对他的朋友远比对他的妻子感情真挚。尽管如此，奥格辽夫也总是喝得酩酊大醉，并且还缱绻于一个妓女以求解脱；这个妓女不久就带着她的孩子——非奥格辽夫所生——加入了那个以赫

尔岑为中心的奇特的一伙。要不是赫尔岑有钱，光景还会尴尬得多；但是实际情况并不象卡尔先生笔下的传记所描绘的那样荒诞不经。赫尔岑的孩子并没有因此而不能在十分正常的环境下长大；赫尔岑同别人的友谊也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或者说他并没有因此而杜门谢客，拒不接待无数登门拜访的人，他们都以一种视若无睹的态度对待这一切。

赫尔岑在英国唯一广泛流传的著作是他的回忆录，英译本的书名叫作《往事和追思》（六卷本，1924—1927年）；这部书对欧洲的革命领袖作了生动的描写，并对当代事态作了评论，因而为人们广泛引证。这部书英译本出版以前早就用法文出版了。赫尔岑的许多最优秀的著作当他在世时就已用法文问世，其中包括他的《来自对岸》，在这本书里，他写下了他在1847年移居巴黎后对西欧所产生的幻灭感。他的名著《法国和意大利的来信》（1850年）也是同一时期的作品，其中记述了他在西方反动派获胜时所产生的极端失望的情绪。他的论文《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也是先以法文问世的。他在1852年迁居伦敦后就创办了自由俄国出版社，这家出版社在《钟声》创刊前后出版过许多小册子。1855年以后，他的许多最好的著作都发表在《钟声》上。赫尔岑的后期著作也有一些并没有在杂志上发表过，其中最重要的是论文《俄国人民和社会主义》（1855年）和《致老友书》（1869年），前者是以给历史学家米希勒特的公开信的形式发表的，后者是他生前最后一年写给巴枯宁的信。

马克思很不喜欢赫尔岑，他对大多数俄国人都是这样。相反，列宁在为纪念赫尔岑诞生一百周年所写的一篇论文中，却对赫尔岑推崇备至，认为他“是通过自由的俄罗斯言论向群众号召、举起伟大的斗争旗帜来……的第一人。”^① 马克思直到在世的最后几年

^① 列宁：《纪念赫尔岑》，载《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6页。——译注

才开始在俄国找到门徒,在这以前,对于那个指责西方文明腐朽未落,并把俄国的落后农民说成是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旗手的人至少没有说过一句好话。在马克思看来,俄国是个严重的蛮族威胁,欧洲有被席卷之危,一旦它同普鲁士的反动派结成同盟,西方日益成长的无产阶级就会遭受铁蹄的蹂躏。与马克思相反,列宁则认为,赫尔岑虽然在许多方面误入歧途,但毕竟是俄国社会主义强劲有力的先声,是民粹派的先驱者,同时也是明确提出如下说法的第一人:俄国人尽管落后,但在未来的世界革命中却能发挥巨大的作用。列宁还特别撰文反驳那些认为赫尔岑力主温和而加以赞许的人。这些人的论据是:赫尔岑写过文章,希望亚历山大二世出面领导伟大的改革运动;赫尔岑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只是批判地接受巴枯宁的极端革命论(当时巴枯宁曾一度受涅恰也夫的影响)。针对赫尔岑论点的这些方面,列宁则提出:赫尔岑在1848年的著作中表现出鲜明的革命气质,也曾为波兰起义进行辩护,再者尽管疑虑重重,他对俄国的革命事业仍然忠诚不渝。不过,如果说赫尔岑“面向群众”,而其含义又是指俄国的群众曾阅读过《钟声》或者涉猎过他的任何书籍和小册子,那就同事实相去甚远了。在俄国,为赫尔岑所吸引的是学生和知识分子。既然群众无法接触到他的著作,或是接触到也认不得,那就不可能不是这种情况了。

我们可以十分简略地谈谈赫尔岑对社会主义、对俄国人在社会主义中所起的作用的看法。他认为在西方,工业无产阶级是主要的革命力量,但是在1848年以后,他对这种力量会很快取得胜利并没有寄以多大的希望。事实上,他倾向于这样的看法:西欧的全部文明已遭资本主义毒化,也许没有复兴的希望了。他同意德·托克维尔的想法,认为议会政治和自由放任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孪生兄弟,议会政治的发展意味着庸庸碌碌和鼠目寸光的私己主义占统治地位,而这恰恰是同他从浪漫主义出发所追求的崇高的

人性相抵触的。但是他不同于德·托克维尔,并不准备接受现实,变坏事为好事。他渴望为自己的幻灭找一条出路,而他在西方又一无所获,于是便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俄国身上。有一个时期,他研究美国,旨在弄清楚在美国那种迅速发展的综合文化中能否找到崇高伟大的东西。他的结论是,西欧的移民在美国即使找不到幸福,至少也有较好的机会,可以过上相当称心如意的生活。但是这同他所追求的相去太远了。他写道:“他们称心如意的生活比起欧洲的浪漫主义理想所梦求的毕竟要差一些、平凡一些、枯燥一些。”不过如果移民认为这就很不错了,那么就让他们去吧。他认为,在自命为人类进步先锋的腐朽没落的西欧社会中再也没有值得留恋的东西。

于是,赫尔岑便把希望寄托在俄国人身上,相信俄国人有能力发动革命,而俄国农民在革命中所承担的任务,正是西方社会主义理论交给产业工人的任务。他还相信这种农民革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因为在俄国社会的农村中仍然存在着原始公社制的因素。这倒不是说赫尔岑美化俄国农民或否定西方的程度曾经象他的某些继承者那样严重。尽管他对西方把所掌握的征服自然的巨大力量搞得一团糟这一点表示深恶痛绝,他仍不失为一个“西欧派”。他希望俄国人吸取西方社会中的精华而扬弃其糟粕:采用西方的生产技术以改进农业和小工业,但又不随之采用资本主义,或者接受资产阶级的统治,哪怕是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的过渡形式。他希望俄国恢复土地的公社所有制形式,这种所有制形式在俄国大部分地区曾经盛行一时,而在土地既没有被国家接管也没有被贵族侵占的地区依然残存着,并且同俄国的人民精神中的自然“共产主义”相适应。赫尔岑论证说,社会主义没有必要建立在工业主义和城市化的基础上,而不妨建立在先进农业的基础上,实行公社所有制和合作劳动制,利用最好的技术。

关于这种组织结构,当代俄国农村中残存的“米尔”(mir)——一种村社组织形式——就能提供必要的基础。即使在农奴制度下,俄国的农村在同地主及其代理人打交道时以及在提供公共劳务时,都在相当程度上保持原有的集体制。在1847年到1852年间,德国的社会历史学家奥古斯特·冯·哈克斯特豪森(1792—1866年)继早先对东德土地制度中的斯拉夫因素进行研究之后,又发表⁴⁴了他对俄国的土地所有权和农村组织的研究成果;格奥尔格·路德维希·冯·毛勒(1790—1872年)在1856年出版了关于德国中古时期的农村组织——村社(Mark)——的伟大著作的第一部。但是这些著作并不是亨利·梅恩爵士以及其他许多社会历史学家所进行的村社研究的嚆矢;梅恩爵士主要是在印度从事研究工作的,他的著作有《古代法》(1861年)和《村社》(1871年)。十二月党人和斯拉夫派的著述家已经强调过俄国农村生活中的公社因素。但是哈克斯特豪森的著作却特别对俄国的农民公社的历史提出了大量新的见解。他所提出的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一些人相信在整个欧洲以及其他大陆上一度存在过一种公社或氏族所有和农村经济由集体分配的制度,私有财产制和地主统治都是后来强加给这种制度的。从此以后,这种原始农村民主制在社会发展中究竟在多大范围内作为普遍现象存在过,就成了激烈争论的课题。我们并不打算在这里解决这个问题。不容置辩的是:俄国已广泛地把农奴制强加在这种远为自由的农村制度之上;农村的集体组织虽然处于衰微状态,但在斯拉夫人民中却保持着比西欧为强的生命力。“米尔”确曾作为农村集体精神的核心,而不仅仅是作为约束农村人民的行政工具而存在过。在赫尔岑和许多其他人看来,解放农奴似乎能使“米尔”更生,而“米尔”的影响又可以防止——或者可以用来防止——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农村结构的发展。那些鼓吹农民社会主义的人相信,过去存在过一种集体拥有和管理

农村土地的农村民主制,也相信有可能恢复农民集体制,使之成为农村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础。从这一点出发,他们希望建立一个不致被西欧的经济所显示出来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弊端所腐化的社会主义社会。

45 赫尔岑也抱有同样的信念,相信俄国人民有潜力实行以农村公社制度为基础的民主自治,但是他并没有打算详细拟定新制度的结构;他同马克思一样,反对预绘出蓝图。直到晚年,他也几乎象巴枯宁一样,坚信得到解放的人类具有为自己做出最有利的事业的创造性才能,只要人类的解放者忠于他们的理想,不听任自己出于仇恨而成为单纯的破坏者,只要人类不在极权主义国家的统治下走上歧途。他始终没有对这些意见作多大修正,而是坚持认为要把这些意见付诸实现需要很长时间。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他曾经几乎用巴枯宁的那种无政府主义的论调写道,当务之急是摧毁现存的制度和准则,然后让子孙辈在废墟上进行建设。但是即使到那个阶段,他还是不愿意鼓励盲目的暴动和不分青红皂白地滥用残酷手段。到了六十年代,特别是在1869年所写的《致老友书》中,他强调指出:重建社会必须以新的准则为基础,而新准则的确立必然是缓慢的,在还没有拟就可以取代的方案以前,骤然推翻一切是危险的。但是,他并没有由于采取这种慎重态度而对改良主义或者西方的议会民主作任何让步。赫尔岑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他相信走向新社会的动力来自人民的内心,而不是来自提倡议会民主的人或是沾染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腐朽标准的改革者。

事实上,赫尔岑同巴枯宁完全一样,憎恨极权主义国家,憎恨具有这种自上而下的国家哲学论调的任何东西;关于巴枯宁的思想倾向,将在后面专设一章讨论。赫尔岑在论述共产主义(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的共产主义)时写道:“我认为俄国政府开始对共产主义感到恐惧是有一定的事实根据的。共产主义就是颠倒过来

的俄国专制制度。”这里所指的恐惧正是边诺阿·马隆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所著《社会主义史》中谈到赫尔岑时所提到的并归因于“某些西方自由主义者”的恐惧。马隆在这本书里谈到，强调俄国社会中的公社因素在西方引起了恐惧，担心“俄国可能把某种专制的共产主义强加于欧洲”。赫尔岑希望俄国实现的并不是一种中央集权的共产主义，而是一种地方分权制。在这种制度下，重建的公社作为土地的所有者将发挥主人翁的作用。他在1860年写下了这样一些表达他的本质思想的话：

我们使人与土地具备了新的关系：我们的人民力图发展个人自由而不丧失对土地的权利，力图用每一个人对个人所有物的主权来限制对不动产的主权。我们是为自己开拓了土地并习惯于某种农产品再分配的移民者，只要没有征服者骑在我们头上，我们就比欧洲的其他民族更易于从社会的意义出发去解决问题。根据我们的理解，人与土地的关系并不是俄国的新发明。这是原始事实，也就是说是一种自然事实。我们现在怀着真诚的自责心情希望在西方的科学和经验的帮助下来发展这种关系。

主张效法西方的赫尔岑就这样着手应用西方的科学，但同时却摒弃了伴随西方科学一道发展的社会准则。他不喜欢西方的革命主义；因为正如他所说的，不论在1848年，还是在六十年代，革命都是在“打不出任何旗号”的情况下进行的——缺乏任何创造性的理论或思想。他在从事社会活动的晚期还呼吁培育一种从整个人类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某种个人想象的乌托邦出发的新思想。在空想主义者中间，他赞扬傅立叶派，认为他们曾力图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我们既不能把我们的世界建成一个斯巴达式的社会，也不能把它建成一个本笃会修道院。为了大众的福利，未来的革命必须把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因素都协调起来，傅立叶派梦

寐以求，力图实现的正是这一点。我们决不要为了某一些因素而扼杀另一些因素。”

下面将要谈到，赫尔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有教养的理想主义者，不可能放纵革命的热情，但是他自始至终又是一个浪漫主义者，追求伟大的人性，痛恨世界上的平庸状态，在这个世界上他是一个流亡者，对一切一直感到格格不入。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当他本着这种精神写作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以往对俄国青年的巨大吸引力。对他的影响提出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以皮萨列夫为主要代表人的文学的“虚无主义”，一是来自
47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其他一些著述家对他的思想的发挥，这些著述家在俄国国内工作，无需把自己的著作从国外偷运入境，同知识分子阶层不断变化的情绪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

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1862年)使“虚无主义者”一词传诸久远，及于国外。大体说来，虚无主义并不是一种政治运动或社会运动。事实上，由于它极端强调个人，并对一切有社会基础的价值提出挑战，因而它同赫尔岑主张公社制的哲学是水火不相容的；它的主要宣传者是文学批评家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皮萨列夫(1840—1868年)。皮萨列夫在不多几年的活动中，对于一代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代人始而由于废除农奴制运动而欢欣鼓舞，终而因为解放农奴所附加的条件以及未能使解放农奴成为进一步改革的起点而颓唐沮丧。皮萨列夫本人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他所关心的只是强调个人的权利，否定一切剥夺个人的自由发展权利的社会价值。但是个人对传统价值所持的这种否定态度是可能带有政治色彩的，涅恰也夫^①的革命虚无主义以及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主要由学生组成的极端革命团体的虚无主义就是例子。皮

^① 关于涅恰也夫，本书第八章和第九章中将述及。

萨列夫是一种自我实现的理论的鼓吹者，这种理论同马克思·施蒂纳的理论相近似。对于一切所谓的“顽强的个人主义”，只要皮萨列夫能够发现，他一概加以推崇。涅恰也夫以及那些信仰皮萨列夫的学说并力图把他的学说运用到俄国当代政治上去的团体，除了否定一切传统价值以外，还坚信只要把革命事业当作个人解放的手段而献身于这一事业，采取任何行动都是正当的。这种信念把个人自我实现的理论变成采取毫无节制的革命行动以破坏资产阶级道德和维护这种道德的制度的理论。我们在后面的某一章中将会谈到巴枯宁有一个时期是怎样受这种社会虚无主义的影响的。在俄国，社会虚无主义的成型不仅在于否认一切理想主义观念，把革命看作是破坏一切旧东西的手段，而且还在于蔑视礼法，使其追随者同社会习俗决裂。此外，社会虚无主义还为民粹运动 48 深入农民铺平道路，知识分子通过这个运动力图同人民打成一片，并且教育他们进行革命以推翻现存社会。

在虚无主义发展的同时，社会批评也开展起来了，只是后者的思想出发点大不相同。这种社会批评同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在《同时代人》杂志中的工作密切相关。尼古拉·加甫利诺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年）于1853年作为一个文艺批评家开始跟《同时代人》杂志建立了关系。他继承并大大发展了别林斯基关于艺术同生活的关系的思想，不仅坚持艺术作为社会批评的适当作用，而且接受费尔巴哈认为“美”和“真”是统一的想法，提出了一种反映在苏联现代理论和实践中的完全功利主义的观点。从1858年起，他把这家杂志的文学部交给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年）负责，而集中精力于社会和经济批评。车尔尼雪夫斯基把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年版）一书翻译成俄文，并就如何把穆勒所申论的原理应用于俄国的社会历史和制度这一问题加上了自己的注释和见地。车尔尼雪夫

斯基为费尔巴哈及其弟子毕希纳的唯物主义哲学辩护，并且强烈攻击黑格尔关于国家或任何集体的真正人格的观念。他的社会哲学是功利主义的，深受边沁和穆勒的影响，但是他的功利主义基本上是从社会的角度出发的。他激烈攻击那些相信“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见解；他根据穆勒关于法国社会主义思想的探讨发展了一种社会合作理论，这种理论中也强烈渗透着路易·勃朗的影响。车尔尼雪夫斯基所向往的社会是以民主的生产者合作社为基础的，这种合作社接受经过改革的民主国家的支援，并且依靠公社——作为解放了的俄国人民的基本集体组织的公社——的复兴力量来防止西方式的“无产阶级化”的发展。车尔尼雪夫斯基并没有错误地把农村公社看作是一种俄国所特有的组织。他认为，农村公社是一种到处都存在过的原始社会的典型组织，只是由于俄国社会与经济的停滞，这种组织在西欧绝迹以后，还在俄国保存了一部分。因此，象赫尔岑一样，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俄国的工业落后肯定是建立新制度的有利条件，在新制度下，这种原始公社将上升到较高的水平。他相信，俄国人可以发动一次革命，使他们能够越过工业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以解放了的农民阶级为基础的自由社会。

在亚历山大二世即位以后，有几年书报检查制度放宽了一些，在此期间车尔尼雪夫斯基得以不受干扰地从事写作。但是，新的压制一开始，他就立刻成了牺牲品。1862年，他被囚禁在一座堡垒中，利用强加在头上的闲暇时间写出了一部社会小说：《怎么办？》，这部小说很快就被翻译成好几种欧洲文字。在狱中监禁了9年以后，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那里又被迫度过了12年，同俄国的主要文化中心完全隔绝。但是他的影响仍然存在，他是民粹运动和新的一代人的主要鼓舞者之一。俄国新的一代人原寄希望于农奴的解放，随着希望的消失，也就不再追随赫尔岑了。在绝望之余，

他们开始采取暴力行动，同那个温文尔雅的浪漫主义流亡者的批判性渐进主义看法很不协调。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西欧思想的发展不是没有影响的。他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从科学看政治经济学》，于1874年由A·特维提诺夫和比利时社会主义者西萨尔·德·巴普合译成法文。这部著作有助于加强那些主张地方分权和公社至上而反对国家集权鼓吹者的西方社会主义者的论点。从此，他敌视工业主义的态度就使他跻身于那些构成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势力的人士之林。车尔尼雪夫斯基强烈反对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分工细密的做法。他认为，劳动的专门化同人类要求从劳动中获得快乐和满足的愿望不相符合，并把公社看作是一种能够把有效率的生产所必需的分工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制度。他的这部分学说显然是受了傅立叶的影响。傅立叶坚持说，为了避免重复劳动的单调乏味和能够更换人们的职业以适应他们的情绪，人人都应该具备条件，能够自由地从事若干行业。事实上，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傅立叶赢得了许多俄国信从者，他的俄国弟子——其中最重要的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在1848年以前的那些岁月中，就积极宣传他的学说。正是由于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一伙，小说家费多尔·陀思妥也夫斯基才被关进一座堡垒并于1847年被放逐到西伯利亚的。俄国的傅立叶派为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说《恶魔》提供了基础，这部小说于1871年问世，这时他对革命运动早就不抱任何同情了。

我们必须把傅立叶算作是促成俄国民粹派社会主义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把“法伦斯泰尔”移植到俄国，看来是一种可取的发展形式，能够使农民公社过渡到一个由社会地位平等的人组成的社会。这个社会使用先进的集约耕作法，消除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种种弊端。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资本主义生产中存在着一种灭绝人性的趋势，这不仅是由于使用简化劳动的机器来逐渐代替

手艺的原故,而且也是因为把人仅仅当作是“商品”,从而也就在经济过程中取消了人的因素。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只有在一个大家都能在互相谅解和尊重的基础上自由合作的小规模组织中,人才能被当作人看待,人的个性才能得到适当的尊重。

本章只打算扼要地谈谈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俄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而不打算探讨俄国国内民粹运动的兴起以及巴枯宁 1861 年逃出西伯利亚以后在国外的活动。关于巴枯宁,在后面的某一章中要谈的很多,而且还要谈到极端虚无主义理论的政治代表人物涅恰也夫的一些情况。在本章,亚历山大·赫尔岑是主要人物,因为尽管他的思想基本上是属于“西方主义”的,然而毕竟是他首先探索了怎样以俄国所特有的方式去解决平等合作的社会主义理论所带来的问题,也正是他第一个提出可能有一种解决方案,而他提出方案时所讲的那番道理,又基本上不同于那些结合西方较发达的工业社会陈述问题和提出解决办法的人所讲的道理。当然,赫尔岑并没有预见到事态的实际发展过程:俄国最后

51 不得不面对等待已久的沙皇专制制度的崩溃,不得不面对在旧社会的废墟上建立新社会的任务。他根本没有料到,这种建设要以效法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大规模生产技术为基础,采取大规模工业化的形式。他确曾预见到的是,俄国人在建立新社会的时候,无需经历他在西欧流亡期间所亲眼看到的那种资本主义统治的阶段。赫尔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列宁主义者。他由衷地憎恨专政和暴力,但是他把西方观念和斯拉夫主义思想结合起来混为一体,却对晚近的俄国有很大吸引力。这并不是说赫尔岑本来会喜欢斯大林主义。他倒会激烈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冷酷无情及其集权的独裁主义,而且也会同样反对俄国以美国为蓝本大搞大规模生产。事实上,毫无疑问,斯大林的俄国会使他极为反感和厌恶。车尔尼雪夫斯基也不会十分乐于承认这种趋势同自由合作的原则相一

致，而在他看来，这一点在社会主义思想中却是主要的。然而不能否认，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①的思想却大大得力于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们鼓吹了如下信念：俄国人的使命是在本质上属于俄国独具的基础上，而不是在照搬西方蓝本的基础上创造自己特有的社会主义。此外，即使不是在工业方面，至少在农业方面，苏联也大大吸取了这两位农业社会主义先驱者的思想，尽管苏联已把这些思想导向完全不同的目标。从某个观点着眼，可以把集体农庄看作是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公社制思想的一种体现，虽然集体农庄是自上而下用强制手段建立起来的，而不是出于农民的意愿自然产生的，而且其控制方式也远远不是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所预期或向往的。这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尽管马克思极不喜欢赫尔岑，而他的名字——还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字——在当代俄国却倍受尊重。当然，当代俄国强调的是赫尔岑对西方资本主义和议会制度的轻蔑以及他的著作的革命方面，而不是侧重他始终主张的、到了晚年更加显著的渐进主义。况且，就连他所主张的渐进主义也并不是那么完全不可接受的，因为渐进主义主要是为了批判巴枯宁把彻底的摧毁当作重建社会必要的第一步的无政府学说而提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那场造成第一国际分裂的巨大斗争中，赫尔岑站在反对巴枯宁的一边是一大功劳；再者，虽然赫尔岑同马克思彼此恶感很深，思想也各走一端，虽然赫尔岑在那场斗争达到顶点以前就已去世，但是他毕竟用自己最后的重要著作相当严厉地谴责他的老战友巴枯宁。

对于那些愿意把车尔尼雪夫斯基当作现代共产主义学说先驱者看待的人来说，他也同样成为问题，因为虽然他是一个唯物论

^① 斯大林：《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22页。——译注

者，但是从马克思主义来衡量，不管怎样牵强附会，也不能认为他是一个决定论者。事实上，从反对俄国激进分子的理想主义这一意义来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俄国的激进分子曾经深受西方空想社会主义以及西方民主观念的影响。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再坚持，用公民自由、人权和民主政府的观念来打动俄国各族人民是徒劳无益的。他说，人民需要的不是投票权，而是足够果腹的粮食、不是自由而是鞭子和足以御寒的衣服。干革命的人如果真正志在革命，就应该给他们送上这些东西，其他可以等一等再说。这正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思想中得到列宁赞扬的那一面，列宁就是把这种观点当作武器去反对当时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者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还坚持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去对待社会问题，必须按照法则处理社会事务。他认为，支配人类历史的法则说到底思想法则，物质环境不过是次要的东西，只有社会进化的早期是例外。他写道，“同思想的发展相比，气候、土壤、资本来源，甚至连物质力量都是无足轻重的”。他认为，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是人类生活所在的社会制度，同时认为，社会制度是人为的，深受那些左右群众的盲目行为冲动的强者的影响。最后，他认定，人类历史是必然的法则的表述，所以伟大人物只能在既定的发展秩序所体现的一般条件下左右人类历史的进程。他说，人类的进步“不过是进展的法则而已”——一种无需解释的纯自然现象。但是，他认为，必然的法则就其本质来说，并不是经济性的，不过是有机的进展过程的表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种自然进化论的革命性的一面就表现在他坚持，人类的进步是缓慢的，“其中十分之九是在短期的紧张活动中发生的。历史缓慢地运动着，但其全部进展几乎都是通过突然的飞跃而发生的”。但是，即使在这一点上，他对事物的起因的看法仍同马克思的相去很远；因为他把进展的加速和

延缓主要归因于有无伟大人物的出现，而不是归因于生产的物质条件的改变。这同他极度强调个人，摈弃一切超个人的社会目的是一致的。他写道，“普天之下，我最重视的莫过于个人。”

在这一章里，还有必要略谈俄国的另一位社会主义者，但并不打算讨论同他的名字关系最密切的民粹运动。此人是彼得·拉甫诺维奇·拉甫罗夫（1823—1900年）。他是一个陆军上校的儿子，1844年到1867年在圣彼得堡军事学院教数学，他经常向带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杂志投稿，并以此而知名。然而他这时还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更不是一个革命者。在卡拉科佐夫暗杀亚历山大二世失败以后进行大迫害期间，他被逮捕并被放逐到沃洛格达，尽管当时他并没有做任何足以引起警方注意的事情。他在沃洛格达的三年期间匿名写出了他的名著《论史信札》，并且通过了检查。这部书在俄国的年青知识分子中不胫而走，很快流传开来。1870年，他逃亡国外，参加了巴黎公社，公社派他到布鲁塞尔和伦敦去组织支援工作。巴黎公社失败时他正在国外，因而躲过了迫害，后来还在巴黎定居下来。1873年，他在巴黎创办了《前进》杂志，并且发展了他的社会学理论。这时他已经成了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不同于巴枯宁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因为他反对立即进行革命，并且力陈有必要进行长时期的教育和伦理宣传，为建设新社会铺平道路。他的社会主义理论实质上是进化论。他不愿意同涅恰也夫或巴枯宁的信从者打交道，更不愿意和跟他一同流亡的特卡切夫有任何联系。后者在日内瓦主办《警钟》（Nabat）杂志，并在杂志中指责巴枯宁是资产阶级反动派，同时宣传由训练有素的中坚分子组织暴动的纯布朗基派学说，其措辞之激烈，甚至连俄国国内的恐怖主义者（包括热里雅鲍夫的民意党）都加以指责。^①列宁曾赞扬特卡切夫是真正的革命者；近年来，更有人企图把他塑造

^① 关于热里雅鲍夫和民意党，参看本卷第318页及以下。

成一位预示共产主义理论的革命思想家。但是，实际上他是布朗基和巴贝夫的追随者。他坚持，必须由训练有素的中坚分子来进行革命，然后才能把广大人民争取到革命方面来。而拉甫罗夫则始终主张，在实际发动革命以前，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宣传和教育，为革命胜利提供必要的基础。正是由于这种信仰，拉甫罗夫在1881年以前恐怖主义活动盛行的年代里，是置身于俄国革命运动之外的。后来，在民意党于流亡中重建的年代里，他大力支持民意党，从1884年到1886年，同列甫·吉霍米罗夫（1850—1922年）在伦敦合编民意党的杂志《民意》。吉霍米罗夫其人在民意党内是同热里雅波夫是齐名的，1881年以前曾在俄国主编民意党的秘密刊物。在流亡中，他写了热里雅波夫、彼洛夫斯卡娅和恐怖主义者其他领袖的传记；但是后来他改变了政治立场，回到俄国，成了极端反动派的名记者。同他相反，拉甫罗夫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见解。事实上，他终其一生是个资质天成的思想家，而不是一个行动家；他的不朽地位在于历史社会学方面。

55 拉甫罗夫社会学理论的基础是对于个人的创造力的坚强信念。他认为，人类社会是从同动物社会形式相类似的社会形式中发展出来的。他说，原始人类就象他们的动物祖先一样，开始的时候是在基本需要的驱使下，单纯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的。但是在人类社会中，共同生活的过程除去发展了利己主义行为以外，也发展了利他主义行为。于是正义感产生了；慈善和互相友爱的意识也产生了。此外，智力的成长带来了批判的能力，使冲动理性化，成为伦理上必须遵循的原则。理智的运用改变了纯由习惯支配一切的做法；人开始形成理想，并作出合乎道德的抉择。拉甫罗夫坚持说，在这些发展中，始终是某些个人起着带头作用，并且通过教诲和示范逐渐赢得皈依者，因此，文明的发展始终是少数天资过人而又富有正义感的人的成就；领导人民走向更高的生活方式正是

这样一批少数人的使命。因此，知识分子的责任是穷毕生精力为人民工作，以报答人民于万一，因为是人民给了他们优越的机会。

拉甫罗夫说，历史是由个人按照自己理想中的模式创造出来的。文明的发展远不是物质力量所决定的，而是伟大人物用说服的方法而非武力的方法把自己主观思想的模式赋予社会而得到的成果。尽管是这样，拉甫罗夫仍然承认历史的运行是由客观决定的，不过他只是从下述意义出发接受这一见解的：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伟大变革者的主观思想就象物质环境一样，也是客观事实。

自然，这些见解使拉甫罗夫遭到每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猛烈攻击。在俄国共产党人的著述中，他被称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典型。他们指责他不把工人阶级当作创造历史的力量，而仅仅当作供高人一筹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摆布的原材料，同时指责他犯了滔天大罪，把思想而不是物质条件当作人类发展的主要动力。

〔拉甫罗夫写道〕理想产生于个人的头脑；理想随着个人的知识和道德标准的提高而相应地在质量上提高，它也随着个人人数的增加而相应地在数量上增加。当许多个人意识到他们的目标一致并决心采取一致行动时，理想就成了一股社会力量。 56

另一方面，人类的大部分由于注定要为他人的利益过单调而十分劳累的生活，因而也就被剥夺了率先在道德 and 知识方面创新的机会，他们充其量只能跟着较幸运的人中间那些认识到自己有责任为人民服务的人走。这就是尼古拉·米海洛夫斯基（1842—1904年）后来在俄国加以发挥的民粹主义理论的基础，他同拉甫罗夫一道通常被认为是民粹主义和继承民粹主义的社会革命运动的理论鼓吹者。不难看出，拉甫罗夫关于知识分子有责任为人民

服务的思想，是怎样从原来所坚持的以和平的示范和说服进行宣传的立场发展成为“用行动进行宣传”的行动主义理论的。当所有其他行动手段似乎都因受到压制而无法采取时，这种理论便吸引了俄国的知识分子。

这里不能详谈拉甫罗夫或米海洛夫斯基，他们所属的时期基本上比本章所涉及的时期晚一些。这里之所以提到拉甫罗夫，完全是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快要开始的时候退出了舞台，而赫尔岑的影响又已衰微，这就留下了一段空白，拉甫罗夫所著的《论史信札》就在这十年结束以前起了填补空白的作用。

第四章

57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比利时社会主义——

柯林斯、卡茨和德·凯色尔

到十九世纪中叶，“空想社会主义”的鼎盛时代已成过去。此后，虽然欧文、傅立叶、卡贝和其他设计大师仍不乏其忠实信徒，而圣西门派的影响也决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位大预言家能够提出一整套显然冠甲诸家，使世事各得其所并适用于全人类的理论体系。不过倒也产生过一位第二流的独树一帜的预言家。他的学说象圣西门或孔德的学说一样无所不包，也同样保证他的立论原则以及根据这些原则得出的实际推论绝对公正。这个晚一辈的空想家是比利时人，名叫柯林斯。他的主要著作都是五十年代，也就是在他漫长而多变的一生最后几年问世的。他的著作在比利时国外从来没有发生广泛影响，不过在他的本国以及在法国和瑞士，他也有一些追随者，甚至在英国以及遥远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也有少数支持他的人。他的理论体系叫做“理性社会主义”，他在几部多卷本的著作中阐述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从实际政策的角度来看，他的理论的基础是公有制，首先是土地公有制，也包括其他大规模生产工具的公有制。但是在“柯林斯的”思想体系中，这种公有制看来是从关于人的天性和人在宇宙万物体系中的地位这个总理论中得出的理性推论。

柯林斯——正式称呼为让·希波力特·德·柯林斯男爵(1783—1859年)——1783年生于布鲁塞尔，自称是秃头查理的后

裔。他 17 岁时到巴黎，原打算进综合技术学校读书，但是改变了主意，加入了法国陆军，因为他希望参加拿破仑计划的对英国的进攻。他最初当列兵，后来由军士升为军官，1815 年拿破仑最后失败时他已经是上校了。波旁王朝复辟时，据说当局曾给他将军头衔，但是他仍然忠于拿破仑，因而便离开了法国，先到比利时，后来又回到美国。他在美国曾力图搞一个利用潜艇或气球飞艇救出被废逐的皇帝拿破仑的计划。他为此而进行的研究工作使他成为费拉德尔菲亚科学院院士；他还学医有成，取得医师资格。后来他去哈瓦那，在那里搞起了一个大农庄，同时开业行医。他在那里一直呆到 1830 年法国爆发革命才回到欧洲。在巴黎定居后，他打算组织一个拥戴波拿巴的密谋。但是在拿破仑第二^①死了以后，他放弃了政治活动而开始著书立说。早在 1813 年，他已经写成《农业经济笔记》，这本书得到了法国农业协会的金质奖章，但是从这一年起直到 1834 年，他没有发表过重要著作。1834 年，他匿名发表了一本书——《社会契约》——明确地提出了土地国有化的主张。这一著作虽然不大引人注目，却为他赢得了第一批弟子，其中有他的理论在比利时的主要阐释者路易·德·波特尔。从此以后，柯林斯发奋钻研了 15 个年头，只是在 1848 年革命期间一度中断，在革命过程中，他曾经被捕，在“血腥的六月”死里逃生，险些死在卡芬雅克将军的士兵的枪下。在这 15 年中，他始终是一个热忱的波拿巴主义者，认定只有在一位明君的统治下，他的“理性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但是，拿破仑第三无意采纳他的建议。从 1851 年到 1859 年去世时为止，柯林斯在一系列著作中阐述了自己的建议，重申了同样的思想。在 1851 年到 1854 年间，他出版了四卷本《什么是社会科学？》。1856 年，他出版了三卷本《政治经济学，革命和所谓社会

^① 这里指的是法国拿破仑一世的儿子、奥地利皇帝的外孙赖喜斯塔特公爵。
——译注

主义乌托邦的来源》和两卷本《新社会及其需要》。1857年，两卷本《论主权》和五卷本《社会科学》问世。他的三卷本《论教会和革命以外的科学的正义》是在他去世后的1861年问世的。他还留下了其他一些著作的手稿——如论笛卡儿、论培根、论宗教和唯物主义、论资产阶级以及论折中主义哲学等手稿，其中一部分在他去世后已由他的弟子编辑出版。

作为一位哲学家，柯林斯既是无神论者，又是反唯物主义者。他相信，个人的灵魂是永生的不可摧毁的，是自我存在而非任何更高的存在所创造的。他说：永生的灵魂不仅在这个世界中，而且还在构成宇宙的无数其他世界中相继肉体化为一系列躯体；每个灵魂都把历次肉体化时构成它本身的成分带入新生命。他在人同动物之间划了一条绝对的界限，他认为动物是根本没有“判断力”的。他认为，宇宙中除了人以外，一切东西都是物质的，注定了的，没有思想和感觉。唯有人具有肉体 and “非物质的判断力”，这两者的结合构成了“真正的智慧或自由”。柯林斯坚持说，人的灵魂掌握自由意志和道德准则，承担采取正确行为的责任。

柯林斯的空想主义极其清楚地陈述在他的非常简单的历史理论中。他把人类的整个过去和现在仅仅分为两个历史时代，随后便是人类注定要进入真正自由和幸福的王国，即第三个历史时代。在这些时代中的第一个时代，人生活在一种不懂得有任何权利的状态中，他所知道的唯一行动规则是强者强加于弱者的法律。但是，由于这条规则的运用，混乱状态不断造成威胁，人类有彻底毁灭的危险，于是强者发现有必要使弱者自愿地服从，而不能单纯利用武力迫使弱者就范。柯林斯说，这就是宗教的社会起源。强者控制教育程序，把如下信念灌输给弱者：强者的统治是以超人类的上帝向人类所启示的法律为基础的。他们自封为解释这种所谓的启示的教士，自封为解释同一说法的“世俗部分”的立法者。“这样

60 一来,武力就变成了权利,服从就变成了义务。”强者以教士和立法者自居,下令严惩任何怀疑他们的法律的弱者,并且利用权力剥夺广大群众接受一切知识文化的机会以及全部空闲时间,强迫他们为强者从事繁重的劳动,使弱者完全处于野蛮状态。强者还有意识地把每个社会的弱者同其他社会隔绝起来,因为如果让他们进行接触并了解各国在法律和习惯方面的差别,就势必会唤起广大群众的批评精神,并对自己所处社会的教士和立法者所灌输的教条逐渐表示怀疑。为了做到上述各点,强者从耕种者手里夺走了一切财富的本源——土地。这就是人类历史的第一阶段,其特点是“戴着欺骗的假面具”(诡辩)的武力统治。

但是这种状况不可能无限期地保持下去,因为把一个社会同另一个社会永远隔离开来是办不到的。创造发明方面的进展使这种状态无法保持。航海家的罗盘冲破了大陆之间的隔绝;火药的发现把战争艺术变成了一个如何以科学为基础运用智慧的课题,并推翻了暴力主宰一切的局面;印刷术的发明使得知识的传播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最后,铁路和电报的利用实际上缩短了空间的距离,打破了各民族之间的知识界限,促进了国际批判精神的增长,而这种趋势又是自封的旧权力制度无法抗拒的。

但是以这种方式摧毁旧秩序并不足以建立新秩序。批判的发展倒是造成了一种新的无政府状态——这次是意见上的互相冲突和不断改变而造成的无政府状态。人们不知道真正的理性法则;他们只相信不同的事物。“社会科学”还不成立,因为如果成立的话,人人都会承认它,就如同人人都承认数学的基本命题和自然科学的基本定律一样。而且“权利也会是一致的,就象科学是一致的一样。”

那么,人类将遇到什么局面呢?人类将陷入混乱。柯林斯说,
61 在这种混乱中,“财富和贫困将在两条平行线上同时增加”,也就是

按照无政府主义者所谓的“政治经济学法则”发展，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种局面同维系社会存在所必需的秩序是完全不能相容的。贫者终于看到自己的贫困是财产制度带来的后果。他们看穿了宗教的诡辩，并且得出结论说，象“责任”和“权利”之类的字眼无非是毫无意义的空话。他们还得出结论说，他们之所以贫困不过是因为他们没有使自己成为强者的头脑吧了。于是，革命的时代开始了：穷人奋起反对富人，而且由于人数众多，结果取得了胜利。但是仅仅是穷人获得胜利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胜利只是带来了另一个同样风雨飘摇的强者统治。于是革命一个接着一个，永无尽头。

那么，怎样才能使革命时代结束呢？柯林斯宣称，只有从物质和知识两方面出发去消灭贫困，革命时代才能结束，那就是说，只有把自由生存的物质资料——特别是土地——交还给众人，只有教育众人懂得权利的真正理性法则，革命时代才能结束。按照柯林斯的意思，所谓权利的理性法则就是：“判断力”是人的一种不断更新的力量，它不受外力的影响，依靠它才能建立起公正的社会秩序。但是广大群众单靠自己永远也学不到这一课，而统治众人的强者也永远不愿意把这一课教给自己的子民。产生新秩序的唯一希望就在于地球上的某个地方出现一位大权独揽的人物，他割断同特权阶级的联系，献身于人类的启蒙工作。即使是这样一位人物也不能指望对自己的同辈人的思想起有效的作用，但是他可以控制学校，利用学校向青年人传授真正的知识，从而使他所统治的社会在下一代取得如此突出的成就，以致所有其他社会都纷纷效法，惟恐后人。柯林斯接着说，这就要求这位集大权于一身的人物利用权力防止社会上的成年人由于盲目无知而破坏他的教育实验。此外，这位仁慈的统治者还必须防止按这种方式接受真正科学教育的儿童在离开学校进入社会时，由于受到旧秩序消极因素的影响

62 而盲然不知所从。为此,他必须实行国内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并通过土地集体所有制以及把生产资料拨给每个善于利用的人的途径,“一并消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只让一个阶级——人类——留在世上”。

这种奇怪的理论显然大大得力于圣西门及其信从者,也大大得力于孔德,不过,集数家之说成一家之言则基本上是柯林斯自己的成就。柯林斯及其弟子在这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具体建议,建立起相当庞大的上层建筑。他们不仅要求实行土地的集体所有制,而且要求变生产的其他资本要素为集体所有。但是他们并不希望由集体本身来耕种土地或者组织工业的日常生产。就象托马斯·斯宾士和其他早期的“土地国有化提倡者”那样,他们希望通过小型公共管理机构——公社——把公有土地出租给个人或生产者团体去耕种,由个人或生产者团体支付同生产价值相适应的地租。柯林斯及其弟子希望公共管理当局把土地分成适当的小块,连同必需的建筑和设备一并出租。同样,他们要求把工业厂房和设备出租给出价最高的人,不论出价者是个人还是合作社。只有真正的大规模事业,比如铁路、某些采矿企业和公用事业,他们才主张归公共所有,也归公共经营。为了使人人都有机会公平地获得生产资料,柯林斯及其弟子要求按照蒲鲁东所鼓吹的方式,建立公共信贷银行;不过他们认为,个人和合作生产者的流动资本应部分地由生产者本人提供。为了使人人都有公平的机会以这种方式参加生产,他们建议国家应在每个人完成学业以后给他一笔基金(“嫁妆”),由他自由地把这笔钱投入他去工作的企业,但不得挪作他用。法律应该禁止一切固定资本的私有;一切现有的以合股所有制为基础的公司和法人团体都应解散。

63 为了实现私有财产向公有制的全面过渡,柯林斯主义者建议对一切在业主去世时根据他的遗嘱转手的财产课征 25% 的遗产

税。他们进一步建议取消一切旁系亲属的继承权，并在死者无遗嘱的情况下，将全部财产交给国家，但死者有直系法定继承人者不在此限。他们希望不去触动直系亲属的继承权，因为这可以为劳动提供必要的刺激因素；他们也希望允许任何产权人根据自己的意愿将财产留给任何人，只要缴纳遗产税，因为这也是一种必要的鼓舞因素。但是必须记住，这种遗留的私有财产只限于业主实际使用的财产。如果业主的继承人不把他所继承的财产当作他个人劳动的附属物而加以利用，他便丧失产权而归国家所有，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所有权并不能成为鼓舞生产的因素。为了使人民作好准备，能够在按照上述步骤建立起来的社会中生活，柯林斯及其信从者建议国家对教育实行最彻底的控制。所有儿童到两岁时都由父母交给国家照管。国家免费供给儿童膳宿和衣着，向他们灌输知识，教导他们为未来的事业作好准备；这种制度一直继续到儿童成年。在教育过程中，男女学生完全分校。在结束这种公共教育后，每个男子由国家分配到某项公共工程中工作五年，在此期间由国家维持生活，只是在这个阶段结束时一次领取他的全部工资以及他的社会“嫁妆”。这时他就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并把他的流动资金定额投入他决定加入的任何企业。

关于政府，柯林斯主义者也有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严格说来，当人类事务按照理性法则进行科学管理时，立法就不再需要了。留下来的只是如何执行理性法则的问题，而这一点只要建立合理的秩序，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他们认为，每个有理性的人都应该按照他所具备的得到同等地位的人承认的能力，对贯彻理性法则作出个人贡献。但是他们坚持以结婚作为取得正式公民资格的必备条件。柯林斯的瑞士高足胡根托布勒说：“集体大家庭不应该由宦官或苏丹来管理。” 64

柯林斯及其弟子一再坚持，应该把社会看作是一个集体大家

庭。他们说，社会的管理应该采取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兼行并施的制度。基础单位是公社，他们称公社为“第一级城市”，它由一个普选产生的社长和社政委员会管理。若干个公社组成“第二级城市”，即区，区长和区政委员会由公社社长和社政委员会共同选举。更高级的组织是第三级和第四级城市，最后是一个“第五级城市”——以整个世界为范围的“环球共和国”。各级“城市”都有它的市长和市政委员会，由比它低一级的市长和市政委员会选出。同这种“地方分权”制相结合的是一种自上而下任命的“中央集权”制。“第五级城市”市长给每一个“第四级城市”任命一名委员驻在“第四级城市”，监督“绝对法则”以及适用于全世界的一般性行政规定的执行情况。以下各级也是这样，驻在“第四级城市”的委员再任命委员驻在“第三级城市”，以此类推，直至公社一级。柯林斯及其弟子认为，这种自下而上的选举同自上而下的任命相结合，就为十分平衡的政府奠定了巩固的基础；但是他们并没有下多大工夫去规定体现地方分权的市长和市政委员会以及体现中央集权的委员的权力，也没有费多大气力去说明应该赋予各级“城市”什么职能。后来西萨尔·德·巴普以及在柯林斯派中间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探讨。西萨尔·德·巴普深受柯林斯的影响，虽然他反对柯林斯派的总的哲学观点。但是在这些问题上并没有公认的正统派，提倡这一理论体系的人，有的主张高度的地方自治或区域自治，有的则赞成比较集权的制度。柯林斯本人，由于坚信自己的理论体系是完全合乎科学的，往往认为只要根据科学的教训明确提

65 出根本法则，这些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因为在他看来，到那时就会显然看出哪里需要一致，哪里需要在服从世界的统一制度这一原则下，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条件和经济结构而因地制宜。

当然，我们不难把这一大套假科学的理论体系目之为一派胡言而予以否定。对柯林斯持批判态度的人很快就指出，他的理论

体系是以纯教条为依据的，他用来证明自己的体系正确无误的唯一办法是反复申论之。柯林斯派——还有他们的老师——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一再宣称他们想要肯定的任何事物“就象二加二等于四那样正确”。他们这样说的含意是，在他们看来，他们的基本命题的真实性是不言而喻的，无需证明。

当然，标榜自己忠于“科学”、声称科学的法则放之四海而皆准、同时又完全无视从假设出发进行研究的程序是自然科学方法的特色的人，并不仅限于柯林斯及其弟子。柯林斯的全部著作是一位独自进行思考的思想家的典型产物，他构思出一整套独创的理论体系，用以表达自己的愿望和情感，并对其真实性深信不疑，因为这套体系符合他自己的思想模式，而且渗透着他自己的个性。

然而，如果认为柯林斯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完全不重要而予以抹杀，那又是错误的。他在以下两个方面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第一，他把土地和资本的集体所有制这个主导思想注入了社会主义发展的主流中；第二，他强调每个公民都应接受国家的教育和训练，使之具备为巩固公正而合理的社会秩序所必需的知识 and 道德条件，以便为完成社会所要完成的工作做好准备。他也是主张由青年组成“产业大军”去建设适当的公共工程的重要先驱者。他把物质的“贫困”和知识的“贫困”联系起来，认为必须首先根除这对孪生的弊端，才能在理智和正义的稳固基础上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他的这一见解也有独到之处。

同这些创见恰恰相反，柯林斯对于灵魂和肉体持有荒诞不经 66 的想法，而且坚信必须由一个独裁者开创新秩序，由他着手训练新的一代，使青年具备正确的社会态度和有关“社会科学”法则的知识。这就势所必然地使柯林斯同工人阶级中主张全面社会变革的大部分人对立起来。正象圣西门一样，柯林斯从一开始就对拿破仑第一寄予厚望，继而又把满腔热情倾注在拿破仑第二和第三身

上,这就使对立更加尖锐了。毫无疑问,1848年以后,拥护波拿巴主义的大有人在;事实上路易·波拿巴也曾处心积虑地争取无产阶级的支持(它的许多成员在“血腥的六月”中死于卡芬雅克将军的屠刀下),用以对付居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但是不管怎么说,在政变以后,拿破仑第三并没有摆出任何道理足以赢得有组织的工人——政治俱乐部和行会的骨干——对他的爱戴。柯林斯提出的由好心肠的独裁者开创新体制的号召使自己的影响大受限制。象孔德一样(事实上同孔德形成了激烈的竞争),柯林斯主要是在专业工作者中得到支持的。他的弟子是医生、律师、建筑师、公务员和思想混乱的商人,而不是体力劳动者。柯林斯的学说在法国和比利时这类人数有限的阶层中具有相当旺盛的生命力;在瑞士,情况也是这样,只是范围更小而已。在弗雷德里克·波尔德的领导下,柯林斯的学说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甚至还再度活跃起来,声势相当可观;波尔德是柯林斯派杂志《未来的哲学》的编辑。柯林斯的第一批主要信从者是比利时人路易·德·波特尔^①和瑞士人胡根托布勒,他们编辑了柯林斯的某些著作,并且出版了柯林斯理论体系简编。其他主要提倡者有路易·德·波特尔的儿子医生阿加松·德·波特尔^②和巴黎建筑师德拉波特。我们已经谈过,在第一国际中,比利时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家西萨尔·德·巴普就深受柯林斯的影响。这一点等我们以后介绍第一国际就公有财产的集体化和管

67 理问题展开论战时就显然可以看出。

但是,如果把柯林斯看作是对于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作出别具比利时色采的贡献的唯一人物,那又会引起误解。事实上,柯林

① 路易·德·波特尔(1786—1859年)在1830年比利时革命中起过重要作用。他的主要著述发表在柯林斯的著作问世以前,主要是在晚年才接受柯林斯的影响。

② 1881年,阿加松·德·波特尔也发表了一部概述柯林斯的社会理论体系的著作。

斯虽然在比利时出生和成长,但就其思想发展和社会关系来说,却是法国的色彩多于比利时色彩。早在柯林斯用自己的名字写出任何实质性的东西以前,比利时佛兰芒族人雅科布·卡茨(1804—1886年)就在奠定比利时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方面起了作用。卡茨是一名于1830年以后避居布鲁塞尔的荷兰共和派军官的儿子,最初是织布工人,当过学校教师,以后成了烟草商人,他在业余时间写了一些带有宣传性质的通俗剧本。作为一位社会思想家,他写了许多关于艺术如何影响人民生活的论著,强调必须提供条件来满足创作的要求,以便为民主的社会秩序奠定基础。就象法国的路易·勃朗一样,他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就大声疾呼,要求成立“劳动组织”,认为这是国家对广大人民的责任。他大力鼓吹普及免费的民主教育,同时实现充分的信仰和政治自由。也象勃朗一样,他要求实行普选制,把普选当作变国家为促进大众福利的机构的手段,并且主张专门对富人的过分利得课征赋税。

对早期的比利时社会主义思想作出贡献的第三个人是农民几何学家纳波里昂·德·凯色尔(1806—?)。他曾积极参与1830年的比利时革命,并在此后的几年中同卡茨密切合作。除了报刊文章以外,他的著作不多,他的成名巨著《自然的支配》直到1854年才问世,而这个时候柯林斯已在又多又快地出版著作了。德·凯色尔的巨著的大部分是很早以前就已写成的,他的主题是直截了当地攻击他所谓的“双重封建主义”——土地既得利益和工业制度。他说这是工人必须与之斗争的孪生敌人。象柯林斯一样,德·凯色尔断言,人人都有权分得一份土地,又说这种权利——在他看来是一种“自然权利”——只有实现公社所有制才能真正享受到。他希望公社拥有土地,并把土地出租给佃户或合作组织。他还建议 68
公社提供有效利用土地所必需的流动资金。小型工业企业应同样由公社提供资金,而那些需要大规模经营的企业则应由适当地区

内的公社联合组织来掌管。这些建议实际上同柯林斯的建议如出一辙，很难判定是谁首先想出来的。德·凯色尔与柯林斯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更加坚决地赞成公社独立，而反对集中控制。他并不附和“理性法则”说，根据这种法则，一切问题都会得到“科学”的解决，他认为有理性的人也可能产生意见分歧。他也根本不同意柯林斯所主张的要由一个大权独揽的人物来开创新体制。他主张由一定地区内的独立的公社联合起来共同经营或监督大规模企业。但是正如巴枯宁的信从者后来的态度一样，他也坚决主张地方公社应该是一切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基础，绝不受任何政府强加下来的一切控制。就建立新秩序来说，德·凯色尔认为革命是必要的手段。他攻击这样的想法：在仍然保持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向富人征税就能实现收入和财产的再分配。他还攻击宗教组织，认为它是以特权为基础的不公正的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但是他相信宗教是人类的自然冲动，并力图创立一种不披神学外衣的“自然宗教”。

在德·凯色尔的著作中，关于资产阶级在不断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遭遇的论述并不是最无关紧要的部分。在他的词汇中，资产阶级一词并不是指大资本家，而是指马克思一直称为小资产阶级的小雇主、商人、小农户和其他中间集团。德·凯色尔指出，这些中间阶级在大规模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中遭到无情的摧残。69 他说，他们的利益在于同工人站在一边，向封建地主和日益强大的大资产阶级投资者、商人和放债人的阶级联合力量展开斗争。他不同意工人应该帮助资本家去反对封建主义者以便向社会主义迈进一步的见解。毫无疑问，这是受了这样一个事实的影响：比利时的工业比较先进，封建主义者和大资产阶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联合起来，掌握了 1830 年革命所建立的新国家。比利时的社会和政治形势实际上更接近于英国，而不是德国，甚至更不是法国。在许

多方面，德·凯色尔的分析比马克思更适合比利时的情况。

比利时的情况始终由于社会成分的混杂而显得错综复杂。卡茨和德·凯色尔是佛兰芒族人；柯林斯则是瓦龙族人。一般说来，瓦龙族地区的工业比佛兰芒族地区发达，讲法语的工人和知识分子远比佛兰芒族人易于接受法国的影响。

事实上，法国和比利时的社会主义关系从一开始就很密切。巴贝夫的同事和传记作者邦纳罗蒂一生有大部分时间在比利时度过，他的叙述平等派密谋的著作就是在布鲁塞尔出版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布鲁塞尔是仅次于巴黎的德国流亡者的聚会中心，马克思在迁往伦敦以前就曾在这里生活过一个时期。在拿破仑第三统治时代，许多法国人在比利时避难，凡是不能安然无事地在法国出版的书刊都在布鲁塞尔或根特出版。有许多讲法语的比利时人在法国工作；往来于两国之间的人不绝于途。

1848年以前，尽管有德国的流亡分子，法国作为革命运动和革命思想的主要中心，仍然发生普遍的影响，而佛兰芒族人受德国或荷兰激进思想的影响则比较少。事实上，直到很久以后，荷兰对社会主义思潮简直就没有作出任何贡献，在第一国际中所起的作用也微不足道，甚至连这一点作用也主要是反映比利时的佛兰芒族人的活动。佛兰芒族人知识比较闭塞，正因为这一点，他们竟然能够对社会主义思潮作出象卡茨和德·凯色尔两人所作出的那样 70 重大贡献，也就更加值得刮目相看了。至于柯林斯，应该把他看作是最后一个受法国思想启发的空想理论体系的创造者，而不是一个别具比利时特色的思想家。我们下面将要谈到，在德·巴普身上，法国和佛兰芒族的影响是兼而有之的；后来由于路易·贝特朗的领导，比利时社会主义的发展又受到法国影响的支配；而另一方面，在爱都阿·安西尔领导下的比利时合作运动的发展中，法国和佛兰芒族的影响又重新融合在一起了。在荷兰，第一个重要

人物是 H·格哈德(1829—1886 年),他把服装工人组织起来,又在 1872 年写了一本论第一国际的小册子,但是在对荷兰人传播国际主义思想中起主要作用的还是来自比利时的佛兰芒族人,比如范·登·阿比尔。不过有关这些方面的情况都属于后面的某一章。我在这里只是想说明,在促成十九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伟大的欧洲社会主义复兴的知识力量中,不应该象往常那样忽视比利时的贡献。

第五章 拉萨尔

71

在 1848 年革命失败后的德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中,荣誉应该归于斐迪南·拉萨尔,而不是归于马克思。马克思在流亡中无法对德国的舆论直接发挥作用,事实上,他也不具备领导群众所需的品质。1850 年有几期《新莱茵报》在德国出现;1851 年海尔曼·贝克尔在科伦出版了马克思的《选集》一卷(第二卷始终没有出版)。在这以后,马克思再也没有什么著作在德国出版,直到 1859 年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才在柏林发行。甚至连 1853 年在瑞士印刷的、准备在德国发行的马克思抨击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小册子也没有能够传到预定的读者手里^①。这些年,马克思在德国有一些忠实的朋友和崇拜者,但是即使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问世以后,他也没有得到普遍的拥戴。直到威廉·李卜克内西于 1862 年重归国门,马克思在德国才算有了一位能够用通俗形式阐释他的基本理论的代表,而在国际工人协会成为一种富于挑战性的力量以前,马克思的名字甚至在日益强大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大多数领袖当中也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拉萨尔是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物,也是那个国家第一个相当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实际创始人。事实上,他非常熟悉马克思的著述,并且一再提到和推崇马克思是他的老师。但是拉

^① 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德文在纽约出现。1852 年发表在约·魏德迈编的《革命》杂志上。马克思攻击维利希的小册子《高贵意识的骑士》也于 1853 年在纽约和伦敦出版。

72 萨爾天生是个自視過高的群眾領袖，是個過分自命不凡的人，因而不論在實踐中還是在理論上總是不甘屈居人下，從來沒有真正接受過他人的領導。雖然馬克思一開始就為拉薩爾的才華所吸引，而且希望能夠把他引上正道，但是縱使當時他們都在德國，也不可能設想他們能夠合作。在實際政治中，拉薩爾恃才傲物，以領袖自期而不肯聽命于人，而在理論問題上，不管他準備把馬克思作為一位思想家推崇到什麼地步，他也会置馬克思的反對意見于不顧而自行其是。毫無疑問，在理論方面，他們有許多共同之處；而他們的意見分歧在他們的大多數信從者看來也是無關宏旨的。但是在實際政治中，他們相去十萬八千里，因為馬克思是支持資產階級反對普魯士國家的，而拉薩爾却十分願意同普魯士國家站在一邊去反對資產階級。此外，在上述分歧的背後，還存在一個理論上的分歧，這個分歧就其本質來說要比他們關於決定工資高低的因素以及合作企業的價值的對立理論重要得多。拉薩爾儘管十分熱衷於個人權勢，却深深相信普選制是把國家變成民主工具的一種手段；而馬克思儘管十分願意幫助資產階級當政，儘管十分堅持有必要採取議會行動，却根本不相信這一點。不過這個分歧過了很長時間，在拉薩爾過早地逝世以後很久，才顯現出來。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他們的分歧看來是在經濟而不是政治上，甚至更多的是在兩人遭遇的懸殊上，而不是在經濟或政治上。馬克思落泊異邦，生計維艱，對於拉薩爾的揮霍無度深有反感，即使在拉薩爾訪問倫敦，馬克思勉為其難地招待他時，也是懷着這種情緒；而拉薩爾對於馬克思的卓越知識的頌揚則帶着幾分馬克思決不能容忍的施惠于人的味道。

儘管是這樣，在 1859 年以前，兩個人並沒有公開決裂。正是拉薩爾為《政治經濟學批判》在柏林找到了一家出版商，並且商定了有利的稿酬條件。拉薩爾把他所著的跟《政治經濟學批判》同年

出版的革命诗剧《弗兰茨·冯·济金根》送了一本给马克思，并为恩格斯的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在柏林出版作了安排，尽管他完全不同意这本小册子中的论点。这本小册子论述了普鲁士就拿破仑第三企图插手干涉奥地利和意大利因伦巴迪问题而产生的纠纷所应采取的态度。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全力支持下，赞成普鲁士出面干预以支持奥地利反对拿破仑。与此相反，拉萨尔则认为维护奥地利在意大利北部的控制对普鲁士并无切身利害关系，并认为法国和德国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大动干戈对于欧洲文化和欧洲社会主义的前途都是危险的。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和拉萨尔之间本来就不自在的同盟关系开始破裂。关于这个问题，如果要追究谁是谁非，所需的时间那就太长了。马克思甚至十分错误地指责拉萨尔故意阻挠《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版；此后他总是以不信任的态度来看待拉萨尔的一举一动，而随着拉萨尔在德国的工人阶级运动中建立起领导地位，这种不信任也就恶化成为更加深刻的对立。然而这并没有妨碍马克思继续同拉萨尔保持关系，因为他如果同拉萨尔公开决裂，就必然会使自己同德国各邦日益壮大的社会主义运动隔绝，而这正是他所经受不了的。

斐迪南·拉萨尔生于1825年，卒于1864年，他在短暂的一生中从事大量活动，不仅是德国工人阶级运动中的杰出人物，而且还是哲学家和律师，他曾在哈兹费尔特伯爵夫人同她丈夫的长期诉讼中担任女方的辩护人^①。最后还有一点也不无重要意义：他是

^① 哈兹费尔特案件同社会主义毫不相干，只是在下述意义上同拉萨尔的政治活动有联系：这个案件使他能够作为一个受虐待的妻子的维护者来反对一个滥用财富和权力而拒绝给予妻子以公正待遇的德国贵族。拉萨尔于1845年第一次会见伯爵夫人时年方20岁，这时伯爵夫人已经同她丈夫分居了很久，并因财产权利以及孩子们的赡养问题同丈夫发生复杂的法律诉讼。拉萨尔看来是本着一种浪漫的打抱不平的精神受理这个案子的。这使他进行了10年斗争，只是在1848至1849年革命期间中断过，他由于革命活动，在杜塞尔多夫坐了一年牢。哈兹费尔特案件的双方对簿公堂达36次之多，闹得满城风雨，尽人皆知，其中还横生不少枝节——包括为了弄到确定伯爵夫人权利所需的证件，竟从伯爵的情妇梅仁多夫男爵夫人那里偷来首饰盒的轰动一时的事件。这个案子以伯爵夫人的胜诉而告终，她出于感激送了辩护人一笔优厚的可以年年领取的报酬，并热烈支持拉萨尔于胜诉后所致力政治斗争。

个猎艳能手，无法抗拒他的追求的女人看来多得出奇。拉萨尔的生平对于传记作家具有无穷的吸引力，他的传记很多，因而象本书这样的著作完全没有必要再重复已经被多次涉及的领域。但是拉萨尔的性格同他对德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的贡献关系如此密切，以至不可能完全略而不谈他的活动中的那些表面看来好象同社会主义很少关系或者毫无关系的部分。最适当的做法只能是，尽量简短地谈谈这些同拉萨尔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重要性显然很有关系的方面。

拉萨尔是西里西亚的犹太人，生于布累斯劳，当时普鲁士的犹太人仍然受着不平等的公民身分所带来的种种限制，更有甚者，还要受到卑微的社会地位所招致的屈辱。拉萨尔从小就对自己因种族出身而蒙受的歧视愤愤不平。这种愤懑情绪使他本来就有的凌云之志更加坚强。他初入社会就下定决心要一鸣惊人，不顾重重障碍，努力攀登某种领导地位。不论他从事什么工作，他都抱着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决心。正如他为那个表面看来是无希望的哈兹费尔特伯爵夫人的案件年复一年地进行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一样，他也全力以赴，终于赢得了伟大的哲学家，伟大的法学家，后来还有德国的伟大政治领袖的称号。他在短短的一生中始终为疾病所苦，全凭毅力征服身体上的病痛和种族上的限制。他一生中所从事的各种活动如此之多，所取得的各种经验如此丰富，以致他的同代人和传记作家无不为之惊叹不置。作为著作家和政治家，拉萨尔得力于他的颇具特色但往往失之于浮华的文体，通过这种文体他可以轻而易举地用浅显的语言把哲学的抽象概念写成常人一读就懂的小册子。可以肯定，他爱慕虚荣，而且是利己主义的，但是在他的天性中还有一种见义勇为的素质，这使他能够全心全意地投入一项事业，唯一的条件是这样干能使他显姓扬名。拉萨尔对自己、对当领袖的品德都深具信心，他有当领袖的素质。毫无疑

问,在他的最后几年,他曾把自己设想成获得新生命的德意志国家不容置疑的领袖人选。多年来只有一个人他以师礼相待;说来奇怪,这个人就是卡尔·马克思。 75

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拉萨尔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人写过很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件中有很多次提到拉萨尔,其中有许多是语含贬抑的。恩格斯从一开始就很不喜欢拉萨尔,这种厌恶情绪一直持续到最后,尽管连他也承认,在组织德国工人阶级的全国性运动方面,拉萨尔的贡献是超过任何人的。另一方面,虽然马克思同拉萨尔的气质极不相同,但马克思开头显然是喜欢拉萨尔的,只是在他看到拉萨尔正在德国工人中间树立一种同自己针锋相对的、而且他认为有损于工人阶级革命利益的势力时,才逐渐改变了态度。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有很长一段时间把拉萨尔看作是1848年革命运动失败后从德国向他提供消息的人中最有价值的一个人;他一再向拉萨尔借钱(后来都还清了);迟至1861年,他还十分认真地计划同拉萨尔合办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杂志,以便作为德国运动发展的中心。但是即使在马克思同拉萨尔在德国问题上关系很密切的时候,马克思也非常清楚他们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我们在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里发现他抱怨拉萨尔剽窃和歪曲他的许多观点。这些信件使人得出这样一个明确的印象:马克思越来越妒嫉拉萨尔在德国的地位和声势。对一个意识到组织和理论的巨大力量的人来说,这决不是什么不近人情的事,他被迫流亡异邦,生活贫困,而同他竞争领导地位的人却是手头阔绰,而且又具备在德国本土而不是在流亡中领导德国工人运动的便利条件。

拉萨尔的原名不是Lassalle,而是Lassal。最后两个字母是他自己加上去的,这样他的名字就显得法国化了,这或则是因为这样听起来更高贵一些,或则是因为这样听起来更富有革命性,因为法 76

国当时仍然是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无可争议的中心。这两种动机都符合拉萨尔的奇怪的个性，因为他既是一个欢喜结交豪门贵胄和模仿他们的举止气派的人，又是一个相当真诚的革命领袖。就经济而言，拉萨尔的父亲相当富裕，拉萨尔本人也从来没有真正受过穷，尽管他为自己以及在作为哈兹费尔特伯爵夫人的辩护人为她进行长期诉讼期间，他都很挥霍。他的父亲对他无比溺爱，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我们发现他一再给他父亲去信要钱，而且即使在老拉萨尔不得不举债的时候，他也总能如愿以偿。做父亲的非常喜欢这个抱负远大而禀赋颖异的儿子，而且愿意为他牺牲一切，因此拉萨尔尽管小时放荡不羁，却受到了金钱所能买到的最好的教育。他的大学生活使他成了一个热忱的黑格尔主义者，正如同大学生活使许多德国左派的早期领袖——包括马克思本人——成为黑格尔主义者一样。但是拉萨尔跟马克思不同，他一直到死始终是一个黑格尔主义的唯心论者；他既不接受，也不完全了解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以及后来在许多其他著作中所阐明的那种颠倒过来的黑格尔主义。促使马克思反对拉萨尔的因素之一，就是他觉察到拉萨尔坚持这种唯心论死不改变，特别是在拉萨尔看上去似乎完全赞成马克思的某些主导思想的时候。拉萨尔的这种唯心主义在他所写的两本主要著作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即1857年出版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和四年以后出版的《既得权利体系》。在这两部著作中，他的论证方法完全是黑格尔的方法，丝毫没有马克思影响的痕迹。只是在他的政治演说和小册子中才可以看到他从马克思那里学到的东西。可是即使在这些演说和小册子中，虽然看上去他似乎是在附和马克思的意见，而事实上他往往是在附和马克思的前辈关于剩余价值理论方面的意见，或者是在附和他个人的朋友洛贝尔图斯的意见。在许多方面，他的思想同洛贝尔图斯更相接近，远甚于他接近马克思。在《既得权利体系》一书中，拉萨

尔着手探讨在不同类型的文明中财产继承权所依据的全部基础。在就构成第二卷的主题所加的冗长附录中，他系统地阐述了这样一种理论：不同的继承制度取决于不同民族对人死后的灵魂所持的不同看法。他相信，罗马法律所发挥的罗马人的看法是以如下观念为依据的：死者的意志在死后继续存在，所以他的后裔的行动被看作是按照死者的意志所采取的行动。与此相对照，拉萨尔提出了日耳曼族的继承权看法。他认为这种看法不是依据把个人死后的灵魂当作意志的来源这一观念，而是依据家庭在任何成员死亡后仍继续存在这一观念。拉萨尔就罗马法和日耳曼法在继承权问题上的不同所作的这番解释，在今天已不大可能为任何人所接受。这番解释对本书来说，其意义并不在于它是否正确，而在于拉萨尔对两种不同的观念的起源所作的论述。拉萨尔并没有设法结合这两种不同的继承制度在早期罗马和早期日耳曼政治制度中产生时的经济状况——实际上也没有从任何历史环境的角度——去进行解释，而只是简单地把这两种看法归因于罗马民族和日耳曼民族的不同的民族精神(Volksgeist)，至于为什么一个民族有这种民族精神，而另一个民族又有截然不同的另一种民族精神，则根本未予解释。 77

当然，这种从民族精神出发去解释社会制度的尝试实质上是拉萨尔师承黑格尔主义的见解的一部分。拉萨尔认为，历史说到底各是各民族头脑中的思想的历史；就象黑格尔一样，在他看来，民族的头脑比个人的头脑更实际。这些意识形态的“实际”是历史的真正动力，在历史中外在的事物不过是表象而已。同马克思的观点形成鲜明对照的，再没有超过这个观点的了，按照马克思的社会学理论，思想始终应该从产生这些思想的具体条件来加以解释，而不应该反其道而行之。

就本书的目的来说，似乎没有必要更深入地探讨拉萨尔在《既

得权利体系》一书中所阐述的理论，因为这些理论同社会主义的唯一关系就在于，拉萨尔确实利用了大量的法律上的聪明论点和黑格尔主义诡辩来证明这样一个命题：社会没有义务承认那些过去事实上得到承认的但——用他的话来说——不再符合“民族精神”
78 的权利是不可否定的权利。拉萨尔论证说，一个人只对他自己的自愿行动的成果享有权利，所有其他权利完全取决于它们是否符合民族精神所承认的权利，随着民族精神本身内容的改变，这些得到承认的权利也必然会改变。因此，要制定法律取消那些根据传统而享有的权利，在法律上是没有什么真正障碍的。群众的觉悟是检验这种权利是否有效的唯一正确的依据。结合拉萨尔时代的普鲁士制度和特权阶级的权利来看，按照这条思路进行辩论在当时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拉萨尔所反对的统治阶级在今天的先进社会中只留下一些残余，尽管在许多还没有进行过社会革命的落后社会里，旧精神仍然保存着它的力量。在西方思想中，至少是在我们论述社会主义历史时必须涉及的那部分西方思想中，我们无需多费唇舌便可证明，特权阶级根据传统而取得的权利并无任何神圣不可侵犯之处。

作为一位社会主义思想家，拉萨尔的重要性决不在于他那部《既得权利体系》煞费苦心予以论证的社会法律学，而在于那些直接涉及政治和经济的著述。拉萨尔的这类著述并不多：若干篇演说（其中有一些特意写成小册子供出版用），一本反对自由主义者舒尔采—德里奇的合作计划的篇幅不多的评论集，以及在致各界人士——包括马克思，特别是洛贝尔图斯——的信件中出现的许多有价值的资料。这类著述合在一起数量并不可观，其内容也不能说明拉萨尔的政治和经济思想有多少独具创见的地方。他曾不止一次表示打算写一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巨著，但始终没有写，或者就我们所能看到的来说，他并没有动笔。拉萨尔在政治上的

中心思想是，德国工人阶级必须成立一个强大的具有全国规模的联合组织，以争取直接普选权作为它的第一项要求。他认为，没有普选权^①就不能有所作为——至少无法采取任何实质性行动——去改善工人的经济地位。但是工人一旦获得选举权，从而也就会掌握使国家服从他们的愿望的权力。按照拉萨尔一贯坚持的说法，只要国家是合法的，这时国家不论在什么地方实际上都会势所必然地成为增进全体人民福利的工具。接着拉萨尔大力鼓动说，工人一旦取得选举权，就应利用选举权坚决要求国家承认工人是自己的主人；把资本和信贷交给他们掌握，让他们排除资本家雇主，把集体生产的全部产品留给自己。换句话说，拉萨尔提出了一份同路易·勃朗在1848年革命前的10年内一直在法国鼓吹的方案十分相似的纲领。同样，勃朗也曾要求把普选权当作“劳动组织”的基础。勃朗号召工人争取普选权，并利用他们的权力迫使国家建立国民工场，这些工场由工人的自治团体而不是国家来经营，经营的方式保证人人享有“劳动权”和劳动的全部成果。路易·勃朗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法国鼓吹的主张同拉萨尔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德国提出的纲领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当然宣传这些理论时的两国政治环境则完全不同。此外，拉萨尔象路易·勃朗一样，强调成年男子选举权和国家行动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他认为，没有国家的帮助单靠自愿的合作事业，工人是不可能实现他们的经济解放的。路易·勃朗一直反对傅立叶派以及其他各种提倡合作企业的人。他说，按事物之常理，如果不去触动土地和资本的私有制，即使能够利用自愿的合作事业来改善小集体的劳动者的境遇，那也不可能改变工人阶级普遍受剥削的状况。

^① 我之所以用“普选权”一词而不用“成年男子选举权”一词，是因为拉萨尔和路易·勃朗同他们的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使用这个名词，虽然他们并不认为这个名词包括妇女投票权。

在拉萨尔时代的德国，舒尔采—德里奇同德国的自由进步党有密切联系，他一直鼓吹成立自愿的信贷联盟和合作社，作为工人避免资本家剥削的手段。英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正如欧文派在他们以前在大得多的规模上所做的一样。拉萨尔对舒尔采—德里奇的主张做了回答，而拉萨尔说得切中要害的那部分也同样击中了所有主张通过生产者或消费者的自愿合作事业走向新社会的设想。拉萨尔对舒尔采—德里奇的主张进行攻击所依据的是“铁的工资规律”这一概念。这个概念是他从马克思以前的经济学家（他们在李嘉图的经济学理论中发现了这个概念的基础）以及洛贝尔图斯那里得来的。洛贝尔图斯在德国独立地提出了大致相同的概念，虽然时间晚了一些。当然，在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中，可以看到一种同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理论十分相近的理论，但是马克思坚决认为拉萨尔关于工资规律的性质的概念同他自己的概念有根本的区别。正象马克思和李嘉图一样，拉萨尔在提出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工资无时无刻不趋向于仅够维持生存的水平理论时承认，“仅够维持生存的水平”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取决于一个社会在某一个特定时间对最低生活水平的看法。不论是李嘉图、马克思，还是拉萨尔都没有说过在一切情况下，劳动者都必然只能维持没有变化的最低限度的生存。他们都认为，“仅够维持生存的水平”是某种在长时期内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不断变化而必然要改变的东西。但是拉萨尔又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支付的实际工资虽然会发生上述那种在长期内出现的变化，但是却不断地围绕着在长期内保持不变的仅够维持生存的水平波动，并且认为实际工资究竟波动到这个水平以上还是以下，则取决于劳动力供求的相对条件。在他看来，供求关系中的这些波动主要受马尔萨斯的生存法则的支配，也就是说取决于这样一种趋势，即人口持续不断地要求

取得生活资料,以致实际工资有任何上升,人口也会随之增加,到 81
了一定时候,由于劳动力供应的增加,工资又会再一次下降到仅够
维持生存的水平,甚至低于这个水平。而当实际工资下降到仅够糊
口的水平以下的时候,这又会反映在人口的减少上,这时由于谋求
职业的工人数目的减少,工资又会恢复到最低的维持生存的水平,
甚至高于这个水平。

马克思虽然承认拉萨尔的工资理论同他自己的学说显然有相
似之处,但是在一些论点上却又持截然相反的意见。首先,拉萨尔
说自愿的合作事业对改善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处境无能为力,
他这番话如果适用于合作事业,那也同样完全适用于工会运动。既
然由于铁的工资规律起作用,工人不可能通过合作事业来改善他
们的经济状况,难道工会也不是同样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摧毁
以前为它们的会员取得任何实际利益吗?拉萨尔及其信从者往往
辩解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会不可能取得任何真正的成效,尽管
后来他们确曾想在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旗帜下组织工会,其主要目
的是想把工会当作政治解放运动的辅助手段。与拉萨尔相反,马克
思则坚信工会是有价值的,坚信在资本主义仍然存在的条件下为
改善工人状况进行的努力是有价值的。他一再指出英国工人通过
工厂立法取得了把纺织工厂的劳动日限制为十小时的积极成果。
在他同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联系中,他始终设法使自己的方针同
工会运动的直接要求取得一致,他也努力使这一方针成为国际工
人协会的基本方针。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拉萨尔在工会的作用及其
同工人阶级斗争的关系这一问题上是有尖锐分歧的。第二,马克
思的工资学说虽然象拉萨尔的理论一样,强调资本主义制度下的
工资没有增加到仅够糊口的水平以上的趋势,但是马克思并不是
主要从马尔萨斯的人口法则的角度去解释这种趋势的。根据马克 82
思的论证,资本主义社会的工资之所以被压低,主要是因为资本家

垄断了生产资料，这使得资本家能够把日益提高的生产力所产生的利益攫为己有。马克思认为，工资之所以往往被压低到目前仅够维持生存的水平以下，是因为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他所说的矛盾在这里主要指的是资本主义扩大生产的速度高于大部分人民手中所掌握的消费资料的趋势。由此可见，拉萨尔所描绘的是一幅工资不断围绕着长期固定不变的仅够糊口的水平摆动的图景，而马克思所强调的则是这样一种趋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资本的日趋集中和大规模生产技术的发展，比较熟练的工人和小资产阶级落伍者便被抛进广大劳动者的行列，因而工人阶级也随着“愈益贫困”。马克思还进一步强调了由于压低工人阶级生活水平而造成的资本主义危机的重要影响。总的说来，马克思的观点比拉萨尔的要悲观一些，但是马克思的观点比较灵活，同时为工人阶级采取有效行动，以抵抗那种使劳动者陷入愈益贫困境地的资本主义力量的可能性留出更大余地。实际上，拉萨尔所争辩的是，不夺过国家机器，并利用这种机器使工人阶级自己当家做主，就无法帮助工人，而马克思则强调日常斗争的价值，期望工人运动发展成为一支经济力量并以此为基础掀起革命，而不期望把政治鼓动当作主要手段以争取普选权。

在关于工会的作用这个分歧的背后还存在一个更带有根本性的分歧，即关于普选权的意义和国家本身的性质的分歧。拉萨尔始终认为，工人只要能取得选举权，就能毫不困难地把国家变成一个为他们所用的工具。与此相反，马克思则对普选的效果表示怀疑，他认为，普选更可能导致某种形式的独裁统治而不是执行工人的意志。马克思从来没有把国家主要看作是一台立法机器，能够制造出选民所要求的任何类型的法律。他倒是认为国家基本上是一个阶级政权的强制工具，单纯扩大选举权并不能改变它的性质。因此

83 虽然他支持英国工会所进行的、导致 1867 年改革法案的政治改革

运动,但是他认为扩大选举权的胜利,仅仅是一个可以用来加强工人阶级的力量以便对国家施加压力的手段,而不是一个能够用来把国家变成工人的工具的手段。另一方面,拉萨尔由于实际上受黑格尔主义的国家观的支配,认为国家本质上根本不是一个阶级机构,而是一个适当表达全体人民意志的机构——这个机构多少世代以来一直乖离它的真正目标,但是通过普选能够把它拉回正道。在马克思看来,要求整个工人阶级运动把国家当作解放劳动者的手段,或者是确保他们得到集体劳动的全部成果的工具是荒谬的,而且实际上也是一种背叛行为。马克思还对拉萨尔主张的由国家资助工人合作社的观点持批判态度,其理由也正是拉萨尔在反驳舒尔采—德里奇时所讲的那番道理:这种组织在拿到国家投资和信贷以后很容易变成牺牲非特权组织的利益以肥己的特权集团。在马克思看来,拉萨尔的理论是以这样的观念为依据的:工人,不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人数有限的集体的成员,都能认出自己所生产的产品,并有权占有其价值作为自己的劳动报酬。而马克思则认为,生产过程中的协作性不断在加强,这种特性正在迅速地吞没掉个体劳动者和人数有限的集体所生产的特有产品,并使劳动者的整个社会性劳动成为阶级的社会性产品的制造者;就最完整的意义来说,工人实质上只有作为一个集体才能对这种产品享有权利。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阶级一体性的观念占据很重要的地位,他所著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以及《资本论》第一卷(1867)在阐释价值和剩余价值时就表明了这一点。因此,在马克思看来,拉萨尔深信国家资助的工人合作社具有种种优点这个想法,是拉萨尔的小资产阶级幻想的又一明证。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马克思反对拉萨尔把国家当作民族精神的意识形态表现的整个想法。拉萨尔的这种国家观同德国人民的民族统一的概念是密切相连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国际性

的，虽然他常常强调德国人具备对世界无产阶级思想觉悟作出贡献的特性。与此相反，拉萨尔主要是从德国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并且紧密结合实现德国的政治统一这一目标，着手把德国工人阶级建立成为一种政治力量。马克思和拉萨尔都反对按照小德意志的概念统一德国的想法，都希望发动一个以全体德国人民为中心的反对德意志国家目前的政府形式的运动。但是在实践中，拉萨尔远远超过马克思而倾向于把普鲁士看作是实现德国统一的主要工具。马克思是莱茵兰人，基本上承袭西方的文化传统，而拉萨尔是西里西亚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从以柏林为中心的德国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马克思始终认为俾斯麦和普鲁士政府是沙俄反对西方的盟友，因而主张坚决反对普鲁士的霸权。与此相反，拉萨尔的恐俄病要比马克思轻得多，他乐意同俾斯麦勾勾搭搭，希望说服这位“铁血宰相”赞助自己的某些计划，以便使德国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支持自己为实现普鲁士领导下的德国统一所作的努力。至于俾斯麦，他倒也乐意听取拉萨尔的意见，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说明他曾经有过作出实际让步的丝毫打算。不过，毕竟还是俾斯麦实行了成年男子选举权，以此为基础，先后成立了北德意志邦联议会和1870年新德意志帝国国会，因为他十分了解，普选决不意味着在一个仍然以农业为主的地域会产生一个由工人控制的国家，或者是他完全清楚，只要选举产生的下院的权力受到那个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选出的上院以及大体上不受人民议会控制的行政当局的制约，就不会出现工人控制的国家。

85 俾斯麦之所以能从这些角度考虑问题，是因为对他来说，中心的课题是尽量争取人民支持君主专制政府，以反对拉萨尔那个时代由进步党代表的德国中产阶级所提出的要求。拉萨尔力图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但是发现自己同进步党人的分歧非常尖锐，而在争取建立立宪政府的运动中，当时德国大部分地区的工会一

直是同进步党人合作的。德国进步党人主要代表商人和商业阶级以及德国社会中的自由职业团体,他们大多数人反对专制政府,而且坚决地相信自由放任主义经济的优越性。因此,他们激烈反对任何形式的工人阶级联合,因为这种联合一旦实现就会要求国家为贫苦阶级的利益出面干预经济。正是由于这一点,拉萨尔把进步党人而不是专制制度的保卫者看作是工人的死敌。而且非但不准备同资产阶级合作以迫使反动统治阶级在政治上作出让步,反而着手组织一个敌视进步党人的独立的工人阶级运动,并诱导一直在进步党人领导下进行活动的工人背弃进步党。正如他在致俾斯麦的信中所表明的,他甚至愿意考虑普鲁士的君主政体同工人结成联盟以反对资产阶级的可能性,就如同巴枯宁和其他一些俄国人曾经希望沙皇领导人民去反对剥削者一样。拉萨尔究竟是怎样认真对待自己的希望的,必然永远是个谜,但他抱有这种希望这一事实适足以说明为什么马克思要强烈怀疑和反对拉萨尔的政治路线。因为马克思虽然坚决主张组织一个独立的工人阶级政治运动,但是对于普鲁士主义却是激烈反对的,马克思认为这个运动应该暂时同资产阶级合作以攻击旧特权阶级的政府,只应在革命成功地推翻旧秩序以后,才去对付自己的盟友。这是马克思在1848年革命中的方针,也是他以后一个时期所采取的方针。正是由于 86 这一点,他强烈反对拉萨尔对资产阶级立宪改革派所持的态度,而且很容易对拉萨尔联合普鲁士专制政权反对进步党人这一点产生怀疑,甚至超过实际情况,以为拉萨尔在这条道上已经走得很远。这种在当前实际政治策略上的分歧是同马克思主义者和拉萨尔派在国家学说上的分歧密切相关的。

拉萨尔不到 40 岁就结束了他那短促的一生。众所周知他死于一次决斗,这是他同一个小他几乎 20 岁的少女发生恋爱而引起的。这位少女最初答应嫁给他,后来又在身为显贵的父母的压

力下抛弃了他，而属意于他的情敌。情人的态度使拉萨尔感到恼怒，受到创伤的情感使拉萨尔有些神经失常，他要求同情敌决斗，结果受了致命的重伤。乔治·梅瑞狄斯的小说《悲惨的喜剧人物》就是以这件事为素材的，那已是尽人皆知，无需在本书中赘述了。我们所关心的是，拉萨尔在从事他的伟大的政治运动以后不过两年，在还没有来得及给运动奠定稳固的基础的时候，死神就过早地夺走了他的生命。他在1863年和1864年所作的宣传旅行获得了惊人的成就，为他个人赢得了不可动摇的优越地位。但是整个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个人的创造物，因而在丧失了它的领袖以后是否能继续存在就远不是有把握的事了。运动的确存在下来了，尽管在拉萨尔的直接继承者伯恩哈德·贝克尔的无能领导下曾因争吵而发生过混乱。不久，约翰·巴普提斯特·施威泽成为运动的新领袖，他能力很强，采取许多措施充实运动的力量；运动一直存在到1875年同对立的社会民主党合并时为止。社会民主党1869年成立于爱森纳赫，领导人是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

关于在拉萨尔早死以后发生的这些情况，我们将在下面的某一章中再谈。目前只需指出，拉萨尔这个杰出人物的去世为李卜克内西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从而使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如果在普法战争期间，在建立以俾斯麦为主脑的德意志帝国的时候，拉萨尔还在人间而且很活跃的话，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从长远着眼，结果也许会一样，但是谁又能肯定呢？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填补了因拉萨尔之死而留下的空白，而且如果拉萨尔不是一个多情种子，也不是一个天才的社会主义鼓动家，马克思主义通过德国对整个欧洲社会主义发挥影响就会方便得多。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第一国际

国际工人协会 1864 年成立于伦敦，起初是英国和法国工会的联合组织，并有当时寄寓伦敦的欧洲其他地区的一些流亡人士参加。应该了解，虽然协会从一开始就关切政治，但是它最初主要是一个工会组织，体现法国和英国有组织的工人的团结一致，而不是一个政治运动。事实上，在着手创建这个组织的两个国家中，当时也没有其他方式可以采用。在法国，在第二帝国的统治下，工人的政治组织几乎无法公开存在，尽管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的一年以前，即 1863 年，出现了帝国建立以来的第一批工人阶级候选人。拿破仑第三在资产阶级越来越反对他的政权的威胁下，经过一再犹豫，着手摸索利用工人阶级——或者说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作为抗击资产阶级反对者的力量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工会运动仅仅得到非常有限的宽容。即使在 1864 年，工会在法国也是非法的，只有以互助会的名目为掩护，不造成太多的麻烦，才允许存在。参加建立第一国际的法国人最初于 1862 年到达伦敦，他们并不是作为工会主义者而是作为参加伦敦国际博览会的一个推选出来的工人代表团团员前去的。毫无疑问，派他们到伦敦去的意图是要使他们归国时对世界上那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工会主义者和合作主义者的温和和通情达理有明确的认识，从而愿意放弃还保存在法国工人阶级会社的下意识中的革命传统。

法国人 1862 年在伦敦发现负责招待他们的主要是伦敦工联 89 理事会，这是两年以前因 1859 年伦敦建筑业劳资纠纷而建立起来

的组织。这时英国还没有一个代表整个工会运动的中央组织，更不用说任何有组织形式的工人阶级政党了。宪章运动已经寿终正寝；国际协会也随之消亡，它是民主派兄弟协会的后继组织，在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曾设法同大陆激进主义运动保持联系。伦敦工联理事会是当时存在的最有代表性的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接管了旧组织的职能，并使这些职能获得工会的支持。伦敦工联理事会在美国南北战争中积极支持北部反对奴隶主的事业，起了重要作用；它负责招待前来参观1862年国际博览会的意大利和法国工人阶级客人；它参加了为加里波的1864年访问英国而安排的盛大接待。它在1862年还积极参加筹组工会政治同盟的工作，这个组织后来发展成为全国改革联盟，在争取议会改革的斗争中成了工人阶级的主要工具。不过即使在1864年，当法国代表再次访问伦敦，并提出成立国际组织的计划时，这些发展还仍然处于初期阶段。

在这以前，英国工人同意大利工人的关系要比英法工人之间的关系密切。英国中产阶级的和工人阶级的激进分子同以马志尼和加里波的为首的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声息相通，彼此同情。加里波的更被推崇为深孚众望的英雄，1864年他访问英国时受到欢迎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在马志尼的影响下成立的意大利社团并不是工会，或者说主要不是由工人来领导的。这些社团虽然叫作工会，但大部分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同1862年欢迎这些社团的代表来英访问的工会主义者很少共同之处。英国的工会主义领袖们一开始就认为他们应该参加第一国际；国际章程草案的初稿是由加里波的副手沃尔弗少校以马志尼的意大利工人协会为蓝本拟定的。这是几种草案中的一种，到了最后这些草案都被搁置一旁，而采用了马克思所拟定的草案。马志尼派在国际工人协会中再也没有发挥更多的作用。当时访问英国的法国人则完全不同，

他们是工人，实际领导为争取社会承认以及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而进行斗争的真正工会。英国的工会主义者承认他们是能够与之共同事业奋斗的同胞兄弟。国际工人协会主要是作为一个英法工会的联合运动而成立的，筹组协会的人们希望通过协会取得其他国家志同道合的团体的合作。协会采取的第一步是，有选择地邀请一批寄寓伦敦的流亡者参加会议。马克思也受到了邀请，这主要是因为他的两个朋友——德国成衣工人格奥尔格·埃卡留斯（1818—1889年）和瑞士钟表工人海尔曼·荣克（1830—1901年）——在英国工会运动中享有地位，得以从一开始就把马克思拉进运动。

参加1864年会议的法国人是雕刻工昂利·路易·托伦（1828—1897年）、花边工厂机械工沙尔·利摩赞、镌版工E. C. 弗里蒲、装订工欧仁·瓦尔兰（1839—1871年）和乐器工欧仁·杜邦（1831—1881年）。除了住在伦敦的杜邦以外，他们都是巴黎的手艺人，都是仍然占据重要地位的小规模工业的代表。其中有一人——托伦、利摩赞和弗里蒲是蒲鲁东的信从者和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反对者，但是他们并不反对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另一位巴黎人——欧仁·瓦尔兰是法国工会运动的主要组织者，他的观点比其他人要左得多，用现代的话来说，他是工团主义者。至于一直留居伦敦的杜邦则深受马克思及其友人的影响。不过在当时，这些来自巴黎的代表都一致认为必须发起一个声势浩大的工会运动，采取独立的工人阶级政治行动，同时强调工人必须同资产阶级的和奥古斯特·布朗基信从者的革命激进主义划清界线。原来法 91
国工人中的觉悟分子不是拥护布朗基派就是拥护蒲鲁东派（蒲鲁东本人死于1865年）。

1864年，马克思本人对托伦评价甚高，对他的那一伙人也颇有好感，但是不久就同他们所有的人发生争执，仅杜邦一人除外。

在拟订第一国际的《成立宣言》和《章程》时，马克思小心翼翼，缄口不谈可能开罪于两个主要集团的事情，因为要使新组织顺利地建立起来，就必须诱导它们接受《成立宣言》和《章程》。《成立宣言》的大部分段落以鲜明对比的方式指出了主要工业国家物质财富和收入的迅速增长和劳工大众的不断赤贫化。在这种对比下，马克思论述了体现在 1847 年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和其他国家工厂立法中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压倒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巨大胜利。他还欢呼在工人的控制下成功地建立起合作工厂，认为这适足以证明工人阶级的能力，也预示着来日的工业民主。与此同时，马克思断言工人不可能通过自愿的合作事业获得普遍的解放，必须采取全国性的行动以建立新的工业秩序。他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工人必须组织起来以夺取政权。此外，工人必须同时在国内和国际上壮大工会运动以捍卫自己，并且把工会运动当作建立新秩序的工具。《宣言》的最后一段雄辩地谴责了俄国的野蛮暴政、波兰的苦难以及欧洲各国统治阶级对美国奴隶主的同情，同时号召工人“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①，而且“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②

当然，对于上述全部论点可以作不同的解释。马克思在 1864 年依然故我，仍旧是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并没有放弃 16 年前
92 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采取的立场。但是他获得了 1848 年和以后十多年的经验，更加懂得在以必要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革命实践方面存在着重重困难，也更加懂得在缺乏组织严密的工人阶级运动的支持下单搞革命隐藏着种种危险。1850 年以后，马克思不再属于革命运动的极左派，而是对单纯的暴动主义深表怀疑，他认为

①、②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34—135 页。——译注

单纯的暴动主义只是毫无必要地向敌人提供摧毁工人组织的机会，并且由于监禁或放逐使工人丧失自己的领袖。在建立第一国际时，马克思希望做到的不过是实事求是地对待工人运动，并在日常的斗争中加强国际的力量，因为他相信这样就能把国际引入正途，并且能在意识形态的指导下，从争取局部的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斗争经验中逐步发展革命观点。他用半诙谐的遗憾口气对恩格斯说，他被迫在第一国际的《成立宣言》中写进了一些无伤大雅的关于正义和公平的词句，但是引用这些词句是否真正使他感到不快，倒是可以怀疑的，因为这些词句组成了那个他设法驾驭使之沿着自己所指定的目标前进的运动的推动力量。《宣言》的全文证明，对于他所回顾的那个时期的资本主义制度露骨的不公正他是多么深恶痛绝。

实际上 1864 年马克思就看到，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革命又一次临近了，但是他并无意于鼓动革命，他更关心的倒是竭尽全力加强工人阶级运动的力量，使工人阶级对革命所要造成的局势作好准备。在马克思的信札中，我们看到他一再说，英国是唯一能够发生真正社会主义革命的大国，在那里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已经消灭了旧的生产方式，并摧毁了原是一支有效力量的农民阶级。但是他并不认为，英国的革命已经指日可待。他论证说，爱尔兰革命会打击英国地主贵族的力量，是英国发生革命的先决条件。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对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达到高潮的芬尼亚运动寄予很大的希望^①。他确实希望，英国工会不断开展的斗争以及同时

^① 爱尔兰芬尼亚兄弟会（这个名字源自“fianna”[意即“士兵”]）建于 1858 年，在爱尔兰和美国设有分会，领袖是詹姆斯·斯蒂芬斯和约翰·奥马洪尼。这是一个受誓言约束的秘密革命社团，它的目的是要在爱尔兰举行起义，与此相呼应，计划从美国进攻加拿大，并在英国的爱尔兰人中间挑起骚乱。爱尔兰起义原定于 1865 年举行，但是当局先发制人，进行大规模逮捕，因而起义于 1867 年真正暴发时，就被轻易地镇压下去了。在这次起义的同时，在英国也采取了有计划的行动：进攻切斯特监狱和克勒

进行的争取议会和社会改革的运动，会促使英国的工人阶级建立这样一个政党：它同自由主义界限分明，并能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同资本主义展开搏斗的过程中增强战斗力。如果不是英国统治阶级——不管是自由党人还是托利党人——见事不妙，及早作出了巨大让步，这种情况确实是很可能发生的。结果是爱尔兰起义被轻而易举地镇压了下去。就在这个阶段，1867年通过了改革法案，1871年和1875年工会取得了完全合法的地位，1867年和1875年对一些劳资法案作了修订，此外又结合对工人作出的这些让步制订了多项社会立法，所有这些都有效地防止了马克思所期待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但是在1864年，这些发展都还没有发生，因而对英国工人抱有希望，估计他们即使不会成为革命者，至少也会大大增强战斗的阶级意识是合乎情理的；此外，既然马克思随时可以给予英国工人以思想指导（马克思始终认为给予这种指导主要是德国人的特权），预期这种阶级意识会越来越带有社会主义色彩也就是合情合理的事了。当时，急待着手的工作是掀起一个直接以英法工会为基础的国际运动，并把总部设在英国，从而确保运动不受法国人宗派主义争吵的干扰，不受蒲鲁东影响的支配，同时也为寄寓伦敦的德国流亡者参加运动敞开大门。在马克思看来，这些德国人具有正确的思想，尽管他们在德国没有一个其团结程度堪与英国的运动——哪怕是法国的运动——相比拟的全国性运动。

应该指出，在第一国际的《成立宣言》或者《章程》的前言中，马克思根本没有提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他谈到了合作生产，认为这证明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在没有利用雇佣工人阶级劳动的雇

肯威尔监狱；顺利地救出了关在曼彻斯特的犯人。由于1867年事件，若干人被处决，许多芬尼亚兄弟会会员被长期监禁。从此以后，芬尼亚运动采取政治的而不是暴乱的手段。马克思之所以寄希望于爱尔兰起义，是由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芬尼亚运动正在迅速壮大。

主阶级参加的条件下”^①是能够进行的；在强调自愿组成的合作企业的限制时，他敦促说，“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因而也必须依靠全国的财力。”^②由于这一点，同时还由于有产阶级估计会抵抗劳动群众的取代，马克思说，“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③但是即使他有此心愿，他也不可能以任何更明确的措词提出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因为这样作会使他同大多数法国代表——很可能还同主要的英国代表——形成严重的对立。托伦及其一伙是互助论者。他们所向往的是这样一种社会：人人都单独地或者作为一个生产合作组织的成员拥有自己的财产，并得到自己的全部劳动果实。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蒲鲁东派相信应该实行一种“无息信贷”（不支付利息的资本信贷）制，即通过人民信贷银行向作为个人或者团体成员的生产者提供贷款。人民信贷银行是一个由宪法规定的自治的公共组织，在任何方面都不受国家控制。蒲鲁东派强烈反对经济平等，认为人人都应该按其劳务得到报酬；他们还大力主张一种经过改良的不受阶级剥削的财产制度，因为他们把家庭看作是社会的主要基础，把地产和其他生产资料产业看作是家庭在社会中存在的必要条件。与此同时，他们强烈反对妇女参加劳动，认为这破坏家庭生活，也反对妇女享有权利，认为这破坏家长制的家庭基础。

至于英国人，他们对蒲鲁东的社会学说则没有这种教条主义⁹⁵的信仰，本可以诱导他们接受土地的社会化^④，而且对他们来说，工业的社会化简直就不成其为问题，只是他们在形式上对合作生

①、②、③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3—134页。——译注

④ 实际上，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关于土地国有化的问题，英国颇有争论。马克思视为自己的一个主要外围组织——土地与劳动同盟就提倡土地国有化。马克思的副手埃卡留斯是这个组织联合书记处书记，欧文主义者约翰·韦斯顿是司库。

产的主张抱传统的友好态度而已。这种主张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显然又重新抬头,而且得到工会主义者的大力支持。

如果当时马克思以集体主义者的身份出现,那就必然会使第一国际在刚诞生时便夭折。在他的信札中没有迹象说明他愿意这样做。他的方针并不包括说服当时的各国接管工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他希望在适当的时候推翻这些国家,然后由获胜的工人用经过他们改造并由他们控制的国家取而代之。也没有迹象说明他曾考虑过在革命成功以后工人究竟会怎样着手组织工业。他肯定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作任何说明,也不愿意把它列入第一国际的纲领。按照他的设想,第一国际当前的战斗任务是以工会为手段,进行宣传鼓动,争取进一步制定类似十小时工作日法案那样的法律以改善条件,同时成立一个着眼于夺取政权的工人政党。至于在工人的控制下如何组织工业的问题,则可以留待工人取得政权以后再予解决。就眼前来说,现存的生产合作社就预示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基于几个十分充足的理由,马克思在1864年首先着重考虑的是合作问题,而不是社会化问题。第一,合作问题是正在发展中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问题。斐迪南·拉萨尔在两年以前就发起建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联合会的突出要求是国家把资本和信贷款项交给工人合作社掌握,从而使合作社能够代替资本主义工业。这是法国的路易·勃朗1839年在所著《劳动组织》一书中所提出的纲领的再版;这也是对许多发出如下呼吁的人的社会主义答案:他们呼吁工人不要去追逐政治幽灵,而应集中全力建立自愿的生产合作社,作为解放劳动的手段。我们已经谈过,许多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社会改革家曾把这种可以追溯到傅立叶和欧文的主张(除去其中较有革命性的方面)当作对抗激进社会主义的有力措施。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德国,进步的自由主义者海尔曼·舒

尔采—德里奇曾特别提出这个主张，而拉萨尔的攻击矛头主要也是指向他的。如前所述，拉萨尔反对舒尔采—德里奇的第一个论点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既然工资由于“铁的工资规律”的作用被降低到仅够糊口的水平，那么工人从消费合作社得到的任何一点好处就必然会由于工资的降低而被剥夺掉；第二，通过自愿行动成立的生产合作社只会产生工人的特权小集团，他们会退出阶级斗争，而对促进劳动的普遍解放毫无作为。拉萨尔论证说，工人合作社必须取得国家的支持和掌握充分的资本来源，以便从资本家那里撤走一切最优秀的劳动力，从而迫使资本家不是提高工资和改善条件，便是关门大吉。事实上，他认为只要国家支持工人，到头来资本家就必然会落得这样的下场。实际上，拉萨尔是在向整个自由放任主义的学说挑战，他说只要国家从工人的利益出发，进行干预以改善生产条件，“铁的工资规律”就不会再起作用。因此，他借用蒲鲁东和路易·勃朗的一个主张，提倡一种其规模足以使整个工人阶级成为自己的主人的国家信贷制度。他认为这需要建立普选制度，普选制度会把国家变成工人利益的保卫者。于是，要求普选权便成了全德工人联合会纲领的第一条，以此作为建立国家资助的合作生产新制度的手段。

我们已经谈过，马克思对拉萨尔的这些理论在许多论点上持严格的批判态度。他不相信拉萨尔所主张的那种“铁的工资规律”，这一分歧具有实际的重要意义，因为拉萨尔的理论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会对改进条件无能为力，马克思则坚持工会能够大有作为。此外，马克思完全不同意要求任何国家给予帮助，他认为只能在剥削者国家的废墟上另建工人的国家。他不无道理地指责拉萨尔同俾斯麦勾勾搭搭，同时指责拉萨尔出于对资产阶级进步分子的憎恨，竟准备同德国最反动的势力勾结起来去反对他们。尽管马克思对进步分子并无好感，但是他认为在进步分子对普

鲁士以及其他形式的德国封建专制制度进行的斗争中，工人应该支持进步分子。马克思本人在德国的信从者以威廉·李卜克内西为首，当时正勉为其难地同德国许多地区比较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联盟，并同他们一道工作；拉萨尔的方针在马克思看来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背叛。但是马克思所反对的并不是这种由国家资助的合作社，而是所有那些谋求现存的国家提供帮助的建议，他认为现存的国家实质上是反动的组织。

在法国，蒲鲁东派也大都主张在新秩序中举办合作企业以代替个体生产。但是他们激烈反对第二帝国，因而根本不愿意同任何主张用如此肮脏的国家资源资助合作社的建议发生关系。他们主张由工人自愿组成生产合作社，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就有许多这样的合作社在法国建立起来。在蒲鲁东以自愿为基础建立信贷银行的尝试失败以后，蒲鲁东派提出了“无息信贷”的建议，但是看来，只有在那场他们预期不久便会推翻拿破仑帝国的革命到来以后，提出这个建议才是合乎时宜的。从上面可以看出，蒲鲁东派是站在马克思一边反对拉萨尔的。在英国，合作社纯粹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发展的，自从罗伯特·欧文开始为合作社进行宣传以来，就没有发生过国家提供帮助的问题，当时欧文只吁请地方的济贫当局在建立“合作村”方面发挥它们的作用。英国的輿情对于国家提供帮助的主张十分不利，因为自由放任主义的思想居于支配地位。与此相反，不论是俾斯麦的德国还是拿破仑的法国，在理论上都不反对国家干涉经济事务，尽管法国和德国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激烈反对这一点。但是，他们是反对派，政府不由他们控制。

除了那些由寄寓伦敦的流亡者在名义上代表的国家以外，参加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大会的有四个国家，它们是英国、法国、比利时、瑞士（或者说是日内瓦，因为瑞士的其他地区没有代表）。在这些国家中，比利时代表一人：西萨尔·德·巴普；日内瓦代表二人：

德国人约·菲·贝克尔和法国流亡者弗朗索瓦·杜普列。除了贝克尔以外，代表德国参加大会的只有住在伦敦的流亡者：马克思本人和他的朋友埃卡留斯、弗里德里希·列斯纳以及卡尔·沙佩尔。法国派托伦、利摩赞、弗里蒲参加大会，他们都来自巴黎，杜邦则代表伦敦的法国流亡者参加大会。英国的代表是：乔治·奥德加（伦敦工联理事会现任主席，即将改任理事会书记），乔治·豪威尔（伦敦工联理事会现任书记），威·朗·克里默（木匠工会成员，后来出任第一国际第一书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马克思的朋友，留居伦敦的德国成衣工人）。参加大会的还有波兰流亡者鲍布辛斯基，留居伦敦的瑞士钟表工人海尔曼·荣克以及意大利人沃尔弗少校（此人在大会的开始阶段即退了出去）。

基于两个原因，德国没有真正的代表出席大会，公开提出的理由是德国的法律禁止参加国际组织。这不可能是真正的理由，因为这一规定肯定并不适用于德国所有各邦。真正的原因是，除了地方工会以外，1864年德国工人唯一的大规模组织就是拉萨尔的全德工人联合会，而这正是马克思决不想邀请的一个团体。他宁可等待，希望李卜克内西不久能在德国组织一个工人运动，同拉萨尔分庭抗礼，同时希望这个运动易于接受自己的影响，而无需担心 99 它甘愿同反动政府勾结以对抗资产阶级进步分子。马克思在德国的支持主要来自莱茵兰，而拉萨尔的活动中心则在柏林。马克思认为，同思想开明的德国西部相比，柏林是东部野蛮主义的老巢。如果他邀请自己在德国的任何朋友参加大会，那么他们除了代表自己以外，就不能代表任何人，其后果必然是同拉萨尔派断然决裂，而在当时这并不是马克思所希望的。拉萨尔本人在1864年8月的那场尽人皆知的决斗中丧生，此后一个时期他所领导的运动的前途就成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向拉萨尔派发出邀请（事实上并没有），他们也不大可能参加伦敦大会。

由于波兰代表实际上不代表任何人，而以沃尔弗少校为代表的意大利人又完全不同情主要以工会为基础的国际，因而在这个阶段就只有两个国家需要考虑，即比利时和瑞士。一年以前，瑞士人皮埃尔·库勒里医生为了争取实现两国共同成立国际的计划访问了比利时，实际上这正是这方面的初步尝试。应该着重指出，当时比利时在欧洲是仅次于英国的最发达的工业国家，它有发达的资本主义结构和延续不断的工业斗争史，特别是在采煤和冶金工业方面。在思想领域，比利时深受法国的影响，这种影响更由于比利时有大批的法国流亡者而加强了。不过比利时本身——不论是它的瓦龙族还是佛兰芒族——也有自己的相当悠久的社会主义思想传统。我们已经谈过，比利时卓越的社会主义先驱者有雅科布·卡茨、纳·德·凯色尔和柯林斯男爵。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比利时的主要理论家是青年印刷工人和医生西萨尔·德·巴普(1842—1890年)；在第一国际成立后的几年中，他在国际内部的政策争执中发挥了很大作用。1864年，德·巴普年仅22岁，但是已经崭露头角了。当时比利时并没有其他代表参加国际的集会，直到1868年比利时人才成批地参加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德·巴普还先后参加了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和1867年洛桑代表大会。在伦敦，他还是个不为人所重视的人物，直到国际着手讨论工业的社会化和控制问题时，他才作出了特殊贡献。

如前所述，瑞士派约·菲·贝克尔(1800—1886年)和杜普列参加了第一国际的成立大会。贝克尔是德国人，老社会主义者，马克思的朋友，长期定居日内瓦；杜普列是法国人，也住在日内瓦，后来成为第一国际在瑞士出版的第一种杂志的编辑。1864年，瑞士的社会主义运动仍处于萌芽阶段，最著名的社会主义倡导者是贝克尔和改革派皮埃尔·库勒里医生，他们在瑞士操法语的各州有相当多的信从者。从政治上来说，瑞士人比欧洲大陆任何其他

地区的人都自由。在各大城市,地方性工会运动也有相当声势。但是瑞士人没有全国性组织,甚至没有一个组织能把瑞士的操法语各区或操德语各区联合起来。在德语地区,没有任何了不起的运动,虽然某些城市有德国流亡者的团体。在法语地区,最活跃的中心日内瓦被技术工人的工会控制着,这些工会的大多数成员是充分享有选举权并在政治上同中产阶级的激进派采取联合行动的公民。与此相反,大部分建筑工人则不是日内瓦公民,没有选举权,是工人阶级中支持对立派最力的团体;对立派强烈反对同激进派进行任何合作,主张采取直接行动以解除疾苦的政策。在瑞士其他操法语地区——汝拉,居支配地位的工业是为资本家商人服务的家庭工业,特别是钟表制造业。这些小规模的生产部门已经受到英国和美国的工厂工业发展的威胁,而且景况正日趋恶化。许多家庭工业工人准备团结起来支持任何为他们的疾苦说话的战斗性运动。莱洛克尔、拉绍德封以及汝拉地区及其附近的其他中心城市的家庭工业工人同日内瓦的建筑工人一道,形成拥护巴枯宁的基本力量,在最后招致第一国际瓦解的争执中支持巴枯宁。詹姆斯·吉约姆(1884—1916年)很快就成为这些地区的工人的杰出领袖;他是教师、印刷工人兼新闻记者,他留给后人的有关第一国际的历史远远超过许多同类书籍,材料最为丰富。 101

这些无政府主义团体直到1866年第一国际在日内瓦举行代表大会时才露面,过去并没有参加过大会。总的说来,贝克尔和杜普列是追随马克思的。在第一国际的成立大会上,马克思只需同英国人和法国人打交道,而英法代表一致同意主要在工会的基础上建立国际,而不是把国际当作政党的联盟或以政治为主的团体。

在成立大会上通过的第一国际《共同章程》的序言部分,有一句话注定要在后一阶段引起激烈的争论,这句话是:

因而^①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②

就象《成立宣言》和《章程》的序言部分的许多内容一样,这句话可以作几种不同的解释。总的说来,可以按照法国和英国的工会主义者的理解,认为这句话意味着工会行动居于首要地位,而政治活动除了在工会基础上以外,相对说来是无关宏旨的。甚至可以象某些法国人那样,认为它是一种警告,告诫不要采取任何形式的可能促使工人阶级运动同现存的国家或者资产阶级政党妥协的政治行动。但是也可以认为这句话是断言工人必须采取政治行动作为取得经济解放的手段;毫无疑问,马克思的本意就是这样。

由于第一国际的《章程》经巴黎支部翻译成法文时,在法文本中删去了“作为手段”字样,这就使语意越发混乱了,法文本只是说:

劳动受资本支配是一切奴役制度——政治、精神和物质奴役制度的源泉。

102 所以,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

毫无疑问,这句话的语调不同,但是谁又能说这究竟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呢?法文本远比英文本明确强调政治行动的从属性质,这同完全排除政治行动是相当一致的。马克思在看到法文本的时

① 这里的“因而”是同引文上面的一句话相呼应的,那句话是:“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原注所引的这句话见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6页。——译注)

② 同上。——译注

候勃然大怒，指责说无政府主义者这样干是为了歪曲第一国际的宗旨。但是十分可能的是，即使翻译者有心在措辞上有所变动，也完全无意改变它的原意。不管这个问题的真相如何，这句话终于成了第一国际后期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激烈争论的问题，那时对立宗派之间的斗争已经全面展开。

第一国际是在整个欧洲处于极其不平静的形势下着手创建的，以后几年，又是在战争和革命烽火不断蔓延的环境中发展的。一般说来，在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以前，这些条件有利于国际的发展，肯定提高了它在敌人眼中的地位，它的敌人动辄把一切形式的群众骚乱都归咎于它。罢工的大量增加也使第一国际获得赞誉——或者是受到责难，而事实上这主要是1866—1867年经济危机以及随之出现的复苏的结果。非常可能，第一国际的存在是这些年来鼓舞一些国家的工会主义迅速发展的一个因素；但是如果没有国际，这种发展十之八九也是会出现的，因为这是对普遍存在的经济条件的自然反应。当然，无需频频提到第一国际，就能解释英国和法国——还有比利时——的工会发展的历程。在德国，第一国际对于事态发展几乎没有发生影响。在西班牙，工人阶级的组织主要是在第一国际的名义下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这同伦敦总委员会发出的任何指示毫无关系；在意大利，运动受到巴枯宁的影响远远超过马克思或者总委员会的影响，而且对于国际工人协会的拥戴始终极为勉强。事实上，很难指出第一国际作为一个组织曾向任何一个国家真正提供了主要动力。就大多数情况来说，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运动都是分道扬镳，各行其是，而不管它是不是主要打着国际的旗号。第一国际通过捐款和阻止罢工破坏者通过国境，给予罢工一些援助，但是除此以外，它对引导事态的发展就不能有多大作为了。它能够大造声势，使它的反对者惶惶不可终日，同时使它的支持者感到大有盼头，但是它的真正力量始终受

到很大限制；早在它内部的理论争执达到严重地步以前，它所掌握的力量基础就已经受到了损害。

有一点也不无重要意义：第一国际不象它的后继者第二国际，并不是各国党的一个联合组织，也不是一个以工会或者其他工人阶级团体为成员的组织。第一国际在每个国家的成员都是个人，他们加入它的总支部和支部，直接缴纳会费。在有全国性总支部的地方，总支部把各地的支部联合起来，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一个联合机构，但是受国际影响以及在某种情况下受它鼓舞的工会并不是它的成员。比如在法国，国际在巴黎和其他城市的组织同联合工会组织是并存的，而且彼此是独立的。这种分立门户的做法，无疑部分地是由于法律对于工会的联合以及建立联合政治组织规定了限制；分立门户的目的也在于建立总支部和支部，作为领导和鼓舞群众运动的富于战斗性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机构。

104 第一国际原打算 1865 年在比利时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正式通过它的《章程》。但是到了应该进行筹备的时候，比利时颁布了限制外国人入境的新法律，此外与会代表看来也不可能很多，于是总委员会认为在比利时举行大会不适宜，决定把大会推迟一年，另在伦敦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处理紧急问题。在这个阶段，马克思对第一国际在英国的发展抱着一种非常热切的心情，似乎以为自己在左右英国的运动，而实际情况却远远不是这样。1864 年在伦敦成立的总委员会的双重任务是领导整个国际，同时组织这个运动的英国支部。马克思毫不犹豫地认为，英国工会采取行动，成立自己的改革同盟，力促实行成年男子选举和无记名投票，同时掀起运动以求把工会联合成一个全国性综合组织，都应归功于总委员会的作用。诚然，这个时候有一些英国工会最有影响的领袖是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并在委员会的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但是很难得出结论说，他们在处理国内事务时接受第一国际的领导。事实上，

那个促使职工大会于 1868 年成立的运动,更应归功于格拉斯哥和英格兰北部的矿工工会和工联理事会,而不是伦敦工联理事会或者总部设在伦敦的一批混合工会。伦敦人虽然在争取议会改革的斗争中最为活跃,但远远不能代表工业运动中最富有战斗性的份子。如果第一国际不存在,英国的事态发展在任何重要方面看来也不可能有什么不同。毫无疑问,马克思诱导伦敦工会领袖在若干文件上签了名,如果没有马克思,他们是决不会想到要制定这些文件的;同样不容置疑的是,由于英国运动享有威信,它的领袖所给予的表面支持便成了增加第一国际在其他国家的影响的重要因素。但是这些领袖决不打算听任马克思或者任何其他外来人替他们指导运动。他们继续加强自己的组织以推行国内事务,把国际看作是一个次要组织。1867 年,这些领袖在把选举权扩大到城市工人以及修改劳资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也正是这一点使他们的革命性削弱了而不是加强了。此外,1866 年的谢菲尔德暴行以及翌年 105 霍恩比对克罗斯案件的判决,更把工会推向守势,使得工会领袖们甚至在被巴黎公社的爆发吓得目瞪口呆以前,就不那么倾向于采取任何旨在恐吓英国资产阶级的行动了。

在这个时期,国际的法国成员也自行其是,基本上受国内事态发展的支配,而不是听命于伦敦的任何指示。拿破仑第三 1864 年以后给予工会的有限容忍根本没有产生工人阶级转而支持帝国这个预期的结果。恰恰相反,左右法国工人运动的力量已经逐步从托伦及其温和派同事转移到以欧仁·瓦尔兰为首的比较富于战斗性的集团手里。1868 年,巴黎工人成立了一个独立于国际工人协会巴黎支部之外的中央工会联合会,不过这个联合会设在同一座大厦里,而且同巴黎支部有密切关系。在一些其他城市,比如里昂、马赛、卢昂和布勒斯特,很快也成立了类似的联合会。瓦尔兰为组织这种同国际地方支部并存的联合会奔走于全国各地;结果证明,其

中的大多数比原来的蒲鲁东派集团左得多。托伦在第一国际的历次代表大会和会议上继续担任法国的主要发言人，但是在法国本土，他的势力正被这样一些人所取代：巴黎的瓦尔兰和边诺阿·马隆，马赛的爱德列·巴斯列卡和里昂的阿尔伯·理查。这些人的观点是工团主义的而不是互助论的，他们很快就在关于集体所有制的争论中反对托伦，同时在政治行动问题上以及在他们称之为马克思的“极权主义共产主义”政策问题上反对马克思。

在 1866 年的日内瓦代表大会上，这些争论还没有发展到严重地步。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批准或修正 1864 年成立大会所通过的《章程》，使第一国际有一个明确的规章。事实证明这并不是一个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而且由于序言未经讨论就通过了，序言的英法文本的差别还没有为人所知，因而争论也就更少了。在关于《章程》的辩论中，唯一引起激烈争执的是，大多数法国代表希望把国际的成员资格完全限定为体力劳动者（这样就会把马克思排除在国际外面），而在这个提议由于英国和瑞士代表的反对而遭到否决以后，法国代表又提出只准许体力劳动者参加总委员会或担任职务。后一提议也遭到了否决。接着大会决定，总委员会的会址下一年仍旧设在伦敦。

关于国际的成员成分问题具有关键性的重要意义，但是对来自各国的代表团来说，其涵义各不相同。在英国人看来，这不过是一个接受少数外来者的帮助的问题，比如马克思以及在全国改革同盟中同工会合作的一小批中产阶级同情者。英国没有人怀疑，国际在英国必须依靠工会取得主要支持，鉴于宪章运动的衰落，国际也不可能从任何其他团体得到支持。与此相反，对法国人来说，所面临的问题则是究竟让不让主要由中产阶级领导的大批积极的革命共和派加入国际，如果让他们加入，他们几乎肯定会设法取得控制权，至少在巴黎是这样。参加建立国际的那批法国人的首要

目的是,把正在各行业中建立起来的抵抗协会联合成地方工会,并以此为基础组织一个带有鲜明工会色彩的运动。这个集团希望把这些纯工会组织变成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共和运动以及布朗基派和其他革命俱乐部的纯暴乱主义相抗衡的力量,而后者则以牙还牙,指责这些工会主义者同拿破仑第三秘密勾结,反对革命。第一国际本身不得不就这项指责进行调查,结果认为它毫无根据(事实也确实如此)而不予处理。第一国际中的法国领袖们的确对罢工和经济运动更感兴趣而不大关心政治,而且决心防止他们所领导的运动被激进主义政客所篡夺。然而第一国际中的法国领袖们内部是分裂的:一方面是以托伦为首的温和派,这派人希望 107 在工会的基础上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并在完全摆脱中产阶级激进分子的情况下竞选;另一方面则是以欧仁·瓦尔兰为首的工会主义者左翼,他们不相信议会行动,而是希望通过地方和区域的联合会,把工会建成一支强大到足以从中产阶级激进分子手里夺过革命控制权的独立革命力量。有一个时期,这两个集团曾联合起来,希望把国际变成一个明确的工人阶级组织,拒绝中产阶级的政客分享国际的控制。但是为时不久他们之间就发生了争执,法国各支部的大权就从托伦集团转到了瓦尔兰集团手里。

1866年,主要关心中产阶级参加国际这个问题的还有瑞士和比利时代表团。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人数居支配地位的瑞士代表团大都投票反对法国人。在瑞士,阶级关系比其他地方要复杂得多,因为特别是在日内瓦,小业主和熟练手艺人之间根本没有鲜明的界限,许多手艺人具有选举权。因此,他们从传统上就倾向于激进党派,而这些激进党派又不象法国的激进派,并没有革命性,它们的主要兴趣具有强烈的地方性。与此相反,特别是在汝拉地区的小城市和农村地带,大批家庭工业工人处境非常恶劣,而日内瓦本地的建筑工人,大部分又是没有公民权的移民。因此,一方

面是大批赞成推行温和政策和同激进党人合作的人，另一方面则是主要由日内瓦的没有公民权的人和农村地区的家庭工业工人形成的左翼。后者由于无法对选举发挥重大影响，因而往往依靠工业行动，并指责政治对工人阶级领袖发生了腐化作用。但是他们对左翼知识分子丝毫不象法国人那样抱敌对态度，因为不存在中产阶级的革命激进主义运动同他们争夺领导权的问题。他们完全准备接受非工人阶级的支持，并且在巴枯宁宣布他那套革命理论的时候马上便团结在他的周围。巴枯宁的理论根本不是要掌握国家，而是要求废除国家，依靠工人的革命本能，在地方性自由结合的基础上创建一个新社会。

因此，在法国代表所提出的限制国际会员资格的问题上，瑞士人一致欢迎中产阶级支持者加入第一国际。比利时人对这个问题本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派代表参加日内瓦代表大会；德国代表人数少，没有代表性，因为拉萨尔派没有派出代表，而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才开始根据独立的方针组织起来。

马克思并没有参加日内瓦代表大会，但对大会将要产生的结果感到不安。他向代表总委员会参加大会的埃卡留斯大略谈了一下过去两年的情况，并就如何对付参加大会的人数众多的法国蒲鲁东派作了具体指示。大会结束以后，他才感到如释重负，这倒不是因为大会除了批准规章以外还取得任何特殊的成就，而是因为大会没有作出任何真正关系重大的决定，从而使国际对蒲鲁东派的主张承担义务。大会确曾通过一项决议，赞成按照蒲鲁东的“无息信贷”的原则建立一个国际信贷银行，并且着重表明赞成提倡生产合作社。但是大会也同时宣布自愿的合作生产并不足以改变社会制度的基础，而且还批准了马克思提出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着重强调罢工和工会组织，并且主张不仅要利用工会对雇主展开日常的斗争，而且要利用工会实现推翻工资制度和建立以工人阶

级政权为基础的新社会秩序这一更具有根本意义的目标。同时大会经过辩论,不顾某些法国和瑞士代表的反对,宣布赞成制定法律以规定八小时工作日制和儿童义务教育制。这两项决议使得代表大会承担了采取政治行动和利用国家权力作为贯彻社会改革的手段的义务。马克思认为这两项决议是压倒蒲鲁东主义无政府主义的胜利。这时巴枯宁主义无政府主义在大会上还无声无息,这种形式的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的领导很快就构成一种更加严重的挑战。 109

1866年的日内瓦代表大会主要是一个法国和瑞士代表的集会,瑞士代表团在大会最多不超过60名代表中有33名之多,占代表总数的一半以上;法国代表有16人。其余代表包括3名德国人以及6名来自英国的人:其中3名是英国人,即奥德加、威·朗·克里默和詹姆斯·卡特尔;其他是来自伦敦的德国人埃卡留斯、瑞士人荣克和法国人杜邦。比利时和意大利都没有代表参加;西班牙人和荷兰人还没有加入第一国际。

翌年在洛桑举行的代表大会也主要是法国和瑞士代表的集会。代表人数很难确定,但是见诸记录的代表姓名包括37名瑞士人和20名法国人,代表总数是72名。这次有6名德国代表(他们仍然不能代表任何力量强大的德国运动);2名来自受到巴枯宁影响的意大利的代表;1名比利时代表(德·巴普);6名来自伦敦的代表(3名英国人,2名德国人和1名法国人)。这次没有任何杰出的英国工会领袖与会,他们正在为议会改革法案和工会权利进行双重斗争,非常忙碌,脱不开身,派埃卡留斯作他们的主要代表,同来的还有香料商詹姆斯·卡特尔和营造商兼建筑师、全国改革同盟的阿尔弗雷德·华尔顿。

在洛桑代表大会上,第一国际在政策问题上仍在摸索前进。事实上,它完全不能肯定自己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一个决策机

构，并让全国性或地方性组织根据不同的条件去各行其是。当时认为，在日常的经济斗争中，各国工人通过捐款和竭尽所能防止来自远方的工贼破坏罢工，从而尽力帮助其他国家的工人，乃是理所当然的事。与会代表也一致同意，工会应该在最广泛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在国内组成各行业的区域性和全国性的联合机构，并且组成每个行业或工业的国际性联合机构。与会代表还相当一致地同意，应该鼓励合作生产，并且号召工会在投资和道义上给予支持。但是对于哪种合作活动应该得到支持的问题，却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有许多代表对消费合作事业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他们的理由有二：第一，这种事业牵涉到持股的消费者对雇员的剥削，而且往往会产生特权的工人贵族；第二，在工资由“铁的规律”决定的资本主义条件下，消费合作事业的成就只会使雇主更易于降低工资。生产合作社则比较受欢迎，因为它预示工人控制工业。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一些代表反对说，这种合作社只会造成自己当家做主的合作社工人的特权集团，而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以解放大多数人。洛桑代表大会最后通过的决议承认有这种危险，但是又说只要无产阶级认识到这一点，这种危险是可以避免的。为研究这个问题而成立的委员会向代表大会提出了报告，大力主张生产合作社社员完全平等，不允许存在从他们的劳动中攫取利润的特权股东阶层。蒲鲁东派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他们还进一步使他们的如下计划得到通过：利用信贷银行体系把“无息贷款”交由任何劳动者或劳动者团体支配。一些投票赞成关于合作生产的决议的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相信在工会的支持下自愿合作的扩大有朝一日能够不必进行政治革命就消灭资本主义。有一些代表（蒲鲁东派）认为，社会革命会取消国家，会建立“无息贷款”制，是组成合作共同体的一个先决条件。还有一些代表则根据路易·勃朗和拉萨尔的学说主张，通过普选而民主化的国家必须首先成为生产合

作事业的资助者，然后才能摆脱它目前所受的限制或者消除这样一种危险：只解放一部分工人阶级，而同时留下一个非合作社社员¹¹¹的受剥削的无产阶级——“第五阶级”。

当洛桑代表大会讨论到议程上的最后几个项目时，上述分歧更加明显地显示了出来。在如何对待国家以及工人对国家采取什么政策的问题上原有的根深蒂固的分歧这时明朗化了。第一个尖锐的分歧是在教育问题上产生的。代表们普遍认为应该把接受教育当作一种普遍人权，但困难在于指出如何贯彻人们所享有的这种权利。有些代表希望在完全摆脱宗教的基础上，用法律规定一种普遍义务教育制，并由国家来执行。另外一些代表则争辩说，即使能够保证教育的非宗教性，把教育交给国家也是错误和危险的，难道国家实质上不就是统治阶级的机构吗？难道国家不会利用所控制的教育大权把错误的社会思想灌输给工人吗？还有一些代表（蒲鲁东派）更进了一步，不仅断言国家是一个天生的反动工具，而且肯定教育理应是父母的事，任何公共机构都无权包办代替。这些分歧终于在一项决议中得到了弥合。这项决议开头断言有实施教育的普遍必要，同时坚持教育必须完全摆脱宗教；接着又说，国家无权过问教育，除非父母没有能力给予子女以应受的教育。这句话给主张采取集体行动的人以争辩的口实：既然有子女的工人阶级谁也没有这种能力，那就等于授权国家把这项工作抓在自己的手里。蒲鲁东派在把自己所主张的词句塞入决议之后，也就容忍了其他一切。于是，关于国家的提法便在根本没有充分考虑其真实意义的情况下被接受了下来。

然而，在议程的下一个项目中，代表们又不得不更直截了当地谈到“国家”这个问题。这个项目以一份报告——关于国家对工人运动的作用的报告——的形式正面提出了这个问题。大会通过了一项主张交通工具和交换手段公有制的决议，但是拒绝接受西萨

112 尔·德·巴普提出的要求土地也归公有的修正案，大会把这个新问题留交国际的下次代表大会作更充分的讨论。这是个开头，从此在第一国际存在期间，集体所有制的问题就一直是大规模辩论的主题。关于银行和交通事业社会化的建议之所以提出，是由于把这些事业组成生产合作社存在着巨大困难；一般认为，生产合作社基本上是合作者在单一的机构内一道工作的地方组织。英国人一直要求把铁路和其他大规模事业收归国有，理由是这些事业必然是垄断性的，因而必须从资本家手里把它们夺过来，资本家利用某种规模大于生产合作社的机构控制它们。蒲鲁东派则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谴责金融垄断资本，要求以不谋利的公共信贷银行取而代之；他们也准备投票赞成把其他垄断企业收归公有，只要不要求他们明确宣布赞成国家所有制，这也就是说，只要不为公有制的形式下定义。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肯投票赞成土地公有制，因为他们是农民所有制的热烈拥护者，认为农民的财产是农民本人享有自由的必要组成部分。瑞士代表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是分歧的，大会把这个问题留交所属各支部作进一步考虑。

参加大会的集体主义者认为，大会作出主张垄断企业公有制的决定是一大胜利，但是“公”有制实际上是否意味着任何类型的“国家”的所有制，还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议程上的下一个项目又在不同的方面提出了同一个问题。这个项目是工人阶级在“政治斗争”中应该发挥的作用以及“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之间的关系。经过大量辩论，大会终于通过了这样两项决议：“（一）关于工人的社会解放同他们的政治解放是不可分割的决议；（二）关于争取政治自由是绝对必要的首要步骤的决议”（德·巴普曾尖锐批评这是“本末倒置”）。最后，几乎所有代表都投票赞成这两项决议，因为人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对它们进行解释。这两项决议具有双重
113 目的，既谴责那些完全反对政治行动的人——无政府主义者和极

端工团主义者，又谴责那些准备不要政治革命而实现社会改良的人，特别是那些打算同拿破仑第三的帝国或者俾斯麦的普鲁士德意志国家妥协的人。然而与会代表谁也不愿意承认对这些方针抱有任何同情。至于这两项决议的其余部分，由于措词过于含糊，代表们没有分歧意见。此外，大会又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在以后举行的每次代表大会上都应“庄严地重申”这些决议，并应正式通知第一国际的全体成员。这一事实清楚地说明大会认为这两项决议具有根本的重要意义。

国际工人协会洛桑代表大会讨论的最后一个重大问题是国际对于国际和平大会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这个大会即将由新近成立的和平与自由同盟主持，在日内瓦召开。这个同盟是由前圣西门主义者沙尔·勒蒙尼埃(1806年——1891年)发起组织的，目的在于把力主和平的倡议同在共和政体下建立欧洲联邦的主张联系起来。勒蒙尼埃最初建议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但是拿破仑第三的政府批驳了这个计划，于是中心便转移到日内瓦。勒蒙尼埃的计划遭到许多历史比较悠久的和平团体的反对，特别是英国和美国的，理由是把和平宣传同建立共和政体或欧洲各国组成有主权的联邦的建议联系起来是错误的，但是有一些国家却成立了支持这项计划的颇有声势的委员会，在支持这项计划的宣言上签名的有一万多人。其中有这样一些杰出人物：维克多·雨果、约翰·布莱特、加里波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路易·勃朗、埃德加·基奈、赫尔岑和日内瓦的詹姆斯·法齐。同第一国际有关系的威·朗·克里默是英国筹备委员会的秘书。

勒蒙尼埃的倡议是在欧洲和平运动几乎长期陷于停顿以后提出的。1843年曾举行过一次世界和平大会；从1849年到1851年，先后在伦敦、布鲁塞尔、巴黎、法兰克福举行过一系列世界和平会议，最后一次会议是在1851年举行国际博览会期间再次在伦敦召 114

开的。但在克里米亚战争以后，这个运动便在欧洲逐渐消逝了；在美国，这个运动为南北战争所破坏，这场战争使运动的拥护者陷于严重分裂。然而到了 1866 年，在巴尔的摩组成了一个新的环球和平联盟；翌年，除了勒蒙尼埃所作的努力以外，还分别有人作了几次尝试，打算在欧洲建立一个新组织。这些新运动大都集中于鼓吹把国际仲裁当作防止战争的手段，避免提出任何可能使保守派望而却步不敢给予支持的政治建议。另一方面，和平与自由同盟则肯定是一个左翼运动，得到许多教授、文人和资产阶级激进政治家的支持，而且对激进派和工人阶级特别具有号召力，吸引他们纷纷前来参加。加里波的亲自参加了和平与自由同盟所召开的大会，而且由于是深孚众望的杰出英雄，成了大会的主要人物。这次大会还吸引了许多在 1848 年和以后几年欧洲革命失败后被赶出自己国家的流亡者。其中有米哈伊尔·巴枯宁，他立即使自己成为与会代表的左翼领袖，并着手从这一运动的资产阶级发起人手里夺取运动的控制权。

日内瓦和平大会的组织者由于迫切希望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邀请国际工人协会给予合作；洛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不得不决定如何作出答复。国际总委员会在召开洛桑代表大会以前曾举行会议，马克思在会上坚决反对跟和平与自由同盟发生任何关系，他把同盟看作是一批无能的资产阶级空谈家妄费心机的集会而予以否定。但是他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主张；在洛桑代表大会上，大多数代表赞成在同盟的反战斗争中与之合作，同时坚决要求同盟正视社会问题并接受只有改变经济制度才能避免战争的观点。于是洛桑代表大会通过了《致日内瓦和平大会全体代表书》，其内容如下：

115 鉴于战争不仅剥夺工人阶级的生计，而且迫使工人阶级流血，是主要压在工人阶级身上的沉重负担；

鉴于武装的和平使生产处于战争的威胁之下，驱使工人从事完全无益的工作，陷生产力于瘫痪，对生产造成威胁；

鉴于和平是普遍幸福的首要条件，需要在社会上不复存在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新制度中加以巩固；

国际工人协会洛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完全而彻底地赞助将于9月9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和平大会，给予大会以有力的支持，并参加大会所从事的一切工作，旨在废除常备军和维持和平，以便能尽快地摆脱资本的力量和影响，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并组成欧洲各自由国家的联邦。^①

这个得到大多数瑞士代表支持的决议在通过的时候，并不是完全没有人反对。洛桑代表大会决定派遣一个三人代表团到日内瓦去送交这个文件，这时托伦出于怀疑所建议的同中产阶级激进派的合作，在德·巴普的支持下，提出了一项表明国际的支持取决于是否接受《致和平大会全体代表书》中的附加条款，并得到通过。这项附加条款是个尖锐的挑战，其措词如下：

鉴于战争的主要根源在于贫困和经济不平衡，鉴于解散军队并不足以制止战争，还必须保证生产分配日益平等，改变社会组织，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大会决定它对和平大会的赞助取决于和平大会是否接受上述宣言。

当然，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猫放到鸽群里，而且也恰恰起了这样的作用。日内瓦和平大会是一个组织成分极其不纯的集会，根本没有准备在社会问题上同国际站在一边，因此马克思的意图得以实现。詹姆斯·吉约姆是国际派往日内瓦和平大会的正式发言人，就不信任激进派政客这一点来说，他更甚于马克思。国际的来书在大会上并没有经过直接辩论，但是和平与自由同盟是不同意

^① 这个文件是本书作者根据法文本译出的。

这个文件的。大会结束以后，在它所成立的委员会上，迅速展开了一场斗争。当时巴枯宁还没有同第一国际发生关系，在积极参加了日内瓦和平大会以后，继续在同盟内部担任左翼领袖，力促通过全面的革命性社会纲领；翌年，同盟在伯尔尼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争执达到了严重程度。巴枯宁及其信从者退出了同盟，决定同国际工人协会共命运。

从此，本书的叙述就进入第一国际内部开始激烈斗争的阶段，这场斗争到头来终于断送了国际在 1870 年和 1871 年遭受严重打击后的残余生命。1868 年以前，国际内部的争执看来主要是蒲鲁东派同其余的人的争论，当时马克思从称呼托伦及其同事为“好伙伴”的阶段进而转变到对他们的“蒲鲁东主义的一派胡言”嗤之以鼻。但从 1868 年起，蒲鲁东派的影响已无足轻重。国际法国支部的实际领导权已经从托伦转移到欧仁·瓦尔兰手里；这时马克思同巴枯宁信从者之间的新争执遮盖了其他一切。

这些争执究竟是什么呢？首先两人的气质就完全相反。马克思满怀革命热情，头脑清醒有条理，不能容忍巴枯宁的如下信念：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鼓动群众起来革命，放手摧毁一切，而把建立新社会秩序的全部工作留待群众的自发能力去解决。第二，马克思所设想的国际是一个在集中和统一领导下工作的运动，尽管必须留出很大的回旋余地，让各国支部根据本国的不同条件去制定自己的政策。而在这个问题上，巴枯宁得到拉丁语系各国大多数
117 拥护国际的人的支持，坚决认为，每个国家——事实上即每个地方——的运动应该有制定自己的政策的充分自由，不必受一个控制中心的任何指导。这就是第一国际内部的中央集权论者同“社联主义者”或“自治论者”之间争持不下的问题。中央集权论者后来又被称为“极权主义共产主义者”；而“社联主义者”或“自治论者”则自称为“自由集体主义者”，有时候又被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

后两个名称当时还没有被国家社会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所采用,当时是作为“共产主义”(作为中央集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对偶名称来使用的。

第三,巴枯宁以及国际中他所支持的那个集团是一切形式的国家的彻底反对者,巴枯宁名噪一时的著作《上帝与国家》把这两个概念连在一起,当作是极权主义原则的体现——人类自由的孪生死敌。马克思也指责上帝和国家,但是他视为敌人的“国家”乃是封建主和资本家的“警察国家”,他力图推翻这种国家,并用那种直接以工人阶级政权为基础的新国家——即人民国家取而代之。在巴枯宁眼里,人民国家只能是对工人实行暴政的一个新工具;所谓工人国家在巴枯宁看来纯粹是用语矛盾。巴枯宁同马克思一样,主张无产阶级对剥削阶级实行专政;但是巴枯宁认为这种专政必须是整个觉醒了的工人阶级的自发专政,而不是凌驾于工人阶级之上、处于权威地位的任何领导集团的专政。出于反对巴枯宁的反国家统治论,有一个时候,马克思曾同布朗基的信从者结成联盟反对巴枯宁,布朗基所主张的正是巴枯宁所指责的那种觉悟的少数领袖的专政。但是马克思本人所主张的专政既非巴枯宁的也非布朗基的专政,而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专政。马克思所希望的专政乃是以大部分产业工人的支持为基础,但由一个依靠这种支持的紧密团结的领导集团,在共同纪律(即今天所谓的“民主集中制”)的约束下来实行专政。他非常坚决地认为,这些领袖决不应操之过急,决不应使自己脱离工人阶级群众的舆论。但是国际内部的反极权主义者看不出马克思和布朗基关于专政的概念有什么不同。他们无分轩轻地指责马克思主义者和布朗基派都是极权主义中央集权论者,指责他们力图把新型国家的枷锁套在工人身上,而不是废除这种始终是人对人施行暴政的工具的制度。

第四，巴枯宁一旦跟和平与自由同盟以及他在国际中的大多数支持者决裂以后，就反对同激进派政客和资产阶级运动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或者给予他们以任何形式的支持；而马克思虽不喜欢这些人（就如同这些人不喜欢马克思一样），却认为必须支持他们，只要他们力求进行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改革，比如扩大选举权、限制劳动工时或者扩大政治自由等。尽管马克思在谴责资产阶级时毫不容情，但是他却激烈反对所有那些出于憎恨资产阶级而支持政治上的反动派或独裁者的社会主义者。为数不少的政治反动派自称是社会改革和自愿合作事业的提倡者，有些人显然还着手讨好工会，至少是讨好那些能够被说服采取社会和平与阶级合作的方针的工会。马克思和巴枯宁都积极反对这种趋势，但是他们在明确说明自己对待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态度时就各讲自己的一套道理了。马克思要求支持那些使工人易于开展运动和易于在现存的制度下为实现社会改革而施加压力的政策，因为他认为这种政策会加强工人阶级，有利于推行革命工作。与此相反，巴枯宁在跟和平与自由同盟闹翻以后，就拒绝同现存的制度进行任何形式的妥协，他争辩说，在现存的制度下搞改革只会削弱工人的革命热情，到头来使工人阶级运动受制于资本主义和国家。

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坚定的态度，主要是受英国和德国的状况的影响，而影响巴枯宁的则主要是俄国和意大利的状况。马克思身居英格兰，把英国看作是工人阶级运动发展的关键性地区，
119 因为它是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他认识到，要使英国工会不集中主要精力于确立工会权利，扩大选举权和改进工业立法（工厂法案、矿山法案、劳资法案等等），那是根本办不到的事。因此，他在英国的策略便以促进这些事业为依据，希望既能收到加强工人运动战斗性的效果，也能收到使运动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更加团结的效果。与此同时，马克思也在注视德国的工人运动的发展

情况，那里的运动不得不面对一个施政上专制得多的国家制度和
一个经济上落后得多的资产阶级；他认为这个资产阶级需要在工
人的不断推动下才会去反对这种专制政权。马克思非常怀疑拉萨
尔及其继承者有同俾斯麦勾结起来对付资产阶级进步分子的意
向，而且往往过分夸大，竟致毫无理由地相信拉萨尔派的头头们
实际上已被俾斯麦收买了。

另一方面，巴枯宁一旦跟和平与自由同盟决裂以后，便无意于
同政治反动派勾勾搭搭，实际上也无意于同资产阶级激进派拉拉
扯扯。在拟定政策时，他考虑得最多的国家是俄国和意大利。在他
看来，要在俄国现存的国家结构内搞改革，纯粹是荒唐可笑的事；
至于意大利，它仍处于灾祸频仍的动乱之中，这是由于工人阶级
的赤贫，由于马志尼派民族主义好高务远的抱负同 1860 年建立
的新国家——尤有甚者，同仍处于十足封建状态的南部——的肮
脏现实之间存在着不啻霄壤的差别。巴枯宁在 1864—1867 年客
居意大利时发现，那里的所谓工人阶级运动受马志尼派知识分子
的控制，他们虽然是共和主义者，反对君主制国家，但是仍然忠于
他们的领袖的学说，向穷人谈责任的时候多，谈权利的时候少；巴
枯宁支持分散的左翼，并帮助它组织成为一个强大的运动，这个左
翼坚决反对马志尼的共和主义者和加富尔^①的新国家。在意大利 120
利，尤其是在那波利，唯一实际可行的工人阶级的抵抗形式是暴动
——即吃不饱肚子的人为反对苦难和压迫而进行的武装暴动。这
种暴动在实践中必然是地方性起义，几乎没有统一的计划可言，而
且是以严重的地方疾苦为基础的。唯一能够支持这种起义的组织
形式是纯属意大利传统的密谋活动；这种活动形式完全适合巴枯
宁的气质和他的俄国背景。1867 年以后，当他在第一国际广阔的

① 卡米洛·本索·迪·加富尔(1810—1861 年)，撒丁王国首相，曾同拿破仑三
世签订密约，企图仰仗后者统一意大利，建立王国。——译注

舞台上露面的时候，他把自己在意大利所取得的经验果实带到了国际的活动中，并且希望诱导全欧洲的工人按照这个步调起舞。但是事实上，许多在国际中同他合成一伙反对马克思的人完全不同意他那套基本上是搞密谋的活动方式。这些人同意他的意见，坚决反对马克思的“极权主义”和一切旨在把集中制定的政策强加于国际的企图。他们也同他一样，痛恨现存的国家和资产阶级政治：他们向往那种以工人主持的地方自治公社为基础的、松弛地联合起来的自由社会。但是他们也热心提倡巴枯宁丝毫不感兴趣的工人合作社；他们缺乏那种促使巴枯宁主张连根拔除整个社会秩序，一切由解放了的工人从头干起的热情。事实上，他们大部分是体面的有家室的人，对于传统的准则和生活方式并无恶感，只是希望消除有钱佬对穷苦人的压迫而已。

当然，在瑞士、法国和比利时，有不少人既不赞成巴枯宁提出的摧毁一切的主张，也不附和 international 中许多反对马克思的人所持的建设性社会无政府主义的立场，而是介乎两者之间。在法国，蒲鲁东派衰落以后，流行的反极权主义趋势是工团主义的而不是彻底的无政府主义的。在瑞士法语地区，这种趋势是公社和合作社性质的。在比利时，存在着各种互相矛盾的趋势。这种局面之所以形成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华龙族人和佛兰芒族人之间的民族分歧，使得比利时总是沦为对立思想的战场。在德国，有一个以约翰·莫斯特为首的人数不多的无政府主义集团，但是主要的斗争还是拉萨尔派和马克思主义者这两个极权主义集团之间的对垒。巴枯宁的主要追随者——即完全同意他的观点的集团——是在意大利，稍后则在西班牙，因为那里的环境适合搞密谋活动。不过在西班牙，特别是在卡塔罗尼亚，工团主义的趋势也有一些力量；巴塞罗那和巴伦西亚的运动同马赛和里昂的工团主义运动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巴枯宁客居意大利期间，组织了某种秘密的革命兄弟会或同盟。但是从任何正规的角度来看，要说清楚那些据称以巴枯宁为其领袖和鼓舞者的革命团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际存在，那是极其困难的事。巴枯宁讨厌正式的组织，他所喜欢的是这样一种感觉：朋友和同道亲密无间，自成一伙，不拘泥于形式，也没有成文的规章制度，事实上也无需任何明确的人资格。他喜欢口头吸收任何看来愿意赞助他的事业的人加入他的兄弟会或同盟，而且往往使得这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加入的是什么组织，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加入了没有。巴枯宁同许多国家的革命者或所谓的革命者书信来往频繁。他还不断为他的革命书信发明密码，但简直很少使用，因为常被警察发现。这种密码除了散布一种有人在搞重大密谋的气氛以外没有起其他作用。我认为，巴枯宁大名鼎鼎的国际革命兄弟会实际上只是他本人的想象，始终没有真正存在过，除非是说所谓存在系指他本人曾同很多人通过信，而他如果有意的话，又可以把这些人当作国际革命兄弟会的会员。巴枯宁的意大利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看来倒是确有其事，而不那么虚无飘渺，这是他后来在日内瓦成立的同盟的前身。

在巴枯宁和他的一批支持者——主要是流亡人士——于1868年退出和平与自由同盟并宣布在日内瓦组成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以前，除意大利以外，是没有真正的巴枯宁派组织的。即使到了此时此刻，从任何正规的角度来看，除瑞士以外，实际上除日内瓦一地以外，民主同盟简直就不存在。毫无疑问，泛泛说来，民主同盟是得到意大利、西班牙以及法国南部的许多团体的支持的，但是上述国家那些支持民主同盟的团体是独立的组织，而不是民主同盟的一部分。巴枯宁在组织民主同盟的时候宣布他有志使这个组织同国际工人协会联合起来，他写信给马克思说，从此以后，他打算把全部身心贡献给国际工人协会。

巴枯宁在退出和平与自由同盟以前，曾企图说服它的领导委员会以一个大体上取得一致的纲领为基础同国际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让国际去处理经济问题，而由同盟来对待政治问题。他的这一努力取得了一些成就。他说服了领导委员会写信给国际，邀请它进行合作并派代表参加同盟的伯尔尼代表大会，但是这一邀请在伦敦并没有为国际所接受。国际在1868年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宣布说，它认为同盟没有继续存在的充分理由，要求同盟解散，同时建议同盟的组织和成员改属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实际上拒绝了巴枯宁所提出的分工建议，因为大会讨论了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并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各国工人积极行动起来以防止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甚至要“在他们各自的国家一旦爆发战争时，就完全停止劳动”。大会说只能恰如其分地把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看作是工人之间的内战。于是，为反对战争而举行国际大罢工的政策便第一次在历史舞台上出现了。这使马克思非常烦恼，他在评述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议程时指责说，全盘想法纯粹是胡闹。

123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在确定了本身的工人阶级战争政策以后，接着就参照这一决定考虑它对待和平与自由同盟的态度。它并没有打算阻止其成员参加同盟的伯尔尼代表大会，其中有相当数目的人是准备参加伯尔尼代表大会的，但是布鲁塞尔代表大会表明，他们将只是以个人身份参加，无权为国际承担义务。国际让他们带去了要求同盟解散的决议。这件事使巴枯宁感到不快。他正确地把国际的态度主要归咎于马克思，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在伯尔尼代表大会上提出他自己的使同盟保证执行一项先进的经济和社会计划的建议。在伯尔尼，他提出了如下提案：

鉴于我们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是阶级与个人的经济和社会平等化的问题，大会确认，没有这种平等化——也就是说没有正义——自由

与和平便不可能实现。因此，大会把研究这个问题的实际解决方案列入了议程。

在就自己的提案发言时，巴枯宁自称是一个“集体主义者”，并鲜明地指出这种理论同共产主义不同。他贬斥共产主义必然是一种专制主义和集权主义的理论。他说：“我讨厌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否定自由，而我不能想象没有自由还有什么是有人性的东西。我不是共产主义者，因为共产主义的目的在于把社会的全部权力集中在国家手里，因为共产主义必然导致财产集中于国家的情况，而我则希望废除国家，希望彻底根除国家的权威和监护原则，国家以普及教育文化为借口，迄今一直在奴役、压迫、剥削和败坏人民。我主张通过自由结合，自下而上地组织社会，组织集体或社会的财富，而不是通过任何种类的权威自上而下地进行这种组织。我主张废除国家，因而我也主张废除财产的个人继承权，这种继承权无非是国家的一种制度，是国家原则的结果。从这里你们可以体会到我是个集体主义者而根本不是共产主义者。”

巴枯宁的提案，由于集体主义的倾向，遭到蒲鲁东派的反对，同时也遭到一些德国社会主义者和大多数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反对，终于被否决了，于是他和一批信从者便退出了和平与自由同盟¹²⁴并宣布成立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个集团最著名的成员有地理学家埃利塞·莱克留、俄国流亡者尼古拉·茹科夫斯基、波兰人瓦勒里·姆罗茨佐夫斯基、意大利人朱泽培·法耐里和阿尔伯托·塔西、里昂的阿尔伯·理查以及和平与自由同盟的创始人之一阿里斯泰德·莱伊。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宣布它的意图在于组成一个国际性的革命团体，并要求根据如下谅解加入第一国际：保持本身明确的组织形式，除参加整个国际所举行的代表大会外，自己也单独举行代表大会。国际总委员会自然拒绝了这项申请。于是同盟作

为一个国际性组织决定解散，并要求它的支部加入国际的全国性总支部和地方支部，同时把它自己的中央组织改组成国际设在日内瓦的宣传部，接着再次向国际总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接纳。令人颇为惊异的是，总委员会在这个基础上竟决定接受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人的申请，但拒绝了同盟提出的批准巴枯宁为同盟拟定的那份纲领的要求。总委员会说，它不对本身所属组织的纲领作出判断，而只是根据组织是否纯洁决定是否接纳它。马克思在私下对巴枯宁的纲领非常瞧不起，特别是纲领中所说的废除继承权的重要意义，他指责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感情。此外他也特别轻视其中所提出的“阶级平等化”的要求，他说后者完全是一派胡言，因为国际的宗旨不在于阶级平等化，而在于消灭阶级。总委员会支持这个论点，在它的坚持下，巴枯宁派欣然同意修改自己的纲领，以便表明这正是自己的初衷。但是我们将会看到，继承权问题上的争执仍然存在。

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总部所在地日内瓦，巴枯宁的日子并不好过。大多数日内瓦国际派反对他的无政府主义观点，虽然有一个支部支持他，特别是建筑工人支持他，建筑工人 1868 年在国际的帮助下举行了一次成功的大罢工。巴枯宁在瑞士的主要支持来自流亡者——俄国人、波兰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还来自汝拉山区讲法语的家庭工业工人，这些集团后来形成了独立的汝拉总支部。操德语的瑞士人简直没有给予巴枯宁以任何支持，以拉绍德封的库勒里医生为首的合作主义者也对他采取敌对态度。巴枯宁的民主同盟跟国际日内瓦总支部中的大多数人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斗争。尽管设在伦敦的国际总委员会接纳了同盟的地方支部，但是日内瓦总支部却拒绝接纳它。在瑞士当地进行斗争的时候，马克思同巴枯宁还在整个国际中进行范围更大的斗争。

关于这场主要的斗争，我们下面必然还会谈到，目前有必要谈

谈 1868 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其余情况,以便把第一国际本身的历史继续下去。参加这次大会的人同前两年参加日内瓦和洛桑代表大会的人大不一样。这次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并不是瑞士人,而是比利时人,他们在总共 100 名代表中占 56 名,明显居多数。其次是法国人,有 18 名。英国代表包括以伦敦为中心的总委员会委员在内有 12 名,其中 6 名是外国人。瑞士代表只有 8 名。其余是德国人 4 名,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各 1 名。除了埃卡留斯以外,英国代表队伍中只有一位著名的工会领袖,即本杰明·鲁克拉夫特。托伦仍然是法国代表团的领导人,瓦尔兰当时关在监狱里,没有参加大会。大会以后,瓦尔兰和一些其他人从狱中向和平与自由同盟递交了一份意见书,抗议国际对同盟的不友好态度。德·巴普是杰出的比利时代表,约·菲·贝克尔是瑞士的主要参加者。瑞士无政府主义集团的领袖詹姆斯·吉约姆未能与会。德国人中唯一重要的代表是实际上客居巴黎的莫泽斯·赫斯。意大利代表是巴枯宁的一个住在日内瓦的信从者;西班牙代表来自巴塞罗那,他用了一个假名。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说话算数的是比利时人,他们为大会准备了一些专题报告,并且事先还进行了多次初步讨论。要求代表大会决定的主要问题是德·巴普一年前在洛桑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土地所有权问题。在他的提议下,不顾声势日落的法国和比利时蒲鲁东派和瑞士温和派的反对,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宣布,土地应归集体所有。事实上,大会的决议比这更为全面,因为除了土地本身以外,还包括矿山和石矿、铁路、运河、电报和其他交通工具以及森林。在另一项决议中,还考虑了生产的资本工具问题;大会说,机器迄今是用来剥削工人的,只有通过“比较平等的组织把机器交给工人掌握”,才能真正为工人服务,而且“只有通过合作社,通过互通有无的信贷组织,生产者才能拥有机器”。

由此可见,在布鲁塞尔大会上,国际已经明确赞成高度的集体主义。但是就制造工业来说,它所设想的那种类型的集体所有制乃是以生产合作社为基础,辅之以一种“无息信贷”制;这就是说,通过互惠银行把无息资金交给工人支配。代表大会所宣布的并不是国家拥有或控制工业,而是以分散——更确切地说,以地方化——为原则的合作社所有制。至于农业,大会也设想了一套类似的解决方案:土地归地方公社所有,由农业工人合作社负责耕种。在代表们看来,比较难于决定的是究竟应该怎样来经营象铁路、运河之类跨越地方界限的大规模企业;大多数发言的代表都认为,可以在这类企业所跨越的地区,以地方公社为基础,采用某种联合的形式来经营。大多数代表排除了国家拥有和控制这类企业的设想,认为国家实质上是一种反动机构,但是又认为关于大规模企业将来如何组织的整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应在下一次大会上加以考虑。

在宣布合作组织是接管和控制机械工业的最适当的机构时,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特别阐明了它心目中所设想的那种合作机构。为研究这个问题而设立的委员会提出了报告,强调指出合作事业采取资本主义形式的危害性。报告指责以营利为目的的资本积累以及买货分红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认为这种做法不是要取代资本主义,而只是为了一部分工人阶级的利益使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从而制造一个资产阶级的本性保守的“第四等级”。报告着重指出,工人合作事业的真正目的在于把生产工具从资本家手里夺过来,交由合法的主人去经管。为此,代表大会通过了如下决议:

所有按照民主原则组成的社团,一律反对以资本的名义进行的各种形式的榨取,不管它所采取的形式是租金、利息还是红利,因为这样才能为劳工保留他们的全部正当报酬,保留他们的全部权益。

第一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无意同罗契台尔式的消费合作社建立关系，也无意同那些为投资支付利息或以分红的方式酬劳工人的生产合作社建立关系。大会只赞成以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为原则的合作形式，虽然它在阐明这条原则的内容方面还没有取得很大进展。

大会所成立的一些委员会曾就若干其他问题提出报告，大会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比利时代表准备了一份建立信贷银行以资助合作企业的计划。这份计划在原则上得到了通过，具体方案则送交国际各总支部作进一步讨论。

关于工会问题，大会得出结论说，虽然罢工并不足以解放劳工，但罢工还是必要的。大会号召工人在自己的行业中全面地组织起来，并联合成立总的组织；它建议每个地方的工会联合组织都设立一个“仲裁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并不是雇主和工人的共同组织，而是各行业工会的联合机构，其职能是就应否给予举行罢工的建议以全面支持作出决定。这项成立仲裁委员会的建议大概是以英国最近所发生的情况为依据的，英国于1866年成立了“联合王国有组织行业联盟”。128

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还提出了教育问题。这次，大会决定要求国际本身的各个支部公开设立“提供科学、职业和生产指导”的训练班，以弥补工人实际所受教育的不足。大会同时承认，只有缩短工时，这种计划才能行之有效。在这个问题上，大会确认已经到了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并规定所有支部有责任开展缩短工时的运动。

马克思没有参加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他对大会的议程深表不满，这部分是由于大会坚持互助论的信贷主张，而他认为这是愚蠢的，部分是由于他不喜欢为反对战争而举行总罢工的主张，他认为这种主张是行不通的。但是这次大会毕竟是工人阶级运动史上的

一个重要里程碑,因为它标志着工人阶级明确接受社会化的概念。

1868年是一些国家罢工相当活跃的年头;经过1866年和1867年的萧条和恐慌,贸易正开始复苏。1869年,经济恢复繁荣,罢工运动大为加强,在参加第一国际的所有国家中,工会会员人数大大增加。在法国和比利时,罢工运动导致许多领袖被捕;人们几乎把每一次罢工都归咎于国际的邪恶作用,即使国际在罢工中并没有起任何作用,而国际的会员则欣然扮演起他们的反对者指派给他们的角色。在西班牙,1868年的立宪革命暂时为工人阶级的组织和鼓动敞开了大门,国际(主要是在无政府主义和工联主义的思想影响下)得以迅速发展。在意大利,不论是在北部,还是在那波利以及西西里的一些地区,组织的发展也很迅速。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869年的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正式成立。当时有一部分拉萨尔派分裂出来,根据一份主要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纲领同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联合。这个新成立的党并没有正式成为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德国的法律,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李卜克内西实际上是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参加了国际的1869年巴塞尔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第一国际已召开过的大会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次大会,它显示国际的声势正接近于顶点。

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与会代表确实比布鲁塞尔大会少,前者为72名,后者为100名。但是人数减少的原因是瑞士人只派遣了24名代表,而一年以前,比利时人就派去了56名代表。1869年,没有一个国家拥有多数:25名法国人、24名瑞士人、5名比利时人、5名德国人、2名奥地利人、2名意大利人、2名西班牙人和1名美国人;美国人是第一次参加国际的代表大会。英国(包括总委员会在内)只派来了6名代表,即罗伯特·阿帕尔加尔特、本杰明·鲁克拉夫特、考维尔·斯特普尼以及3名外国人:埃卡留斯、列斯纳和荣克。阿帕尔加尔特系英国杰出的工会主义者,是新近参加国

际的重要人物。在法国人中，瓦尔兰出狱后又回到了自己的岗位，托伦尽管在集体化的争论上失败了，仍然参加了大会。德·巴普还是比利时代表的领袖；瑞士的大多数主要人物都来了，只有在国际走向集体主义时退出的库勒里没有到会。两名意大利代表中有一个是巴枯宁，他是第一次在国际的代表大会上露面。

地产问题又一次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提了出来，尽管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已经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表决。托伦及其友人坚持说，表决没有经过充分酝酿，于是大会同意重新讨论这个问题。这次，问题分成两部分：即社会是否有权变土地为集体财产？这样作是否得宜？这两个问题都以大多数票得到通过，但是在如何正确处理集体所有的土地的耕耘问题上却产生了分歧。大会责成一个委员会就这个问题提出报告，在委员会上大多数代表赞成由公社进行实际的集体耕种。埃卡留斯代表总委员会，主张由国家把土地出租给那些其规模足以充分利用机械化生产方法的农业合作社。德·巴普和其他一些人则赞成公社所有制，由公社以优惠条件把土地出租给农业合作社或缴付地租的个体佃农。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130

在巴塞尔大会上争执最激烈的问题是继承权问题。如前所述，在和平与自由同盟代表大会上，巴枯宁集团把废除继承权问题当作关键问题；在退出同盟以后，巴枯宁继续向国际的一些支部力陈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得以列入巴塞尔代表大会的议程，主要是由于某些支持巴枯宁的法国代表的活动，这一点使马克思深为恼怒。因为在马克思看来，财产继承权完全渊源于私人占有，正确的作法是直接攻击私有财产制，只要废除私有财产制，继承权就会自然而然地消灭。马克思认为这一点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在他看来，抨击继承权不过是浪费时间，不过是解决一个取决于法制——即取决于国家——的次要因素，而财产本身的问题是同下层经济结构相联系的。因此他论证说，强调废除继承权而不强调废除私有财产制

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态度。尽管这样，马克思主张征收高额遗产税作为过渡时期的措施，但是除了生产资料的彻底社会化以外，他反对把任何其他主张放在社会主义纲领的重要地位上。

在上述问题上，马克思执意甚坚，他指示埃卡留斯准备一份报告，陈述自己的观点，因为他本人并没有到巴塞尔去。继承权问题终于引起了激烈争执，而大多数代表并不能真正理解症结之所在。大会任命的委员会提出了报告，赞成废除继承权。埃卡留斯则提出马克思的与之对立的建议。巴枯宁发表了长篇演说，支持委员会的观点。他在演说中承认，只有暂时不去触动农民拥有的土地，但是又说在取消继承权以后，将很容易废弃这种地产。巴枯宁反
131 驳马克思说，虽然经济条件是财产关系的根本决定因素，但是国家所批准的制度——比如继承权——在历史的发展中也发挥了一种它本身所特有的次要决定作用，因此既有必要利用下层经济力量的发展，同样也有必要攻击继承权之类的制度。巴枯宁最后说，攻击继承权是对整个国家制度必须发动的攻击的一部分，可以用来实现废除一切形式的专制政府这一基本目标。

巴枯宁的论点说服了参加投票的大多数代表，委员会提出的废除继承权的建议以 32 票对 23 票通过，表决时 13 票弃权，7 票缺席。埃卡留斯代表总委员会提出了马克思所主张的建议，这个建议以 37 票对 19 票被否决，表决时 6 票弃权，13 票缺席（这时代表大会已接近尾声，代表们开始离去）。因此，没有一项建议获得绝对多数票，而这是作出最后决定所必需的。马克思虽然大为烦恼，但是堪以自慰的是巴枯宁并没有能控制国际。事实上，总委员会也没有进一步讨论废除继承权这个问题。事实已经表明，总委员会对国际的控制已经朝不保夕，至少在这个问题上，巴枯宁的影响是不容轻视的。

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讨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涉及第一国际总

委员会的权力。事出意外，巴枯宁在这个问题上竟然站在总委员会一边。他之所以倒向总委员会也许是因为总委员会同意接纳社会主义民主联盟入会，而国际日内瓦支部则表示反对。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巴枯宁发言赞成授予总委员会以广泛的权力：有权接受或拒绝加入国际的申请，以待代表大会最后批准；在任何支部被指控采取不利于国际的行动时，有权中断该支部的会员资格，以待代表大会对该支部的申诉作出裁决。由于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巴塞尔代表大会终于授予总委员会它所要求的权力。不久以后，总委员会就利用这种权力来反对巴枯宁；此外，由于环境，国际有三年时间无法举行正式的代表大会，因而这种权力也就变得，132更加重要了。

综上所述，国际工人协会于 1864 年成立，于 1869 年发展到顶峰，在通往社会主义的大道上实际上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对蒲鲁东信从者展开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因为他们所持的土地国有化主张是一个完全不能接受的概念。和平与自由同盟已经解体，它本可能成为一个对立的国际派活动中心，从而分散对国际工人协会的支持。作为一个国际团体，巴枯宁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也解散了，至少在形式上已沦为国际工人协会瑞士支部的宣传部。在一些国家，工会已经成长壮大，进行了多次成功的罢工，即使说罢工不是由国际发动的，至少国际却由于罢工而赢得了声誉。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国际已经出了名，并享有威望，它的组织仍然在迅速扩大，特别是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已在爱森纳赫建立了起来，虽然它还不能正式加入国际，但可望同国际进行密切的合作。最后，尽管中央集权论者和自治论者之间发生了争执，但是马克思所控制的总委员会毕竟取得了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控制全国性和地方性支部的权力，而且是在巴枯宁本人的支持下取得的；这虽不是十分明确的权力，然而却是很广泛的权力。

因此，总的说来，不管马克思私下抱怨什么，就问题的表面来看，他很有理由感到心满意足。如果他并不是这样，那是因为引起他不满的原因就隐伏在当时事态发展的背后，只是还没有严重影响国际的工作而已。尽管这些原因隐而不显，它们已经压在他的心头，将来有造成麻烦的危险。首先，爱尔兰很快举行起义的前景已不复存在，而马克思曾经说过，这是英国掀起革命的一个先决条件。芬尼亚党人在爱尔兰已经遭到失败，虽然他们留在美国庇护下的人仍很活跃。第二，英国的工会领袖已经得到他们所要求的议会改革，至少可以说，得到了部分的议会改革，这就使他们更多地考虑使用他们的新政治影响而不是考虑国内外的革命。此外，他们争取法律承认工会权利的活动也大有发展，而且越来越集中精力于议会斗争，以求获得这些权利。他们还明显地证实，议会改革法案在社会和工业立法方面也会获得丰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远远不象在改革斗争的高潮中那样愿意倾听马克思的意见。至于马克思，他十分清楚，他对国际的控制完全取决于他是否能左右总委员会的英国委员。事实上，除英国以外，他在国际中几乎没有追随者，国际实际上没有德国支部。在法国，他知道没有什么人支持他，因为他既不能依靠托伦也同样不能依靠瓦尔兰作为他的顺从弟子去采取行动。如果把西班牙和意大利也考虑在内，它们是巴枯宁派的活动场所，而肯定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天地。在瑞士，他认为他可以依靠贝克尔和其他一些德国流亡人士，但是在那里巴枯宁派的影响也很强大，而且日内瓦和其他地方的右翼还承担了同资产阶级进步分子结成联盟的义务。比利时有它自己的方针路线——肯定不是马克思的方针路线。全部情况就是这样。在1869年以前，马克思设法控制了第一国际，因为英国的工会领袖在大陆事务上甘愿给予他和他的德国流亡者小集团实际上是自由行事的权力，但是他毕竟能看出这种愉快而亲切的合作精神不可能

持久。此外，特别重要的是，马克思必然完全了解，第一国际表面上的强大实际上是多么虚幻，战争的炽热空气多么容易把国际的大部分力量一扫而光。

谈到这里，我们必须暂时搁下国际工人协会的内部历史，因为我们必须先讨论普法战争的爆发以及法国失败的后果——巴黎公社——对欧洲工人阶级运动的影响，才能说明国际工人协会的衰亡情况。这样，我们也才能参照这些暴风疾雨般的史实回过头来接谈第一国际以后的历史。

第七章

巴黎公社

在 1870 年以前,巴黎远远超过其他城市,是国际工人协会最活跃的中心。尽管工会在巴黎只被宽容了几年,而且受到警察的监视,尽管第一国际本身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巴黎总支部的委员先后三次被捕入狱,尽管激进派和社会主义者不断遭到迫害,他们的刊物也迭受严格审查,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但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巴黎仍然处于工人阶级日趋激烈的骚乱之中。当时经济上困难重重,治政上第二帝国则受到敌视;在这十年行将结束的时候,在巴黎和外省的主要城市罢工此起彼伏。里昂、马赛、勒克勒佐、布勒斯特、圣太田、卢昂都是动荡不安的中心,也都是在第一国际的旗帜下积极开展组织活动的中心。

但是,在激进派和工人阶级运动的队伍中却存在着尖锐分歧。在工会主义者中,特别是在巴黎,唯一最大的影响来自蒲鲁东,而蒲鲁东的学说中最为盛行的则是他的“互助论”。如前所述,在第一国际的历次代表大会上,对他的“无息信贷”方案曾进行过激烈的辩论;他的信从者所建立的互助信贷银行于 1868 年倒闭,但这丝毫也没有使他们幡然悟及蒲鲁东的理论是行不通的。他们只是认为,面对着金融资本所控制的持敌对态度的国家,互助制度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希望帝国的崩溃会给他们带来机会。他们信心十足地期待帝国的崩溃。在第一国际中,常常有人指控蒲鲁东派同拿破仑秘密勾结,但是这种指控是无稽的。这种指控以两个事实为依据:第一,拿破仑确曾企图拉拢工人领袖搞和平合作;第二,

第一国际的巴黎领导人并没有接受拿破仑的建议，而是设法利用法律对结社的限制有所松动来进行合法的而不是地下的组织活动。批评蒲鲁东的人（以布朗基为首，他曾指示信徒抵制第一国际）认为，以这种方式承认法制是对革命事业的背叛，并且我行我素，继续同其他坚持雅各宾派密谋传统的地下激进组织一道，搞革命中坚人物的秘密组织。就象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一样，巴黎的革命俱乐部和社团星罗棋布，比比皆是；这些组织的成员在大学生的大力支持下，创办了一系列昙花一现的激进派刊物，这些刊物不断招致警察当局的控告和镇压。在最有影响的激进派新闻记者中有昂利·罗什福尔(1830—1913年)其人，他在各种杂志上攻击拿破仑第三的政府，以后于1868年创办《明灯报》，不久就系狱一年。1869年出狱以后，他又在一家新创办的杂志《马赛曲报》上继续进行攻击，结果再次身陷囹圄。在巴黎公社时期，他在巴黎主持《口令报》，后因攻击梯也尔而被解往新喀里多尼亚。再往后，他支持布朗热将军，并且加入了对德莱福斯的迫害。但是在六十年代后期，他还是公认的共和派左翼的杰出新闻记者。

从任何明确的意义来说，这种极端的激进主义基本上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它的大多数领袖来自知识分子而不是劳动者，尽管布朗基以布鲁塞尔为根据地，有相当多的工人阶级拥护者。在老一辈的激进派中间，1848年的革命传统是很强烈的；那些记得“六月起义”的人还越过1848年和1830年，回顾1789年革命的伟大时代，特别是缅怀后来被拿破仑第一扑灭的1792年和1793年的革命高潮。这些革命老战士痛恨拿破仑第三和他的叔父的劣迹，也痛恨帝国，认为它是革命的破坏者。他们是热忱的共和派，对他们说来，共和政体不仅意味着废黜皇帝，继续放逐波旁王朝和奥尔良派的王位觊觎者，也意味着推翻国家——推翻那个始终是人类自由的巨大集权力量。他们致力于清除专制权力的整个机

构,尽管他们对于要用什么来代替它只有个模糊的概念。布朗基从自己所持有的革命专政概念以及从巴贝夫那里得来的平等化概念出发,以为自己了解——至少是在轮廓上了解——想要建立的是什么样的新社会。但是大多数传统的雅各宾派则满足于认清自己的敌人,并乐于假定一旦把敌人赶下台,代之以民主共和国,就万事大吉了。

这种类型的雅各宾派激进主义有一种强烈的平等主义色彩,但是大体上说来,对财产并无敌意。这种激进主义要求政治上的完全平等,彻底取消政治特权,但是除了痛恨金融家、大资本家以及帝国制度下许多靠养老金度日的老朽以外,它的经济主张是暧昧不清的。它要求比较公平的税制和成年男子选举权,要求一个直接和完全从属于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的行政机构。它痛恨官吏;特别是警察和正规武装部队的军官。它主张建立一支民兵队伍,一支能够进行自卫的人民武装。它非常怀疑扮演御用反对派角色的自由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激进派;但是它也知道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也追随比较激进的政治家,因为除了地下的密谋活动以外,别无他途可循。在那些主张推翻帝国,用资产阶级共和国取而代之的激进派,同那些仍然记得共和国在1848年如何利用了自己,因而憎恨资产阶级形式的共和国的人之间,并不存在鲜明的分界线,后者憎恨资产阶级形式的共和国的程度仅次于憎恨帝国,并且提出真正民主共和国的概念,主张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而不把权力交给任何极权主义的国家机构,哪怕是以成年男子选举权为基础的国家机构。在左翼激进派看来,成年男子选举权已因拿破仑第三搞公民投票而受到玷污。他们虽要求成年男子选举权,但是他们认为除非割断同极权国家的联系,否则就无法顺利行使这种权力。但是在遇到投票的时候,这些左翼激进派大都只能在放弃投票或投票赞成资产阶级激进政治家——至少是在那些发表极左演

说的政治家之间作出选择。有些人投了票,有些人弃权;在后者中间,有许多人认为,在帝国的统治下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是一种背叛行为,无异于同一个只能用革命行动去推翻的政权搞妥协。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随着工会的发展,随着工会在行业与行业之间建立起联系,一个更具有工人阶级特性的运动也开始同激进派团体分道扬镳。但是在这里也碰到难题。有少数人持极端态度,准备同帝国妥协,甚至不惜设法阻止工会过问政治,而只愿充分利用拿破仑的国家所给予的宽容,但是大城市的绝大多数产业工人对帝国敌意很深,根本不可能采取这种态度。于是便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充分利用国家给予的让步,公开展开组织工作,同时又不放弃反对现政权的立场;另一种是拒绝当局给予的让步,并设法按照明确的革命路线秘密地进行组织活动。布朗基派和许多雅各宾分子赞成后一种政策,但是手工艺工人行会的大多数积极成员则十分自然地赞成前一种政策。他们公开地组织行会,不久又联合成立代表一些行业的工团联合会;随后,他们胆量更大了,在组织这些地方性工团联合会的同时,又开始组织国际工人协会的分部或支部。国际分部或支部既吸收各行会的会员,同时也直接吸收大批以前根本没有组织的工厂工人、矿工、运输工人和建筑工人,对这批工人来说,行业互助会已不是采取联合行动的适当基础。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在巴黎和其他一些城市,工团联合会和国际支部并肩存在,部分会员有双重身份,而且往往同在一处办公和聚会。

在这种安排下,工团联合会主要代表熟练的手艺工人,其中大 138
多数人为小雇主做工,至少是在小作坊或自己的家里做工,而国际各支部则包括很大比例的非熟练工人以及大多数受雇于大企业或大工程的工人。但是大体上说来,两个组织的领导却是共同的,虽然在手艺人中,有为数甚多的温和派,他们关心的主要是得到

承认的技术行会的事务。就某种意义来说，大多数温和派是革命者，因为他们也希望推翻帝国，而且相信帝国即将崩溃。然而他们比较倾向于支持进步的资产阶级激进政治家，同时力图建立工人阶级政党参加竞选，旨在创建一个立宪共和国。1863年，正是从行会中产生了第一批工人阶级议员候选人，这批人以当时巴黎的杰出工人领袖托伦为首。第二年，也正是他们发表了由巴黎大多数工会领袖签名的《六十人宣言》，要求实现社会解放，以补充所赢得的政治上的让步——普选。这个运动受到蒲鲁东所著《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一书的强烈影响。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大多数法国蒲鲁东派赞成以政治行动支持工人阶级的要求，尽管他们仍然希望工人于掌权以后消灭政治性的国家。正是这批蒲鲁东的信从者前往伦敦帮助建立第一国际的。

在这个阶段，工会的组织活动还没有越出熟练手艺工人的范围。如前所述，参加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大会的4名法国人都是代表小工业的手艺工人。欧仁·瓦尔兰是其中的一个，他不久就成了法国工会运动的杰出组织者，在巴黎以及外省他的号召力从手艺工人扩大到广大工人群众，并且成为第一国际在法国的真正领袖。不过这都是后来的事。在其余三人中，托伦既是一名工会主义者，也是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六十人宣言》的领袖，
139 不过他本质上是一个温和派，他同在伦敦结交的英国的工会主义者意气相投。其他两人同托伦相似，而且后来也同托伦一道反对巴黎公社，并被以前的同志指责为叛徒。这两个人早期就脱离了国际。

但是托伦及其友人又不是正统的议会类型的激进政治家。他们是蒲鲁东的信从者，赞成小私有财产制，主张自由信贷和生产者有权按照自己的劳动得到报酬。他们反对任何种类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认为这会破坏个人自由。他们攻击大规模生产和资本

主义的发展,认为这会引引起少数人剥削多数人。他们还坚持这样一个观点:每个生产者有权得到所需的无息资金,使他能够单独生产,或者通过合作团体同他人共同生产。他们直截了当地反对这样一种局面:熟练的手艺工人无力独立经营,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务或是出卖给受商人资本家剥削的小业主中间人,或是直接出卖给商人资本家,除了通过商人资本家以外,无法接近市场。在他们看来,蒲鲁东所提出的由一个大规模的中央信贷银行通过所属分行发放无息资本的主张,是保证每个生产者能够得到自己全部劳动成果的适当手段。我们已经谈过,蒲鲁东并不希望由他所反对的国家而是希望直接通过人民来建立他所拟议的银行,而且希望银行成为一个同国家完全无关的独立机构。1863年和随后几年,蒲鲁东派曾参加议员竞选,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把国家当作实现银行国有化的工具,而是要利用自己的影响来独立地建立银行,同时通过革命来消灭现存的国家——帝国。拿破仑的议会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一个讲坛,他们希望在这个讲坛上能更好地宣传他们的反国家学说。

就我们所知,瓦尔兰在这个阶段同托伦及其友人是意见一致¹⁴⁰的,只是瓦尔兰远比后者强调工人在经济领域中的集体组织,强调合作社而不是个体生产。但是由于他所强调的这两点,他的看法同托伦及其友人便产生了很大分歧,而且分歧迅速扩大,因为他是既从大工业也从小工业,既从整个工人阶级也从个体手工艺者及其行会这些角度来考虑问题的。

此外,整个集团——包括瓦尔兰和托伦——都强烈反对中央集权。他们是工联主义者,致力于在地方的基础上建立工人组织,然后把地方的工人组织联合起来。他们所向往的自由法国是一个由地方自治公社组成的国家,它是为实现那些需要在广大地区采取行动的共同目标而自由地联合组成的,权力在地方公社,较大的

联合机构并不享有强制性权力。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虽然这个名词当时简直还没有普遍使用)，反对一切形式的政治性的国家，哪怕是民主共和国，而且也敌视布朗基派，布朗基的革命专政理论在他们看来沾染着极权主义的观念。他们愿意承认的唯一权威是由公社直接体现的人民本身的权威。他们拒不接受自称代表人民并向人民发号施令的革命中坚分子这样一个概念。

在这个问题上，雅各宾派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他们常常指责国际派是拒绝承认必须有一个进行指导的革命权威的“吉伦特派”。但是他们同布朗基派也有分歧，因为他们坚持权力必须属于全体人民而不属于中坚分子。此外，大多数雅各宾派还认为自由公社是新生法国的必要基本机构，但是他们并没有达到坚持一切权力必须归于公社的地步。他们希望建立一个强大的革命的中央权威，这个权威将用一个公安理事会或委员会来代替剥削者的国家，公安理事会或委员会是人民的执行机构，利用直接立法程序——全民投票——作为它的主要立法工具。除此以外，雅各宾派不同于布朗基派和国际派的地方还在于：雅各宾派主要不从阶级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他们的观点首先着眼于政治，而国际派则基本上着眼于经济。后一种观点是从力图赢得群众的支持出发的，而布朗基派则完全依靠“觉悟的少数”去采取革命行动。

马克思在同法国的领袖们打交道时始终感到为难。在第一国际中，他藐视托伦的蒲鲁东主义，并且激烈反对他为小私有财产所作的辩护。他全心全意地支持瓦尔兰为掀起群众性工会运动（作为工人发起群众性政治运动的基础）所作的努力，但又竭力反对瓦尔兰的无政府主义的工联主义。他认为，这种工联主义是同建立统一和集中的阶级政权的需要不相容的，阶级政权是创建和保卫新秩序的工具。马克思反对雅各宾派的态度甚至更加激烈，指责

他们是不可救药的教条主义者，总是留恋 1789 年和 1793 年的伟大时代，而不去研究周围的世界，同时指责他们不顾阶级斗争的明显事实，不过是资产阶级激进派中的一个宗派，根本不理解他们号称拥护的社会革命。实际上从气质上来说，马克思对法国的任何一个派别都不抱同情，不管在巴黎公社失败的时刻，关于巴黎公社他心里想说什么话。他对法国所有派别都不抱同情这一点，是第一国际错综复杂的历史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到了 1867 年，瓦尔兰——不是托伦——成了国际工人协会法国支部的实际领导人。不久，他的富有战斗性的领导使他进了监狱，因而没有能够参加 1867 年和 1868 年的国际代表大会。当他重新参加 1869 年的巴塞尔代表大会时，关于集体所有制的斗争实际上已成过去。在国际和法国工会运动中继续支持国际的那部分工会中，蒲鲁东派失败了^①；国际已转到一项困难的任務上去：明确它已在原则上宣布赞成的那种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在法国，拿破仑第三的政府为罢工的扩大和工会的发展而感到惊恐，于是对国际进行迫害。在一些地方，政府出动军队枪杀罢工工人。工会举行抗议示威，并募集款项以支援法国以及瑞士和比利时的罢工工人。 142

1870 年，普法战争爆发，这使正蔓延到法国、比利时、瑞士以及西班牙，同时也对英国和德国发生影响的工会运动的滚滚怒涛嘎然中断。俾斯麦把拿破仑第三诱进了战争，这场战争使得两国的工人阶级运动面对着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在法国，到处存在着对第二帝国的强烈敌意，因而法国的大多数工人阶级领袖并不感

^① 蒲鲁东的思想照样牢牢地控制着法国的许多行会。法国的国际派掌握了巴黎支部，同时在里昂、马赛、布勒斯特和其他一些地区也占支配地位。但是蒲鲁东主义决没有死亡，它仍然是强大的力量，我们将要谈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它又卷土重来，再次抬头。

到有支持战争的任何要求,后来国家遭到了入侵,拿破仑的军队连战皆北,溃不成军,战争变成了一个保卫国家,反对占领和分割的问题,情况才有所改变。在德国,人们不得不面对在北德意志议会中表决战费的问题,当时在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的领导下,社会民主党刚在1869年的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成立,同拉萨尔派分庭抗礼。国际的法国支部曾向德国工人发出一份宣言,呼吁和平与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爱森纳赫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也发表了一份友好的宣言作为回答。当战争实际爆发的时候,拿破仑第三表面上成了侵略者,爱国热情席卷了整个德国。拉萨尔派在北德意志议会中投票赞成战费;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弃权,理由是他们不能投票赞成一场普鲁士独裁政权发动的战争,也同样不能投票支持看来象是支持拿破仑的侵略。在要求马克思发表意见的时候,他大体上同意他们的做法,虽然恩格斯在就这个问题致信马克思时曾强烈希望德国取得胜利。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致认为,正确的道路是在战争保持防御的性质时支持战争,但是

143 坚决反对任何吞并阿尔萨斯—洛林的建议,并应在德国取得胜利,推翻帝国,为法国建立共和政府扫清道路以后,立即要求和平。

普鲁士军队的所向披靡、拿破仑第三在色当的被迫投降以及第二帝国的崩溃,使得法国土崩瓦解,处于无政府状态,巴黎直接受到被占领的威胁。旧政府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新临时国防政府简直没有丝毫合法地位,也很少群众支持。甘必大被派到内地去重整旗鼓,征募新军;巴黎准备抵抗围攻。临时政府派梯也尔到欧洲各国首都求救。在巴黎,国民自卫军重新组织起来,工人拿到了武器,因而立即就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军事上来说,守卫巴黎是毫无希望的,在普鲁士人的包围下,即使攻不下,也能把它围困得弹尽粮绝。在内地征募的新军迅速遭到了失败;至少政府已经明显看出,除了按照俾斯麦愿意接受的条件投降以外别无出路。梯

也尔两手空空地回来了,巴赞在麦茨投降了^①,这两点更加强了这些看法。但是巴黎人不肯象他们的惶惶不安的统治者那样去看待这些问题。布朗基本人(表现在他所办的《祖国在危急中报》上)和大多数雅各宾派都成了热诚的爱国者,决心战斗到最后一人,认为巴黎投降是不可容忍的耻辱。他们指责政府继续采取守势,而不发起攻击把普鲁士人打回去。随着巴赞的投降,对政府的不满达到了顶点。布朗基派不顾布朗基本人提出的运动尚未成熟的劝告,两次发动政变,旨在建立革命政府,但是没有得到什么支持而被打败了。与此同时,政府的将领们虽然明知枉费心机,还是施加了压力,进行了一些徒劳无益、部署失当的出击。这座孤城的粮食储备很快耗尽了。于是政府同普鲁士人开始谈判,后者坚持要占领北部和东部的要塞炮台,并且要把大军开入巴黎市中心。

巴黎国民自卫军虽然仍处于政府任命的领导人的指挥下,但是已经按区成立了自己的警备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大都派有代表参加由20个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这个中央委员会同巴黎工会联合会以及国际巴黎委员会在同一座建筑物里开会。这时,巴黎本身已没有市政委员会,它归政府任命的军事和民政官员控制。事实上,每个区派有区长1人和副区长2人,权力非常有限。这些地方官员在围城期间增加了许多新职务。他们因各区阶级性质的不同,而持有不同的政治观点,其中大多数人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或激进派,无产者很少,哪怕是中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或革命者也很少。国民自卫军的领导比较激进,但主要是由一些默默无闻的人组成的,大部分出身于中产阶级下层,只有少数工人阶级积极分子。

由于只剩下了仅够维持几天的给养,而且又没有得到外援的

^① 阿基·法朗斯瓦·巴赞(1811—1888):法国元帅,1870年10月27日率部173,000人在麦茨向普鲁士军投降,为普军进攻巴黎让出了道路。——译注

希望,于是临时政府同意献城投降。根据拟议的条件,双方应该休战,临时政府应该辞职,并在法国各地举行直接选举以产生国民议会,然后由国民议会批准和平条款。巴黎北部和东部的炮台应立即投降;除留下有限的国民自卫军保留武器以维持秩序外,巴黎的军队应解除武装。

1871年2月选出的议会,反动到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它基本上由保皇党人组成,波旁王朝正统派和奥尔良派人数大致相等,几占总数的三分之二。甚至还有一批波拿巴派;各种面貌的自由主义者和共和派只占总数的六分之一。社会主义者和雅各宾派左翼在630名议员中只占20名,其中包括路易·勃朗、德勒克吕兹、维克多·雨果以及其他一些1848年的老战士;此外还有新闻记者昂利·罗什福尔以及工人候选人名单上的4名候选人——托伦、边诺阿·马隆、费里克斯·皮阿和布朗基主义者律师沙尔·弗雷德里克·加姆邦。议会推举梯也尔领导新政府,对普媾和。

俾斯麦的条件很苛刻:割让阿尔萨斯—洛林、支付巨额赔款以及普军占领巴黎。但是除了接受这些条件以外,实在别无出路,于是议会同意了。问题是巴黎将怎样对待这个消息。

激进的巴黎人获悉之余群情激昂,愤怒无比。街头不断出现示威游行,当局动用军队和警察才把游行镇压下去。革命的激情第一次从公开的革命者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队伍扩大到群众。国民自卫军抵制政府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指挥官,开始在一个更具有代表性的新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按照更全面的方针组织起来。无人看守的武器被抢走了;几营国民自卫军把即将缴送普鲁士人的大炮转移到比较安全的所在。由于这些大炮是巴黎人民慷慨输将而为国民自卫军购买的,缴出大炮的企图使群情激愤。有谣言说,普鲁士军队一开进城,就进行武装抵抗。不过,实际上并没有进行抵抗。普鲁士人只限于占领很小的地区,而且两天以后就撤到

北部和东部的炮台上去了。他们并没有打算进入主张抵抗的人和许多普通居民避入的工人阶级居住区。许多上层和中层资产阶级分子逃出了巴黎。普鲁士人撤走以后,人民露面了,街头示威也恢复了。这时,议会在波尔多举行会议,通过法令,要求立即偿清过期的房租和债务,这使许多店主和住户受到了破家荡产、无以为生的威胁,从而激起了新的愤怒。使群众更加怒不可遏的是:议会害怕巴黎人民,决定不在首都开会,稍经犹豫之后,决定把会址迁往凡尔赛。在巴黎人看来,他们曾经英勇地保卫了巴黎,“取消”他们城市的“首都地位”是莫大的侮辱。因此,局势更加紧张起来。梯也尔曾不断向巴黎增派军队以维持秩序,但是一旦发生暴动又无法信任他们,于是便下令撤出首都——军队、政府各部门等等全部撤出。这样,巴黎就被扔下了,听任它自行其是,没有负责当局,只有一个由无权的区长和副区长拼凑而成的委员会以及一个新成立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后者主要是由只在本区内知名的人物组成的,但是它同工会组织和国际巴黎支部有密切联系。实际上,它成了正式政府撤退以后唯一存在的权力机构,巴黎的控制权暂时就落到了这个委员会的手中。 146

这就是巴黎公社的起源。很早以前,从拿破仑垮台的时候起,巴黎就有人喊出了成立“公社”的口号。这个口号可以追溯到1793年的革命公社,只是对不同的呼口号者具有不同的含意而已。在一个极端,这个要求不过意味着巴黎需要历届政权都没有给予的市政自治。在另一个极端,这就意味着极左派长期梦寐以求的社会革命:一个由互相合作的自由公社组成的法国,每个公社都实行充分的自治,并且按需要自下而上地联合组成较大的行政单位,但最高权力由直接代表人民的公社掌握。当然也有介乎上述两种主张的中间意见。在围城期间:“公社”主要意味着巴黎人有权组织自卫力量,而不受人所不齿的临时政府任命的官员支配。当梯也

尔不仅从巴黎撤出军队，而且撤出全部行政机构的时候，许多以前反对公社或者态度冷漠的人也认为公社是必不可少的了，因为舍此，又将如何管理这座城市呢？

147 根据对历史的研究分析，现在看得很清楚，梯也尔在下令撤出巴黎的时候，肯定已横下一条心，即使不诉诸内战，至少也要利用一切必需的手段来使巴黎人屈膝。他不能指望说服由于投降和议会的行动而义愤填膺的国民自卫军放下武器；他又没有做好以武力压制对抗的准备。他手下的军队太少了；而且仅有的军队大都因为失败而军心涣散，无法信任。为了制服巴黎，他需要一支新军，他希望以战俘为主组成这支军队，他要劝说俾斯麦交还战俘以“恢复秩序”，使法国有一个普鲁士人所要求的稳定的政府。由于撤出巴黎，由于没有帮助区长们组织一个温和的政府，他实际上就是把巴黎交给了革命者，并且把公社强加在他们头上，因此除非巴黎自行崩溃，否则他必然是要把巴黎沉浸在血泊之中。这样他就能指望在一切体面人的欢呼声中，建立起新的资产阶级国家，并且使法国一劳永逸地压服作为 1789 年的遗产而留下的具有革命传统的巴黎。

被听任自生自灭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本来并无意于成为革命的巴黎的政府。委员会的领导人说，它没有得到委任；它的许多成员对于落在自己肩上的责任感到惊愕。于是委员会立即决定由成年男子选举产生有充分代表性的巴黎政府。这个组织将称为“巴黎公社”。委员会还宣布说，公社一旦产生，就将把权力移交给公社。在此期间，区长和副区长正奔走于梯也尔和巴黎人之间，进行调停，但是梯也尔婉言推脱，拒绝帮助。3 月 28 日，在 485,000 已登记的选民中，以 229,000 票选出了公社——如果考虑到许多居民已经离开巴黎，这个票数算是很多的。开始时，公社并不是一个纯由革命者组成的机构。有相当数目的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和

激进派，主要是从中产阶级居住区选出的，但是这些人或则没有到任或则很快就引退了。其余的成员是著名的激进分子（其中有许多新闻记者）、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布朗基派、各革命俱乐部的雅各宾派以及工人阶级成员和少数同国际有关系的人。在选出的92名公社委员（有21人很快辞职，另通过补缺选举选出了继任者）中，国际派占21人。在人选改变以后，雅各宾—布朗基派是多数，国际派形成相当团结的少数。

我并不想在本卷中重述巴黎公社的悲惨历史。我所关心的是它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中的地位；我之所以不得不列举这么多导致建立巴黎公社的事件，完全是因为不提到它的起源就无法了解它的性质。我想我已经说清楚，公社的产生并不是因为有一批团结紧密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者预先作了策划，把它当作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楷模，而是因为事态的发展决定了它的结构。应该肯定，自1793年以来，建立某种革命公社的想法就一直留在巴黎人的头脑中；在每次革命危机中，都有人提出建立“公社”的口号。但是当时并不存在这样的明确想法：公社应该是一个建立在无产阶级专政或者除自由、平等和成年男子选举权以外的任何基础上的新型劳动者国家。对法国人来说，市镇是传统的地方行政单位。法国是由地方市镇组成的，集权国家的一切反对者自然把公社看作是直接来自人民的对立政权的中心。巴黎公社之所以成为一个主要代表工人阶级的机构，仅仅是因为上层阶级分子或是逃离了巴黎，或是虽当选为委员，但由于敌视革命而拒绝任职。即使到了最后阶段，仍然有很大比例的委员不是工人，而是同情工人阶级要求的中产阶级激进派和雅各宾派，其中包括许多重返国门的1848年的流亡者。公社还包括为数不少的巴黎中下层阶级人物，他们通过国民自卫军参加了革命。

公社的领袖是何许人？他们人数太多，成分太杂，因而不可能

通过辩论形成任何统一的领导。没有一个人出人头地，成为中心人物；倒不如说在一幅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混乱的背景下，有一系列没完没了的“特写”镜头。在 36 名我能够找到生卒年月的主要人物中，有 7 人在 30 岁以下，21 人在 35 岁以下。另有 5 人在 40 岁以下，只有 10 人超过 40 岁。在这 10 人中，有 5 人是 40 多岁，有 2 人是 50 多岁，有 2 人 60 多岁，有 1 人——沙尔·贝雷 75 岁。可见，他们主要是一批年轻人，在所有人中有一半人在 32 岁以下，有一些人在 30 岁左右，特别是那些同国际有关系的体力劳动者和布朗基的信从者。

让我们从年纪最大的开始，谈谈上述那些杰出人物吧。沙尔·贝雷(1795—1878 年)，蒲鲁东的信从者，信贷改革家，为人有点乖僻，属于国际，是国际少数几个资产阶级会员之一。他略有资产，诚实无欺，但不是领袖人才。公社失败后，他逃往瑞士，在瑞士写了回忆录(《我的回忆》〔1873 年〕和《公社真相》〔1877 年〕)。他对 1871 年事件并没有多大影响。

其次是路易·沙尔·德勒克吕兹(1809—1871 年)，1848 年革命的老战士，曾任流亡在外的赖德律—洛兰的助手。德勒克吕兹是进步的激进派，1848 年式的社会主义者，不同于任何后来的学派，曾担任几家革命刊物的编辑，从 1848 年的《民主社会革命报》到他为攻击拿破仑第三政府而于 1868 年创办的《觉醒报》。他是可以称之为“旧雅各宾”集团中的杰出人物。他为人正直，英勇刚毅，曾作艰巨努力以保持各有争执的集团的团结，并防止公社在最后的日子里采取过火行动。在这场毫无希望的斗争的最后阶段，他违反自己的意志，受命担任军事委员；到了末日，当抵抗几乎结束时，他有意识地在—一个街垒上暴露自己，光荣地死去。

费里克斯·皮阿(1810—1889 年)，比德勒克吕兹小一岁，是一个浪漫主义戏剧家和演说家，对于自我戏剧化有强烈兴趣，但没

有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皮阿能够发表演说或起草宣言，但到紧急关头就无所作为了。他在巴黎的文人圈子里曾是个不容忽视的人物，是乔治·桑的挚友，一个有成就的剧作家和新闻记者。在公社中，他同一群严肃认真的青年工匠格格不入，他们认为他相当可笑，有时还骂他既胆小怕事，又爱慕虚荣。象贝雷一样，他也逃脱了，而且活着重返法国，晚年在激进派政治活动中又起了一些作用。

按年龄，其次是茹尔·阿利克斯（1818—1897年），一个发明家，在拿破仑第三统治下曾长期身系囹圄，有时神经错乱。公社任命他为将军，但是他神经失常，只好把他关起来。凡尔赛人把他送进疯人院，他在晚年出院后在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运动中起了积极作用。再次是伟大的画家古斯塔夫·库尔伯（1819—1877年），他是革命艺术家委员会主席，由于参加破坏旺多姆圆柱^①而被课以巨额罚款，但是他逃到瑞士去了。

上述5人都是老战士。接着我们要谈的是古斯塔夫·鲍尔·克吕泽烈将军（1823—1900年），他的有争议的“将军”头衔来自美国南北战争，年轻时当兵，1848年曾对工人作战。他是个莫测高深的人物，好吹牛，爱摆架子，敢于冒险。他的军事声望使他短期当上了公社军队的将领；但是他没有能力，不久便被解职。他是另一个逃往国外，得以活着写回忆录的人。除了一般的左倾以外，他没有非常明确的政治见解，虽然他于1871年成为国际工人协会会员。

古斯塔夫·勒弗朗赛（1826—1901年），另一个得以活着在瑞士撰写研究公社的著作，后来又发表回忆录的人，他同一批国际会

^① 旺多姆圆柱是竖立在巴黎市中心旺多姆广场上的铜柱，顶上有拿破仑第一的立像。这是拿破仑第一为炫耀自己的战功，用缴获的1,200门大炮铸成的。1871年5月16日，巴黎公社拆除了旺多姆圆柱，后又为法国资产阶级政府所恢复。——译注

员有联系，但往往同德勒克吕兹一道采取行动。他曾设法阻止处决公社的人质，表明深通事理。勒弗朗赛参加了反马克思主义的1872年圣伊米尔代表大会；后来移居美国。

加布里埃尔·朗维埃(1828—1879年)，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来到公社，巴黎贝尔维尔区区长，是从一开始就衷心拥护公社的唯一巴黎区长。正是他发出声明，宣布公社的成立；也正是他公布了最后宣言，并且领导贝尔维尔区的防守直到最后。他逃到了英国，1872年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他是布朗基派的代表。

按年龄下面是安都昂·马格路瓦·布吕奈尔(1830—1871年)，他在战斗中起了显著作用，并在战斗中阵亡。其次是著名的路易丝·米歇尔(1830—1905年)，后来她成为无政府主义运动的领袖，我们还要谈到她。她参加了战斗，被控告积极参与烧毁建筑物。她要求判处死刑，公然藐视控告她的人，但是她被解到新喀里多尼亚，从那里回来后在复兴的工会运动中起了主要作用，并且写了回忆录。

阿尔图·朗克(1831—1908年)，甘必大的信从者，激进派新闻记者，公社领导中坚强的右翼，曾经编辑邦纳罗蒂的《平等派的密谋》和《小共和国报》。

再往下是古斯达夫·弗路朗斯(1831—1871年)，法兰西学院一位科学教授的儿子，本人也在那里教过书，拿破仑第三统治时期，是积极的革命者，并同一次暗杀拿破仑第三的活动有关。由于参加1870年10月未遂的起义，他被判处死刑。但1871年1月，仍然逍遥法外的布朗基派领导人组织了一批人把他和其他被判刑的革命者从监狱里放了出来。他是个虚有其表的浪漫主义者，对于领导冒险行动特别感兴趣。公社初期，他在对凡尔赛人的一次出击中阵亡。

在我所列出的36人名单中，其他领袖都不超过40岁。按年龄

来算其次是小说家和新闻记者茹尔·瓦莱斯(1832—1885年),他的主要作品是自传性的三部曲《雅克·文特拉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曾为《法兰西信使报》撰稿,公社期间,他继续编辑自己创办的《人民呼声报》。瓦莱斯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尖锐的批评者,布朗基派的朋友而不是它的成员。他逃到了伦敦。

比茹尔·瓦莱斯小一岁的是不久成为卡尔·马克思的女婿的沙尔·龙格(1833—1901年)。龙格从学生时代起就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原是蒲鲁东的信从者,但后来投向国际。公社期间,他主编《公报》。后来在盖得的工人党中起了巨大作用,还撰写了若干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1901年与妻子一同自杀。

比龙格小3岁的是波兰人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1836—1908年),他作为军事领袖对公社作出了贡献,而且十分幸运地逃了出来。其次是另一个国际会员让巴提斯特·克雷芒(1837—1903年),他也逃了出来,后来又参加伦敦的运动。另一个重要的波兰人雅罗斯拉夫·东布罗夫斯基(1838—1871年),大概是公社最优秀的将领。他积极参加了1863年的波兰起义,象符卢勃列夫斯基一样,以流亡者的身份寄居巴黎。他在战斗中阵亡。普罗斯比尔·奥利维耶·利沙加勒(1838—1901年)一直战斗到最后,但逃了出来,后来写了一部最优秀的公社史,一度传说可能同马克思的第三个女儿结婚。

在36人名单中,按年龄下面几个人只有32岁;从这批人开始,我们要谈到有所不同的一辈新人,他们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的领导人:巴黎工会主义者、国际巴黎支部、以及聚集在布朗基周围多半是还在求学的青年人。这批人在年龄上非常相近。在国际会员中,瓦尔兰和泰斯都是32岁;潘迪和卡梅利纳31岁;阿西、马隆和杜瓦尔30岁;茹尔德和阿勒芒28岁;弗兰克尔仅27岁。属于同一个年龄范围的还有布朗基派的普罗托32岁,瓦扬31岁,特里东

30岁，爱德只有27岁。年纪更轻的是先后担任公社警察局局长的两个名声极坏的布朗基主义者——年仅26岁的费烈和年仅25岁的拉乌尔·里果。最后还有蒲鲁东派的维尔莫列尔30岁和罗塞尔仅28岁，后者是正规军军官、一度指挥过公社的武装部队。在这批青年人中，有许多不是死于战斗就是在战斗结束后被处决或者被解往新喀里多尼亚。

欧仁·瓦尔兰(1839—1871年)，如前所述，是工会的主要领袖和国际工人协会巴黎支部的杰出人物。他在战斗的结束阶段被俘，惨遭凌迟，最后被枪杀。在公社期间，他担任过多种工作，先是出任驻法兰西银行的代表，后来按最迫切的需要历任多种职务。关于瓦尔兰我在本卷他处已经谈了很多，这里无需再谈了。木刻工人阿尔伯·泰斯(1839—1881年)，瓦尔兰在工会运动和国际工人协会中的亲密同事，巴黎工会联合会的秘书以及国际工人协会几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公社期间，泰斯是驻邮政局的代表，在战斗的最后阶段受伤，后被判处死刑，但是逃脱了。

路易-让·潘迪(1840—1917年)，也是国际会员，原是细木匠，公社时期在军事委员会工作，十分幸运，得以逃到瑞士，我们将要谈到，他在瑞士参加了力图恢复国际工人协会法国支部的活动，同吉约姆和克鲁泡特金来往密切。雷米·蔡费兰·卡梅利纳(1841—1932年)，又一个“国际会员”，当过铜匠，在公社时期负责造币厂。他曾领导1866年冶金工人罢工，并曾在工会联合会中同瓦尔兰一道积极工作。他是全体公社委员中最长寿的人之一，得到大赦后一直活到1932年，他积极参加法国社会主义运动。死后为他举行了感人的公葬。

阿道夫-阿尔芳斯·阿西(1841—1886年)，也属于国际工人协会，1870年勒克勒佐罢工的领袖，一个熟练的机械工人。公社初期，他曾担任一些会议的主席，因此公社有时被称为“阿西先生

的政府”，但是他并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他被解往新喀里多尼亚，从那里回来后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工人运动中起了一些作用。

边诺阿·马隆(1841—1893年)，起初是画匠，公社初创时任第十七区副区长，曾积极参加巴黎工会运动，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曾在罗什福尔的《马赛曲报》上报导了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他同笔名安德烈·列奥的小说家列奥代尔·香普西克斯夫人过从甚密。他们两人合写了一篇要求农业工人支持公社的呼吁书。公社失败后，他们一同逃到瑞士；我们在以后几章中将要谈到，马隆生前不仅写出了第一部《社会主义史》巨著，而且成了独立社会党的真正缔造者，并创办了《社会主义评论》。他的后期事业属于本书第三卷的范围。 154

同马隆同年的是艾米尔·维克多·杜瓦尔(1841—1871年)，也是国际会员，作战英勇，但在战斗初期就被凡尔赛分子逮捕枪杀了。

弗朗斯瓦·茹尔德(1843—1893年)，参加了最后的战斗，被捕后被解往新喀里多尼亚，大赦后从新喀里多尼亚回来，写了公社回忆录。公社初创时，他同瓦尔兰共同负责公社的财政，并负责同法兰西银行打交道。瓦尔兰不久就被调去担任其他工作，茹尔德仍留在原来的岗位上，关于公社的财务他有一本一笔不苟的账本，在审讯时他交了出来。茹尔德是一个十分能干，一心为公的行政人员，在那个混乱如麻的时期，他始终镇静自若。他是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前来参加公社的人物之一。他不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而是一个有条理的行政部门负责人。让·阿勒芒(1843—1935年)，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成为可能派社会党左翼领袖，关于他我们以后还要谈到。他也是被解往新喀里多尼亚去的人中的一个。

列奥·弗兰克尔(1844—1896年)，匈牙利出生的首饰工人，

“国际派”最年轻的杰出领袖。公社成立前几年才到法国，在迁居巴黎以前曾帮助建立国际工人协会里昂支部。公社派他担任公社的劳工与工业代表；我们将会看到，在经济领域中，他是那些公社有条件兴办的建设性事业的主要负责人。弗兰克尔在战斗中受伤，他后来逃到伦敦。在那里马克思派他担任国际工人协会匈牙利通讯书记。后来他回到自己的诞生地布达佩斯，成了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创建者之一，参加了第二国际的早期活动。

155 在我随便列出的名单中占重要地位的国际会员，就到此为止。名单上还有7个名字，其中5人是布朗基的信从者。这些年轻人中最大的是欧仁·普罗托（1839—1921年），他在学生时代就很活跃，我们已经谈过，他曾想凭借和平与自由同盟的关系参加第一国际的代表大会。普罗托是律师，后任公社的司法部首脑。人们曾以为他在战斗中牺牲了，其实他逃过了这一关，而且活到高龄。

在布朗基派中，年龄再小一点的是爱德华·瓦扬（1840—1915年），他是土木工程师和物理学家，公社派他负责教育。他从摆脱宗教的影响出发，着手兴办学校，在当时的条件下，工作做得很出色。他逃到瑞士，后来又迁居伦敦，大赦后回到法国，成了巴黎市参议会布朗基派的领袖，直到1905年社会党统一为止，他在统一的党内担任了工作。他能力很强，一直忠实于他青年时代所信仰的革命的理性共和主义。

古斯达夫·特里东（1841—1871年），布朗基最亲密的朋友。1870年同布朗基合编《祖国在危急中报》，原先编辑自己创办的杂志《直言报》。他是律师出身，略有资产，属布朗基派左翼。他的短促的一生随着公社而结束了。

艾米尔·爱德（1844—1888年），又一个左翼布朗基派，是知名的自由思想家，同布朗基合编《既非上帝，又非老爷报》。公社时期，他主要在军事方面很活跃，是公社指挥战斗的将领之一。他逃

到瑞士,后来又迁往伦敦,在那里成了中央革命委员会中的布朗基派的领袖。他同瓦扬继续密切合作,合编《自由人报》。他是大赦后法国布朗基派的主要领袖之一。

其余的布朗基主义者泰奥菲尔·费烈(1845—1871年)和拉乌尔·里果(1846—1871年),都付出了生命,他们共同担负公社警察局的主要责任,在凡尔赛分子开始杀害被俘者的时候负责监管公社逮捕的人质以及其他由公社逮捕或监禁的人。在公社即将结 156
束时,正是费烈下令枪决巴黎大主教达尔布瓦等人质。他的职业是药剂师,在政治上是一个冷血的恐怖主义者,后被凡尔赛分子俘掳和枪杀。比较起来,里果其人就远不象费烈那样不讨人喜欢,他是一个热情的革命家,从开始攻读法律的时候起,就是一个积极的布朗基主义者。作为警察局长,他发表过激烈的演说,并且逮捕了许多人,但把大部分人都放走了,只是到公社快要结束时才下令处决一些俘虏。到了后期,他精神错乱了,进行了血腥的报复。他在最后的战斗中被捕并被枪杀,但是没有被人认出来,后来经缺席审判处以死刑。凡尔赛警方由于不知道他的遭遇,曾一度通缉他。

在我所列的名单上还有两个人,头一个是普鲁东派的新闻记者奥古斯特·维尔莫列尔(1841—1871年),他是那家办得有声有色的反对派报纸《法兰西信使报》的编辑,并发表过重要著述《1848年的人们》和《反对派》。他死于街垒战。另一个是纳当尼埃尔·罗塞尔将军(1843—1871年),他是正规军的工兵上尉,从巴赞的败军中逃出来,被任命为公社的总司令,不久便由于国民自卫军不同意他的作战方案而辞职。罗塞尔以前同社会主义或工人阶级运动没有关系;他参加公社是因为他对法军的崩溃感到震惊,反对临时政府向普鲁士人投降。公社失败后他被俘受审,后被枪决,年仅28岁。

我承认这个名单是随意列出的。其中漏掉了若干在公社中起

过某些作用，后来由于个人的成就而变得重要或至少出了名的人。例如保尔·布鲁斯，后来有一个政党就以他的名字命名，这个党拒绝盖得的马克思主义正统理论，一直独立存在到1905年才统一。名单上也略去了克鲁泡特金的盟友、地理学家埃利塞·莱克留，他
157 担任公社的图书馆馆长。但是我认为名单包括了所有曾在公社事务中起过重要作用的积极领袖。我没有列入昂利·德·罗什福尔，因为他虽然受到放逐新喀里多尼亚的惩处，却从来不是真正的公社成员。

在上述36人中，恰好有一半，即18人，逃往国外（其中大多数逃到瑞士或英国）；有10人在战斗中阵亡或在被俘后就地枪杀；有两人在受审后被处决；有5人被放逐到新喀里多尼亚。有一人——阿利克斯被关在疯人院里。由此可见，这些领袖中只有三分之一牺牲了，考虑到战斗和在战斗结束后“血的一周”中所进行的报复的激烈和残酷程度，就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微小的数字。从总的伤亡人数来看，领导人的命运显然要比被领导者好一些。永远不会有人准确地知道，在那个血的一周中或是后来搜捕公社分子的骚动中究竟有多少巴黎人断送了性命。有人估计在街垒中战死的约有2,500人，在战斗结束后被杀的在14,000人以上。另有人估计总共有30,000人被杀，45,000人被俘。哈诺托^①说，凡尔赛方面关有35,000名俘虏，其中有许多人死去；到1875年，被捕的人数是43,521名，因为搜捕持续未断。这个数目当然不包括被杀害的人。幸而保留下来的一份名册列出了经正式法庭审讯的约20,000人的职业。名册计列：劳工2,901名，机械工人和锁匠2,664名，泥水匠2,293名，细木工1,659名，商业雇员1,598名，鞋匠1,491名，文书人员1,065名，住宅油漆匠863名，排字工人819

^① 加布里埃尔·哈诺托（Gabriel Hanotaux, 1853—?）法国历史学家和外交家，1894—1898年曾两度担任法国外交部长。——译注

名,石匠 766 名,裁缝 681 名,家俱匠 636 名,珠宝工人 528 名,木匠 382 名,制革工人 347 名,纪念物雕刻匠 283 名,白铁匠 227 名,等等,下面还列有 106 名教师以及一长串人数较少的职业。被判罪的大多数人是遍布于巴黎各行各业的体力劳动者。

巴黎公社在存在的短短的两个里,甚至没有机会为新社会奠定基础。它的任务是战斗,但是自从放弃对凡尔赛方面发动大规模出击的主张,听任梯也尔放手加强镇压革命的军事力量的时刻起,这项任务就已经毫无希望了。事实上,大概从一开始就渺无希望,因为公社的武装部队主要是由国民自卫军组成,适于防御而不适于进攻;即使当时发起一次成功的进攻,大概也只会激起普鲁士人的干涉。如果各外省城市纷纷起事并顺利地建立起自己的公社,那么议会所掌握的那支力量薄弱的军队就会分散,这倒可能给巴黎方面一个机会,至少是妥协的机会。但是外省的运动——例如里昂、马赛、圣太田、布勒斯特和其他一些地方的运动——都被轻而易举地镇压下去了;面对着反动派在选举中获得压倒胜利的局面,巴黎完全陷于孤立。公社在一种失败已无可避免的气氛中进行了辩论,即使它的委员无法使自己承认这个事实。他们主要关心的必然是军事,而在这种形势下,成分如此庞杂的组织必然要发生争吵,并在出了乱子的时候,找替罪羊。负责劳工和工业事务的列奥·弗兰克尔尽了最大努力设法使被业主抛弃的工场和作坊作为合作社重新开工,同时改善劳动条件,并同工会合作。他使得一些工场开了工,根据公共合同提高了工资,废除了面包业工人的夜班,并且进行了一些次要的改革;但是他没有来得及做更多的事情。爱德华·瓦扬负责教育工作,他制定计划实施免费的非宗教性义务教育,但是由于缺乏经费,他的大多数改革只是一纸空文。主要负责统筹公社财务的弗朗斯瓦·茹尔德和欧仁·瓦尔兰办事非常稳健。他们没有触动法兰西银行,条件是由银行向公社提供

经费；而法兰西银行无疑征询了凡尔赛方面的意见，拿出了足够的钞票，使得公社委员能够在继续征收赋税和获得特种贷款的帮助下做到收支相抵。梯也尔并没有把银行整个搬走，并使整个财政制度瓦解，因为这不符合他的要求；而茹尔德和瓦尔兰也没有准备在危急存亡之际承担另行建立一套新财政制度的任务。后来，瓦尔兰把主要注意力放到其他方面，而茹尔德则继续工作到最后，把公社账目管得分毫不差，而且不顾普鲁东派和在财政上持奇特看法的人的叫嚷，坚持严格的正统作法。

159 总的说来，公社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并没有什么成就，除非把如下做法也算作社会主义：公社废除了旧官僚，另以只领取工人工资的人取而代之。一大部分低级官员和文书在其上司撤往凡尔赛以后仍然继续工作。公社在恢复必要的公用事业方面，看来非常成功；这些公用事业在整个战斗期间一直没有中断，直到公社最后崩溃时才再次瓦解。

公社的重大困难是在军事方面。它一再更换军事指挥官，在出了乱子的时候就把某些指挥官监禁起来，而且从来不给指挥官任何明确的权力。我们决不能把公社的主力部队国民自卫军当作正规军来对待。这支军队以地方性的营和团（由来自同一个区的营组成）为基础，都倾注全力以保卫自己的区。此外，这支军队有自己的指挥系统，它的中央委员会并没有因为选出公社而解散，而是同公社的军事委员会并存，双方的权力和职能都没有任何明确的划分。首任军事司令官克吕泽烈庸碌无能，接替他的纳当尼埃尔·罗塞尔是一名正规军军官，始终无法适应国民自卫军的那种非正规军队的作风，也无法贯彻自己的命令。公社最优秀的将领是波兰人雅罗斯拉夫·东布罗夫斯基和瓦列理·符卢勃列夫斯基，他们都进行了英勇的战斗，但是符卢勃列夫斯基只担任次要职务，而东布罗夫斯基出任司令官已经为时太晚，根本来不及挽回公社

的军事颓势。布朗基主义者布吕奈尔也干得很出色，但是由于非他本人的过错而失去了信任。埃米尔·维克多·杜瓦尔是一个参加了第一国际的持不同看法的布朗基派，他在战斗初期就阵亡了。随着失败迫在眉睫，政治领导有了改变，从而使军事领导人的地位进一步复杂化。受命消除混乱局面重建秩序的一连两届公安委员会只不过使局面更加恶化罢了；因为公社本身、公社各个委员会以及同时并存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所发布的命令互相矛盾。在任命公安委员会以及其他问题上，公社中的雅各宾派—布朗基派的联合多数同国际派发生了遗患无穷的分歧，国际派反对雅各宾派独裁，希望使公社具有更明确的工人阶级性质。有一个时候，国际派甚至不出席公社的会议，虽然他们继续在各个委员会中进行工作。 160

在这些争执中，布朗基派和旧雅各宾派一般说来是极端派，而以瓦尔兰、弗兰克尔和茹尔德为首的国际派则是温和派，后者得到国民自卫军的一些代表的支持。国际派强烈地意识到必须依靠大多数工人，并为他们的要求讲话。国际派不信任布朗基派的革命中坚分子，也不信任一直缅怀以往的革命的雅各宾派。但是随着局势的越来越没有指望，极端派势必就更加得势了。即使是这样，几乎一直到最后，公社对待它的敌人仍然是非常人道的。凡尔赛方面从一开始就枪毙和虐待俘虏，并且每天叫嚷对叛乱分子格杀勿论，决不饶恕。而公社方面有一个时候则随便让反对分子离开巴黎跑到凡尔赛，而且即使公社效法俾斯麦的做法，扣留人质，同时警告只要凡尔赛方面继续枪杀俘虏，就要处决人质，公社也没有将这项警告付诸实行。事实上，只是到了最后才这样做了，而且也只是在中央控制完全崩溃以后才处决了几个人质。甚至连负责警察局的性烈如火的布朗基主义者拉乌尔·里果，在最后神经失常以前，也没有干出什么事来足以证明劈头盖脸而来的种种攻击是

有根有据的，尽管他喜欢发表激烈的言论。签署命令处决巴黎大主教的是他的继任者费烈。

同凡尔赛方面相比，大体上说来，公社远远不是那么残酷的。事实上，马克思即使在为公社辩护的时候，也强烈批评公社在摧毁旧秩序的基本机构方面表现了过分的犹豫。正如人们所料到的，公社发表了大量耸人听闻的演说和报刊文章，但是嘴狠心不狠，实际行动远不象口头说的那么过火。公社的大多数雅各宾派本质上是热忱的人道主义者，而不是惶惶不可终日的欧洲资产阶级所认为的暴徒。同任何主要的公社委员相比，梯也尔要野蛮无数倍；至于残酷，他的许多凡尔赛支持者则又更甚于他。“右派”的这种残酷无情无疑主要是出于恐惧。法国的上层阶级身受普鲁士人的侮辱，对于革命的巴黎倍感害怕；他们的恐惧驱散了一切谅解和同情。他们成了道道地地的嗜血如狂的野蛮人。为了这些上层阶级，梯也尔及其将军们进军巴黎街头，大肆烧杀，所到之处，俘虏都被枪决或残害。为了这些上层阶级，梯也尔和他的法官们于取胜之后就着手审讯和处决，并大规模地把俘虏放逐到新喀里多尼亚去。对于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来说，这一切暴行首先就使公社成了永不泯灭的记忆。暴行暂时得逞了，革命的巴黎被压制了一个世代，法国处于第三共和国的反动统治之下。第三共和国之所以能够成立，完全是因为找不到一个反动派能够一致拥戴的君主。

公社的崩溃破坏了第一国际，后者已经由于普法战争的爆发而大大削弱。在法国本土，瓦尔兰和他的同志们共同掀起的强大的工人阶级运动差不多已经荡然无存了，而瓦尔兰也在战斗中阵亡了。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完全依靠流亡在外的人才保存下来，因为少数象路易·勃朗和托伦之流的温和派已经无足轻重。他们站在反公社的一边，只是设法减轻迫害的残酷性。他们在幸存的工人阶级领袖的心目中是叛徒，而且为得胜的反动派所轻视。在公

社成立前不久选人议会的那批人中，加姆邦、马隆和皮阿辞去了议员职位，参加了巴黎的保卫工作。只有路易·勃朗和托伦留在凡尔赛，声誉扫地，束手无策。毕生从事革命的布朗基本人并没有参加这一切，因为当革命——他一直引颈以待的革命——终于爆发的时候，他不在巴黎，他正在患病，而且被悬赏通缉。巴黎公社的余波也影响到他，他又进了监狱，他成年后的岁月大部分都是在监狱中度过的。

流亡异邦的公社委员和左翼领袖——那些逃脱了大屠杀和放逐的人——不久就在国外争吵起来。团结最紧密的布朗基主义者先是加入他们过去所轻视的第一国际，后来——我们将要谈到——他们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又厌恶地退出国际。这时，国际在英国正在瓦解。英国的大多数工会领袖一心想的是自己的事务，甚至在巴黎公社以前就对国际失去了兴趣。他们始终没有派遣许多代表参加国际的历次代表大会。事实上，在1866年以后，除了埃卡留斯以外，参加代表大会的著名领袖只有参加1868年和1869年大会的本杰明·鲁克拉夫特和参加1869年大会的罗伯特·阿帕尔加尔特。参加大会的英国其他代表或是中产阶级的支持者，比如考维尔·斯特普尼和阿尔弗雷德·华尔顿，或是一些小人物，比如詹姆斯·卡特尔、托马斯·摩特尔希阿德和约翰·黑尔斯。工会领袖参加总委员会始终也不是固定的，总委员会主要留给马克思、埃卡留斯、荣克和一些其他人（大多是外国人）去管理。但是在1871年以前，国际毕竟能够指望英国工会的许多主要领袖在名义上给予支持。马克思为公社所作的充满热情的辩护（《法兰西内战》）是用国际的名义发表的，这个文件使这种局面走向尽头。鲁克拉夫特和乔治·奥德加提出辞职以抗议马克思的宣言^①，他

^① 1871年成为英国职工大会书记的乔治·豪威尔大约也在这个时候辞了职，但是我不能确定到底在什么时候，出于什么原因。

们几乎是留在国际总委员会中仅有的杰出的英国工会主义者；而就英国来说，从那个时候起国际也就不再同工人阶级的主体发生任何实际关系了。马克思激愤之余，指责英国领袖“把运动出卖给格莱斯顿”。不过实际上他们从来就不是革命者，对他们说来，巴黎公社太难以理解了。他们总是把国际主要看作是一个组织工会并在罢工行动中促进各国之间相互帮助的工具，退一步说也把它当作争取工人阶级候选资格和鼓动选举改革的工具。1871年出现了
163 必须击败刑法修正法案以及争取实现工会完全合法化的形势，面对这种形势，英国工会领袖特别迫切希望避免同议会中的中产阶级力量形成对立。即使他们并没有由于马克思为巴黎公社所作的辩护而真正感到震惊，支持公社这一行动势必也会使他们在国内取得成功的希望化为泡影。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在1871年的英国是拥护乏人的。宪章运动已经寿终正寝，继起的运动还没有诞生。

由此可见，巴黎公社对于摧毁国际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姑且不谈马克思和巴枯宁之间的争执，这场争执很快就给了国际致命的一击。在1870年以前，法国——不是英国或德国——一直是第一国际进行大规模工人运动的实际中心，国际的分支遍及比利时和瑞士的讲法语地区。德国人正忙于组织自己的运动，而且由于拉萨尔派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争执而陷于分裂，因而在国际的活动中没有发挥多大作用；英国人尽管在表面上同德国人恰恰相反，而实际所起的作用甚至更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即使工人打着国际的旗帜进行活动，他们也一直是自行其是，根本不理会伦敦总委员会的愿望。再者，法国——更确切地说是巴黎——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仍然是欧洲革命运动的不容置疑的中心；革命运动的失败同1848年的情况完全一样，意味着反动派又重新掌权了。马克思在1871年就象在1851年一样，必然已经了解到，革命斗争

暂时已经结束了。但是有许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国际工人协会的影子依然存在,尽管它的实质已经消失了。

回顾既往,究竟有哪些东西我们可以归纳为巴黎公社对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主要贡献呢?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赞扬巴黎公社委员依靠革命的本能,而不是依靠任何推理的过程发现了劳动者举行阶级起义的正确方式:以革命的公社作为兼管立法和行政职能的工作机关,从而取消强加在人民头上的国家机器的分权制。他赞扬公社,因为公社的委员只领取普通工资,是同无产阶级其余部分平等的劳动者,而不是强迫人民服从的更高的阶级。¹⁶⁴在马克思看来,目前的国家是拥有统治人民的权力的管理工具,由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控制,并得到只听命于他们的军队和警察之类强制工具的支持。与此相反,公社由人民直接投票产生,公社本身不仅制定法律,而且通过它的代表监督法律的执行,这些代表就各部门的日常工作向公社及其委员会负责。除了公社大会以外,没有大权在握的更高的执行官员。全体公务员都在选举产生的公社委员的直接管理下进行工作,这些选举产生的委员则直接向推举他们的公民负责。

当然,上述一切同自那时以后在英国和瑞典这样的国家发展起来的责任政府制有许多相似之处。在这些国家,政府各部门直接在内阁大臣的指挥下工作,而内阁则对普选产生的立法机构负责。但是马克思所看到的局面并不是这样。在1870年,还没有一个国家实行这种制度。英国在许多方面同这种制度非常相近,但是即使在1867年以后,英国的政府结构仍然是建立在那种把主要权力留在中产阶级手里的选举制之上的,仍然以贵族院和英王的照样完整无缺的权力为依据。此外,在不列颠这个国家的生命中还保持一种阶级特性(即使到了今天仍然保持着,只是程度较小而已),使得人们无法认为它是根据人民——更不用说从工人——的

意志而产生的。军队和文官系统、市政府和郡政府以及教育系统仍然牢牢地掌握在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上层的手里。只有在立法部门通过选举产生的那一部分中,才有可能出现工人的直接代表,但是下议院中仍然连一名工人阶级的议员都没有。因此,马克思自然要认为一切现存的国家都是强加在工人头上的强制机构,而不是劳动者能够通过它表达自己意志的民主机构。此外,马克思还认为国家实质上是阶级组织。他不能设想工人能够夺取现存的国家并利用它来实现必要的变革,使社会基础发生根本的变化。他认为这种变革必须是工人自己的事情,工人必须作为一个阶级,以夺取政权的阶级组织为基础采取行动。工人不能寄希望于这样的方法,即离开采取行动的阶级基础而同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客搞合作的方法,去实现这种变革。马克思认为在同反动派作斗争中,工人应该支持资产阶级中比较激进的那些部分,但是在他看来,支持同合作是两回事。为了给予支持而又不卷入资产阶级政治,工人必须严格地保持自己的阶级组织和阶级行动的独立性。工人可能认为帮助资产阶级从封建主义者——旧特权阶级——手里夺取国家,或者力促小资产阶级反对大资产阶级是适宜的行动。但是全部无产阶级政治的真正目的不是夺取而是推翻现存的国家,是以新“国家”取代现存的国家,新“国家”必须能满足无产阶级的需要,使无产阶级上升到统治阶级的地位。在这以后,可以让工人的国家“消亡”,但是只有在国家已经利用权力实际消灭阶级差别,从而也消灭了反革命的危险的时候才可以这样做。

因此,马克思认为梯也尔把旧国家的整个上层建筑——军队、政府、上层文官系统和武装警察——搬出巴黎,是工人开始建立自己的全新国家的机会。从这个角度出发,马克思阐释了巴黎公社的组织史。的确,公社是在成年男子选举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没有把任何不属于工人阶级的人排除在外;当时选民第一次能够

自由投票,而不受特权阶级(它们的代表已经离开了巴黎)的影响,这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马克思始终认为无产阶级和贫农一起构成了人民的绝大多数,而在城市,没有农民,无产阶级也是多数。因此,他赞成成年男子选举制,不排除工人阶级以外的阶级,但是 166 在他看来,究竟是要要求选民投票选举候选人,以参加构成现存国家机器一部分的议会,还是号召他们投票选举一个能够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改造整个国家的新型代表大会,那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最关紧要的并不是只有工人才有权投票,而是不管谁投票,都应该选举代表去参加那个受选民的委托,享有全权重新组织社会的立法和行政联合机构。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公社的实质就在于统一和集中大多数人的权力,不受阶级控制,通过直接选举出来的代表进行治理;以大多数人的统一和集中的权力向代表下达具有约束性的指示——即公社期间谈论得很多的强制训令。只要有了这样的基本政治机构,那么作为一个阶级而组织起来的工人就能够贯彻他们的集体意志。同工会密切结合的第一国际的职能就是系统地表达这种意志,并提供必不可少的动力。

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以后的列宁就是这样解释巴黎公社的。但是,不仅对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对若干非常敌视马克思主义的集团,特别是布朗基主义者,还有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公社都成了鼓舞人心的历史记忆。布朗基主义者把巴黎公社看作是革命的中坚分子采取行动的一个实际榜样,指责国际派由于坚持那些在革命专政时期毫不适合的民主概念而毁坏了这个榜样。对布朗基主义者来说,公社的重要性不在于它的选举制或者是它的代表向选民负责的概念,也不在于它所部分依靠的工会组织的基础,而在于内战这一紧急事变强加在它身上的专政特性。他们也是某种“民主主义者”;但是他们所设想的民主是一种在革

命专政摧毁旧秩序以后实行的制度，而不是用来推翻旧秩序的工具。有一个短时期，马克思和布朗基主义者之间的这种分歧模糊了，因为他们一致认为必须实行专政和集中权力，而且也联合起来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但是这种联盟注定是短命的，因为马克思相信群众组织是革命本身的必要基础，而布朗基派则不相信这一点。

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又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巴黎公社。他们认为巴黎公社的实质在于实行地方主义，反对中央集权，以及摧毁作为专制统治中心的政治国家。在他们看来，巴黎公社直接体现了巴黎人民自己治理自己的权利，是世界范围的自由的地方公社制度的榜样，终将使全世界摆脱专制政府和集权主义的危害。在他们眼里，巴黎公社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对国家的否定；因此，即使在战斗的紧急关头，公社也必须保持它的民主特性和它的基础——构成巴黎的较小地方单位。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实质上是社联主义者，他们追求的是这样一种社会：在那里，权力如果存在的话，也将牢牢地赋予地方团体，任何活动范围较广的机构最多也只负有受委托的职能。但是在公社的委员中，有各种各样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其中一个极端是普鲁东主义者，他们反对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赞成农民所有制和个体手工业生产，认为合作社是完成规模较大的工作所必需的，但是他们不相信一切大规模的组织，反对解放妇女，希望政治性的国家彻底消灭。他们主张制定一部“宪法”，根据这种宪法，将建立一套永久性的信贷银行制度，旨在向生产者提供资金，并保证他们享有劳动的全部果实，但是他们并不认为这种银行应从属于任何类型的国家，或者需要国家继续存在。他们的理论可以说是自由放任主义的一种革命性的翻版：他们论证说，在取消了国家的压迫以及租金、利润和利息的盘剥以后，一切事情都会各得其所。

有些蒲鲁东主义者对于工会是冷淡的，当工会在性质上不仅仅是手工艺工人的行会时，甚至还反对工会。然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从工会发展起来的工人组织是新秩序的**必要基础**。我们已经谈过，在法国参与建立第一国际的蒲鲁东主义者主要是后一类人。但是在法国工会运动中同蒲鲁东主义者对垒的是以欧仁·瓦尔兰为首的“集体主义者”；1871年以前，集体主义者是巴黎地区以及里昂和马赛的工会运动中占支配地位的集团。毫无疑问，就本质来说，瓦尔兰同蒲鲁东的共同之处远远超过他同马克思的共同之处；但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最重要问题上，瓦尔兰及其集团发现他们同马克思站在一边，因为他们赞成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在第一国际的辩论中，集权化对社联主义的争论还没有成为重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升为主要问题的时候，公社已经失败，瓦尔兰和他的许多最亲密的朋友已经死了。但是在公社以前已经十分清楚，就主张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这个意义来说，瓦尔兰和他的朋友决不是“集体主义者”。他们希望土地和大规模生产工具归地方公社所有，在必要的时候，归公社所建立的联合机构所有。他们希望尽可能由工会组织的合作社来从事实际生产，他们认为这种合作形式的生产是“集体主义民主”的精髓。因此在对新社会的看法中，工会具有根本的重要意义。实际上，他们往往认为——尽管不十分明确——将来的公社是建立在地方工团联合组织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任何政治基础之上的。随着这种工团主义观点的出现，也出现中产阶级雅各宾派和激进派的迟疑态度，以及一种坚持第一国际的控制权应牢牢掌握在真正的工人手里的主张。在巴黎的国际工人协会的队伍中，既有工团主义者，也有马克思主义者，不过很有意思的是，他们的领袖列奥·弗兰克尔并不是法国人，他是匈牙利出生的日耳曼人，定居在巴黎。法国的“集体主义者”大部分站在马克思一边而反对蒲鲁东主义者，但是

也反对马克思的“中央集权主义”和他对国家的看法。法国的“集体主义者”¹⁶⁹也认为巴黎公社是伟大的历史先例，是劳动者第一次在历史舞台上独立出现，不过他们对公社的看法是社联主义的和反极权主义的。他们不是社会民主主义或现代共产主义的先驱，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那个时期法国总工会的工团主义的鼻祖。

面对着这一切混乱因素，面对着巴黎公社忧患重重、骤兴骤灭的紧张局面，要描绘出一幅烘托真实情况的画面是极其困难的。事实上，巴黎公社简直没有机会显示它究竟具有什么建设性能力——或者说，如果出于奇迹，它幸而保存了下来，它究竟会走什么道路。公社的产生不是因为事先有人进行了筹划，而是因为梯也尔尽其所能把统治工具和行政机构搬出巴黎，留下了一个除非完全投降，否则总得想办法填补的空白。巴黎大部分人民笼罩在这样一种情绪之下：这种情绪包含着受到屈辱的爱国主义、由于普鲁士人围城而激发起来的高度公民荣誉感、对于控制国民议会的反动派的深恶痛绝、以及由于企图收缴公民手中曾经用来抗击普鲁士人的武器而引起的愤懑。在这种情绪下，投降是绝对不容考虑的，对于坚定的革命者是这样，对于国民自卫军的大部分地方军官和普通士兵也是这样。在那些不为这种情绪所动的人中间，大部分人——包括大多数富裕公民——不是早已逃离巴黎，就是在公社着手工作以前离开了巴黎。留下来的是工人、店主、小公务员和市政工作人员以及其他不能离开的人——病人、老人和纯粹的暴民，还有一小批新闻记者、艺术家、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其中大多数人抱有这种或那种左翼观点。

普鲁士人的围城对建立公社倒起了铺平道路的作用，形势迫使巴黎组织一个同全国各地和政府隔绝的临时政府，并成立一个市民军事组织，这个组织成为新的抵抗体制的核心和楷模。围城¹⁷⁰使得公社的建立自然一些，也容易一些，如果没有当前困守孤城的

经历,情况就会不同了。当然,建立公社的巴黎人并没有想到要建立一个永远独立存在下去的新的劳动者国家。巴黎公社只打算成为许多公社中的一个;毫无疑问,它将成为新的民主法国基本结构的一部分,但仅仅是一部分而已。即使是那些对自己的所行所为具有最明确的概念的布朗基主义者,他们所设想的新巴黎政权也不过是一种专政政体,旨在率先发动一场遍及全法国的革命,为全国建立一个新政府。雅各宾派的激进分子也同样认为公社是那个将要扩展到法国全境的新共和国的民主开端,只是他们并不抱有布朗基主义者的专政观念。主要力量在于工会的工联主义者同布朗基主义者和雅各宾派不同,因为他们认为新法国必须由自治的公社组成,而巴黎公社则是其中的第一个,这些公社在某种并不拥有强制性权力的联合组织中松弛地联合在一起。由此可见,工联主义者的想法大体是这样的:公社是取代国家的一种组织,而不是将来公社也要并入其中的新型的全国性政府结构的先驱。总的说来,在影响当时事态的发展上,所有上述看法都没有起多大作用。公社不是预先策划的,而是自发产生的,于是每个集团便只能在大敌当前必然主要考虑根本生存问题的形势下,就公社实际怎样和应该怎样的问题形成自己的概念。

起初,当梯也尔从巴黎撤走的时候,有两个机构可以任选其一,让它承担任务,采取临时措施以维持必要的服务性事业和组织抵抗(这是说如果要抵抗的话)。这两个机构一个是国民自卫军;另一个是各区正副区长组成的联合委员会,但是第二个机构成分太复杂,政客太多,他们既敌视国民议会,也同样害怕巴黎的暴民,以致不可能担任领导抵抗的任务,相反它倒致力于在巴黎和国民议会之间进行调解工作。这项工作从一开始就是毫无希望的,因为国民议会除了接受无条件投降以外,根本无意作任何妥协。这样就剩下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一个机构了,这个机构虽然自认

没有能力行施政治或行政管理权,但是丝毫无意交出武器,或者听任巴黎遭受被普鲁士人占领的耻辱。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发现不得不承担本来未曾料到要承担的责任以后,立即决定摆脱政治权力,而把这项不愿接受的权力交给人民。于是它下令立即由全体人民选举一个代议制市政府。看来这是解决困难的自然而民主的途径;而巴黎公社也就这样诞生了。

我们已经谈过,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选举——每个留在巴黎的成年男性公民都有投票权——产生了若干名不是始终没有就职就是很快就辞职的代表,因而需要补选。在选出的92名代表中,有21名属于上述两种情况,这些空缺大多数都在几个星期内通过补缺选举而得到了补充。即使在这以后,公社也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知识分子比工人多,其中有持各种观点的新闻记者、相当多的商人和中产阶级下层的其他成员。大多数成员没有具体的组织关系,不过至少有22人据了解曾经是第一国际的会员,有24人不是布朗基主义者就是近似布朗基主义者。有6人是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他们的明确的政治观点无从得知。其余的人多数是形形色色的左翼激进派,据了解同国际或布朗基派没有关系。当然,其中若干人实际上可能是这种或那种学派的有觉悟的社会主义者。

在有明确组织关系的人中,我们还没有提到的最著名的国际派有以下几个人:维克多·克雷芒、奥古斯特·赛拉叶、歌词作家欧仁·鲍狄埃、儒尔·约翰纳、保尔·维西奈和奥古斯特·阿弗里亚尔——他们大多是体力劳动者。在布朗基主义者或近似布朗基主义者中,还没有提到的杰出人物是克洛维斯·杜邦,达·科斯塔斯三兄弟和茹尔·米奥特。巴比克是安凡丹的信从者。德坎普当时或后来是无政府主义者。Y·Y·皮约是怀念拉梅耐的左翼神甫;爱都阿·阿尔弗雷德·古波尔是工人阶级居住区的著名医生;巴斯卡

尔·格鲁塞是文笔犀利的新闻记者，后来帮助把英国的运动介绍到法国来。所有这些人真是一个奇怪的混合体，其中有工会主义者和知识分子，有老激进派、青年工人和学生，有雄辩滔滔的，也有沉默寡言的。后者在骚乱中竭尽所能努力工作，这些工作有的是指派给他们的，有的则是需要人做，而又好象没有人去做，他们就主动担当起来的。

从如此复杂纷纭的一批人中，里面又有如此众多的天生的演说家和领袖，即使有时间，也是不可能产生关于政府或社会主义的系统理论的。要想从巴黎公社得出理论教训，那就得把自己的意见硬塞进去，否则从中是得不到现成的教益的。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提出了及时的解释，旨在为这个问题作最好的说明，因为他所关心的是捍卫公社委员以对付他们的敌人。后来，列宁为了取得所需要的教训，进一步曲解事实，并利用公社大做文章，以充实自己的专政理论。但是明摆着的事实是，公社委员并没有共同的理论，在公社存在的三两个月中，他们太忙，来不及制定理论。当然，这就意味着每个集团和每个成员都尽其所能，务使公社适合自己在公社出现以前就已构思出来的思想模式。他们的争执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布朗基派（往往同雅各宾派结成联盟）同这样一些人的冲突：这些人或是主张更直接地向全体选民负责的民主责任制，或是要求进一步密切同工会，特别是工人阶级社团的关系。除了这种冲突以外，还有军事领袖同那些保持文职身份和观点的人之间的争执；有时甚至在蛮横霸道、拒不让步的凡尔赛议会及其党徒的面前，还要发生究竟是待之以克制还是待之以粗暴的争论。我在前面已经谈过，拉乌尔·里果嘴恶心不恶，但是从一开始他就狂热地进行令人震惊的大逮捕（虽然他所逮捕的人有许多很快就释放了），而且喜欢大肆炫耀独裁权力。等到公社失败的最后阶段终于到来的时候，他对处决人质也毫不手软。但是同梯也尔相比，

公社是毕竟有节制的，尽管这种节制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实际上从一开始，也就是从可以明显看出梯也尔和议会绝不会妥协的时候起，失败就成了定局。如果普鲁士人没有允许梯也尔用他们放回的战俘组成一支军队，从而帮助他粉碎公社，那就完全不是普鲁士人的本色了。当时只有在法国其他城市爆发大规模起义才能拯救巴黎的革命，但是在巴黎以外的地区，革命的尝试几乎还没有开始就被镇压下去了。因此，梯也尔能够把巴黎起义淹没在血泊之中，而且他也迫切希望这样做，为的是给法国各地一点教训。他受到欧洲一切反动集团的喝彩，因为摧毁了巴黎公社，他也就打倒了第一国际和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的革命运动。

第八章

174

第一国际的衰亡

巴黎公社的失败，使社会主义者所抱的欧洲早日普遍爆发革命的希望归于破灭。在十九世纪整个六十年代，巴黎、瑞士和伦敦的流亡者首先注视着法国，渴望看到预期的第二帝国的崩溃。巴黎尽管处于警察的统治之下，但仍不失为西方革命情绪最浓烈的中心，西方的革命者希望巴黎带头推翻帝制，重建在1848年血腥的六月中显然已经变质的共和国。法国在经济发展方面确实不是最先进的国家，这个荣誉属于英国，其次是比利时。但是在六十年代，谁也不认为英国正处于爆发革命的边缘。在那里，为工会权利和议会改革这两个同时并存的问题而展开的声势颇壮的斗争很快就得到了解决，而没有引起激烈的骚乱，尽管在六十年代初期，简直没有人料到工人会在两个方面赢得象1867—1875年实际赢得的那样巨大的胜利。无论如何，在1867年，议会改革法案、劳资关系法案和新的工厂法案说明，大部分统治阶级宁可向工人阶级的要求作出让步，而不愿诉诸决斗，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一小撮狂热分子以外，任何人都不能认为英国的革命已迫在眉睫。马克思曾寄希望于爱尔兰的芬尼亚党人，相信爱尔兰的革命会导致英国激烈的阶级斗争，但是即使芬尼亚党人比他们的实际情况强大得多，看来也永远不会出现这种局面。明显的事实是，在大陆上形成资产阶级反对派主力的那类人，在英国属于能够不凭借武力而轮流执政的立宪政党；工人阶级——至少是其中比较有影响的部分——自“饥饿的四十年代”以来，境遇一直在改善，愿意寄希望于工会同资方的

175

讨价还价上和扩大选举权上，而不愿寄希望于宪章运动者再次提出的同统治阶级的斗争上。英国的工会和改革派领袖可能愿意给予生活在专制警察统治下的大陆革命者一些支持，但是决不会想到在英国掀起革命。

在比利时，统治阶级要反动得多，尽管工业高度发展，而工资却非常低，劳动条件非常恶劣。革命情绪在这里要旺盛得多，但是这主要是瓦龙族地区的情况。无论怎么说，比利时这个国家毕竟太小，不足以对整个欧洲的运动起领导作用。事实上，讲法语的比利时人深受法国的影响，正在等待法国的信号，尽管他们在柯林斯和其他先驱者的著作中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独树一帜的社会主义理论而倍受赞扬。除法国以外，最可能掀起革命的是意大利和西班牙。意大利已经发生了民族革命；这里虽然社会骚乱此起彼伏，情况严重，但是这些骚乱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或方向，而且除了在北部的少数城市以外，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并不存在。在经济上意大利仍然非常落后；即使真的发生革命运动，这种革命同《共产党宣言》所预示的革命显然不会有什么共同之处。西班牙则更加落后，除了卡塔罗尼亚以外，简直没有工人阶级运动，那里即将发生的暴动看来也不可能对欧洲其余地区的事态发展有多大影响。

剩下未谈的有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它的属国以及俄国。在俄国，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地下的革命运动已经显然重新活跃起来，但是西欧对这些运动很少了解，领导运动的学生和贵族仍然主要向农民而不是向实力尚小的城市无产阶级发出呼吁。波兰人根本没有能力起来反对他们的俄国统治者，他们仍然界限鲜明地分为贵族民族主义者和民主民族主义者两派，后者在许多情况下大力鼓吹国际革命行动，认为这是他们的唯一希望。在土耳其的领地，有一些民族主义革命者，他们主要同意大利人的极左翼或者同寻找新战场的加里波的派的冒险家有联系，而在保加利亚，

则同俄国人有关联，但是在土耳其领地并没有工人阶级运动。在奥匈帝国也没有任何声势可观的工人阶级运动。维也纳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指望德国和瑞士的讲德语地区；匈牙利的社会主义者人数太少，起不了作用。此外，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都找不到同他们的斯拉夫同胞相处的共同立场：民族问题仍然比社会问题重要。

这样，没有提到的就只剩下德国了，在斐迪南·拉萨尔的领导之下，那里最近出现了1848年以来第一个大规模的工人运动。不过德国显然还不具备工人起来领导革命的条件。在普鲁士以及整个德国北部，俾斯麦正在稳步加强他的力量，并在为建立普鲁士领导下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扫清道路。对俾斯麦持否定态度的资产阶级反对派举棋不定，它一方面同情俾斯麦的扩张主义民族主义，一方面对工人阶级的任何独立政治行动深怀敌意，因而陷入了半瘫痪状态。除了社会冲突以外，在那些赞成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的人，同那些坚持德国各邦独立因而易于跟德国社会中某些最反动的分子结成联盟的人之间，也存在着尖锐分歧。德国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领袖也截然分为两派：一派首先主张同资产阶级进步党人决裂，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甚至不惜同俾斯麦站在一边，赞成在普鲁士的霸权下统一德国。另一派则希望在反对专制统治的斗争中作为进步党人的盟友而保持独立，反对一切会加强普鲁士势力的行动，因为普鲁士显然是专制和军国主义控制的权力中心。大致说来，拉萨尔派代表前一种趋势；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在马克思的赞助下，代表后一种趋势，尽管马克思往往对他的副手持严格的批判态度，因为他们过分屈从资产阶级左翼，并出于憎恨普鲁士的霸权而显然反对德国的统一。

在国情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下，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一心考虑的是自己的问题，根本没有多少精力去过问整个欧洲的革命。此外，1866年，俾斯麦取得对奥地利战争的胜利，这实际上解决了民

族问题,使普鲁士受惠。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时的情况使得人们认为这是一场德国人反抗法国侵略的卫国战争,因而根本不可能把德国工人团结起来去反对俾斯麦。这一点办不到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俾斯麦是同拿破仑第三动干戈的,而且左翼人士一致希望推翻第二帝国。因此,虽然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领导新组成的爱森纳赫社会民主党无所畏惧地拒绝投票赞成军费预算,并且由于反对得胜的俾斯麦强加在法国人身上的条件,而同其他领袖一道坐牢,1870年和1871年的暴乱不会导致任何德国革命仍是不容置疑的事。

即使在法国,革命也只是在巴黎一地达到了成熟地步,里昂、马赛和其他地方掀起公社运动的尝试都被轻而易举地镇压下去了。这说明革命在全国其余地区并没有深厚的根基。国际工人协会的兴起,它早期在一些国家成功地发动起来的大罢工,以及英国改革斗争期间它在英国得到的明显支持,这一切都使得国际工人协会的发起者及其敌人过高估计了它的实力和工人阶级的革命热情。由于普法战争的爆发,由于真正的工人阶级感情的中心——最富有生气的巴黎遭到破坏,国际工人协会发动革命的时机也随之消失,否则国际无疑会作为一支相当强大的力量而存在得更长久一些,在工业领域中也会取得更大的成就。但是一旦国际被迫放弃罢工行动而诉诸纯武力,它就显然处于绝对的劣势,而其解体也就不可避免了。

178 在我们讨论国际工人协会的后期历史之前,有必要简单谈谈国际在两个国家的情况。当国际在法国已经止步不前而英国实际上已经退出国际的时候,国际在另外两个国家却继续大踏步地向前发展。这两个国家是意大利和西班牙;在那里,运动的发展同马克思和伦敦的总委员会的愿望和政策完全没有关系,是按照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路线,而不是法国的布朗基主义路线或马克思的社

会主义路线发展的。

我们已经谈过，国际工人协会在伦敦创建的时候，意大利的代表是加里波的手下的一名旧军官、马志尼的朋友鲁伊吉·沃尔弗少校。他同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意大利各地的马志尼派的工人联合会有密切关系，曾根据马志尼派中央组织的章程，提出了一份国际章程草案，但是这份草案遭到否决，而采用了马克思提出的草案。此后马志尼派在国际工人协会中再也没有发生什么作用，他们在这个组织中也根本不会感到自在。马志尼的组织在开始时是革命的。在意大利的那些还有待并入新国家的地区，它不仅仍然保持它的共和主义而且还保持它的一些革命特色，但是马志尼派的运动从来不是建立在阶级基础之上的，也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经济斗争。这个运动几乎完全是民族主义运动，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中产阶级（特别是以革命为己任的人）手里，运动的一大部分拥护者也是这些人。我们已经谈过，马志尼本人的观点具有温和的社会主义性质，但是他对阶级斗争有强烈的憎恶，认为阶级斗争破坏民族统一。他所强调的是严格遵守权利与义务的相互关系，从伦理出发去对待政治。这使他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强烈反对者，事实上也使他同样反对巴枯宁所大力鼓吹的那种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志尼肆无忌惮，恣意攻击巴黎公社，直到这时他对新社会主义的强烈憎恨才算充分暴露出来，不过从一开始，就显然看出，要建立一个足以兼容马志尼和马克思的国际是根本不容考虑的事。

因此，在国际成立的头几年，意大利人简直没有参加国际的任何活动。寄寓伦敦的大多数意大利流亡者是马志尼的拥护者；马克思无法罗致足够的人去同马志尼分庭抗礼。恩格斯由伦敦的总委员会任命为负责意大利的通讯书记；他设法建立了一些联系，但是他报告说，跟知识分子不同，要同劳动者建立联系极其困难。他

在意大利的主要联系人是洛迪地方的安里科·比格那密，他所办的《人民报》(1867年创刊)坚决支持总委员会，而反对巴枯宁及其信从者。1871年，在争执的高潮中，总委员会从支持国际的人数不多的伦敦意大利人中选派了一名代表前往意大利北部，希望争取对即将在海牙召开的代表大会的支持，但是他一无所获。在国际的早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把希望寄托在卡洛·卡菲埃罗侯爵(1846—1883年)身上，他曾任意大利驻英使馆随员，后来辞职，并宣布信仰社会主义。但是卡菲埃罗回到意大利以后，又很快接受巴枯宁的影响，改信反极权主义理论。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社会主义在意大利没有真正扎下根基，不能控制工人阶级，那时工人阶级大体上处在马志尼的影响之下。诚然，有些个别人信仰法国的某些特殊的社会主义学说。在托斯卡纳，利奥波尔多·坎皮尼在三十年代曾力图传播傅立叶主义，而康斯坦丁诺·马摩西则宣传一种从巴贝夫和邦纳罗蒂那里引伸出来的理论。在波洛尼亚，以马可·明盖蒂和加布利埃诺·罗西为首的一批圣西门主义者，同当时住在巴黎的另一个意大利圣西门主义者安吉罗·法瓦保持接触。三十年代，在比萨、佛罗伦斯以及卡拉布里亚，还有其他一些圣西门主义者。所有这些团体都受到米兰的贝尔吉奥约索公主——更出名的称呼是克里斯亭·特里沃尔齐奥(1808—1871年)的影响，她在1830年移居巴黎，圣西门主义者时常光顾她的沙龙。1848年，许多社会主义流亡者暂时回到了意大利，比如在伦巴第的革命运动中起了主要作用的朱泽培·费拉里，还有相当一批同短命的罗马共和国有关系的人。这些人中最重要的是浪漫主义军人卡洛·皮萨坎尼，即圣吉奥凡尼公爵(1818—1857年)。皮萨坎尼以罗马共和国陆军参谋长身份参加了1848年的革命，后来在阿尔及利亚法国外籍军团服役，但是仍然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冒险家。1857年他率领一小支志愿部队在意

大利登陆，希望发动一次暴乱，但是他的部队被击溃，本人死于战斗。在他生前，关于他的社会主义观点人们所知不多；但是他的《论文集》1860年在巴黎出版，流传颇广，读者甚多。皮萨坎尼主张土地和工业资本的公有制，土地归公社集体耕种，消费品由人民平均分配。他在意大利国外生活和工作，没有组织任何运动；他属于那个推许加里波的为鼓舞者的战斗的左翼；当然，从广义来说，加里波的本人是社会主义者，也是共和主义民族主义者，他的民族主义情绪决不以自己的国家为界。

但是，不论加里波的还是皮萨坎尼都没有创立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事实上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这种运动简直就不存在。1860年，意大利新国家成立以后，工人中间便发生了巨大的骚动。在1861年举行于弗洛伦斯的第九次工人代表大会上，那些希望工人协会仅限于进行“互助会”活动的人，同那些主张实行更富有战斗性的工业政策以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人之间发生了斗争。罢工仍然为法律所禁止，而左翼的一项要求就是承认工人有组织起来以进行共同防御的权利。但是胜利的多数并没有同马志尼决裂，运动的主要努力仍然是支持他和加里波的所提出的要求：解放仍然留在新意大利王国以外的地区。但是1862年，加里波的在阿斯普罗门特被王家军队击伤和逮捕。这件事引起了骚动。大多数工人协会宣布支持加里波的，因而被警察大批封闭或解散。那些仍然存在的协会第二年（1863年）在帕尔马又举行了一次代表大会，根据米兰的加斯佩尔·斯坦帕的建议，制定了一个共同行动的“盟约”，并且设立了一个常设委员会。1864年，在那波利代表大会上，特拉尼的吉奥范尼·波维亚建议定期举行代表各国工人运动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这是国际工人协会在伦敦刚刚成立以后的事。那波利代表大会还设立了一个旗帜鲜明的意大利工人协会联合会，斯坦帕是其中的杰出人物。

在举行那波利代表大会的时候，巴枯宁在伦敦，同马克思有接触，但是准备去意大利定居，在那一年早些时候，他曾经在意大利，并同加里波的和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工人协会的一些领袖建立了联系。1865年初，他回到意大利，不久就在那波利定居下来，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集团，其中有卡洛·甘布齐（赫尔岑的朋友）、萨维利奥·弗里西亚、阿尔伯托·塔西和朱泽培·费拉里等人。费拉里后来是国际工人协会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主要组织者。同年，尼科罗·洛·萨维奥在佛罗伦斯创办了《无产阶级报》，一般认为这是在意大利首次出版的立场鲜明的社会主义报纸。大体上说来，洛·萨维奥是蒲鲁东的信从者，他的报纸成了温和派反对巴枯宁主义运动的一个集合点。两年以后，安里科·比格那密的《人民报》在洛迪发出了更加明确的马克思主义音调。

1866年，西西里的一系列起义召致了普遍的镇压。为了对付这种局面，巴枯宁及其友人第二年在波利建立了一个叫做“正义与自由”的协会，并用同一名称创办了一个刊物。他们还在那波利建立了国际工人协会的第一个意大利支部。在同年后期举行的第一国际洛桑代表大会上，米兰的斯坦帕作了关于意大利形势的报告；塔纳里作为波洛尼亚的代表参加了大会。斯坦帕的报告说，意大利工人协会有一百多万会员；当然，这个数字包括许多不同倾向的社团。第二年，在国际工人协会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弗里西亚是唯一的意大利代表。

1865年定居于那波利的巴枯宁认为，前那波利王国和西西里的骇人听闻的经济状况和当地特有的农民骚乱是一个不可失之交臂的鼓吹革命的机会。不管怎么说，当他在1867年离开那波利的时候，革命组织的核心及其机关报《平等报》仍然保留下来，其影响不仅扩大到西西里，而且也扩大到罗马尼亚以及意大利北部的一些地区，特别是米兰。在这些年里，巴枯宁并没有同伦敦的国际工

人协会有过直接联系；他一直在建立地方性的革命团体，这些团体对任何中央机构都没有正式的从属关系，而一直是以一个秘密组织的名义进行活动的。他称这个组织为“国际兄弟会”——一个没有章程或者正式组织形式的秘密国际，主要存在于他的头脑中。我们已经谈过，1867年，巴枯宁有一个时候把主要注意力转移到和平与自由同盟身上，是年同盟在日内瓦举行代表大会。他离开意大利以后，定居于瑞士，暂住日内瓦。但是他在日内瓦——后来又在瑞士其他城市——仍同意大利革命运动的发展保持密切的联系。1868年，巴枯宁及其那波利的的朋友退出和平与自由同盟，并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设总部于日内瓦，于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便成了巴枯宁同意大利运动保持联系的机构，不过除了同盟的日内瓦支部以及巴枯宁同许多革命朋友的大量通信以外，同盟实际上简直就不存在。从1868年开始，看来巴枯宁至少是有意于充当国际工人协会的代理人的。当国际总委员会在马克思的督促下，拒绝根据巴枯宁所建议的条件接纳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加入的时候，同盟宣告解散（据此国际工人协会便接纳同盟为会员），只有同盟的日内瓦支部除外，于是那些原来表示效忠于同盟的与巴枯宁有联系的团体现在都转而向国际效忠了。如前所述，意大利已经有两名代表——米兰的加斯佩尔·斯坦帕和波洛尼亚的塞巴斯提亚诺·塔纳里侯爵——参加国际1867年的洛桑代表大会，而参加1868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只有一名代表，那就是巴枯宁在和平与自由同盟中的拥护者萨维利奥·弗里西亚（1813—1886年）。但是这些都不过是名义代表而已，只有米兰的斯坦帕真正代表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运动。意大利大部分地区的运动仍然在逐步摆脱马 183
志尼的组织，另在北部各工业中心的工人中寻找新的基础。参加1869年巴塞尔代表大会的两名意大利代表，一个是那波利的一个裁缝斯提法诺·卡波鲁索，另一个是当时住在瑞士的巴枯宁本人。

北部地区没有派代表参加大会。

在巴塞尔代表大会和 1872 年海牙代表大会的间隔期间，国际在意大利有了很大发展。1870—1871 年，有些团体退出马志尼组织，退出的团体大都宣布加入国际工人协会。巴黎公社事件以及马志尼对巴黎公社的激烈指责使气氛更加紧张，并使那些在这以前就心怀二志的人加入这个或那个阵营。1871 年 12 月，在波洛尼亚举行了一次代表大会，会上成立了一个新机构——工人团结协会(Il Fascio Operaio)，旨在促进工人运动左翼采取一致行动反对马志尼派。“法西奥”(Fascio)的意思是一些捆在一起的木棍，它既能产生力量而又无需完全结合为一体；这个词的含意并不是现在所谓的法西斯主义，而是指地方工人团体的联合团结。这个运动很快就扩大到其它城市，领导运动的是干练的安德里亚·科斯塔(1851—1910 年)，后来他是意大利社会党的主要缔造者。这个运动在观点上是无政府主义的，至少是“社联主义的”，完全支持巴枯宁和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瑞士反对派。1872 年 3 月，马志尼逝世，他所领导的运动开始解体。在那以后的几个月中，又有许多人退出马志尼的工人协会。纳布鲁西和多米尼科·特罗姆贝蒂以同国际有关系的工人团体代表的身份去争取加里波的支持，结果得到了他的赞助。卡菲埃罗向恩格斯宣布自己义无反顾地背弃马克思主义而投向巴枯宁方面。1872 年 8 月，海牙会议前不久，意大利那些支持国际的团体在里米尼举行了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组成了国际工人协会意大利总支部，卡菲埃罗任主席，纳布鲁西任

184 副主席，安德里亚·科斯塔任书记。里米尼代表大会同时宣布主张国际工人协会所属各国全国性组织应完全自主，并且指责伦敦的总委员会有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的偏差。在马克思和“社联主义者”之间的争执(一场决没有由于巴黎革命的悲惨结局而终止的争执)中，里米尼代表大会坚决支持巴枯宁和汝拉总支部。这次代

表大会在波洛尼亚附近的伊莫拉,以“联合联络局”的形式,设立了国际工人协会意大利总部,它没有执行权,也没有强迫国际工人协会意大利各支部接受任何中央机构指示的权力。波洛尼亚的联合联络局同巴枯宁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日内瓦支部,同汝拉总支部维持着友好关系,但是意大利人宣布,他们将拒绝派遣代表参加国际工人协会根据目前的章程召开的任何国际代表大会,因为他们认为这个章程赋与总委员会和代表大会本身的权力都过了头。

巴黎公社以后,意大利政府对国际工人协会意大利各支部的态度远不象过去那么宽容了,还逮捕了许多领袖。马志尼派和国际派之间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在意大利的许多地区,国际再次被迫转入地下。在开始为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这是从1869年以来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进行准备的时候,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日内瓦支部和汝拉总支部对意大利人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要他们派出阵容坚强的代表,以便维护反专制主义的观点,但是在里米尼代表大会以后,意大利领袖回答说,他们接到了自己的代表大会的明确指示,建议由不同意总委员会的态度的国际会员另行召开一次对立的代表大会,以确保各国会员的本国组织的充分独立性。因此,意大利没有任何代表参加1872年的海牙代表大会,尽管西班牙人(其中大多数人同意意大利观点)决定派出代表。意大利人反而派遣友好代表参加了瑞士人召开的一次对立的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在海牙大会以后不久举行于圣伊米尔。

此后,国际工人协会意大利各支部卷入了1873年和1874年蔓延于意大利各地的反饥饿暴动以及1874年的波洛尼亚起义。那次运动被轻而易举地镇压下去以后,第一国际北意大利支部就发生了分裂。以罗马支部书记奥斯瓦尔多·格诺奇-维亚尼为首的意大利中部的一个团体退了出去;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反无政府主义团体按照非暴力的方针新建了一个伦巴迪总支部,主张采取合

乎宪法的政治行动。提倡“整体社会主义”的法国人边诺阿·马隆把自己的流亡寄寓之地从瑞士迁到意大利，也为意大利社会党的创建出了力，起了帮助铺平道路的作用，不过直到1879年安德里亚·科斯塔(当时关在巴黎监狱里)同无政府主义者决裂，并带头在社会民主主义方面采取行动的时候，意大利社会党才宣告成立。这时候，无政府主义者整顿了他们在意大利中部和南部以及西西里的队伍，并且发动了一系列地方性暴动，其中最重要的是1876年的贝内文托起义；在这批无政府主义者中，埃里科·马拉特斯塔(1853—1932年)已经是崭露头角的人物。

当然，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意大利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绝大多数农业人口生活水平非常低，人烟稠密的城市也极其贫困，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仍然完全处于封建状态，那里的广大土地为私人所拥有，农民一向受着残酷的压迫，而在不景气的岁月往往铤而走险，掀起声势浩大的运动。除了北部以外，就连城市也一贫如洗，根本谈不上工业化，以致无法为建立稳定的工会提供任何基础，也无法建立任何有效的工人阶级领导。在米兰、都灵以及北部其他少数城市，至少还存在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运动的核心，但是即使在这些城市，领导权也仍然主要抓在革命的贵族以及以革命为职责而又别无出路的人手里。尽管情况是这样，在南部和农村地区的反饥饿暴动同北部城市的比较有影响的运动之间仍然存在着鲜明的分界线。但是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这两支力量由于共同反对拒绝正视社会问题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民族主义者而联合起来了；这两部分同为无政府主义所吸引，不大关心社会主义，因为通过任何种类的合法政治行动去争取国家的让步似乎都是渺无指望的事。在大多数意大利领袖看来，马克思的政策，即帮助资产阶级激进派，使之成为国家主人，消灭封建主义，以便在资产阶级获胜的时刻再去攻击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完全不适合自己的

的情况的；他们认为，既然新的意大利国家显然无能哪怕是控制封建主义，更不必说采取任何行动去改善城市工人阶级的状况，那么，反抗政治激进派的时机分明已经到来。

当然，从经济上来说，西班牙大部分地区甚至比意大利还要落后，在1868年革命以前，统治当局也反动得多，残酷得多。1868年革命才为第一国际西班牙支部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卡塔罗尼亚，特别是巴塞罗那，是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也最容易接受法国南部的影响。当推翻伊萨贝拉女王的革命临近的时候，西班牙的运动正是在巴塞罗那首先集结力量的。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西班牙实际上不存在社会主义运动，虽然傅立叶的学说以及后来蒲鲁东的学说对于个别思想家有相当大的影响。西班牙主要的傅立叶主义者是费南多·加里多，他也受到欧文的影响，早在1846年就在马德里主编宣传傅立叶主义的刊物《引力》。另一个有影响的人物是华金·阿布鲁，他从1823到1834年一直住在法国，结识了傅立叶，1834年定居于加的斯以后，便成了傅立叶学说的积极宣传者。其他早期的社会主义鼓吹者有西克斯托·卡马拉，四十年代他在马德里主编一家讽刺性杂志《袋蜘蛛》，还有罗克·巴西亚和何塞·穆尼兹，后者1840年创建了巴塞罗那的工人互助协会。西班牙议会议员奥达克斯·阿维塞拉1848年宣布赞成社会主义；纳西索·蒙图里奥尔四十年代在巴塞罗那建立了一个拥护卡贝的组织。1858年，一个在加里多的鼓励下成立的团体提出了西班牙第一个社会主义纲领。当时，社会主义者在共和党内组成了一个派别；三年以后，他们企图诱使共和党采取社会主义政策，从而在党内造成了危机。但是争执得到了解决。六十年代初，加里多访问英国，研究了合作运动，归国后成了英国罗契台尔合作制的热心鼓吹者。但是加里多本质上是一个温和派，几年后就被淘汰了。1868年西班牙革命

以后，社会主义者同胜利的共和党人立刻发生激烈的争吵。社会主义者退出了共和党，并大力开展工人阶级的组织工作，这一方面是为了采取罢工行动，一方面是为了实现更广泛的政治目的。国际工人协会主要以马赛和里昂为据点，首先推广到卡塔罗尼亚，然后推广到西班牙其余地区。新组成的工人协会迅速联合组成国际的支部和区组织；一名西班牙工人代表参加了1868年国际工人协会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他自称为萨罗·马加兰，他的真名是A·马沙尔·伊·安格洛沙。他来自卡塔罗尼亚，是一个冶金工人。第二年(1869年)，两名西班牙代表参加了巴塞尔代表大会，他们是加斯帕尔·桑提农和巴塞罗那的拉菲尔·法加-佩利塞。后者是印刷工人和新闻记者，拥护巴枯宁。他主编西班牙国际工人协会的机关报《联合报》(1869—1872年)和《劳动报》(1872年—?)。另一个有影响的人物是加的斯的费尔明·萨尔沃契亚(?—1907年)，他是1868年在加的斯成立的临时政府的成员，但是在第一国际在西班牙展开活动的关键岁月里，他在坐牢。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他在西班牙社会主义的复兴运动中起了很大作用。

第一国际西班牙支部从一开始就持无政府主义观点。那些在建立西班牙支部方面起了主要作用的法国人——如马赛的安德列·巴斯特列卡和沙尔·阿勒里尼——就属于法国国际工人协会中战斗性最强的集团，并同巴枯宁关系极其密切。在建立西班牙国际支部方面最重要的人物是意大利人朱泽培·费拉里，他曾经同巴枯宁在和平与自由同盟中共事，后来又一道退出同盟而加入国际。把运动从卡塔罗尼亚推向其他地区主要是费拉里的功劳。他建立了国际工人协会马德里支部，在那里同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敦促下，拉法格又成立了一个得到伦敦总委员会支持的与原支部对立的马德里支部。

巴枯宁本人并没有参加西班牙运动，但是运动却是按照类似意大利所奉行的那些方针发展的，而意大利运动则受到巴枯宁比较直接的影响。西班牙运动的主要机关报是《联合报》和《团结报》，前者 1867 年在巴塞罗那发行，后者 1870 年在马德里发行，是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总支部的机关报。1870 年，西班牙总支部在巴塞罗那召开了公开的代表大会，大会的议程表明总支部的强烈革命性。以前很受欢迎的合作理论而今被指责为旨在分裂和削弱无产阶级；代表大会还宣布反对同共和党政客进行任何形式的政治合作。

国际西班牙支部的领袖们热烈欢迎巴黎公社，1871 年，组织工作甚至以更大的速度继续发展。但是公开发展的阶段已经结束。国际工人协会遭到政府的取缔，原定在巴伦西亚召开的代表大会无法公开举行。领袖们只好举行一次秘密代表大会，会上决定在工会的基础上改组西班牙国际，并决定对罢工政策进行统一控制，以免分散力量。1871 年 10 月，西班牙议会利用共和宪法中唯一能够使它取缔国际的条款，以国际“不道德”为借口，下令解散西班牙国际。但是西班牙国际仍然作为一个地下组织壮大起来，并且通过在它的控制下建立起来的西班牙制造业工人联合会进行公开活动。在各大工业城市，罢工风起云涌。政府进行镇压，逮捕了許多人。于是问题就产生了：为了对付镇压，国际会员是否应该设法同共和党左翼结成联盟？一些领袖，特别是在保尔·拉法格的影响下建立的国际马德里支部，赞成这种方针，但是大多数西班牙支部表示反对，在随之发生的分裂中，无政府主义者几乎控制了整个组织。拉法格实际上是作为伦敦总委员会的代表派到西班牙来的，希望把西班牙人从拥护巴枯宁主义政策的立场上争取过来；但是整个形势对他不利。何约塞·梅萨主编的马克思主义者支部（马德里支部）的机关报《解放报》，无法战胜尼古拉斯·阿龙索·马塞劳

主编的《理性》（在塞维利亚和马德里出版）和多数派的机关报《联合报》（在巴塞罗那出版）。1871年，在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会议上代表西班牙的安塞尔摩·洛伦佐是无政府主义派的领袖，著有许多宣扬“集体主义”无政府主义理论的书籍。西班牙国际工人协会既然拒绝同激进派政客合作，于是便开始组织革命活动。1873年，地方性暴动发生了，其中以卡塔赫纳最为激烈，那里宣布成立了一个左翼革命政府，并且执政了一个时期。但是这些起义终于失败了，从而也摧毁了作为群众运动的西班牙国际工人协会，尽管一直到七十年代末，它始终存在于地下，并且把无政府主义传统留给了现代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和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运动。

这些事件是在激烈的政治骚乱此起彼伏的背景下发生的。在普列姆将军1868年的不流血革命以后，紧接着又是一个动荡不定的时期，在此期间，胜利者走遍全欧，力图物色一位立宪君主来继承被废黜的伊萨贝拉。1870年行将结束的时候，萨伏依王朝的阿马德乌斯经过说服，接受了王位，但是他在位时国家多事，统治只维持了两年多一点时间，当时政府同第一国际有斗争。他退位后宣布成立的共和国维持了不到两年，在此期间曾四易总统。其中一位是社会主义者领袖弗朗西斯科·皮·伊·马加儿^①（1824—1901年），他只当了一天总统。以西班牙王室正统派、伊萨贝拉之子阿尔芳索的拥护者、共和党人为一方，同以无政府主义者为一方之间发生了内战，直到1874年阿尔芳索登上王位，才扫平了各个反对派。在这些动乱多事的年代里，西班牙人表明完全没有能力实行他们曾经尝试过的各种代议制政体，同时也表明他们显然倾向于区域自治而反对任何形式的集权政府。许多共和党人都是

190 区域自治论者，只是因为工人运动采取鲜明的无政府主义立场，他

^① 皮·伊·马加儿除了社会主义方面的著作以外，还写了一部《十九世纪西班牙史》，这部书在他死后第二年分七卷出版。

们无法赢得广泛的支持，于是君主政体的复辟便成为势不可免的事了。马克思显然看出，打败西班牙反对派的唯一希望在于工人同资产阶级激进派合作，但是他力促拉法格推行这一政策的唯一效果却是总委员会对西班牙事务的影响完全丧失。

在 1869 年巴塞尔代表大会和 1872 年海牙代表大会之间的那几年，瑞士仍然是国际内部反对伦敦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领导的主要中心。1867 年以来，巴枯宁一直住在瑞士，他把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总部设在瑞士，并以此为据点同许多国家的革命者保持经常的联系。在瑞士很容易同意大利、法国南部以及在奥地利和德国南部的同情者进行密切的接触。巴枯宁在里昂和马赛的朋友同巴塞罗那和瓦伦西亚的西班牙人经常有接触，而巴枯宁的意大利朋友在希腊，甚至在巴尔干半岛又都有联系人。此外，在日内瓦和瑞士其他一些城市，有相当多俄国侨民，还有一向寄寓在那里的波兰流亡者，1871 年更增加了大批来自巴黎和法国其他第一国际中心的难民。

当国际总委员会拒不同意巴枯宁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在保持自己原有的各国支部，并可单独举行国际性代表大会的条件下加入国际的时候，巴枯宁确实正式解散了作为国际性组织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但是这次解散实际上不可能起多大作用，因为同盟事实上本来就不是一个正式的国际组织。因此，在巴枯宁设法使第一国际承认日内瓦宣传支部为国际所属的一个支部以后，他和他的信从者仍然处于很有利的地位，可以进行反对中央集权和专制主义倾向的宣传，他们指责伦敦总委员会具有这种倾向。同盟的日内瓦支部——后来广泛地简称为“同盟”——本身就是一个完全国际性的团体，它主要由俄国、波兰、意大利和法国的流亡者组成，同时又有足够的瑞士同情者，因而不是一个纯外国人的组织。此外，同伦敦总委员会的意图相反，它在瑞士还得到吉约姆的国际汝

拉总支部的支持。汝拉总支部是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单独支部组成的,得到总委员会的承认,这是瑞士人内部经过激烈争吵以后的结果。如前所述,在日内瓦,除了建筑业以外,当地各行业大都赞成参加城市和州的政治活动,而反对那种在汝拉区的小城市和村庄中占上风的反对参与政治活动的倾向。起初,日内瓦和汝拉同属国际的一个总支部,由1848年德意志革命的老战士约·菲·贝克尔领导。有一个时期,贝克尔既同马克思有密切接触,通常也欣然接受他的领导,同时也跟巴枯宁及其同盟合作,后来库勒里的信从者和日内瓦各行业奉行的资产阶级激进政策。但是当以巴枯宁和吉约姆为首的反对参与政治活动的集团在统一的总支部中占有多数,少数派——它在日内瓦当地却是多数派——便退出了这个总支部,并且拒绝接受不参加地方政治活动的决定。贝克尔经过一番犹豫以后,同少数派采取了一致行动,而且由于库勒里领导下的极右派断然退出了国际,贝克尔也就更加爽快地退出了总支部。面对着这种分裂,伦敦总委员会同意接纳日内瓦总支部和汝拉总支部同为国际会员,只要求它们保持原来的名称。于是在日内瓦就有了两个对立的机构——日内瓦总支部和巴枯宁的日内瓦宣传同盟,后者同詹姆斯·吉约姆和阿德哈麦尔·施威泽贵布尔领导的汝拉总支部密切合作。我们前面谈过,巴枯宁的同盟原先曾申请加入日内瓦总支部,作为它的一个成员支部,但是遭到了日内瓦总支部的拒绝,尽管伦敦总委员会接纳了它。总之,无政府主义者可以自由地分别通过两个机构进行宣传——在他们认为适合的时候,通过日内瓦宣传同盟;在他们希望作为国际工人协会认可的国家支部而采取行动的时候,则通过汝拉总支部。这实际上意味着,日内瓦宣传同盟主要同意大利和西班牙以及法国南部的左翼支部打交道,而同比利时、荷兰、巴黎和伦敦打交道则主要是汝拉总支部的事。巴枯宁最初力促吉约姆在汝拉建立一

个单独的同盟支部，但是吉约姆既拒绝这样作，也拒绝加入同盟。他看出以国际工人协会地区总支部的名义行事，要比一个公开反叛的派别更有价值。

巴枯宁本人曾经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投票赞成扩大总委员会的职权，这种作法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总委员会是他的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信从者所日益反对的。1869年，普法战争爆发以前，人们普遍相信，一个新的“1848年”——即一场大革命已经迫在眉睫，这场大革命将从法国开始，然后席卷欧洲，使组织起来的工人有机会把革命变成无产阶级领导和控制的运动，而这种机会正是工人在1848年由于太不成熟而失之交臂的。巴枯宁不得不承认这样一次革命需要统一集中的革命指导。但是除了总委员会以外，又有什么机构能够承担这种责任呢？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专心致志于本身的民族革命，甚至到了这个阶段也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而且当时他们在拟定国际工人协会的种种计划中也只起次要的作用。法国人和比利时人以及大多数瑞士人当时也确实希望有一个共同的领导；而英国人在国际中发挥的作用实际上如此微不足道，以致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能够以他们的名义任意发表意见。但是在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以后，德国被一股爱国主义的浪潮所席卷，而法国则由于遭到失败，国内革命的结局听命于普鲁士人，以致革命的性质有了改变，因此欧洲普遍发生革命的希望也就消逝了。此外，巴黎公社的失败更加清楚地表明，在西欧掀起无产阶级革命的日子还遥遥无期。

马克思对改变了的局面的反应是实事求是地接受事实，就好像他在1850年以后所表现的那样。他十分清楚，国际充当欧洲革命的的工具的机会已经消逝；如果他能够的话，他完全愿意结束国际，而不让国际成为一系列行不通的和代价高昂的暴动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巴枯宁和无政府主义者一般说来对先进的工业国家远

193

不如对意大利、西班牙和俄国那样关心，西方形势的改变完全没有使他们望而却步。对他们来说，当前已经不是在欧洲普遍发动革命的问题，而是置成败于不顾，抓住任何地方任何机会采取革命行动的问题，因为他们坚决认为，每一次起义都是对群众进行革命教育的过程的一部分，因而也是走向彻底铲除现存的社会结构这一理想目标的一步。因此，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一切形式的集权都是发扬地方主动性和群众革命精神的障碍。他们根本不希望扩大总委员会的职权以指导运动，而是希望完全取消总委员会，仅仅用一个联络局来代替它，联络局只起保持各国组织之间的接触的作用，在任何方面都无权指导各国组织的政策。

这种意见冲突并不是巴枯宁或马克思搞任何“阴谋”而造成的。冲突之所以形成，既是由于对组成国际的各种运动抱不同的态度，也是由于运动本身各有不同的特点。巴枯宁和吉约姆，还有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领袖们，在开展反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宣传方面的确越来越激烈，但是其中并没有构成阴谋的特殊活动，除非把巴枯宁惯于在极其普通的活动中故弄玄虚也算作阴谋。就马克思来说，他认为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愚蠢行为，对之深为恼怒。当争执发展到高峰时，他已经形成了一种严重的阴谋恐惧症，以致认为整个反专制主义运动都是针对他个人的一个恶毒的阴谋。恩格斯出于对马克思的英雄崇拜，不幸也大大加强了这种态度。此外，巴枯宁为人愚不可及，性烈如火，他犯了下述两个严重错误，这在神经过敏的马克思看来，似乎也包含非常邪恶的用意。

194 第一个错误——远为次要的错误——涉及到把1867年在日内瓦出版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翻译成俄文。巴枯宁在1869年竟然承担翻译《资本论》的工作，而马克思居然也同意由他翻译，这说明他们两人在那个阶段肯定不是敌人。但是如果有人认为巴枯宁实际上会完成这项翻译工作，或者说如果他完成了，马克思会

感到满意,那无疑也是稀罕事,因为巴枯宁每做一件事几乎都是虎头蛇尾,半途而废,而且也是世界上最不可能诚心诚意地完成一项如此艰巨而厌烦的工作的人。他为翻译这本著作得到了一笔预付的稿费,但到了显然决不可能完成这项翻译任务的时候,他又无意退出稿费。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因为他老是缺钱花,而且一向无孔不入,到处弄钱。这就是这个俄国庞然大物的行径,这个人也是一个大娃娃,在钱财问题上完全不负责任。马克思必然十分了解他的巴枯宁的为人,因而不管他为此感到多么懊恼,对巴枯宁使他失望一事是无权感到惊奇的。但是不幸的是这个翻译问题同另一件严重得多的事纠缠在一起了,这件事终于使马克思宣布要同巴枯宁及其所有的朋友决一死战。

这就是著名的涅恰也夫事件,关于这件事人们常常谈到,这里只略提几句就够了。谢尔盖·涅恰也夫(1847—1882年)是一个俄国青年,1869年到达瑞士,一度与巴枯宁过从甚密,他显然是一个病理学上的病例。同涅恰也夫对无政府主义和破坏的狂热相比,巴枯宁的理论看来还算是温和而可亲的。涅恰也夫真诚的革命热情是不容怀疑的,他为此付出了代价,34岁就死于彼得—保罗要塞,他在那里被关了十个年头。但是他的革命理论和他对革命理论的身体力行简直使任何正派人都瞠目结舌,在真相大白的时候,甚至连巴枯宁也不例外。他否认一切道德,认为这都是资产阶级的迷信;他认定革命行动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他谋杀了一个对他神秘的“革命委员会”的事务过分追根究底的同道,他对谋杀作了一番安排,为的是让集团里的其他成员遭到连累,从而保证革命的团结;他毫不在乎地故意使那些不大坚决的革命者引起警察的怀疑,以便使他们更深地陷入他的密谋。他对朋友就象对敌人一样信口开河,不说真话;谈起自己的功绩,他总是积习难改,吹得天花乱坠。为了博得巴枯宁的欢心,他杜撰了一个席卷全俄的伟

大革命运动和一个地下组织，而他又自称是这个组织的头头。他在到达瑞士的时候，装出一付甫自彼得—保罗要塞逃出来的样子，虽然当时他从未被捕过。有一个时候，巴枯宁完全相信了他的全部故事，并深受这个年方 21 岁的青年的影响，而事实上，他的革命活动仅限于领导一个影响不大的小小的学生团体而已。涅恰也夫劝诱巴枯宁同自己合作，编写一系列极端激烈的小册子，准备偷运进俄国。甚至到了今天，也还无从肯定巴枯宁是否受了涅恰也夫的影响，同他合写了臭名远扬的《革命问答》，这本书毫无保留地阐述了彻底的革命超道德主义。即使巴枯宁没有写《问答》，他肯定是同意这本书的，他本人就常常说些大致相同的话，只是不那么露骨而已。巴枯宁给涅恰也夫起了一个绰号，叫作“孩子”，宠爱备至，而且由于这个他誉之为青年俄国的使者对他这位革命前辈的尊重而感到洋洋得意。甚至在涅恰也夫被揭露出来的时候，巴枯宁仍不能忘怀这个他垂青的人，即使他不否定此人的思想，至少也不得不否定此人的所作所为。总之，在他终于发现涅恰也夫的真相，并停止与之合作以前，恶果已经造成了。

涅恰也夫发现巴枯宁在翻译《资本论》时感到厌烦而不能自拔，于是答应为他摆脱这项义务。说来也是本性难移，涅恰也夫的做法是威胁准备出版这部著作的出版商说，如果他坚持要巴枯宁继续翻译或偿还预付稿费，就要对他进行某种未作具体说明的报复。马克思听说这个消息，勃然大怒，认为这件事证实巴枯宁同涅恰也夫完全勾结在一起，蓄意对自己失信，并同自己为敌。马克思疑心这是一个阴谋，企图阻止自己的伟大著作在俄文出版。在他的
196 头脑里，这同他对俄国和俄国方式的根深蒂固的厌恶、对涅恰也夫的虚无主义和否定一切人类行为准则的做法的强烈反对混合起来了，同时也跟他的这样一种想法纠缠在一起了：有一个策划周密的阴谋，想拥戴巴枯宁为国际的独裁者，取代自己，从而破坏国际。

从事实来看,巴枯宁的书信和已经发表的著作表明,尽管他不同意马克思的方针,他对马克思的智力还是深为推崇的,虽然决不是无条件的推崇。同时也几乎可以肯定,巴枯宁同涅恰也夫对《资本论》俄文版的预约出版商所进行的威胁这件事没有关系。但是,马克思再也不能理智地考虑问题了;1871年国际由于无法举行全体代表大会而召开了伦敦代表会议,会上浪费了很多时间去调查马克思对巴枯宁的指控,而没有去考虑面对巴黎公社失败和法国运动日趋没落的局面,国际应该怎么办。

另一个俄国流亡者尼古拉斯·吴亭在日内瓦的活动引起了新的纠纷。吴亭于1863年离开俄国,从那时候起就主要住在瑞士。他曾同巴枯宁合作,后来发生了争吵,成了一个俄国人团体的领袖,这个团体反对巴枯宁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所领导的集团。早在1870年,他就设法控制了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机关报《平等报》,这个刊物以前掌握在巴枯宁的朋友手里。接着吴亭便着手在日内瓦组织国际的俄国支部,跟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分庭抗礼。俄国支部向伦敦总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承认,并且要求马克思担任该支部驻总委员会的代表,以加强它提出的申请。马克思由于迫切希望支持任何反对巴枯宁的行动,接受了这个职位,并使申请得到承认。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曾说,他居然成了一个俄国组织的代表,真是一个稀奇的局面。此后,吴亭不断从日内瓦向马克思提供有损于巴枯宁及其追随者的名声的消息,大事煽惑,气得马克思不惜用任何武器来对付自己的对头,一心要报复。吴亭出席了1871年的伦敦代表会议,参加了关于巴枯宁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讨论,并受命准备一份关于涅恰也夫事件的报告。会议断然否认国际工人协会同这一事件有关。吴亭在破坏第一国际的争吵中演完了自己的角色以后,便从运动中消失了。他同沙皇俄国妥协后,回到了俄国,晚年成了一个富有而体面的官府承包商。

在 1871 年 9 月举行的伦敦代表会议上，法国代表全是流亡者：巴黎的瓦扬、弗兰克尔、罗沙和赛拉叶以及马赛的巴斯特利卡。瑞士派有两名代表：日内瓦的吴亭和昂利·佩雷，后者以前是巴枯宁的支持者，后来转变了立场。总委员会因为同汝拉总支部在议事程序问题上发生争执，拒绝邀请任何瑞士反对派的代表参加会议。西班牙只有一名代表，意大利没有代表。英国代表团只有约翰·黑尔斯和爱尔兰人托马斯·摩特尔希阿德，除非把在伦敦的外国人——马克思、恩格斯、埃卡留斯、荣克、丹麦的柯恩和波兰人安东·扎比茨基——也算在内。比利时派来了以西萨尔·德·巴普为首的 6 名代表，只有在这个国家，国际仍在真正发展中；这批人采取了起缓和作用的态度，但是并没有能防止会议把大部分时间浪费在巴枯宁对总委员会、特别是对马克思犯罪这个问题上。德国没有派代表参加会议，由于普法战争的结果，德国的运动大体上已经暂时无声无息。

从这个阶段一直到第二年的海牙代表大会，马克思暂时同主要为布朗基主义者的法国流亡者结成联盟以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国际的英国拥护者——其中已不再包括任何主要的工会领袖——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英国总支部委员会。只要伦敦工联理事会以及新建立起来的职工大会的主要领袖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支持者，就有理由说，单独成立英国总支部委员会，其作用只会是重复这些人在这些机构以及在全国改革联盟及其后继组织——1869 年的劳工代表同盟中的工作。但是，在英国的工会领袖退出国际工人协会（有些人在巴黎公社以前就已退出，其余的人则是由于国际支持巴黎公社而退出）的时候，就可以明显看出，除非单独在国际本身的总支部委员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作为左翼工人阶级舆论的中心，以便同工会领袖集团刻意制定的温和策略相对抗，国际就不可能在英国真正存在。于是，伦敦代表会议以后，立刻就建立了一

个有别于总委员会的国际工人协会英国总支部委员会，但是它始终没有赢得任何广泛的支持。它的出现使得总委员会的权威所依据的本来就很单薄的基础更加削弱了，因为根本无法保证这个机构会按马克思的指示行动或者是让马克思放手行事，就象总委员会中比较著名的英国委员过去常作的那样。

在国际伦敦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决议中，有一项决议宣布，每个国家的工人都绝对需要建立自己的政党，完全独立于一切资产阶级政党之外。由于无政府主义者没有参加会议，而且法国代表团的布朗基主义色彩浓厚，这项决议得以顺利通过，但是它不大可能为未参加会议的反对派所接受，反对派对会议是否有权约束国际提出质疑。瑞士的那些反对马克思的集团立刻召开了自己的代表大会，否认伦敦决议，并且向国际各总支部发出通告，敦促它们要求尽早召开一次正式的代表大会。显然，到真正举行这样的代表大会时，无政府主义者和工联主义者为一方，中央集权论者和政治行动主义者为另一方，必然会发生殊死的斗争。

这场等候已久的斗争终于在 1872 年海牙代表大会上发生了，这是第一国际全盛时期最后一次真正的集会。至少在纸面上，这确实是第一国际历次代表大会中代表性最广泛的一次大会。就曾经在运动中发挥过巨大作用的国家来说，只有意大利人没有参加大会。如前所述，他们拒绝出席大会。另一方面，西班牙人派来 5 名代表，比利时人 9 名，瑞士人 4 名（代表敌对双方的集团）。英国总支部委员会及其有关机构派来 7 名比较默默无闻的代表。德国代表总共有 10 名，这是他们第一次派出人数较多的代表团。荷兰 199 人第一次与会，派来 4 名代表，丹麦代表 1 名。以马克思的朋友弗·阿·左尔格为首的 3 名代表自称代表美国，其实他们都是欧洲移民。匈牙利和波希米亚支部各有 1 名代表与会。从法国来了 3 名用假名的代表，这是一个可疑的集团，其中至少有一人是奸细。

也还有一些法国流亡者以总委员会的代表身份参加大会，他们是马克思的女婿沙尔·龙格、布朗基主义者爱德华·瓦扬、列奥·弗兰克尔以及一些从巴黎公社逃出来的人。最后，来自总委员会的还有马克思的一批老同事：格奥尔格·埃卡留斯、埃蒂耶纳·杜邦、弗里德里希·列斯纳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后两人都是第一次参加正式代表大会，虽然马克思曾经参加过成立大会。但是在老“信徒”的队伍中有一个空白。伦敦的瑞士钟表工人海尔曼·荣克拒绝参加大会，他以前曾作为马克思的坚决盟友主持过多次会议。

实际上，在那批资格较老的人中间已经出现了裂痕。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法笼络代表大会的策略，他们对瑞士顽抗分子所进行的报复性攻击，也许最重要的是，马克思对背弃国际的英国工会主义者所进行的毫无节制的攻击，使荣克和埃卡留斯翻了脸。这两人不准备再追随马克思的领导了。他们不喜欢被拉进总委员会的布朗基主义者；他们不愿意看到马克思决心把包括巴枯宁本人在内的反对派领袖正式开除出去而使国际陷于分裂。马克思必然十分清楚这样一种作法会断送国际，肯定会使西班牙人、大部分比利时人以及绝大多数瑞士人离去。与此相反，德国人（几乎全都是力主采取议会行动的人）则很可能第一次被说服发挥真正的作用，但是那还会有什么人留下来同他们合作呢？因为不论在英国或法国都不存在真正的运动了。但是，马克思十分坚决，一心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宁可毁掉国际，而不愿甘冒风险，让国际落入反对者的手中。

200 海牙代表大会原打算处理若干重要的社会主义政策问题，这是各总支部在1869年的巴塞尔代表大会上提出来供进一步讨论的。但是真正到了讨论的时候，与会者已经无暇他顾，而只注意政治行动的鼓吹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激烈争执了。这是马克思

同巴枯宁的争执,这一争执胜负不分,简直无法讨论其他问题。到了表决的时候,多数票显然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和工联主义者而赞成政治行动。看一看在主要问题上多数票和少数票的构成情况是颇有意思的。不能认为以下数字是十分精确的。因为有几个代表团意见不一致,而且也不是每个代表都投了票。

	多数票	少数票
德国	10	—
英国	—	5
法国	6	1
比利时	—	7
瑞士	2	2
西班牙	1*	4
匈牙利	1	—
波希米亚	1	—
荷兰	—	4
丹麦	1	—
美国	2	1
总委员会	16	5
	40	29

* 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

从上面可以看出,由马克思的信从者和布朗基主义者所组成的总委员会和团结一致的德国集团是构成多数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比利时人和持异议的英国人则是少数派的主要成分。瑞士代表有投赞成票的也有投反对票的。荷兰和西班牙站在持异议者一边投了票,当然如果意大利人派来代表也会这样投票。在多数方面,波希米亚人、匈牙利人、丹麦人以及美国的代表(只能从广义上来说是美国的代表)都根本不代表任何运动,或几乎不代表任何

运动；法国的运动是分裂的，不可能有真正的代表。总的说来，结果基本上是，德国人（包括德国的流亡者）加上法国的布朗基主义者在票数上压倒了其余的人。

201 开始时，海牙代表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加强总委员会的权力的决议，这实际上也就是威胁要把任何反对总委员会政治方针的集团驱逐出去。于是便产生了总委员会将来设在何处的的问题，过去它一直以伦敦为会址。大会以非常微弱的多数决定，不应再以伦敦为中心，因此恩格斯建议把总委员会会址迁往纽约。这一惊人的建议完全出乎大多数与会代表的意料，使代表们瞠目结舌：多数人陷于分裂，少数人进退两难。如果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们不再希望国际总委员会留在伦敦，它究竟应该迁到哪里去呢？瑞士人、比利时人和荷兰人不会赞成总委员会迁入他们的国家，因为他们反对任何握有代表大会所赋予的那种权力的总委员会存在。西班牙人采取同样态度，而德国的法律则不允许一个国际组织在德国国土上活动。法国显然根本不容考虑，但是布朗基主义者激烈反对把他们心目中的革命中央机构迁出欧洲。最后，30名代表赞成迁往纽约，14名代表赞成留在伦敦，尽管伦敦总委员会不愿意继续留在那里；赞成迁往布鲁塞尔和巴塞罗那的各有1名；另有13名代表弃权。

人们有时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确相信国际能在美国找到进行活动的新基础，能在美国一直存在下去，直到时机成熟，重新在欧洲出现。在国际的历次代表大会上，一再有人就美国劳工运动的发展作满怀希望的发言，总委员会同美国的一些劳工领袖也有一些交往。有一个美国人——芝加哥《工人拥护者》编辑、八小时工作日同盟和全国劳工联盟的主要成员安德鲁·卡尔·凯麦隆（1834—1890年）参加了1869年的巴塞尔代表大会；有3个美国代表参加了海牙代表大会，其中2人是法国流亡者，1人是德国移

民。但是国际在美国始终没有真正的立足点，而且这个欧洲的弃儿也极不可能取得这样的立足点。弗·阿·左尔格（1827—1906年）对于前途不抱幻想，他是应马克思的紧急要求从美国到海牙来的德国移民，并且在马克思的强求下接受了总书记这个吃力不讨好的职务。毫无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希望把总委员会迁往纽约，倒不是为了它在那里可能起任何作用，而是为了防止它落入一些人的手里，如果留在伦敦就必然会落到这些人的手里。为此，原巴黎公社的委员们大为恼怒，他们本以为，既然英国工会主义者已经离去，无政府主义者又被赶走，他们现在可以控制国际了。 202

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无权结束国际，尽管他们能够使他们的对手无法取得继承的合法名义。少数派在海牙代表大会的表决中被压倒以后，便着手在他们始终主张的完全分权的基础上重建国际。在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立即在苏黎世召开了一个代表大会，根据巴枯宁的提议，决定新建一个他们自己的秘密国际。在这次会议以后，按照意大利人的倡议，他们又在圣伊米尔举行了一次公开的代表大会，把国际重建为各国自治的总支部的自由联合组织。圣伊米尔代表大会不承认海牙代表大会作出的决定，不承认它是国际的一次合法的会议，并且宣称自己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前几次代表大会的真正继承者。事实上，圣伊米尔代表大会只代表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汝拉地区的瑞士人，还有少数法国流亡者。

但是，这些集团很快便同比利时人和荷兰人建立了联系，他们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原是少数派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圣伊米尔代表大会以后，主要在瑞士人、比利时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以及若干法国流亡集团的支持下，又举行了几次代表大会。在1874年以前举行的头几次代表大会，仍然得到英国总支部委员会的一部分人的支持，英国总支部委员会在海牙代表大会以后便分裂成为两个

无足轻重的对立组织。1873年，同在日内瓦举行了两次对立的国际代表大会；纽约国际总委员会召集的代表大会纯粹成了滑稽剧。总委员会无法筹措足够的经费派遣任何代表横渡大西洋，于是组织工作便落到了日内瓦的倒楣的约·菲·贝克尔身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清了代表大会必然要失败，不但拒绝亲自参加，而且劝阻他们的支持者也不要去参加，因而伦敦根本没有派人参加代表大会。会上没有比利时、西班牙或意大利的代表，事实上，除了贝克尔能够拼凑的瑞士人、寄寓瑞士的德国人以及一个名叫海因里希·奥伯温德的光杆奥地利人以外，根本没有别的代表。贝克尔和奥伯温德两人为来自瑞士的德语地区、德国和奥地利的所谓国际支部的大约20名代表制造了全权证书；他们就利用这个多数去压倒讲法语的日内瓦人，这些日内瓦人原希望把国际总部从纽约迁往日内瓦，同脱离分子举行谈判，以期把四分五裂的派系重新团结起来。此后，除了在美国以外，就再也没有听说马克思的国际了。在美国，在激烈的内部争执之下，国际拖延了几年。左尔格于1874年辞职；两三年后，第一国际终于结束了。

在此期间，敌对的国际也在逐渐没落。从一开始，它就根本不是纯无政府主义的。英国代表在没有退出这个国际的时候就力主采取政治行动，一些比利时人和少数其他国家的代表也是这样。从原则上来说，各个集团之所以能够团结在一起，是由于它们共同坚持每个国家的总支部有权执行它认为最好的政策，而不受总委员会的控制，甚至也不受代表大会票决的控制。这个国际没有设总委员会，只有一个联络局，即使是那些在相继举行的几次代表大会上经过辩论而由多数代表投票通过的决议也没有约束力。就实际情况来说，新国际不过代表一些不同的趋向。西班牙人和大多数意大利人纯粹是暴乱主义者。西班牙人总算还代表一个从事实际革命斗争的相当强大的群众运动，而意大利代表中则有西西里和意

大利南部农民起义的鼓动者，也有北部某些城市的集团的成员，这些集团更关心的是组织工会，而且有迹象说明它们即将改弦更张，认为非暴力的政治行动可能具有价值。瑞士代表团是由汝拉总支 204 部的当地无政府主义者和来自许多国家——特别是法国、意大利、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流亡者混合组成的。这些流亡者除了德国人以外，多数是大致同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站在一边的狂热的革命者；而瑞士当地的领袖则是革命性差得多的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者——是社联主义者而不是暴动主义者，他们常常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的激烈态度感到很不安。比利时与荷兰的代表中也有无政府主义者，但是比利时人大部分倾向于追随西萨尔·德·巴普的领导，他介于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提倡政治行动的人之间，主张采取中间态度。法国人来自各个地区，意见也有分歧。布朗基主义者已经退出了两个国际，日益倾向于边诺阿·马隆宣传的所谓“整体主义”，这种理论所强调的无异是说，一切形式的活动在适当的环境中都是有益的，特别是政治行动，只要它不放弃革命目的，也是有益的。

在新国际相继举行的几次代表大会上，上述各种倾向的代表所进行的讨论，大体说来，已集中到一个看上去可能纯系口舌之争的问题上去，1873年和1874年举行的日内瓦和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尤其是这样。1869年在巴塞尔，第一国际曾就工人取得胜利后新社会秩序中公共事业的组织问题进行过认真的讨论，分裂以后，再度讨论了这个问题。在这场讨论中，西萨尔·德·巴普又一次成了主要的阐释者。代表们所面临的大问题实际上是：对于工业和其他显然不能在地方性小范围内安排的企业究竟应该怎么办？代表们一般都同意，绝大多数生产形式将由每个企业的实际生产者所组成的工人合作社接管，这些工人合作社将受到所在地区的地区公社的某种监督。代表们还一致同意，地区公社本身将

负责经营当地的公共事业，拥有土地，大概也将拥有主要的基本
205 设备，并且也将成为一切较大的行政管理机构所依靠的基础。有
些代表认为公社应由当地全体居民共同组成，只把有限的权力赋
予一个随时可以撤换的委员会或公务员组织。另一些代表则认为
公社本身是当地生产者协作社的联合组织，不过代表们都认为两
者并无重大区别，因为双方都期望每个工人或是通过直接立法和
公民投票，或是通过自由选举和罢免代表并向代表发出强制性指
示，在公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代表们还一致认为，为了实现那些因一个公社的地域太小而
无法实现的目标，公社有必要组成联社，并把有关事业交给选出的
联合代表去经营。在那些只需要少数毗邻的公社采取联合行动的
地方，这似乎是一件相当简单的事情，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
还发生究竟是代表有权约束公社，还是一切必须听命于公社的问
题。真正的麻烦来自那些显然需要对相当广大地区——大到涉及
甚至超过一国的整个疆域——进行统一管理的问题。在这个基础
上，事实上存在两个相互关连的问题。首先，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
都是强烈的反国家主义者，他们希望国界彻底消失，世界由根本不
考虑国界的、完全根据本身意志联合起来的自由地方公社来管理。
第二，无政府主义者担心：如果把一批主要企业交给一个单独的机
构去管理，听任它在辽阔的地区里活动，它岂不是要变成一个“国
家”吗？那就是说，变成一个对人民行使权力、否定自由的新权力
机构，而自由正是革命保证要实现的目标。为了回答这种反对意
见，有些代表——包括德·巴普——引证了德国人所谓的“人民国
家”的概念，这种国家不会象现存的国家，成为人民头上的权威，而
将是人民意志的直接产物。

然而，对“人民国家”这个概念也可以作不同的解释。一般说
206 来，德国人往往把它理解为一个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表达工人集

体意志的中央权威，而比利时人和法国人——在他们果真承认它的时候——则认为它是一个从地方公社得到应有的权力，并由地方公社组成的联合机构。无政府主义者当然强烈反对使用“国家”一词来说明这种机构，哪怕在“国家”之前冠有“人民”一词。他们坚持说，决不允许任何一种权力——即使是以联合形式出现的权力——残留到新社会。中间派反驳说，负责管理象铁路、主要公路和必要的通讯设备(如邮政和电报)的全国性事业机构必须授以真正的权力，不可能要求这种机构每作出了一项决定都需经过各个公社的批准，也不可能听任每个公社通过一定手续自由退出某项特殊事业。中间派指出必须有某种中央权威；他们看不出为什么要反对称这个机构为“国家”，只要明确地理解它是一种新型的国家，以地方公社的联合行动为基础，并由地方公社的代表所组成。但是这种中间态度既没有满足无政府主义者，也没有满足马克思主义者。对前者来说，任何形式的国家和权威都是敌人，而后者则希望有一个掌握专政权力，用以完成革命和摧毁一切形式的潜在反革命力量的工人国家。当然，这种中间态度也没有满足布朗基主义者，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同马克思主义者站在一边的。

德·巴普及其信从者(主要是比利时人)之所以退出第一国际，并在新国际中同无政府主义者携手，是由于他们反对马克思的如下方针：迫使整个国际承认有必要采取政治行动，并使国际接受一个对各国总支部拥有很大的中央权力的总委员会；同时也是由于他们不满意马克思对巴枯宁及其追随者所采取的策略。比利时对选举权所规定的限制使德·巴普及其信从者根本没有竞选获胜而进入议会的希望，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他们责无旁贷，必须大力提倡普选权和组织地方政府的自由，而不是背弃这种政治斗争。然而瓦龙族人和佛兰芒族人都不喜欢出现一个忽视他们的不同文化 207

用事业——比如运输——又迫使他们承认有必要建立中央机构以便在全国范围内管理这种企业。因此，他们倾向于支持一种联邦国家的概念，而反对中央集权的人民国家和无政府主义者所设想的完全自治的地方公社这两个对立的极端主张。这种局面促使德·巴普远比国际中的其他任何人更加仔细和实事求是地去考虑新社会的实际组织问题，但是他的现实主义并没有为他在本国以外赢得多少拥护者。他的现实主义使他不断受到指责，说什么他在敌对的宗派之间两面讨好；那些在某些方面最接近他的观点的瑞士人丝毫没有在同等程度上正视发达的工业制度带来的各种问题。

从 1872 年以后所发生的实际情况着眼，可以看出，尽管海牙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决议，就组成第一国际的成分来说，马克思同巴枯宁在这次大会上进行的大论战是在对巴枯宁大为有利而对马克思大为不利的情况下收场的。1872 年以后，除德国以外，马克思实际上简直没有任何拥护者；即使在德国，他的信从者也同拉萨尔派激烈斗争了好几年，拉萨尔派派遣代表参加了 1874 年的反专制主义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翌年，由于爱森纳赫派同拉萨尔派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合并，德国内部的斗争才大体上宣告结束，此后，主要在南德仅仅剩下了一个以约翰·莫斯特为首的小小的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派。但是在哥达进行合并的条件决不是马克思所喜欢的；再者，由于日内瓦人和一部分比利时人力图在松散的联合基础上重建国际，法国人实际上停止了活动，西班牙人和绝大多数意大利人抱着强烈的敌意，而英国人则不再感兴趣，因而马克思根本没有重建自己的运动的基础。与此同时，虽然无政府主义者和社联主义者有足够的力量使一个无所作为的国际多支撑了几年，
208 但是由于西班牙的革命力量已经解体，意大利大部分地区的造反冲动逐渐消失，无政府主义者同中间集团（两者曾联合起来反对马

克思)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国际的基础已经被摧毁了。到了 1877 年,当反专制主义的国际在比利时韦尔维埃举行最后一次代表大会时,它已经没有什么运动可以代表了;同年,为了建立一个范围广泛足以包括各种意见的统一的国际,在根特举行了社会主义者统一大会,但是这次大会并没有产生实际效果。1881 年,无政府主义者建立了自己的徒具虚名的国际,这次他们并没有把中间派拉进来,但是这个新国际同社会主义运动的日益壮大的主体没有关系。社会主义运动在德国人的影响下,已集中精力在一些国家建立社会民主党,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社会主义史上的一个新插曲正在开始,第一国际的时代肯定已经过去和结束了。

反专制主义的国际在 1872 年以后的几年间举行了几次代表大会,会上各个派别只要不就国家和政治行动问题展开辩论,就对两个互相关连的问题非常关注,这两个问题是国际工会组织和总罢工。特别是比利时人和西班牙人,还有一些法国人,往往回到原先的想法,把国际当作工人跨越国界的庞大联合组织,以便在组织和行业纠纷中进行互助,防止破坏罢工行为,并且通过工业联合行动贯彻象缩短工作日这样的改革。相继举行的几次代表大会讨论了国际工会组织的计划,这个国际性组织将建立在双重基础上,即某一地区各行业的地方联合会和某一工业所有工人的全国性和国际性联合会。在这些辩论中,已经有人提倡那种后来成为法国总工会特色的双重组织形式;偏重工会而不是行会作为争取经济权力的工具的倾向也明显地表现出来。除了比利时以外,这种计划暂时都不可能取得积极的成果。十分先进而足以对这些计划采取行动的其他国家只有英国和美国,但是英国并没有采取这种行动的要求,而美国又同欧洲的思想相距太远,接触太少,因而不得不走自己的道路。实际上,美国也是这样做的,首先有劳工骑士团,后来又有丹尼尔·法·里昂的反复努力,他企图主要在马克思主义

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劳工和政治运动^①。欧洲国际的策划者大部分是在荒芜不毛的土地上推行自己的计划的，但是他们后来做的事情却大大影响了法国和其他拉丁国家的工会运动的发展。

总罢工的主张显然同上述全面的劳工组织的规划有密切关系。如前所述，在第一国际的初期就曾讨论过以总罢工为手段，以预防或制止战争，并曾被马克思嘲笑为非非之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总罢工的主张又被提了出来，但主要不是作为结束战争的手段，而是作为社会革命本身所应采取的形式。许多无政府主义者设想，世界革命将以普遍停工，使资产阶级社会瘫痪，并清楚地显示出工人的力量开始。为了使总罢工收到成效，就需要有充满无产阶级友爱精神的、组织严密的工会运动。为此，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支持建立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工会组织计划。但是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认为资产阶级国家会单纯因为普遍停工而垮台。他们预料统治阶级会诉诸武力迫使罢工者复工；他们认为总罢工会导致内战和公开的革命。以边诺阿·马隆为首的“整体主义者”提出，如果在为“那样一天”作准备的时候，工人也利用所掌握的政治权力渗入资产阶级国家，从内部破坏它的防御，使反动派更难以利用国家机器来对付罢工者，那么总罢工和随之而发生的革命就大有成功的可能。无政府主义者反驳说，利用议会会腐蚀工人的革命意志，到时候工人的议会代表肯定会变成叛徒。

前几段讲到无政府主义者，看上去他们仿佛成了一个统一的集团，因为总的说来，在我们目前讨论的问题上，他们的确是这样。但是他们中间彼此也有矛盾，其中一个集团（包括埃里科·马拉特斯塔、许多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还有一些法国人和相当一部分俄国流亡者）大体说来，主张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彻底摧毁现存社会，对于预先拟定新社会制度的任何尝试都不感兴趣，

^① 参看本卷第 362 页及以下。

他们只是笼统地认为，新社会是“自由共产主义的”或“自由社会主义的”，侧重个人自由。按照这一派的说法，在旧秩序完全消灭之后，普通人民的自发的和不再受压抑的才智会轻而易举地确定新社会的形式。但是另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则不大强调个人自由，而主要强调小团体的集体自由，认为小团体会在向往团结和互助的自然天性的推动下采取行动。这派人以彼得·克鲁泡特金为首，后来叫作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这个宗派最初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在汝拉总支部所进行的讨论中出现的，在1878年国际无政府主义运动瓦解以前，汝拉总支部一直是这个运动的主要支持力量。1878年，瑞士的主要领袖詹姆斯·吉约姆退出活动，定居于巴黎，于是瑞士的运动就主要落在克鲁泡特金的手里。巴枯宁死于1876年，在1872年以后就没有进行积极的活动。

从上面可以看出，早在1880年以前，欧洲的动乱就已最后结束了，第一国际曾在其中起过作用。反专制主义的国际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都已寿终正寝，只有西班牙总支部虽然还支撑着，但已名存实亡。在根特，建立一个新的包罗各个流派的社会主义国际的尝试没有成功，这不仅是由于无政府主义者同主张采取政治行动的社会主义者之间鸿沟太大，无法填补，而且也是由于没有强烈的要求团结的愿望以驱使哪怕是比较志同道合的集团采取共同行动。国际思想的没落，主要是由于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运动几乎全遭破坏，在1871年以前，法国的运动在大陆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行动中始终居于中心地位。1871年以后，欧洲最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在德国，尽管它分裂成为两个敌对的派别。但是德国的运动对德国以外的舆论暂时几乎没有发生影响。不久以后，它的影响大增；事实上，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注定要为欧洲大部分地区提供新的社会主义组织的榜样。但是这种影响一直到1875年哥达

统一代表大会以后才具有重要意义，甚至可以说在当时就具有重要意义。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如同五十年代一样，小团体（主要是流亡者的团体）太多，它们忙于追究失败的原因而又彼此推卸责任，以致无法以任何新的形式重新团结。布朗基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革命派和温和派之间彼此指责，争吵不休。在领导人中间，瓦尔兰和其他一些人死难于巴黎公社；巴枯宁也去世了；马克思正在苦心孤诣地撰写《资本论》的后几卷，但由于健康情况日益恶化，在写作方面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德·巴普面对着比利时运动中尖锐的意见分歧；吉约姆对于看来毫无结果的争吵感到厌倦。第一国际各个最活跃的中心需要休息一下了，而且也正在休息——或是象法国和意大利那样被迫休息，或是自动休息。

第一国际没落的部分原因应该到经济形势中去寻求。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前几年高度发展的经济到处都出现急剧的衰退。物价长期下跌的趋势已经开始，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在许多历史悠久的国家，发生了严重的农业萧条，随之引起了工业衰退和失业。工会从六十年代后期到大约 1874 年一直采取攻势；可是现在却发现自己在一切还能存在的地方都退而采取守势。毫无疑问，从长远来说，这种形势同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很有关系，但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这种形势的直接结果是不利的。只有德国的形势才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发展，帝国在统一以后，经济正在高速发展，但是工人阶级的发展很快就遭到俾斯麦历次制定的反社会主义者法的打击，只是在统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对这些法律的反抗获得惊人的胜利时才重新抬头。

在我们开始讨论德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社会主义在欧洲的广泛复兴以前，有必要以一种比迄今所能采取的更加连贯的方式叙述一下这样一个人的思想：他几乎从卡尔·马

克思的手里夺过第一国际的控制权，并把它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用以表达俄国的虚无主义(或者接近虚无主义的东西)同南欧的暴动性无政府主义的混合体系。我在论述第一国际的各章中所采用的处理方法，未能允许以任何明确或全面的方式说明巴枯宁的基本社会哲学。这项工作需要专辟一章来进行，因为不管巴枯宁的著述和言论多么杂乱无章，它们确实代表一种可以明确说明的态度，实际上也代表一种可以理解的思想体系。

第九章

巴 枯 宁

米哈伊尔·巴枯宁是马克思在第一国际中的主要对头,他即使不能算是现代无政府主义的鼻祖,无论如何也算得上无政府主义第一次形成有组织的国际运动时的杰出领袖。关于巴枯宁的著作很多,但是读者寥寥。即使从 E·H·卡尔先生的长篇传记中,也简直不可能对于他的思想得出任何明确的概念;巴枯宁的著作几乎没有用英文出版的,在不懂俄文的人能够加以利用的所有现代版本中,很少见到他的著作。他的虔诚的崇拜者詹姆斯·吉约姆在本世纪头几年收集了他的许多散见各处的著作,在法国出版了一个选集,但是这个选集和马克斯·内特劳在 1895 年印行的巴枯宁选集的最初的版本很难找到。内特劳所著的巴枯宁的不朽传记从未问世,只有在几个大图书馆中才能找到它的影印本,而巴枯宁的主要书信集的唯一版本又是俄文的。

幸好,巴枯宁的思想并不那么深奥玄妙,可以相当容易地对照他的生活背景来叙述他的思想的大致轮廓。也幸好有卡尔先生的大作在,我无需再详细叙述他的生平事迹。主要事迹不象鸡毛蒜皮,毕竟比较简单,很快就能交代清楚。巴枯宁生于 1814 年,比马克思大 4 岁。他是一个具有温和的自由主义思想的俄国贵族地主的儿子,这种家庭出身注定要去当军人。他进了炮兵学校,由于玩忽学业而被开除,被调到一个普通团里,有一个时候随团在波兰服役。21 岁上,他以莫须有的“健康不佳”为由,蓄意使自己被开除军籍,全仗家庭的势力才逃脱了军纪处分。他已经爱上了哲学和多

少带有进步的色彩；他竭力要求到德国去，希望在那里专攻黑格尔哲学——当时在圣彼得堡的知识分子中，这是最时髦的东西。在莫斯科学习和居住了几年（在这几年，他同别林斯基有过以友谊开始以吵架告终的交往）以后，他终于在 1840 年从父亲那里拿到了出国深造的费用，前往柏林。在柏林，后来几年又在巴黎，他吸取了青年黑格尔派，特别是费尔巴哈的思想，也直接接触了法国的思想，特别是后来对他发生重大影响的蒲鲁东思想。他结识了马克思和蒲鲁东，他的狂暴的性格给马克思和蒲鲁东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参加了 1848 年和后来几年的运动，力图建立一个斯拉夫各族的协调一致的运动以反抗他们的压迫者——俄国人、奥地利人和德国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对于民族主义及其领袖渐渐产生了极度的不信任。他参加了 1849 年的德累斯顿暴动，被俘后经萨克森政府判处死刑，但是最后被引渡给奥地利人，奥地利人又把他引渡给俄国政府。在俄国，他在一个要塞里被监禁了 7 年；在监禁不到两年的时候，他写了著名的供沙皇亲览的供词，自从 1921 年发现和发表这份供词以来，人们常常引证来攻击他。巴枯宁在这份供词中彻底而如实地交代了自己作为一个革命者的所行所为，不过他拒绝吐露任何可能连累仍然处于沙皇政府控制之下的同事的活动。他以几乎是低声下气的语调否定自己的革命原则，同时对斯拉夫民族倍加推崇，而鄙薄德国人，他表示了对德国人的刻骨仇恨。这种“泛斯拉夫主义”同巴枯宁以前的态度倒是十分吻合，因为他在 1848 年曾力图鼓动斯拉夫人反抗奥匈帝国。他吁请沙皇领导泛斯拉夫解放运动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唯一新颖之处是他否定了自己革命历史中同俄国有关的部份。

这份供词使巴枯宁作为一个革命者的正直无欺受到多大的怀疑，将始终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那些由于其他原因而不喜欢他的人会借题发挥，大作文章；而那些对他有好感的人则会辩解说，

这不过是他多年以后自己承认的“一个大错误”，不必重视一个人在看来永无出头之日的单独监禁中所写出的东西，何况他至少没有说出任何连累别人的事情。我个人的看法接近第二种意见，我一点也没有把握如果我在类似的情况下会怎么办，特别是如果我相信我为之奋斗的事业已经失败，而我自己又再也没有为之效力的机会。我更不能责备象巴枯宁这样一个如此易于激动、如此喜欢自我解释的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必须写出一些东西来给人看，如果没有人看，则宁可给沙皇看。巴枯宁的行为显然没有英雄气概，但是我并不太喜欢英雄，英雄常常同狂热分子相似到危险的程度。我并不是为供词辩护，但是我也不想以此来苛责供词的作者，他后来的行为说明他的革命信仰是真诚的，不过就其表达和行动方式来说，同样也是易于误入歧途的。我估计巴枯宁对这件事毕生感到内疚，这同涅恰也夫之所以对他产生影响可能有些关系。

巴枯宁写这份供词并不是希望得到沙皇的赦免，而是希望改要塞监禁为西伯利亚流放，当时在俄国要塞监禁是一种非同寻常的长期徒刑。他没有达到目的，他的收获不过是偶尔可以接见家人。过了五六年，他的朋友才设法把他转移到西伯利亚，在西伯利亚他获准住在托木斯克，生活来源靠俄罗斯的家庭。在托木斯克，他爱上了当地一个商人的女儿，并同她结了婚；但是他决不愿意就此安顿下来，过一种无聊而闭塞不文的生活。幸好西伯利亚省长莫拉维俄夫是他母亲的表兄弟，他母亲竭力替他在省长面前求情。当莫拉维俄夫到托木斯克会见巴枯宁的时候，两人建立了友谊。有一个时候，巴枯宁毫无根据地把莫拉维俄夫设想成使斯拉夫人摆脱奥地利桎梏的命定的解放者，并且写信给赫尔岑推崇莫拉维俄夫的美德。而莫拉维俄夫则要求沙皇政府赦免巴枯宁，但是没有成功，在要求被驳回以后，莫拉维俄夫准许巴枯宁夫妇迁居西伯利亚首府伊尔库次克，那里的生活不那么单调，流放者的才能也有更

多的发挥机会。巴枯宁在一家得到莫拉维俄夫支持的新开设的商行中获得一个薪金颇丰的位置，并且准许他代表商行到西伯利亚各地广泛旅行。但是做买卖不合巴枯宁的胃口，他不久就不干了。不过由于他同省长的亲密关系，薪金还是照拿；当莫拉维俄夫1861年退休的时候，巴枯宁仍然很走运，因为新省长科萨科夫是他的弟弟保尔的女子的表兄弟。但是巴枯宁这时已决心逃走，因为他断定重返俄国欧洲部分的机会已不复存在。于是他借口出外经商（他答应科萨科夫他会回来），借足了逃走需用的盘川，依靠科萨科夫为他的所谓商务活动而发给的证件，设法到了日本，从日本坐船到了美国，从那里又横越大陆，渡过重洋到了欧洲。他在1861年年底到达伦敦，恢复了同亚历山大·赫尔岑和尼古拉斯·奥格辽夫的友谊，他在俄国就认识他们。1864年，在从事某种同煽动波兰暴乱有关的异想天开的冒险活动以后，巴枯宁决定在意大利定居下来，以那波利为主要活动中心，致力于组织一个主要以前那波利和西西里王国的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和备受压榨的农民为基础的革命运动。同时他着手建立他所谓的“国际兄弟会”，这是一个国际革命者的秘密团体，我们已经谈过，除了他日常交往的许多革命朋友以外，这个团体实际上并不存在。他的影响从那波利扩大到意大利中部和北部；当他在1867年离开意大利而定居于瑞士时，他已经留下了一个相当强大、尽管组织很混乱的运动。事实上，这个运动的分支已经延伸到法国的南部和西班牙的卡塔罗尼亚；通过他的朋友朱泽培·费拉里和沙尔·阿勒里尼的宣传活动，运动已开始在西西班牙其余地区取得立足点。

在这个阶段，巴枯宁已把主要注意力转移到新成立的和平与自由同盟身上，我们在以前的某一章中已经谈过，同盟组织了一次在瑞士举行的国际和平代表大会。巴枯宁曾经在伦敦同马克思讨论过自己的计划，也曾同作为国际工人协会代表的马克思进行过

接触。我们也介绍过国际工人协会如何在最初决定充分支持这个组织，随后又如何附加了一些条件，但是由于同盟的成份非常复杂，以致这些条件完全不能被它的大多数支持者所接受。巴枯宁及其在同盟中的朋友曾设法使同盟接受一个非常先进的社会纲领，其中包括废除财产继承权和从资本家的剥削下解放工人。在这个基础上，巴枯宁说，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没有理由不协调地一起工作；他又论证说，在任何其他基础上，争取和平都不会有任何结果，如果不解决“社会问题”，如果以剥削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国家继续存在，和平是决不可能实现的。巴枯宁及其盟友在1868年举行的和平与自由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于是便退出了同盟，并如我们所谈过的，组成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以后几年，马克思同巴枯宁的拥护者为争夺国际工人协会的控制权进行了斗争。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巴枯宁发起新建一个秘密的无政府主义国际；但是过了两年，在博洛尼亚起义失败以后，他退出了政治活动。他的健康日益恶化，个人生活潦倒不堪，死于1876年。

巴枯宁身材魁梧，膂力过人。1849年以后他所过的那几年铁窗生涯使他的牙齿全部脱落，并且大大损害了他的健康，但是他仍然能够勤奋地工作，虽然是热一阵冷一阵。不管他到哪里，他对所交往的人总是显示出火一般的活力，而且往往具有真正异乎寻常的魅力。很显然，他是一个非常难于回绝的人，即使他的要求并不容易满足。在其他方面他又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他常处穷困之乡——实际上，除了向朋友告贷以外，他分文不名。他是一个无所顾忌而又难于满足的借贷者，这倒不是由于他为一己的享受挥霍无度，而是由于他不知节俭，在使用借来的钱的时候也大手大脚，因而家庭经济拮据，常常捉襟见肘。他的钱一到手就花掉，要不然就救济别人，然后再去物色能借更多钱的新朋友，他简直从来不

还债，但是也从来不缺乏供给他钱花的新朋友。他大部分时间住在别人家里，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因为他既没有时间观念，也不懂得生活要有条理。他总是把住的房间搞得乱七八糟，往往白天睡大觉，晚上彻夜不眠，拼命写作，大量消耗浓咖啡和烟草。他给人大量写信，并且不断地动手写新著作，他写的东西开始时一般是小册子，后来则成了大部头著作，而且往往为了写某些新东西，而把原来写的离完篇甚远的著作搁置一旁。巴枯宁的大部分著作都没有完成；事实上，这些著作也没有理由能够完成，因为他写得越多，提出的新课题也越多，直到他感到厌倦，开始另写其他东西为止，而这些东西总是包含着大致相同的基本思想，只是布局多少不同而已。他答应为各种杂志写的一系列文章，情况也是这样：往往半途而废，这如果不是因为他对这些文章感到厌倦，就是因为他的注意力已经他移。巴枯宁实践了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原则倒是肯定无疑的事：他在晚年为了安定下来过比较正常的生活而作的一两次尝试，几乎还没有开始就失败了。他总是说生活的大原则就是自由。可以肯定，从来还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的这么一点点钱过这么自由的生活。

但是，这个最不知趣的人也显然是可爱的人，他在朋友中间深受爱戴，他们容忍了他所造成的极大的不愉快。他所具有的那种贵族气质使他完全不理睬阶级界限，他既愿意靠一头洋葱勉强过日子，也愿意在碰巧能够阔绰一下的时候尽情享受。他非常温和，几乎不会发脾气，但是也绝对不负责任。他也是一个无限忠诚的朋友，愿意为好友作任何事情，只有归还借款除外。如果他认为他的对头基本上属于他所热爱的革命这一“边”的，那么他在赞扬他们的时候也了无吝色。他十分大方地赞扬马克思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哪怕他们两人已经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哪怕马克思正在辱骂他，并且除了他真正有的过错以外，还给他加上了各种各样的罪

名。他称道涅恰也夫的优良品德，尽管涅恰也夫偷走了他的私人文件，并在尽量利用了这位老人的照顾以后弃之若敝屣。他确实做不出卑鄙或者恶毒的事情来，就如同他在钱财问题上没有一般资产阶级的诚实一样。

巴枯宁的社会理论以自由开始，几乎也以自由结束。同自由的要求对比，在他看来任何其他要求都根本不值得考虑。他无情地彻底地攻击一切他认为不符合自由的制度；他也同样攻击同“自由即至善”这个论点背道而驰的各种信仰。但是他根本不是个人主义者，他对资产阶级自由放任主义的鼓吹者所宣扬的各种自由极为鄙视。他是——或者说他自以为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他比任何人都更加强调私有财产以及人与人竞争的邪恶。当他论述社会的性质时，他始终强调社会环境对个人的巨大影响，也完全象杜尔克姆^①一样，重视人的善恶观念的社会起源和由来以及习惯对于人类行为的发展的巨大影响。诚然，他也坚决承认那些敢于反抗习惯和舆论的约束，从而成为社会革新者的人对人类所做出的贡献，因为他们的榜样提高了人对自由的想法。但是他并不愿意否认社会对个人的影响，他认为这种影响是一个自然事实。在这方面，他把社会和国家截然分开。他说社会对人说来是自然的，事实上，社会对人和对许多种动物都是一视同仁的，而且由于它是自然秩序的一部份，所以必须接受它。另一方面，他认为国家实质上是人为的工具，是某些人为了通过武力或神权的欺骗手段对他人行使权力而制造出来的。他猛烈攻击卢梭的社会契约概念，认为这既不是历史事实，又起了为人压迫人的暴政作辩护的作用。他说从历史上来看，社会契约的整个概念是荒谬的，因为这等于是说，人在社会发展的初期就有一种功利主义

^① 埃米尔·杜尔克姆(Émile Durkheim, 1858—1917年), 法国社会学家。——译注

唯理论的个人主义，而这种个人主义同国家最初组成时人的实际情况根本不相干。巴枯宁也同样反对隐隐存在一种契约的概念。他指责说这是专门为那些企图跃登王位当暴君的人作辩解而编造出来的。他说社会契约论的拥护者显然是错误的，因为他们认为在组成国家以前，人生活在绝对利己主义的任性的环境中，不受任何是非观念的限制。但是，事实上，人始终生活在社会中，在这些社会（同国家完全没有关系）里，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是非观念，姑不论这种是非观念是多么简单。他论证说，从本性来看，人并不象社会契约论者所塑造的那样，是纯利己主义者。人就象动物一样，本性中一开始就既有利己主义的冲动，也有社会的冲动；在文明人中存在的比较发达的是非观念是从人的原始冲动脱胎而来的，国家非但不是这种观念的创造者或推进者，而且是这种观念的最顽固的敌人和滥用者。巴枯宁说所谓“民主国家”简直就不比其他类型的国家好，在这种国家里，人压迫人的暴政更加明显，它只是起了工具的作用，通过这种工具，官僚和政客阶级代替了剥削压迫普通人的老式统治阶级。

巴枯宁一方面憎恨国家，认为它是暴政的独裁武器，另一方面也同样痛恨教会——实际上痛恨关于上帝的整个概念。在他所著《上帝与国家》以及许多其他著作中，他攻击了神性的概念，其激烈程度就象他攻击国家一样。在他看来，上帝的概念之所以讨厌，既是由于它同人类的自由不一致，因而完全不能接受，也是由于它同 221 平等的概念背道而驰，除非它实际上仅仅是一种奴役和卑贱上的平等。在巴枯宁看来，上帝同国家一样，是不自由和不平等的根本象征。因此，他在谈到上帝时的措词，在信徒看来，简直是亵渎神明，骇人听闻。但是虽然他用词激烈，他的论点倒是高度理性的。他认为上帝存在这个概念产生于思想混乱，对此他竭尽所能作了揭露，其方式同现代逻辑实证论者在面对类似的言语混乱时所用

方式颇有共同之处。巴枯宁说人由于不了解自然，于是便搬出上帝的概念来解释自然，更确切地说，人在取得知识以前，提出了一套足以欺骗人的、似乎言之成理的错误解释，就好象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在化学发展的早期搬出燃素的概念一样。

巴枯宁并不否认人具有宗教的冲动，在人类的历史发展中，这种冲动起了必要的作用。但是他憎恨教士和宗教的一切崇拜偶像，认为由于科学知识的进展，这是人类早应摆脱的东西。他对宗教的起源和发展的解释同孔德非常相象，认为宗教是人最初力图解释世界的一种体现，人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和活动的特性赋之于自然从而来解释周围世界的现象。巴枯宁认为随着知识的发展，这种解释不断在让位，因为人越来越认识自然秩序中的规律，更加能够用“说得通的”、因而能够被认为是自然法则的具体科学假说来解释自然界的运行。象孔德一样，巴枯宁认为人类相继经历过几个阶段，从拜物主义和多神论，发展到一神论，从而又发展到认为整个自然只有一个秩序的概念；他也象孔德一样，认为一神论又让位给形而上学的解释，在这种解释中，神不断进行干预的说法是没有地位的，接着形而上学则又让位给以仔细观察事实为基础的科学。

巴枯宁的这种态度有很大一部分最初是受费尔巴哈以及脱离
222 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唯物论者的影响。但是，他用孔德的对人类问题采用“实证的”方法的社会进化概念补充了费尔巴哈的关于人按照自己的映象创造上帝的概念。毫无疑问，巴枯宁从他同莱克留兄弟——埃利塞·莱克留和厄里·莱克留——的亲密友谊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兄弟俩都属于现代人文地理学和人类学的创始者之林，并且是巴枯宁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在政治上的亲密同事。同所有这些良师益友一样，他坚持认为应该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也受支配所有其他自然事物的法则的支配。但是

他从这种认为人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的概念中所得出的，并不是一种决定论结论，而是一种唯意志论结论。巴枯宁断言，人是自己的历史的创造者，人越是自由，就越能发现本身的存在和周围世界的真正规律；人无时不受生活条件的影响（其中经济条件的影响并非最少），但是人又在环境以及自己本性的限制范围内，作出使自然规律服从于自己的意志的安排。由此可见，巴枯宁同马克思大不相同，因为巴枯宁大力强调个人革新者在创造人类历史方面的作用，认为历史的进程不是预先决定的进程，而是人类把实际的发现应用于生活艺术的漫长序列。他推崇马克思对社会史所作的阐述，大体上也同意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在工人阶级的日益壮大的力量面前即将崩溃的论断。但是巴枯宁之所以认为工人阶级是战胜资产阶级社会的未来的胜利者，并不是因为历史必然性在起作用，而是由于他对工人阶级的创造性充满信心。此外，他认为这种创造性并不存在于作为一个本质单纯的集团或抽象整体的工人阶级之中，而存在于组成工人阶级的单独的个人之中；因此，凡是马克思强调必须进行集中控制和建立纪律严明的阶级组织的地方，巴枯宁总是相信个体工人和基层团体的自发行动，个体工人出于社会合作的自然本性在必要时会形成这种基层团体。

我已经谈过，巴枯宁对宗教深恶痛绝，尽管他承认宗教代表一个对宇宙持原始看法的阶段，而这个阶段又曾是人类无法避免，必须经过的。他认为在十九世纪信仰上帝不过是原始人的残余，只能解释为阴谋弄权的教士及其同盟者——专制主义国家处心积虑的骗局。他一再说，教会是国家的弟弟，是国家的统治者用来分担他们的这样一部分肮脏工作的：强使人们相信在一个由至高无上的权威统治着的世界上，他们无权反抗或享有自己的天赋自由。他大声疾呼，就本质来说，在一个由上帝主宰的世界上，人类根本没有享有自由的余地。如果服从上帝是人的责任，那么人就不再是

自己的主人，也就无法防御国王和教士的孪生的专制统治，他们以上帝的名义命令人去做合乎他们的心意的事。如果宇宙为上帝所主宰，那么社会由一个自称所行所为荣获上帝恩准的人间君主来统治看来也就成了自然的事了。此外，巴枯宁又说，如果在宇宙的秩序中，一切事物都自上而下地来自上帝的旨意，那么人类社会也自上而下地以类似方式构成，似乎也是自然的事了。其实，一切自由社会——全体人类都能享受自由的社会——必须自下而上地建立起来，一切权力必须来自社会应为之服务的个人的主动意志。

巴枯宁的“社联主义”概念便是从这里产生的，他往往在谈到社联主义的同时，也提出“反国家统治主义”和“反神权主义”的口号。在巴枯宁看来，这是一个“人与国家对立”的问题，但是他所指的人并不是象赫伯特·斯宾塞所认为的同社会形成对照的个人，而是社会中的人——自由表达同他人自由合作的天赋社会性和意志的人。巴枯宁论证说，在人们毗邻而居、共同生活的小团体里，这种合作是自然的，必须使每一种具有合法形式的大社会组织都稳固地建立在这些自然的小团体的基础之上。巴枯宁所谓的“社联主义”就是这个意思；他认为如果基础稳定，人就能妥善地联合成更大的统一体，直到包括全人类的庞大的联合体；反过来，如果把国家当作社会组织的基础，那么它的违反自然的集中和专制主义倾向势必会把人类分裂成为争执不休的权力集团，其结果就会同样不可避免地发生战争。

224 我们已经谈过，关于社会组织的这种“社联主义”观通常是从地方公社——集体行动的基本单位出发的，并且在各公社为共同目的而组成的联合体的基础上建立更大的结构，但其组成方式应该使最终权力始终掌握在公社手里，而不是掌握在公社头上的任何独立权威手里。在叙述第一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就公共事业的组织问题进行辩论的情况时，我们已经看到，任何地方，只要经济发

展超过了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阶段,就必然会产生某些难题。特别是在先进的工业社会中,象“谁来管理铁路?”这样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个体公社显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种必须把每一项决定交由个体公社审议的公社联合体,或是那种听任地方公社可以任意退出的公社联合体,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在一个新的自由社会中,由铁路工人组成合作团体来接管铁路的经营管理工作。但是这种解决办法必须首先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有一种超越公社界限的、有权对广大地区作出决定的工人组织形式;第二,铁路工人完全独立于任何为共同利益而设立的控制机构之外,或者是在一个划定的广大地区内组织一个握有控制权的控制机构。当然,彻底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可以回答说,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问题,因为在自由社会中,不再有任何利益冲突,或者说没有成立控制机构的任何需要,因而能够稳妥地让铁路工人去管理铁路为社会大众服务。但是,就连这种解决办法也需要铁路工人成立一种工团主义的组织,在这个组织中,能够在高于地方一级的水平上作出决定,而不必事事都交每个由铁路工人组成的地方团体去审议。当然,实际上社联主义者并不否认,地方公社必须赋予它们所建立的联合机构一些权力,不过他们拒绝称它为权力,而且坚持必须把这种权力限制在实际行得通的最小范围内。社联主义者究竟怎样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常常加以考虑的社会经济结构。一个社会在经济上越是不发达,社联主义者 225 就越倾向于坚持地方公社的绝对性——那就是说,坚持地方公社有完全的自由,可以最后决定是否同毗邻的公社在经营和控制共同事业方面进行合作。

巴枯宁是俄国人,在不考虑俄国的时候,主要考虑意大利,特别是意大利南部,属于最极端的社联主义集团——即最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他的朋友亚历山大·赫尔岑始终设想,社会主义

将要作为农民革命的成果而不是工业无产阶级运动的结果在俄国出现，这种农民革命可以建立在俄国农村经济结构“米尔”——村社的原始共产主义因素之上。体现俄国早期社会主义的村社相当于西方思想中的公社。虽然巴枯宁象赫尔岑一样熟悉西方的思想，并且曾在西方城市中居住过，但是他的思想出于本能却始终围绕着比较原始的社会活动。他在意大利南部的时候，就感到比在西欧任何其他地方自在得多；他在监狱和西伯利亚度过了很长时期，后来他主要是在那波利，重新整理了关于社会行动的思想。甚至他移居经济上发达得多的瑞士，仍然觉得自己是处于一个地方性很强、仅仅从事手工业和家庭工业、很少大规模就业的社会里。当时他继续从高度闭塞的公社的角度，同时本能地从农民或农业劳动者，而不是从工厂工人、矿工或铁路工人的角度来考虑社会的改组问题。因此，统一协调地方公社的活动以及在大地区内兴办一些企业的问题，在他看来都不过是次要问题，只要在自由公社的基础上正确地建立好基本社会结构，上述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与此相反，象德·巴普这样的思想家，对于把这种政策应用于大规模生产和商业组织已经生根的社会所遇到的实际困难则要明确得多，虽然他同巴枯宁一样反对极权主义国家，相信必须使公社成为社会行动的基本机构。

226 社联主义者在不得不面对这种问题时，有时候就依靠“直接立法”的解决办法，那就是说，他们认为，可以用较大地区的普通公民投票所作出的决定来限制公社的独立，但是不得用其他方法。他们反对这样的看法：由若干公社的代表组成的机构可以约束他们所代表的公社，但是他们同意代表有权把问题提交人民公决，人民也有权以多数票作出具有约束力的决定。但是，有一些社联主义者——其中包括巴枯宁——不同意这一点。在他们看来，这种理论不啻是从后门重新引进专制主义原则。他们在拿破仑第三统治

下的亲身经历使他们特别怀疑公民投票；他们坚持不仅任何未经选民明确同意的代表无权约束选民，而且任何选民大会或机构也无权违反少数人的意志去约束少数人。如果把这一原则推向极端，那就会阻碍甚至是地方公社通过多数票作出任何具有约束力的决定；但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并没有让步，因为他们认为，在一个阶级对立已经消灭的地区团体里，总能在有关的人中间达成自觉自愿的协议，而且达成协议的人数足以使强制少数人接受多数人的意见成为不必要。为了理解这种态度，必须认识到大部分极端无政府主义者远远不是个人主义者，他们坚信人的社会本性，坚信那种使人得以在社会平等的“自然”条件下在地方社会中共同生活的团结纽带。个人主义牌号的无政府主义虽然在欧洲有代表人物，譬如马克斯·施蒂纳，但是除了在美国以外，始终没有强大的力量，在美国，这种无政府主义是在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欧洲无政府主义者（我们以后将论述他们的运动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特殊发展）大多数是社会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不遗余力地强调强制性组织是有害的和不必要的，因为人的基本社会本性使他能够而且有权摆脱这种组织。毫无疑问，这正是巴枯宁的观点，也是克鲁泡特金的观点，为了表明立场，克鲁泡特金还首先使用了“无政府主义共产 227 主义者”这个名词；同时这也是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南部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的创始人的观点。

具有这种社会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思想家，对于在地方公社（自由人的必要民主机构）和生产者联合组织这两者之中应以何者为重的问题，存在很大分歧，他们几乎都认为生产者联合组织是在自由社会中经营经济事业的必要手段。他们越是从工业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就越是强调生产者联合组织的作用，而越是从农民的农业团体来考虑问题，就越是强调公社。事实上，他们往往把公社本身

就看作是一种利用土地来谋取公共福利的生产者联合组织。因此，在一个极端，在象里昂这样的大城市，公社就被目为地方生产者组织的联合体，而在另一个极端，一切重点则又都放在公社上，认为公社是一个集中当地全体公民，通过震教徒所谓的“集会感”来作出决定的统一体。

如果说巴枯宁曾经考虑过在大规模运输和生产的条件下组织“自由”社会是存在困难的话，那么他已经用颠扑不破的自由原则的名义把这些困难一扫而空。事实上，他很少关心对未来的社会结构进行探索；他一心想的是清除过去和现在的朽木。但是他对科学知识的发展却寄以很大的希望，并不是那种“归朴返真”的鼓吹者。不过他认为当务之急主要是革命性的和破坏性的，毫不怀疑解放了的人民在站起来以后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巴枯宁始终坚信自由人和组成小团体——即今天所谓的“面对面的”团体——的自由人具有自发的和天赋的才能。他认为，在这样的团体中，问题倒不是实现无间的团结以采取共同的行动，而是防止团结紧密到妨碍个人主动性的地步。他认为正式的强制完全没有必要，因为集体的风俗习惯的影响十分强大。在他看来，这种团结不是经济环境的产物，而是人类和在动物王国中结群生活的物种所共有的一种自然倾向。他常常说，这种自然倾向是人的动物性的一部分，这种动物性是个人永远无法摆脱的，但能在某种程度上使之受自己所具有的人性支配——这种支配就是自由的成就。

巴枯宁在不痛骂上帝和国家为自由的孪生敌人的时候，的确是一个最和善的理想主义著作家——尽管他会对这个称号感到不快。他自认为是绝对的唯物主义者，坚持把人仅仅看作是一种物质存在，但是他又认为这种存在具有为自己及其同胞创造最高理想的能力。巴枯宁断言这些理想并不是固有的，固有的思想是绝对没有的。人不是上帝的造物，人的思想或理想不是外界灌输给

他的。用巴枯宁的一句口头禅来说，人是“创造者而不是造物”，是自己——不是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人而是作为社会的一分子——的思想和价值的创造者。在巴枯宁看来，道德的性质和理想的价值实质上是社会进化的产物，随着人在知识和文明方面的进步，人创造理想的能力也在增长。在这方面，他继承了十八世纪伟大的启蒙运动的传统，而根本不是彻底的非道德论者。至少在他的晚年，有时就有人误把他说成是持这种论调的人。

如果说巴枯宁蒙受这种非道德论的污名并不仅仅由于他的敌人在他脸上抹黑，主要还因为他同涅恰也夫有过一段为时不长的关系。有一个时候，涅恰也夫引起他产生的那种思想情绪，看来的确曾使他暂时丧失了正常的理智。除此以外，巴枯宁常常语多激愤；当然，他也准备支持用最激烈的革命手段去对待俄国政府，实际上去对待任何他认为显示“皮鞭和日耳曼蛮族”特性的政府。此外，巴枯宁非常严肃认真地看待黑格尔和圣西门的思想，特别是圣西门把历史划分为建设时代和破坏时代的思想。他认为自己生活 229 在一个破坏工作占首要地位的时代行将结束的时候。因此，他站在涅恰也夫一边，希望把他现存的社会组织和价值付之一炬。他希望破坏的不仅是这个社会的政治结构和经济设施，还有以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概念——势利、少数人专有的特权、不平等的婚姻制度以及许多其他东西——为基础的整个价值体系。但是，他并不是作为一个不受一切伦理价值约束的不道德的人而主张毁灭一切的；恰恰相反，他要求这样做是为了最高的“自然”道德，本着最高的理想主义精神。在他的大多数著作中，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虚无主义倾向，更不存在涅恰也夫欢呼的那种否定一切道德准则的极端形式的虚无主义倾向。巴枯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 1869 年他和涅恰也夫联合发表的一系列革命小册子，大概永远也不会搞清楚。看来大概的情况是，甚至连最激烈的著作——包

括著名的《革命问题》这本小册子——也有他的份。即使是这样，这些东西同他在这种不幸的关系前后所写的大多数其他著作仍然是不合拍的。最近似事实的看法是：由于涅恰也夫对巴枯宁的奉承，由于这个“伟大的”青年所编造的正在等待巴枯宁出来领导的俄国革命运动的故事，巴枯宁感到飘飘然了，以致赞成甚至写出一些违反自己全部哲学的篇章。《革命问答》有这样的话：真正的革命者“蔑视和憎恨目前各种形式和动机的社会道德。他认为一切促成革命胜利的东西都是道德的”……“他必须用对革命事业的酷爱去消灭亲戚、友谊、爱情、感恩，甚至还有荣誉等一切软绵绵的、使人丧失力量的情绪”。如果巴枯宁相信——毫无疑问他是相信的——道德是文明进化的产物，相信现代人在这方面远远走在野蛮人的前头，尽管现代人事事屈从于罪恶制度，那么他就不可能相信上面所引的那些话。毫无疑问，人可能相信互相矛盾的事物，
230 但是很难达到这样的程度，除非此人偶尔在某种不可抗拒的强有力的影响下精神失常。涅恰也夫有一个时候的确对巴枯宁具有这种影响，尽管为时不长。不幸的是，这种影响起作用的时候正好是巴枯宁在第一国际同马克思展开竞争的紧要关头，因而马克思不禁认为巴枯宁既是工人阶级事业的敌人，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者。

当然，即使完全抛开涅恰也夫的非道德论不谈，马克思同巴枯宁争论的问题仍然很多。巴枯宁的关于自由社会的思想就同马克思的组织概念针锋相对，互不相容。前者认为自由社会应以人类的基本社会团结为基础，从小单位自下而上地建立起来，直到大规模的联合组织；而后者则认为应以按照经济划分出来的阶级为基础，在明确理解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先锋队的领导下组织起来。马克思着眼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从分别代表资本家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高度集中的两大力量之间的矛盾这个角度

来看未来的斗争，同时把一切同这种分析不符的集团都看作是代表日趋衰亡或腐朽的社会形式。另一方面，巴枯宁则认为革命主要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不断的斗争，革命的势头主要来自被蹂躏者集团，不管他们处在什么地方，也不管他们同生活资料的经济关系如何。对马克思来说，当代阶级斗争的重要方面是产业工人——特别是那些受先进的大规模资本主义的条件支配的产业工人——的日益提高的觉悟和组织。与此相反，巴枯宁则主要从社会上最受压迫和最受蹂躏的集团（例如比较落后地区的农民以及象那波利那样的现代工业几乎没有生根的城市的流氓无产阶级）的反抗本能来考虑革命。

此外，马克思就其本质来说是一个属于比较先进的文化传统的理性主义者，对野蛮人——即使当他们站在革命这一边的时候——抱根深蒂固的轻视态度。马克思认为革命不仅主要涉及到破坏现存秩序，而且涉及到建立取代现存秩序的比较先进的社会秩序；在他看来，如果认为这种新秩序能够靠落后的集团来建立，那是异想天开。他非常蔑视农民和斯拉夫蛮族；他认为，即使是先进国家中的农民也不具备革命建设所需的创造力，他们只能紧跟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由无产阶级通过集体主义把他们改造成为现代人。由此可见，马克思不相信起源于经济落后的国家的革命具有创造性。他指望西方起来领路，而东欧和南欧的落后国家充其量只能追随比较先进的国家。与此相反，在巴枯宁看来，革命的冲动——争取自由的意志——是人类的天赋品质，在农民中间，或是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城市流氓无产阶级中间，就象在英国、法国或西德成熟的产业工人中间一样，也可能发现这种品质，事实上，可能性甚至更大，因为产业工人集团更多地接受了以承认国家真正表达民族良知为前提的假民主概念。

巴枯宁在跟和平与自由同盟决裂以前，曾说服同盟中央委员

会通过一个旨在保证同盟奉行先进社会政策的纲领。这个纲领被提交 1868 年在伯尔尼举行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纲领一开头就断言要把社会问题的三个方面，即宗教、政治和经济截然分开是不可能的，然后纲领提出了以下三项主张：

1 为了使教会不再妨碍社会的自由发展，应该从政治机构和公共教育中取消纯属个人信仰问题的宗教；

2 欧洲合众国的组织只能以人民机构为基础，以联邦为纽带，以个人权利的平等以及公社和地方管理各自事务的自治为原则；

232

3 如果我们的目的在于实现财富、劳动、休息时间、教育的平均分配——工人参政和消灭无产阶级的必要条件，现行的经济制度就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

上面的第三条是巴枯宁本人拟定和提出的。这个宣言的结束语说：“同盟反对以任何类型的专制权力进行社会改革的一切尝试。”

在拥护和平与自由同盟的中产阶级拒绝这些建议，巴枯宁及其友人退出同盟而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以后，巴枯宁主义纲领便以更激烈的措词重新被提了出来。民主同盟的纲领开宗明义说，“同盟宣布它是无神论者，主张废除膜拜，以科学代替宗教信仰，以人类的正义代替神的制裁。”纲领接着宣称“以废除继承权为起点，实现各阶级和个人不分男女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平等，旨在使人人的享受同其生产相等，旨在按照最近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工人代表大会的决定，使土地、生产资料以及其他一切资本都成为整个社会的集体财产，从而完全由工人支配，即完全由农业和工业合作社支配。”民主同盟的纲领接着又宣布赞成“发展手段的平等——即在各个水平的科学、工业和艺术上”，全体男女儿童“在抚养、教育和辅导方面一律平等”。宣言断言，这种平等在开始阶段

只是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平等，通过消灭错误和不公正的社会组织所造成的人为不平等，会使个人享有更大的天赋平等。

作为第四项主张，民主同盟表示反对除共和主义制度以外的一切政治制度，并且反对一切政治行动，只有“当前直接以工人反对资本的事业的胜利为目的”的行动除外。第五，纲领接着宣称“一切现存的政治和专制主义国家将逐渐降低到只具有管理公共事业的职能，并将随着农业和工业的自由协作社的全球联盟成立而消亡。”纲领说，这种“全球联盟”应该由一切地方协作社“自由组成”；又说，“只有在所有国家工人国际大团结的基础上，社会问题才能得到真正和明确的解决。”“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反对一切以所谓爱国主义和国与国之间的敌对为基础的政治活动”。233

从思想上来说，上面两项宣言之间有明显的连贯性，尽管后一宣言是在巴枯宁集团同和平与自由同盟的大多数最后决裂以后发表的，更具有挑战性，而且由于远比过去强调工人阶级的作用而值得注意。但是后一宣言同前者一样，并没有使马克思高兴。他认为把无神论放在最前面是拙劣的策略。对于使阶级“平等化”而不是取消阶级这一概念，对于把废除继承权当作经济措施放在第一位，而不是设法立刻直接彻底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马克思也只是报以鄙视。我们已经看到，巴枯宁在上述几个论点中的第一个论点上欣然作了让步，同意“废除”阶级以代替阶级的“平等化”，但是在继承权问题上却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且还在国际工人协会 1869 年的代表大会上在这个问题上击败了马克思。

但是，巴枯宁的拥护者象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也完全赞成集体所有制的原则，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之间的分歧在于对执行集体原则的机构的性质看法不一。巴枯宁主义者所设想的未来的欧洲合众国并不是一个各自拥有中央政府的国家的联邦，而是一个不分国界，由自由的地方公社组成的联合体，每个公社在管理自己的事

务方面仍充分享有独立性。另一方面，马克思则从这样一个角度考虑问题：工人阶级在每个国家夺取政权，然后由夺取政权后产生的民族工人国家组成联邦。从直接的角度来看，这是对待未来革命的两种思想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

234 在这两种思想中，一种过去和现在都符合现代社会的趋向，而另一种则反是。对相信决定论哲学的马克思来说，逆社会趋向而动显然是愚蠢的，因为他的全部学说都被解释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并且号召人们理解和顺应而不是抗拒这种趋势。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以人在控制自然环境方面的进步为依据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和物都聚集为越来越大的集体，使得小小的地方集团，比如公社，作为社会行动的基础已经越来越过时了。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变革的动力并不是这些以人（作为群居动物）的自然结合为基础的集团，而是本身就是经济和科学发展的产物的庞大经济阶级。马克思认为，巴枯宁的整个态度是极不科学的和浪漫主义的，同当代的现实完全脱节，是一个对实际塑造现代世界的力量极端无知的野蛮人的迷梦。

这种批评有些道理，但是并非全有道理。越是认为走向庞大和集中的趋势是科学知识的发展和应用的必然后果，下面这一点就越是重要：应该尽最大可能去扭转个人和小集团被庞大组织吞噬的趋势，这些组织对于普通男女来说都太庞大，以致无法理解，即使他们之中条件较好的人确能理解，也无法进行任何有效的控制。两个拿破仑的“独裁主义”就显示了这种危险，尽管拿破仑第三用来进行活动的力量同今天的物力相比显得很原始；在今天，凡是能够控制国家，又利用国家对人民灌输思想和采取更直接的强制手段的人就能利用这种物力。巴枯宁对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国家深表怀疑是正确的，即使这种国家是以人民民主代表的身份出现，或是以过去被剥削阶级的工具的姿态出现。他的“社联主义

的”解决方案的确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其中大部分意见他甚至始终没有打算回答。对任何一个一贯坚持自由不只是好东西而且是唯一的好东西的思想家来说,不仅在致力于设计一个完全以“自由”为基础的社会模型时,而且同样在力图使这样一个社会实现时,他都必然会发现自己是以卵击石,不断在抗拒纯粹的客观必然性,因为正如列宁某次中肯地指出的,革命是一个极端专政的过程,而那种完全依靠群众的自由主动性的缺乏领导的革命运动则必然要失败,即使在初期获得成功,也必然会半途而废。巴枯宁当然了解这一点,正是由于了解这一点,他才在 1869 年巴塞尔代表大会上支持扩大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权限的要求。他愿意承认当革命实际进入关键紧要关头,强有力的指导是必要的,但是他拒不承认在以后的革命建设阶段,或是为了打击反革命活动,还需要任何专制权力。虽然巴枯宁常常强调社会习惯势力对大多数人的影响,但是他似乎也认为革命的经验会神秘地使他们摆脱风俗习惯的束缚,并且把他们突然转变为新社会风尚的英勇的倡导人。事实上,这正是他坚持必须彻底摧毁旧社会结构为建设新社会结构作准备的部分理由。毫无疑问,他确实预料到,同革命领袖相比,大多数人将保持被动和缺乏创造性,革命的创造性工作会落在少数杰出人物身上。但是他也显然相信这些杰出人物能够引导追随他们的群众进入新的生活方式,而无需具备任何特别的权力或接受自己制定的任何共同纪律。在这方面他显然是错误的;但是他毕竟正确地看到,为了个人自由和集体自由,必须反对各种形式的“民主集中制”,因为这种制度往往会使普通人民再一次沦为独裁者或官僚的棋局中的小卒,不让他们真正过问政策的制订工作,或不承认他们有权至少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走自己的路而不受干扰。

巴枯宁说那些维护国家权益的政治理论家,即使根据他们的自我表现来看,也只是把“安全而决非自由”当作国家的厚礼送给

人民。这确是尖锐的意见。正如他所指出的，卢梭反复论述的社会契约论的传统说法认为，国家起源于个人企求安全的愿望，这种愿望诱使他们为达到这个目的而放弃他们的部分“天赋自由”。巴枯宁问道，放弃了部分自由的人又焉能保证享有其余的自由呢？卢梭本人在关于主权不可分割的论述中已经指出不可能有任何保证。仅仅用“人民”的主权来代替个人的或者寡头政治的主权，并不能改变其本质。某种安全，国家也许能够提供，而自由，则绝无可能提供。只要国家在和平或战争时期能够对安全提出无限制的要求，那么甚至连国家所提供的安全，也不是真正的安全。

上述意见同巴枯宁著作中的其他许多论点一样，接近于个人主义的说法，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这根本不是他的真意之所在。他坚持必须实行财产集体所有制，在这一点上他的无政府主义跟蒲鲁东派不同。在第一国际中，蒲鲁东派以个人有权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的名义反对集体所有制。巴枯宁认为，按照个人的劳动给予报酬并不比仍然以利己主义为基础的过渡社会形式强，他主张充分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巴枯宁对蒲鲁东的确推崇备至，认为蒲鲁东是无政府主义和社联主义的真正创始人。他说，蒲鲁东的学说“自然地导向社联主义”。但是巴枯宁不象蒲鲁东那样怀疑合作社中存在着官僚主义和政府权力的萌芽。在巴枯宁看来，农村社会及其集体使用土地的古老传统对人说来是“自然的”，就如蜂巢里的生活对蜜蜂是自然的一样，因而他认为合作企业而不是个人或家庭企业是人的自发的社会冲动的自然表现，所以也是好的。克鲁泡特金在写作《人与动物间的互助》和发展更明确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理论的时候，发现在巴枯宁身上可以据以发挥的东西很多，而应该抛弃的则比较少。

拉萨尔以后的德国社会主义 ——“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和“国家社会主义者”——文化斗争与反社会主义者法

1864年，当拉萨尔力图把德国劳工阶级纳入一个单一的广泛政治组织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刚刚开始执行时，他的事业便突然中断了。如前所述，他死于决斗，起因于一场可笑的恋爱纠纷，这同他的政治活动，同他为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所作的斗争都毫不相干。他所创始的运动完全是他个人的成就，如果在他死后运动随之瓦解，那也毫不足怪；更何况他处理问题的独断专行已经引起了争吵和叛离，如果运动在他死后彻底瓦解，那就更不足为奇了。要是在1864年他曾经十分巧妙地加以指导的那种工人阶级情绪另有出路的话，也许运动已经崩溃了。但是在他死的时候，并不存在其他出路。事实上，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1900年）曾在1862年回到德国，由于马克思的多方指示，对拉萨尔极为怀疑，对于德国工人阶级的政策也持有大不相同的看法；但是在1864年，李卜克内西还没有掌握有组织的拥护者。当时，奥古斯特·倍倍尔（1840—1913年）至少在萨克森已经有了拥护者，后来成了李卜克内西建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伙伴，他当时虽然年事尚轻，但是声名已经远远越出萨克森地区。倍倍尔同工人教育协会有关系，这些协会在1863年组成了一个联盟同拉萨尔的运动对抗，并基本上跟资产阶级的进步党派合作，同时支持舒尔采—德里奇的合作计划。工人教育协会不是社会主义者的协会，而是自由进步党

238 人的协会,倍倍尔本人在 1864 年才转变看法,信仰社会主义,甚至还没有使当地的工人教育协会支持社会主义。

拉萨尔指定了自己的继承者来领导全德工人联合会。他提出的人选是伯恩哈德·贝克尔(1826—1882 年);贝克尔原打算仿效拉萨尔的独断专行的做法,但是很快就发现他的同事不准备听任他采取他们曾容许拉萨尔采取的作风。贝克尔被撤销了领导职位,他立刻退出了组织,加入了对立的社会民主党阵营。哈兹费尔特伯爵夫人并没有使贝克尔的工作轻松一些,她以拉萨尔的保护人自居,企图使拉萨尔创立的运动保持他生前的局面。当发现联合会不愿意按她的指导行事时,她也带着一小批拥护者退了出去,并企图成立一个对立的联合会,但不久便无声无息了。拉萨尔派的主体在另两个领导候补者匆匆上台匆匆下台以后,接受了一个所能物色到的唯一真正能干的人约翰·巴普提斯特·冯·施韦泽(1833—1875 年)作为领袖。在拉萨尔的同意下,施韦泽是柏林《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创办人和第一任主编,这个杂志在 1864 年拉萨尔死前不久开始出版,曾打算罗致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合作人,并打算成为整个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机关刊物。然而马克思不久就同施韦泽断绝了关系,认为施韦泽是俾斯麦的秘密同盟者;于是《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施韦泽的私人刊物。全德工人联合会之所以在接受他为领袖时表示勉强原因有二:一则他的私生活声名狼藉,道德败坏,再则他出身贵族,信仰天主教。他受过耶稣会的培养,当初曾支持奥地利人反抗普鲁士的领导,但是后来改变了信仰,写了一本书《时代精神与基督教》(1861 年),旨在证明基督教不管是天主教还是新教形式,都同君主政体不可分割,都同时代的民主精神相违背。因此他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但是 1867 年,全德工人联合会终于接受他为主席,同年,他被选入北德意志

239 邦联议会,是在德国的议会中赢得席位的第一批社会主义者中的

一个。

从拉萨尔运动一开始,施韦泽就同拉萨尔一样,承认必须在普鲁士领导下实现德国的统一,因而同马克思及其在德国的信从者李卜克内西发生冲突。李卜克内西 1862 年回到德国,有志于大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针建立一个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威廉·李卜克内西在年轻时曾经参加 1848 年的德国革命,在监狱里度过一个时期以后逃往瑞士,由于有在瑞士领土上重新组织革命活动的嫌疑,又被瑞士人驱逐出境。后来他在伦敦定居下来,在那里同马克思过从甚密,尽力靠从事新闻工作为生。他应聘回到德国,在《北德总汇报》工作,报纸是由前左翼共和派奥古斯特·布拉斯新近创办的,是柏林民主舆论的喉舌。这家报纸允许李卜克内西在报上发表具有强烈的社会主义观点的文章,但是他不久就知道布拉斯是俾斯麦收买的人,自己是被用来攻击资产阶级的进步派,为普鲁士专制政体的利益服务的——那就是说,俾斯麦设法要在工人阶级的支持下建立某种“保守的社会主义”以反对宪法改革运动。于是李卜克内西辞去了职位,不久就加入了拉萨尔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尽管对联合会的倾向和理论有所疑虑。但是拉萨尔死后不久,他就相信联合会走的是与布拉斯的报纸相同的道路,因而攻击拉萨尔派进行有利于俾斯麦的活动。由于这种攻击,警方勒令他离开普鲁士。此后,他在萨克森政府允许有较多言论自由的莱比锡定居下来。在莱比锡,他开始同倍倍尔,又通过倍倍尔同德国工人教育协会联盟密切往来。我们已经谈过,这个联盟是 1863 年为对抗拉萨尔的运动而建立的。李卜克内西几乎一下子就使倍倍尔信仰了社会主义;他们在 1865 年共同说服萨克森的各个工人教育协会采纳了一个社会主义纲领。3 年以后,全联盟的年度代表大会转向社会主义, 240 而仍然拥护进步党的少数则退出联盟。但是与此相对照的是,一大批退出拉萨尔的联合会的人同联盟联合起来,于次年在爱森纳赫

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党。

可见,在拉萨尔死后的 10 年期间,为争夺对日益强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实际领导权,德国曾有过不断的斗争。迅速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统一对于启发产业工人的政治和经济觉悟都起了作用;但是在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政策这一问题上存在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要简单扼要地说明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曾经造成拉萨尔派同敌对的运动之间的那些分歧的性质,并非易事;在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的领导下,敌对的运动正在日益壮大起来。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分歧实际上是相当清楚的。拉萨尔及其继承者把攻击的矛头主要指向资产阶级。他们反对资产阶级所提出的成立以有限选举权为基础的立宪政府的要求;他们坚持必须授予成年男子选举权,希望通过成年男子选举权变国家为工具,把工人从资本家剥削下解放出来。关于地主,他们谈得比较少,而且不大重视农民的疾苦。他们也不打算同构成德意志各邦进步党派主要力量的小资产阶级合作。另一方面,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则认为,正确的政策应该是支持中间阶级比较进步的因素去反对专制统治和贵族制度,相信只有推翻专制统治和地主制度以后,工人才有获胜的希望。当然,后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也是他们两人在 1848 年宣布的、后来又在失败时期一直坚持不放的观点。但是,鉴于大部分资产阶级坚信自由放任主义学说,鉴于进步党派——特别是普鲁士的进步党派——极端懦弱,要实行这种政策并不是非常容易的事。无论如何,要遵照马克思的如下教导办事并不那么容易:工人应该使自
241 己完全独立于资产阶级政党之外,同时又支持它们的反对贵族和专制政府的斗争。

此外,还另有一个错综复杂的情况。如前所述,德国存在一种要求国家统一的普遍愿望,但是统一究竟应该采取什么形式以及什么是实现统一的最好方法,意见却不一致。一种想法是必

须在普鲁士的领导下实现统一；显然这同把奥地利并入统一的帝国的意见不相符合。另一种是实现更紧密的统一的主张，这就是1848年法兰克福议会的支持者一心想实现的那种统一，统一的基础是既为整个德国（不一定把奥地利排除在外），也为组成德国的各邦成立立宪责任政府。第一种想法的拥护者自然以普鲁士为最多，而反对者则在德国其他各邦；第二种主张吸引了持自由主义和进步意见的人，他们认为普鲁士的霸权有发展成为强大的穷兵黩武的专制帝国的危险，这样的帝国会对它的臣民和邻邦作威作福。1866年的普奥战争破坏了奥地利并入任何改组后的德意志政体的可能性；第二年，北德意志邦联成立，普鲁士国王出任总统，这使普鲁士的领导权在德国的大部分地区稳定下来，特别是由于胜利的普鲁士人同时又兼并了汉诺威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在普鲁士于1870年战胜法国之前，南德各邦是否并入尚难肯定；兼并阿尔萨斯—洛林以后，普鲁士便处于君临一切的地位，而在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帝国以后，这种地位立即得到了巩固。

我们已经说过，拉萨尔把成年男子选举权放在他的纲领的前列，并利用他的联合会向俾斯麦大力提出这个要求；与此同时，他又恳求俾斯麦为他成立生产合作社提供国家资金。成立生产合作社的目的在于同资本主义企业展开竞争，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取而代之。1867年，俾斯麦接受拉萨尔关于成年男子选举权的建议，并在选举北德意志邦联议会议员时实行，4年以后又扩大到统一的帝国各地。对于拉萨尔提出的由国家资助生产合作社的主张，俾斯麦敷衍了事，只是在微不足道的规模上给予资助。俾斯麦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改革普鲁士本身非常不民主的选举制，也没有在北德意志邦联或帝国成立任何形式的使各部——政府的行政部门——向议会负责的立宪政府。更有甚者，还使新的帝国议会这个立法机构从属于实际上受普鲁士政府控制的邦联议会。因此，实

行成年男子选举权并不意味着普选产生的帝国议会**有权控制国家机器**,即使大多数议员希望这样作也罢,何况大多数议员实际上并没有这种愿望。两派社会主义者都只能暂时希望在大城市赢得议员席位;就整个德国来说,农村人口仍然占大多数。成年男子选举权使得帝国议会**有可能出现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者**,而有效地行使这种权利,又需要有一定的成立政治组织和进行宣传活动的自由,因此成年男子选举权确实意味着真正的进步。但是新宪法是在肯定加强普鲁士专制政体对整个德国的控制的方式下作此让步的。此外,建立新帝国是同战胜法国和兼并阿尔萨斯—洛林联系在一起,因而普鲁士对整个德国的控制就更加强化了。对法战争是得人心的,兼并也是得人心的,任何人敢于对两件事中的任何一件表示反对就会丧失人心,别人就可以任意侮辱之而不受惩罚——由于俾斯麦狡猾地让拿破仑第三上了当,使他表面上成了侵略者,情况就更是这样。当巴黎公社紧接着法国的军事惨败而出现的时候,俾斯麦攻击任何反对者就更加容易了,他可以指责对方同情巴黎公社或第一国际,因为一般都说国际是巴黎公社的鼓舞者,而事实上国际确曾给予支援。

在 1870 年普法战争爆发以前,德国社会主义的两个派别一直进行着斗争而互有胜负。李卜克内西—倍倍尔派得到国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持,也得到受马克思影响的第一国际的鼓舞,因而
243 在以前接受进步党人政治领导的地方工人教育协会中不断取得发展,而且由于脱离全德工人联合会队伍的人纷纷来归,力量更加壮大,最后于 1869 年在爱森纳赫成立了社会民主党。不过,在 1867 年施韦泽担任主席以前一直失势的拉萨尔派这时也开始迅速振作起来,这主要是由于他们主张在普鲁士领导下实现统一和强调把成年男子选举权当作解放手段的做法,看来都同实际的事态发展密切吻合。1867 年,北德意志邦联实施成年男子选举权,这使人们

更加以为俾斯麦会支持工人反对资本家，施韦泽的当选又为拉萨尔派提出要求准备了便利条件。

接着普法战争爆发了，施韦泽及其信从者便按照德意志国家应由普鲁士领导的主张，支持俾斯麦反对拿破仑第三，并且投票赞成军事预算。另一方面，也在1867年选入北德意志邦联议会的李卜克内西则拒绝投票赞成军事预算，并且率先反对吞并阿尔萨斯—洛林。拿破仑第三被推翻以后，李卜克内西和他的“爱森纳赫”党立刻要求同法兰西共和国体面地媾和，因而在俾斯麦胜利时刻面临着因反对俾斯麦而带来的不得人心的局面。1872年，即巴黎公社以后德国实行高压政策时期，李卜克内西被控告犯有叛国罪，并被判处要塞监禁两年。

事情很快就明白，德国存在的两大敌对的社会主义党派严重地阻碍运动的发展。此外，俾斯麦在1871年以后就不再拉拢两派中的任何一派了。自从巴黎公社事件爆发以后，他一直激烈地指责一切形式的社会民主主义；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都受到了压制，于是便彼此靠拢了。此外，德国1871年在普鲁士领导下实现统一，这也消除了一个产生分歧的重大实际场合。情况很明显，为了同压制进行斗争，为了建立一个强大的参加竞选的政党，社会主义者必须联合起来。1871年，施韦泽受到了强烈而又不公正的怀疑，²⁴⁴被解除了拉萨尔派的领导职务，人们怀疑他是俾斯麦的坐探。于是全德国工人联合会失势了，虽然它仍然在人数上比“爱森纳赫”党占有优势。到了1874年，两派都准备谋求一个合并的基础，第二年在哥达统一代表大会上真正联合起来，成立了统一的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在党内人数原居劣势的爱森纳赫派从一开始就占上风。

李卜克内西事先未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商量，就同拉萨尔派开始了谈判；伦敦的流亡者在看到拟议中的合并条件（体现统一的党

的纲领草案的条件)时大为恼火。他们并不反对根据适当的条件合并,但是他们说,拉萨尔派已经江河日下,地位虚弱,如果爱森纳赫派态度坚决,本可以争取到好得多的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向他们在德国的朋友寄去了激烈批评拟议中的新纲领的意见;马克思在一个很长的文件中具体说明了自己的意见,并把文件寄交爱森纳赫派的领袖私下散发。李卜克内西读了这个文件,并同意少数准许阅读文件的人的意见,应该把文件压下不予公开。多年以后,恩格斯由于力图影响 1890 年废除反社会主义者法以后重新修订纲领的工作,发表了这个文件,在这以前,倍倍尔和其他据信容易受文件影响的人始终没有看到它。李卜克内西和那些同他一致行动的人提出的论点是,统一是必不可少的,为统一而进行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以至不可能重新讨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问题。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管是多么不愿意,都默许了扣压文件不予发表的作法,因为他们认识到,发表他们的见解并不能制止纲领的通过,充其量只能引起新的分裂。

马克思的札记,自恩格斯把它发表以来,叫作《哥达纲领批判》,它重新提出了使马克思和拉萨尔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分裂的全部主要分歧。马克思攻击了拉萨尔关于“铁的工资规律”和“享受劳动的全部所得的权利”的观点,也攻击了拉萨尔关于国家的性质和工人阶级政党对待这个问题的正确态度的观点,因为哥达纲领的用语包含了这些观点。马克思劈头就攻击纲领中的这样一句话:“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而因为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①马克思写道,“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也同样是源泉。此外,“既然有益的劳动

^① 本章引文除另有说明外,均见卡尔·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5—25 页。——译注

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劳动所得就应当属于社会,而单个的工人从中获得的仅仅是不必用来维持劳动‘条件’即维持社会的那一部分。”接着马克思攻击这样一句话:“在现代社会中,劳动资料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他说,这是对国际工人协会章程中的一句话的歪曲——所以说它是歪曲,是因为拉萨尔派只攻击了资本家而没有同时攻击地主。

纲领的下一句话提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集体调节总劳动并公平分配劳动所得”的手段。马克思问道,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既然“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包括非生产者在内,那么又把每个生产者必须得到他所生产的全部价值的权利置于何地呢。从总产品中,必须扣除一些东西,才可能得出可供消费的商品供应。从中应该扣除的是:(1)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所需的费用;(2)用来扩大将来生产的追加部分;(3)预防自然灾害造成的不幸事故和动乱的后备金或保险金。至于扣除多少“应当根据现有的资料 and 力量来确定,部分地应当根据概率论来确定,但是这些扣除根据公平原则无论如何是不能计算的。”但是,除此以外,还必须从里面扣除一些费用来充作公共管理费用和满足公共需要,比如学校、保健事业和其他公用事业等,同时还必须提供维持丧失劳动能力的非生产者的费用。因此,只有一部分“劳动所得”可以分配给生产者,但是在一个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要地位的共产主义性质的社会里,个体劳动者不再有自己的单独的产品。他只不过是社会的总劳动力的一部分。因此很明显,纲领草案必然说的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处于过渡阶段的共产主义性质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完全建成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种过渡经济中,个人所得到的不是他的劳动的全部产品,而是相当于他所贡献的劳动量的东西,从中扣除必要的费用,但是不会由于垄断者的榨取而进一步减少,垄断者的土

地和资本这时已被没收。因此，由于个人对于共同积累所贡献的劳动量不同，“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马克思说，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实际上，马克思的意思是说，随着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就会产生“平等权利”的说法是一派空想主义的胡言。这种“平等”只会出现“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只有“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只有到那时，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马克思的这段话——后来列宁在上面作了许多旁注和表示赞扬的批语——为现代共产主义理论解释资本主义刚被推翻后的那个社会阶段的生产者收入分配问题提供了主要基础。马克思接着说“人们重新强迫我们党接受那在过去曾有一些意思，但现在已变成陈辞滥调的见解作为教条是犯了多么大的罪恶啊”——“关于‘权利’的陈辞滥调以及民主主义者和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其他的谰言。”^①马克思说，“权利”实际上是文不对题，把重点放在分配上也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也就是说生产资料所有制。如果这些资料

^① 这句引文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页译文略有出入，第13页的译文为“这些人犯了多么大的罪，他们一方面企图把那些在某个时期曾经有一些意思，而现在已变成陈词滥调的见解作为教条重新强加于我们党，另一方面又打算用民主主义者和法国社会主义者所惯用的关于权利等等的空洞的废话，来歪曲那些花费了很大力量才灌输给党而现在已在党内扎了根的现实主义观点”。——译注

是私人所有，自然而然地就会应用资本主义的分配法则；如果资料为公共所有，自然就会应用一种不同的分配法则。因此谈论分配收入上的平等，而不是集中注意力去改变必然要决定分配的生产条件，是理论上的倒退。

马克思在整个这一段里是在彻底探究“科学”的社会主义“含义”。他说，社会主义是一种可以用科学来证明的制度，“平等”的概念同它毫不相干。他说，“平等”是一种法律概念，这种概念同在其中应用这种平等的社会制度有密切关系，因此属于“上层建筑”。平等概念的真正决定因素是生产关系的制度，因此社会主义者应该努力去改变这些关系，使它同历史力量的运动相协调，而不是设法根据同现行的生产制度不协调的法则去修改收入的分配。马克思的意思并不是说工人不应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进行斗争以争取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恰恰相反，他强调必须进行这种斗争。他所反对的是他所认为的这样一种幻想：在生产资料仍然为私人所有的时候，可以置决定工业产品分配的“法则”于不顾，使影响收入分配的法律上的改变生效。

马克思下面谈到哥达纲领草案中的另一句话，纲领断言“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情，对它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这句话的后一部分使马克思特别恼火。他断然否认，把资产阶级称为“反动”是恰当的。相反，在对封建贵族以及“力求保持过时的生产方式所创造的一切社会阵地的中间等级”进行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必须算作是革命的阶级。资产阶级只有同注定要代替它的无产阶级对比时才是反动的，绝对地说，或者同封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比，它都不是反动的。相对地说，小商人、手工业者和比较富裕的农民所形成的小资产阶级也只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才具有革命性——那就是说，仅仅是在毁灭的威胁下被迫同工人联合这一点上才是革命的。马克思向他的

德国弟子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难道在最近这次选举中有人向手工业者、小工业主等等以及农民宣布说：‘对我们说来，你们同资产者和封建主一起只组成反动的一帮’吗？”相反，他的意思是说，社会民主党人在选举中争取小资产阶级的支持以反对地主和大资本家是正确的。另一方面，拉萨尔派歪曲情况“是为了粉饰他〔拉萨尔〕同专制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这些敌人结成的反资产阶级联盟”。马克思说明自己的立场所用的方式并不是太明确的，但是他的意思是，无产阶级应当帮助资产阶级，不论是大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只要它同封建主义作斗争，而且应当争取小资产阶级选民，哪怕他们所主张的“民主”沾染着保卫陈旧的经济条件的愿望。马克思完全反对同封建阶级或专制政府联合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立宪主义者。

马克思提出的下一个问题同国际主义有关。他所反对的纲领草案中的一句话是：“工人阶级为了本身的解放，首先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同时意识到，它的为一切文明国度的工人所共有的那种意图必然导致的结果，将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马克思说，当然，为了能够进行斗争，工人就必须在国内组成为一个阶级，并且在自己的国家内进行斗争；但是这同斗争的“形式”而不是“内容”有关，因此要说他们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进行活动”是十分令人误解的——因为现代国家本身必须在国际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的范围内进行活动。资本主义是一种国际制度；俾斯麦作为一个政治家当然不是由于“在国家的范围内”进行活动才成名的。相反，他的伟大主要在于他的外交政策。此外，所谓“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除了是和平与自由同盟所宣扬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术语之外，还能是什么呢？社会主义者所应宣扬的国际兄弟团结是各国工人的国际兄弟团结，而不是分裂成为互相冲突的阶级的各国的国际兄弟团结。马克思又说，这种需

要并没有因为国际工人协会解体而不复存在，国际工人协会“只是”要为国际工人阶级活动“创立一个中央机关的第一个尝试”，而“在巴黎公社失败之后，已经不能再以它的第一个历史形态继续下去了”。马克思在这里是攻击拉萨尔派对于普法战争和吞并阿尔萨斯—洛林的民族主义态度。他感到难过的是合并的党正在放弃李卜克内西和其他领袖在 1870 年和 1871 年所坚决拥护的工人阶级国际主义。

接着便是一段马克思攻击拉萨尔关于“铁的工资规律”的说法的文章。马克思说，如果这条法则象拉萨尔所说的那样，取决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那么象哥达纲领那样说是要通过废除工资制度来废除这条法则又有什么意义呢？马克思根据自己的现已为人熟知的对有偿和无偿劳动时间所作的区别（丝毫不提马尔萨斯的理论），说明了自己的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支配劳动力价格的法则的概念；他还指责了他的德国信从者放弃他的分析，而采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的已被废弃的概念。

但是，所有上述各点同《哥达纲领批判》下一节比较起来，只不过是“小冲突”而已，在这一节里，马克思对拉萨尔的国家概念及其所主张的通过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以解放工人的建议进行了正面的攻击。纲领说，应“在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下依靠国家帮助”建立这种合作社。马克思说，如此说来，建立合作社的将是国家而不是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将通过国家的行动而产生。这一点怎么能同相信工人的解放是工人自己的任务的信仰碰得上头呢？此外，²⁵⁰ 在一个大多数“劳动人民”不是无产者而是农民的国家里，谁是进行这种“民主监督”的“劳动人民”呢？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普选权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监督，远远不是这样。马克思认为，生产合作社之所以可贵仅仅是因为“它们是工人自己独立创设的，既不受政府的保护，也不受资产阶级的保护。”一个要求国家为之建立合作

社的工人阶级，表明它“既没有当权，也没有成熟到当权的程度”。

马克思问道，这个要为工人作这么多工作的“国家”是什么呢？纲领称它为“自由国家”；但是这种说法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使国家变成自由的，这决不是……工人的目的。”在德国就象在俄国一样，国家已经太“自由”了。“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换句话说，就是限制国家的自由。马克思说，纲领“表明：它对社会主义思想领会得多么肤浅；它不把现存社会（对任何未来的社会也是一样）当做现存国家的基础（或者不把未来社会当做未来国家的基础），反而把国家当做一种具有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础’的独立本质。”马克思说现存的各个国家有很大区别，但是在现代世界里，它们都是“建筑在”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社会主义者必须考虑的不是现存国家，而是“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马克思说了以下常常被人引用的话：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马克思说，关于所有这些问题，哥达纲领草案只字未提。它只是说了些“陈旧的、人所共知的民主主义的废话”——例如普选权、直接立法权、公民投票、人民军队等等。马克思说，这些要求“只有在民主共和国内才是适宜的”，而在象“普鲁士—德意志帝国”这样的国家里就没有意义了。既然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敢——在马克思看来这是明智的——提出成立这样一个共和国的要求，关于普选权等等的要求也就不可能有实际意义了。实际上，马克思是

说不可能和平地改造象德意志帝国这样一个“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这种国家只能用革命来推翻。

马克思始终本着同样的精神,对纲领中的若干具体问题进一步做了批判,但是细节同本书无关。他批评的要点是:两个对立的德国社会主义党派达成协议的文件对拉萨尔派做了过多的让步,即使条件强硬得多,它也会不得不接受合并;这些让步放弃了重要的原则问题,特别是在社会主义者对待现存的普鲁士—德意志国家的态度方面。马克思的部分批评所针对的就是纲领把这个具体国家当做好象是法国、瑞士或者美国那种类型的“民主共和国”,而忽视了它仍然保持着军国主义和封建特性,尽管它“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而且也受到一定程度的资产阶级影响。更重要的是马克思还说,即使民主共和国已经成立了,“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最后的形式里,阶级斗争要进行最后的决战”。

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于应该怎样理解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提到的“无产阶级专政”,争论很多。列宁在1917年准备写《国家与革命》的时候,曾对他手头的《批判》本文作了注解,并且把《批判》同《共产党宣言》的原文和恩格斯在讨论哥达纲领期间写给倍倍尔的一封信作了比较。恩格斯象马克思一样,特别攻击了草案中所用的“自由国家”这一说法,他写道,“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在巴黎公社以后,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①他接着说,《共产党宣言》已经说明,“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②然后他作了如下 252
评论:

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

^{①②} 《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1875年3月18日—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页。——译注

暂时的机关，那末，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①

然后恩格斯建议把纲领中的“国家”一词一律改成“公团”（“Community”）——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文古字，相当于法文中的“公社”（“commune”）。列宁在评论时指出，虽然恩格斯建议从纲领中去掉“国家”一词，马克思在一个多月以后所写的《批判》中在谈到过渡时期时，仍保留着这个字。但是列宁说这是没有矛盾的：这两个字的意思一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一个“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在过渡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来，仍然有一个“国家”，但是就象巴黎公社一样，“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最后，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就用不着，它会自行消亡。”看来这是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评论的明确含意的相当公正的概括。所没有谈到的是巴黎公社所预示的“无产阶级专政”将采取什么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无疑会辩解说，专政会根据发生革命的不同环境采取必要的各不相同的形式。他们会讥笑那种不考虑具体社会的性质和当前形势的迫切需要而规定一个固定形式的想法。可见，不能认为他们的“专政”概念排除普选或者是要求普选；也不能认为这个概念除了赋予共产党以整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不是宗派这一总的职能以外，还对共产党的作用有任何特殊的见解。对专政理论作详尽的阐释是后来的事，大部分是列宁作的。

^① 《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1875年3月18日—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页。——译注

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表示反对，纲领草案还是作为两个德国社会主义党派合并的基础而被通过了，只有次要地方作了修改。253
1875年，统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正式成立。虽然拉萨尔派成员在党内居多数，但是从一开始起，有效的控制权实际上就操在爱森纳赫派手里。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主要是由于从1871年开始，俾斯麦及其政府越来越反对各种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从而使拉萨尔派同国家合作以反对上升的资产阶级的政策根本行不通。此外，俾斯麦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同罗马天主教会进行的斗争使得德国的局势复杂化。1871年，普鲁士以一项限制教会从事政治活动的措施为序曲开始了所谓的文化斗争，这是对许多天主教徒反对德国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的一种报复行为。接着在1872年又采取了由国家单独监督学校，并且取缔耶稣会的措施。1873年，又颁布了“五月法”，限制教会对信徒的惩戒权力，并且排除外国教士，甚至排除在国外受教育的德国教士。许多神甫被投入监狱，许多高级教士被解除圣职。1874年，普鲁士政府行使权力，把犯法的教士驱逐出国，1875年，国家停发给教会的补贴，大多数修会解散。这场斗争一直激烈地进行到1878年前后，这一年前后对教会采取的措施开始逐渐放宽，因为俾斯麦需要盟友以支持自己所采取的对付自由主义者的关税保护主义政策以及摧毁力量日益强大的社会民主党的种种尝试。

因此，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国天主教徒和社会民主党人都发现自己同新建立的帝国政府处于敌对地位，而且都需要争取为选举帝国议会而建立的普选区的支持。但是，天主教徒和社会民主党人彼此同时又是冤家对头，因为社会民主党人正象俾斯麦一样激烈反对天主教会的主张，而天主教徒则必须在天主教徒居支配地位的地区（如巴伐利亚和莱茵兰）同社会民主党人争夺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支持。事实上，一个相当强大的天主教社会运动 254

——往往被称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从六十年代初期就在德国出现。1863年，为了回答拉萨尔为建立工人政党而进军的挑战，约翰·道林杰(1799—1890年)呼吁德国天主教徒探讨社会主义问题；第二年，这个呼吁得到了威廉·伊曼努尔·冯·凯特勒(1811—1877年)强有力的响应，这个贵族1848年是法兰克福议会的一名热心改革的议员，两年以后成了美因兹主教。冯·凯特勒主教于1864年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叫作《劳工问题与基督教》，他在书里提出了先进的建议，主张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由天主教会采取行动，建立不受国家干预的基督教合作社，由信徒出钱作为资金。此外，冯·凯特勒赞成采取措施以实现公平的工资和合理的劳动条件，并为失业和丧失劳动力提供保障。他猛烈攻击资本主义的弊端以及放任主义“自由主义”政策的违反道德原则，要求按照基督教的正义和基本人权的概念来使经济政策合乎道德要求。冯·凯特勒深受洛贝尔图斯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基督教合作社提倡者维克多·艾梅·胡布尔(1800—1869年)的影响，关于胡布尔为合作运动进行国际活动的情况，本书前面已经提到。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这种“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说得确切一些，“基督教社会”运动——不断聚集力量。除了冯·凯特勒以外，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坎农·莫方(1817—1890年)，他也是美因兹人，为了支持这个运动，写过很多著作，进行过广泛的宣传。1868年，名叫《基督教社会书信》的刊物开始问世；1869年，德国天主教主教会议表示赞成这个运动。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接管了天主教雇工协会的组织，这个组织是早在1847年由鞋匠出身的神甫阿道夫·科耳平(1813—1865年)在莱茵兰创办的，主要目的在于恢复已受到城市化发展和工厂就业增加的威胁的家庭生活。科耳平的地方协会由神甫主持，在文化和技术教育方面都很活跃。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一项基本教义是：道德的更生必须走在社会的更

生的前头。科耳平是冯·凯特勒的朋友和支持者；当天主教徒决心组织一个全国规模的运动时，他们便接管了科耳平的协会和在农民中间的一些类似的协会，特别是在巴伐利亚。

因此，当俾斯麦和天主教会开始斗争时，天主教徒已经有了一个组织强大的社会运动作为后盾，得以对政府进行强有力的抵制，并同时对社会主义党派的“唯物主义无神论”不断展开斗争。他们的社会宣传从一开始也具有反犹太色彩，矛头针对自由主义资本家和社会主义者的领袖中的杰出犹太人。无需说明，马克思和拉萨尔都是犹太人，但是这种反犹太主义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远不如后来那样猖獗，同奥地利的情况不同，在德国的天主教徒中间，这种反犹太主义也从来不像在路德派中间那样占支配地位。新教徒发起自己的“基督教社会”运动以对抗社会民主党人比罗马天主教徒晚得多；但是当新教徒在七十年代后期行动起来的时候，比起对立的天主教运动来，他们的运动在政治上要反动得多，反犹性质也要强烈得多。新教徒运动的领袖阿道夫·斯托克(1835—1909年)牧师只是到了1878年才建立基督教社会工党，支持他的主要是普鲁士的中下层阶级。他的党是保皇主义的，强烈反对自由主义——事实上，不过是普鲁士宫廷的一个御用机构。

另一方面，冯·凯特勒是一个十分诚实的社会改革者，尽管无需说明，他不是任何普通意义的社会主义者。我们已经谈过，他一开始就提倡创建一个由教会领导的、完全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运动，但是他似乎也认识到他的教会生产合作社的计划行不通，因而在他后来的著作中逐渐主张制定对工人有利的保护性法律。1871年，也就是文化斗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凯特勒的著作《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基督教》出版了，这本书最清楚地说明了他后一阶段的立场。后来继承他的工作的是弗兰克·希茨(1851—1921年)，希望在1880年成为强大的天主教福利组织工人福利协会的总书

记和中央党的领袖，这个党是从天主教社会运动发展出来的。但是当文化斗争开始消亡，国家把主要注意力转向社会民主党发动攻击时，这个运动的主体立即出现向右转的明显趋势。

1878年，德国皇帝威廉两度遇刺。社会民主党人同这些暗杀尝试没有关系，这是个别恐怖分子干的事；但是俾斯麦抓住这个机会，对社会主义者普遍进行迫害，同时跟天主教进入某种休战状态。1878年和以后几年的反社会主义者法把社会民主党赶入地下，迫使它在国外进行组织活动，国内事务则由党留在帝国议会和次要的立法机构中的议员代理。1878年的法律禁止成立或继续保留任何企图通过鼓吹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或共产主义以颠覆现存的国家或社会秩序的组织。因此，这项法律无异于勒令社会民主党和所有其他社会主义团体解散。它也使社会民主党无法定期举行代表大会，因而也就无法修订1875年哥达统一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不过议员候选人无疑可以提出自己的竞选纲领，因而党的组织虽然遭到了取缔，党仍能在选举中取得重大胜利。由于这个原因，哥达纲领在1890年以前名义上一直有效，这一年反社会主义者法撤销，社会民主党终于有了修改纲领的机会，以所通过的爱尔福特纲领代替哥达纲领，关于爱尔福特纲领，我们下面将要谈到。

257 德国的基督教社会运动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全盛时期同时在三条战线上作战，主要战斗则时常从一条战线转移到另一条战线。在新教徒占支配地位的各邦以及整个帝国，它反对国家在教育以及言论和结社自由之类的领域中扩大权力，同时也提倡有利于工人的社会立法。在经济领域中，它反对主要醉心于自由思想、理性论和放任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基督教社会运动也同社会民主党人展开斗争，他们是运动在天主教工业区争夺人民支持的主要对手。一般说来，基督教社会运动主要是作为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对头在六十年代出现的，它之所以这样干，基本上是因为它在寻求一种手段以对抗拉萨尔的社会主义的号召力。在七十年代文化斗争期间，基督教社会运动主要同俾斯麦进行斗争，反对国家权力，而且往往同社会主义者结成联盟反对专制政府。八十年代，当文化斗争已经过去一半，社会主义者成了政府迫害的主要牺牲品的时候，基督教社会运动在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搞平衡，并且由于社会主义者为组织天主教工人而发起的运动受到政府迫害而占了便宜。九十年代，反社会主义者法失效，基督教社会运动由于同社会主义力量展开日益激烈的斗争而进一步向右转，但是继续支持社会立法，认为这是掌握天主教工人的必要条件。

与此同时，自由资本主义和放任主义理论还受到另一个方面的攻击。关于资本主义的概念，即按照自由和经济法则，国家应该放手不管，听任资本主义不受限制地发展的概念，在德国总是遭到哲学家们的强烈反对，他们赞扬国家的职能，认为国家是人民精神的至高无尚的代表。费希特——还有黑格尔——大力主张国家有权支配整个国家的生活；而“青年黑格尔派”则完全反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放任主义理论。经济学家中反对资本主义理论的也不乏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所著《国民经济体系》(1841年)就是对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挑战，这本书坚持说，国家的职能是安排经济发展，保证国家充分利用资源，发挥最大潜力以生产财富。两年以后，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创始人威廉·罗雪尔开始发表一系列著作，提出他对经济规律的相对论的看法。他认为经济规律只是在一定的经济制度的范围内有效，而不是绝对有效。以后几年，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和卡尔·克尼斯继续发挥罗雪尔的治学方法和理论，并产生了显著的成果：把经济学当作同法律和政治密切相关的历史来研究，而不是能够产生绝对规律的演绎科学。这些著述

家在原则上根本没有对国家干涉经济事务提出任何反对，而是认为由国家规定企业家活动的条件是正确而适当的。继承他们的晚一辈的经济学家古斯塔夫·施穆勒、阿道夫·黑耳德、吕约·布伦坦诺、克里斯蒂安·恩格耳、阿道夫·瓦格纳等人，把自己的经济观点同社会主义越来越强烈的挑战更加直接地联系起来。1872年，这些经济学家在爱森纳赫(三年前成立社会民主党的地方)召开了一次德国经济学家代表大会，大会宣布赞成某种“国家社会主义”——当然不是赞成社会民主主义。与会的经济学家(其中有许多人在德国各大学讲授经济学)并没有讨论应该由谁来控制国家，只是讨论了在管理经济事务方面国家的干预应该达到什么程度，而不管国家是怎样受控制的。他们一致攻击“经济自由主义”的全部理论，并且把德国工人中普遍存在的疾苦和不满归咎于自由主义的错误作法。这个运动的主要发起人施穆勒说，“社会民主主义是现代自由主义罪恶的后果”；大会本着这种精神同意提出这样的要求：制定社会法律；由政府在经济事务作出规划。他们欣然接受“讲坛社会主义者”(往往译成“教席社会主义者”)的称号；由于这个称号是在巴黎公社被镇压下去以后，对社会主义开始采取粗暴的反动措施时使用的，所以它更加耐人寻味。毫无疑问，这个称号和这批人在1873年成立的社会政治协会对以后几年德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尽管大多数“讲坛社会主义者”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毫不相干，从政治上来说，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强烈反对这个运动。“讲坛社会主义”也有助于加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对放任主义资本主义展开的批评。与此同时，“讲坛社会主义”还在理论上大力支持俾斯麦的强制性社会保险政策以及他在1880年采取的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

在此期间，基督教社会运动从德国扩展到奥地利。在奥地利，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卡尔·冯·福格耳臧(1818—1890年)。他

出生时是德国新教徒，后来成了普鲁士文官。他在冯·凯特勒的影响下改信天主教，于1864年迁往奥地利，成了奥地利基督教社会党的主要鼓舞者。在奥地利天主教运动的主要机关刊物《祖国》和他自己办的杂志《基督教社会改革月刊》上，他攻击资本主义的弊端，认为这是由于现代社会的上层反对基督教而产生的社会灾难。冯·福格耳臧激烈反对自由主义和犹太人。要求回到按照基督教“等级”制度的原则组成的井然有序的社会。他要求组织工业协作社(基尔特或劳资协会)，这种协作社由根据基督教原则建立的国家来管理，并且在职能上同国家发生关系。他所主张成立的协作社是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的劳资协会制度的鼻祖，当然包括雇主和雇工，并且要通过团结一切阶级为基督教社会服务这一原则而摆脱阶级对立。关于手工业，冯·福格耳臧主张成立合作组织，他还大致拟订了一个在“协作国家”监督下农民进行合作的计划。他的影响同也是迁居奥地利的德国新教徒鲁道夫·梅耶的影响汇合了起来，梅耶的著作《第四等级的解放斗争》(1874—1875年)对奥地利社会运动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冯·福格耳臧——和他所鼓舞的运动——把一种非常强烈的反犹观点掺入这些协作社理论。毫无疑问，他之所以这样干，是因为犹太资本主义在维也纳占有领导地位，而犹太人在那里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又起领导作用。奥地利基督教社会运动的政治路线要比当时德国——至少是德国大部分地区——的天主教社会运动反动得多，这部分是由于奥地利运动的反犹倾向。巴伐利亚受到奥地利的强烈影响，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政策的主要鼓吹者是格奥尔格·拉钦格(1844—1899年)，他在1881年出版了一本概述基督教社会运动的著作。拉钦格虽然攻击资本主义，却是私有财产的强有力的捍卫者，认为私有财产应该受国家规定的道德准则的支配。他还主张实行一种由国家监督的合作社制度；至于私营工业，他主张合伙

经营,分摊利润。但是总的说来,巴伐利亚的天主教社会运动的倾向是跟奥地利走。

在其他地域,也有同日耳曼人国家的基督教社会运动平行的运动,特别是在法国和比利时。在法国,巴黎公社刚刚失败,阿尔伯·德·孟伯爵(1841—1914年),同摩里斯·梅格农、雷内·德拉图尔杜班·香布里和德拉·夏斯侯爵(1834—1924年)合作,建立了一个叫作“天主教工人联合会”的团体,这个团体的宗旨是在基督教君主国的统治下,恢复古老的法兰西的统一,同时在国家的赞助下,建立工业协作组织。这个运动一开始便对第三共和国的“世俗性”抱强烈的敌对态度。德·孟是运动的主要演说家和组织者,而德拉图尔杜班通过他的杂志《天主教联合报》是运动的主要撰稿人。德·孟在1876年当上了议员,他支持布朗热将军,在天主教青年中有广泛的影响。后来在教皇的建议下,他同意在事实上接受共和国。德·孟在1891年支持教皇通谕《新事物》,并且在著名的德莱福斯事件中,成了一个起主要作用的反德莱福斯分子。德拉图尔杜班同德·孟一直合作到1892年,后来在接受共和国问题上同德·孟决裂,成为基督教社会运动主张波旁王朝复辟的那一派的领袖。后来,德拉图尔杜班成了“法兰西行动”的成员。他强

261 烈地反对自由主义。在法国天主教社会运动的著述家中,他最接近以冯·福格耳臧为首的奥地利集团的观点。德拉图尔杜班自称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他的最著名的著作是1907年出版的《走向基督教秩序》,这书记载了运动的进展情况和他自己的思想。在比利时,基督教社会运动的主要代表是昂利·萨维埃·沙尔·贝朗(1815—1905年),从1845年起他是鲁万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他在两本主要著作《基督教社会的财富》(1861年)和《基督教社会的法律》(1875年)中攻击自由主义经济。贝朗强烈反对社会民主主义和德国“讲坛”派的“国家社会主义”;他还攻击主张用合

作方法解决“社会问题”的人。他认为基督教的“自我克制”的概念是正常经济秩序的必要基础，这种秩序需要强大的教会作为它的道德行为的监护者。他的见解在某些方面接近法国勒·普莱的信从者，比如克劳迪奥·雅内(1844—1894年)的见解。雅内的《国家社会主义和社会改革》一书(1889年)就同样反对那批对自由放任主义进行学究式批评的人所抱的那种“国家社会主义”倾向。

我所谈到的所有基督教社会主义著述家当然都是反对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特别是反对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告诉他的德国信从者说，他们的党“应当乘此机会说出自己的看法：资产阶级的‘信仰自由’〔这是纲领中所提出的要求之一〕不过是容忍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自由而已，而工人党却力求把信仰从宗教的妖术中解放出来。”^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当然是反宗教的，认为宗教信仰不过是在社会的特定发展阶段从社会经济基础反映出来的意识形态结构的组成部分。因此，马克思主义越是成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公认的基础，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在社会政策的基础问题上的斗争就越激烈。但是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即使在德国，马克思主义还没有成为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主义信念，因而大陆上的天主教徒仍然可以对“社会主义”表示同情，而又 262 不致同他们的宗教信仰发生矛盾，当然他们也并不是不当面斥责许多社会主义者的“无神论”倾向。巴枯宁和马克思在那场毁灭了第一国际的斗争中，如果说在其他方面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在宗教方面意见倒是一致的，但是即使在这方面，他们两人对是否把宗教当作中心问题，意见还是有分歧的。在人民的意识中，同无神论最明显地联系在一起的政治理论是无政府主义和法国共和派雅各宾

^①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译注

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但是当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德国取得巨大进展，并从德国扩展到其他国家的时候，天主教会就越来越把社会民主党看作是主要的手，而象冯·凯特勒这样的人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在天主教会的范围内这时已经不再站得住脚了。1870年，冯·凯特勒是下面这样一批人中间的一个：他们反对教皇永无谬误的新教义，但是当教廷作出对他们不利的决定时，他们又向教会权威低了头。因此当1878年教皇利奥十三世发布《关于宗座职能》的通谕，指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虚无主义同真正的基督教教义不相容的时候，所有遵守教会教规的人，如果他们曾自称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就不得不抛弃社会主义，并且给自己的理论重新起名。教皇通谕用强烈的措词提到“有一种致命的瘟疫感染了社会的核心，使社会沦入极端危险的境地。”利奥十三世继续说，“我们指的是有一帮人在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等光怪陆离和野蛮粗鄙的名目和称号下，正出现于世界各地。他们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不再依靠在阴暗角落举行的秘密集会给予有力的支持，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抛头露面，力图达到他们蓄谋已久的目的，即连根拔除整个文明社会的基础。”

这番话正好发表在俾斯麦在德国推行反社会主义者法的时候，对于结束正处于活跃阶段的文化斗争，促使德意志帝国同天主教会言归于好是起了作用的。这番话也有助于这两大势力——在此以前互斗不已的两大势力——联合起来，对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共同采取攻势。因此在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这番话还有助于把社会主义运动同反对教会的活动完全等同起来，并且结束了那种以拉梅耐为最有影响的代表的激进基督教理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英国有一个时期看来也很可能发生同样的事情：英国的社会民主联盟对宗教采取跟大陆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同样的敌对态

度。这样的事情之所以没有发生，倒不是因为象斯图尔特·赫德兰姆这样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作了努力，而是因为英国的社会民主运动由于发生下述事件而黯然失色：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的罢工直接形成了新的运动；矿工联合会的崛起；自由党激进派在其领袖约瑟夫·张伯伦因爱尔兰自治问题退党以后出人意外地解散了。这些事态的发展使英国得以掀起新的社会主义运动。这个运动的主要动力是伦理性的冲动，即使在运动的矛头指向教会的时候，大体上也没有令人感到必须立刻抛弃一切宗教信仰，或是提倡一种唯物主义哲学来取而代之。

我们将在本书下一卷讨论这种别树一帜的伦理社会主义，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它在英国扎下根，并且体现在凯尔·哈迪领导的独立工党身上。同目前这个阶段有关的一点是：1878年以后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同教会之间的斗争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的：斗争迫使社会主义者强烈地倾向于采取马克思主义的反宗教立场，以此作为社会主义信念的一个必要因素，而且在其他国家以德国的党为楷模着手组织社会民主党的时候，这种立场很快为其他国家的党所采纳。结果是社会主义者同那些继续信仰由来已久的宗教的人之间的社会鸿沟比以前大得多了。于是，社会民主党人远非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可以比拟，愿意在国内的大社会中形成一个紧密团结的小社会，而在同经济或政治没有直接关系的事务中则养成一种孤立排外的习气。我并不是说这种状态是社会主义者单方面不愿意同他人打交道造成的，这也同样是教会采取坚决行动的结果。教会为使教徒不受感染，禁止他们同“异端”接触。姑且不谈发生作用的力量孰轻孰重，彼此隔离的状态的确出现了，甚至到了今天，它的影响还是十分显著的。

当然，在法国，信教者同反信教者之间的鸿沟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就已存在。这实际上是革命传统的一部分。但是在七十

年代以前，同法国的反宗教立场关系最为密切的信念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共和派的雅各宾主义。因此，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督教变种就大有活动的余地，那一批批追随毕舍等思想家并鼓舞了英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从勒德罗和摩里斯到尼尔和托马斯·休斯——的人士便是例证。七十年代以后，这种基督教社会主义在法国实际上就再也看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那些同第三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政党针锋相对的基督教社会运动。

本章所涉及的范围很广，看来似乎是把许多最好是分开论述的问题罗列在一起了。不过采取这种叙述方式是经过考虑的，而且我相信是有充分理由的。我认为在论述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拉萨尔去世到反社会主义者法失效这一阶段的发展时，不可能不同时讨论文化斗争的影响和基督教社会运动的不断改变的状态，也不可能不同时述及别树一帜的“讲坛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在一个一心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建立和巩固国家统一的国度里，是作为强烈反对经济自由主义的反动力发展起来的。德国的社会主义是在德国取得统一的特殊发展过程的影响下，才具有特殊的形式，同时也是以特殊的文化传统为基础的，这种传统使哲学成为运动的依据，而不是使运动成为哲学的依据，而且简直没有采取英国所采取的那种试验性的经验主义的途径。在英国，加入独立工党或
265 费边社——甚至加入社会民主联盟——的男男女女，同那些把自己的命运和社会民主主义拴在一起的德国人（特别是中产阶级的德国人）毫无共同之处，并没有因为加入某党某派而断绝与非社会主义者的社会和文化联系。事实上，对德国人来说，社会民主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政治信念，倒不如说是一种完整的文化，这种文化同德国资产阶级的文化，同从天主教会中得到启示的敌对的文化是截然分开的。天主教徒和社会民主党人都要求得到一个人的全心全意的拥戴，以对抗提出同样要求的普鲁士统治的国家。后果是这

两个集团都发展了自己所特有的活跃的文化生活，艺术——特别是音乐和文学——成了一党或一派中的共同生活的要素。在遭受压制期间，这种文化联系所产生的力量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很有帮助，使他们能够通过社会活动团结在一起，尽管他们的政治组织遭到取缔。这种力量还有助于他们在竞选帝国议会的议员和其他仍能自由参加的公共团体的代表时，保持必要的联系，因为俾斯麦无法说服帝国议会破坏选举自由，或者取消民众代表和候选人所享有的豁免权。报纸仍然可以自由刊登在帝国议会或其他公共集会上发表的演说；社会主义报刊虽然在其他方面受到严格的检查，仍然能够出版。社会民主党人自己的报纸则不得不在国外印刷，然后偷偷运进德国，不过在德国本土，仍有一些十分友好的报纸——或者说对俾斯麦十分不友好的报纸——给予社会主义的议会政治家以抒发己见的良好机会。

由此可见，德国的社会主义由于具备同马克思主义密切相关的强大的文化基础，才得以安然渡过暴风雨。在第一国际的早期，马克思确曾坚持有必要以实际的运动为基础，而不是先制定一些教条，然后要求运动去适应这种教条。但是，当实际的运动采取他所不喜欢的形式时，他往往就忘记自己的格言，而成为审判邪魔外道的宗教法庭庭长。事实上，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在处于拉萨尔影响下的德国，以及在工会的最迫切的要求得到满足的英国，实际的运动大体上就采取了马克思所不喜欢的形式。在1875年哥达代表大会上，马克思在德国的弟子拒绝按照他的指示行事，但是尽管他们拒绝了，德国的党大体上还是盖上了他所希望的那种烙印，因为它处于受迫害的境地，而且只要它处于这种境地，这种烙印就不致消失。1890年迫害刚刚停止，党就抛弃了那份它过去不顾马克思的劝告而采纳的折衷纲领，并且通过了一份大致符合他的建议的新纲领。但是在它刚刚获得解放，采取这一行动的时候，旧

的分歧就立刻再次出现了；在以后几年内，它陷入了一场严重的“修正主义”论战，爱德华·伯恩斯坦和卡尔·考茨基是这场论战的理论方面的领袖。但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德国代替了法国，成为左右欧洲社会主义的力量；一种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成了大多数发展中的社会主义议会政党的共同理论——至少从理论上说来是这样。另一方面，实践则因国家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别，这取决于不同的政党采取行动时的条件；在德国本身，反社会主义者法的限制性条件刚刚撤除，实践就有了改变。1890年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经过修订的纲领所反映的是一种不复存在的形势，因此理论和实践之间的鸿沟就迅速扩大了。实际上，德国的党在1891年接受它在1875年拒绝完全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倒不是因为马克思或者恩格斯说服了它，而是因为俾斯麦说服了它，但是在俾斯麦的铁腕抬起以后，它的想法很快就开始改变。

马克思与恩格斯——《资本论》与《反杜林论》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第一国际又随之瓦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一生中又一次面临他们曾寄以很高希望的广泛国际运动的解体。在法国，社会主义事实上已不复存在，工会运动也几乎被消灭了。在英国，工会的领袖们虽然并没有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把自己出卖给了格莱斯顿”，但却一心搞他们自己的法律方面的斗争去了，不愿意让马克思以他们的名义进行活动，也不愿听取马克思的意见。西班牙和意大利正处于革命的阵痛之中，但却丝毫也不想听从马克思的指导。在比利时和荷兰，无政府主义倾向或接近于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一时占优势。瑞士跟以往一样陷于分裂，马克思在那里除了同约·菲·贝克尔这个老战友以外，是没有什么联系的。只有德国有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正在发展起来，它宣称其理论和政策都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此外马克思已经开始在俄国得到信从者，并且因而有意改变他对俄国人的态度，因为他开始看到西欧没有早日发生革命的希望，并认为西欧起义的信号毕竟有可能来自经济落后的东方，因为只有东方看来还存在着社会革命取得成功所必需的条件。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的头几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是注意德国。后来，马克思的德国弟子在哥达代表大会上拒绝了他的意见，而过几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又在俾斯麦的反社会主义者法的严重打击下遭到失败；这段时间，马克思和恩格斯便越来越注意俄国，而且开始更加用心推测庞大的沙俄帝国所特有的革命骚乱可能具有的明确的社会主义形式。

在 1848 年革命运动失败以后和第一国际建立以前的那些年里,马克思主要致力于撰写他那部伟大的著作,并打算通过这部著作使他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具有最后的权威形式。这部著作的第一部分是德文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①;由于他的健康不佳,并为生计所迫,这本书耽搁了很久,直到 1859 年才出版。后来,他修改了自己的计划,不再往下写这部著作的以下几卷,而决定重新动手另写一部书。但是几经耽搁,直到 1867 年才出版了他的杰作《资本论》的第一卷,这时候第一国际已经进入全盛时代。在马克思的生前没有再出以后几卷。第二卷是 1885 年,即马克思逝世后两年,由恩格斯在汉堡出版的,书名为《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直到 1894 年也是由恩格斯出版的。

因此,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当以马克思学说为基础的新的社会主义运动首先在德国,然后在其他国家开始发展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著作只有《资本论》第一卷,这卷书的副题是《资本的生产过程》。这就是巴枯宁动手要译成俄文的那一卷——这项工作的不幸结局前面的某一章已经叙述过了。这本书早在 1872 年就有一个俄文译本出版,它并没有受到书报检查制度的禁止;这是《资本论》的第一个外文译本,发行数量相当大,并且大大有助于发挥马克思在革命知识分子中的影响。这个译本的译者是尼古莱·丹尼尔森,他的笔名是尼古-逊,更加出名。不久以后,J. 罗伊的法语译本开始分节出版,1875 年全卷出齐,译稿曾经马克思亲自校订。第一个英译本直到 1887 年才出版,译者是塞缪尔·穆尔和爱德华·爱威林,由恩格斯编辑。

269 在《资本论》的后几卷中,第二卷并没有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总体系增加什么新的内容,尽管对于详细研究马克思某些方面的

^① 《政治经济学批判》(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1859 年柏林版。英译本直到 1909 年才出版。

思想来说还是很重要的，而在研究他就“资本主义的矛盾”以及商业危机的性质所作的阐释时更是这样。这一卷马克思已经差不多写完了。另一方面，第三卷对第一卷的内容则大有增补，特别是对马克思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生产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过程之间的关系作了许多说明。关于资本主义生产，马克思在第一卷的前几章中只作了非常抽象的说明。但是第三卷并不是一本完整的著作，它是恩格斯把马克思在漫长时期内写就的许多手稿编纂起来的，其中有些手稿还是在《资本论》第一卷定稿以前写的。因此，这一卷并不是全部著作的一个前后连贯和一气呵成的总结，而是在相隔很久的时期内留下的、始终没有完全连成整体的一系列研究。这一卷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在过去半个世纪中都曾广泛加以利用。但是它问世过晚，对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的马克思学说的主体没有来得及作出贡献；或者说对于当初从正统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出发一心要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也没有来得及提供任何材料。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随着社会民主党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的兴起而在理论上展开大论战的那几年里，对于论战双方的大多数参加者来说，马克思主义不过意味着《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第一卷所体现的内容，除此以外，就没有多少别的东西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德国以外几乎不为人所知。而最初用法文写的《哲学的贫困》直到1885年才翻译成德文，用英文出版则是1900年的事。甚至连《共产党宣言》也是到1872年才用德文再版，到1886年才用英文再版。六十年代初期，赫尔岑在《钟声》上发表了巴枯宁所译的《宣言》的俄文译本；马克思专门为之写序的第二个译本在1882年才出版。

在本书第一卷中，作者从《共产党宣言》出发，曾经作过一番尝试，力图扼要地说明那些起草《宣言》的人们在1848年欧洲革命时 270

期心目中是怎样设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在上卷的说明中，主要强调的是唯物史观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当代政治的见解，而没有打算讨论他们对于新经济理论的系统阐述——也就是说没有打算讨论他们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经济基础的理论。本卷在谈到马克思同拉萨尔在经济理论上的分歧时，曾经稍稍涉及这个问题；在同一章以及有关 1875 年德国的两大社会主义政党合并的叙述中，也曾谈到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为了说明马克思主义的首创者生前最后奠定的马克思主义同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自称以这一主义为基础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现在有必要更详细地叙述《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第一卷中所系统阐述的经济理论。

从许多方面来看，《资本论》都是一部令人望而却步的书。其中马克思叙述资本主义制度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叶的发展的几章最为可读，但是这几章只是在前面有了九 chapters 之后才姗姗来迟地出现。在前面的九章里，马克思阐述了他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学说。这几章不仅内容本身很艰涩，而且采用了十九世纪初叶古典经济学的阐释形式，如果不了解李嘉图的那一套名词是不容易理解的。此外，作者所受的黑格尔主义的熏陶也使这几章受到很大的影响，其阐述方法非常抽象——这同后来谈历史发展的几章中那种沁人心脾的现实主义和具体的叙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这些特点并没有妨碍这几章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基础；这一体系同正统政治经济学的共同之处越来越少，因为后者抛弃了李嘉图研究价值的方法而日益脱离古典学派所用的概念。正统派的经济学家越来越倾向于考虑价格结构的作用，特别是不再利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区别，而这却是马克思的主要依据。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就发展成为一种完全不同于十九世纪后期的正统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经济学研究法，

它使用完全属于自己的一套辞汇——或者说使用后来的正统经济学家目为从陈腐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得来的一套辞汇。马克思所谈的“价值”同杰文斯或马歇尔心目中的“价值”根本不同，而跟瓦尔拉、门格尔或任何倡言最后效用或边际效用理论的代表人物所说的“价值”也有本质上的差别。这方面的分歧如此之大，以致马克思主义者要同正统经济学家辩论时就几乎必然会引起误解，结果仅仅是重述对立的理论而又不设法去理解彼此的问题，甚至连看都不愿看一眼。

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很简单。穆勒以后的正统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既定的，他们只注意研究它的运行；而马克思则着手攻击这种制度，证明它的历史的相对性，并且接触到那些必然会促使其灭亡的固有“矛盾”。在正统经济学家看来，政治经济学或者说经济学——他们越来越喜欢使用后一名称——的基本任务是分析市场流通过程，而把生产资料属于私有并用于谋取私人利润，同时又有一批可以用工资雇得的工人存在当作理所当然的事。事实上，他们并不是就自己所见到的市场流通过程——也就是受许多非经济因素影响的错综复杂的实际过程——来进行研究，或者只是偶一为之。他们喜欢在提出总前提的情况下作出简单化的假定（只有在例外情形下才分别讨论）：比如说无限制的竞争是存在的，资本与劳动不论其具体性质如何都可以从一种用途转移到另一种用途等。他们把垄断看作是例外；把失业看作是磨擦的结果；把国际贸易看作是劳动分工的特别情况。当然，他们实际上是在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同时也在解释这种制度的运行，但是他们进行辩护的方式是，假定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然现象，同时力图证明：只要这种经济存在，并让它按照自己的“自然”法则运行，便能得到最高的产量，如果国家或任何外界机构干涉这些法则的运行，就必然会降低产量，从而减少能够供给消费者的那块“饼”

的分量。他们说，这块饼在生产因素——包括劳动——的所有者之间的分配必然受市场法则的支配，也就是说，最后受这样一些条件的支配：消费者购买的意图，生产者在吸引需求时所进行的竞争或者在竞争性的条件下提供他们的生产劳动。

在这种经济学中，研究的中心问题是价格，其中不仅包括各种制成品的价格，也包括土地、劳动以及以货币或信贷形式出现的资本的价格。各种生产因素以及各种商品都有它的价格，这种价格取决于市场上买卖双方的讨价还价。经济学家的基本任务就是研究和分析这种复杂的价格结构，并且系统阐述它的运行法则。“价值”这个词如果保留下来的话，其意义也只是去掉具体货币单位的价格。“交换价值”已经不再存在了，而古典经济学家则认为交换价值与实际买卖商品时不断变动的价格有根本差别。

李嘉图认为不同于市场价格的交换价值代表制成商品时所投入的人的劳动量。市场价格同价值总是有距离的，但也总是倾向于回到这种价值上来；而在供求平衡的条件下，价格和价值就必然会一致。物品的交换价值决定于所投入的劳动量的理论并不是李嘉图自己创造出来的，而是他从一系列前辈手中得来的。但是，他的确使这一理论成为自己的新经济理论体系的中心学说，而且在这样作的时候，就为反资本主义批评家留下了一个把柄，让他们一下就抓住了。事实上，李嘉图是把劳动看作衡量价值的尺度而不是看作价值的来源；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并不十分明显，于是批评他的人立刻就把两者说成是一回事。他们争辩说，如果物品的价值决定于投入其中的劳动，那么劳动者显然就有权利收回其所提供的全部价值——也就是说产品的全部价值，作为偿还其劳动的代价。只要少了一点儿，那就等于是说他的劳动被剥削了，让那些对于这种价值毫无贡献的人得了好处。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一卷中所谈过的，这就是反对李嘉图理论的早期反资本主义批评家所提

出的那种形式的劳动价值说。马克思驳斥了这种从个人出发的见解，这种见解要求每个劳动者应该收回他的产品的全部价值。马克思反对的理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不能说某个劳动者制成某一具体产品，他不过是在本质上属于社会性的生产过程中作出了一分贡献而已。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为整个劳动阶级而不是为个体劳动者对整个产品提出要求时，这种要求才具有意义。就象早期批评李嘉图的人已经说过的那样，剥削是存在的，但就其本质来说，这不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剥削，而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

这一点，回头我们一定还要谈到。目前我们所要考虑的是古典经济学家持有一种理论，认为交换价值跟市场价格不同，它完全或者主要取决于直接间接投入各种销售商品中的劳动量。换句话说，他们认为交换价值完全取决于生产条件，而且不受市场需求波动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也承认市场价格是由供求力量的相互作用决定的，并且相信这些价格始终围绕着交换价值波动，而且不断倾向于在供求力量平衡的时候回到交换价值上来。

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于1848年初次问世)的时候，正统经济学理论已经同李嘉图的观点有相当大的距离；在马克思看来，这使得情况大大恶化了。李嘉图以后的经济学家越来越多地用劳动的实际费用或在供求平衡时要为劳动支付的费用这一概念来代替投入商品中的“劳动量”的概念。李嘉图曾经明确地驳斥过这种见解，他认为交换价值不受所付工资的影响，所付的工资跟所投入的劳动量不同；而且他还用下述论点来支持自己的说法：如果所有人的工资都增加一倍或者减少一半，这并不意味着产品的交换价值也同样地增加一倍或者减少一半，因为交换价值基本上是所交换的货品数量之间的比率，而不是绝对的数量。实际上，李嘉图倒的确认为，相对工资往往同所用去的相对

劳动量相应，只有在暂时的市场波动的影响下才会脱离这种相应关系。因此，他的后继者便说：可以认为“正常工资”同一定量的劳动的“价值”或“正常价格”相应。既然以正常工资费用而不以“劳动量”来作为决定价值的因素，李嘉图的后继者就有可能除了劳动费用以外还计入其他“费用”，以便得出一种由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谓的“生产费用”决定商品“价值”或者“正常价格”的概念，这种生产费用包括运用资本的费用、管理工作的费用和劳动的费用。

我们将要谈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谈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价格体系的实际作用时，谈到价格体系在重新分配“剩余价值”的过程中使互相竞争的资本家所得的收益相等这一方面的作用时，接受了一种同穆勒的观点十分相近的观点。但是马克思坚决认为，在竞争性的市场上通过讨价还价决定价格的过程同交换价值的决定没有关系。那些认为两者有关系，而且又抛弃李嘉图关于交换价值决定于投入产品的劳动量这一主张的人，马克思一向斥之为“庸俗经济学家”。但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虽然决不认为商品的“价值”完全决定于所投入的劳动量，但他仍然相信“交换价值”——他认为这跟剥去了具体货币形式的“正常价格”相同——完全是由生产决定的，需求状况只是使这种价值或者“正常价格”发生偏差的原因。不过在穆勒以后，正统经济学就变成完全另外一个样子了。不同于价格的交换价值的整个概念逐渐被抛弃，他们集中研究的是市场实际价格，认为这是刺激企业家进行生产的需求因素所产生的结果——企业家在对市场需求的一定估计作出反应时，就根据生产本来决定产量。

新的正统经济学也抛弃了古典学派关于两种价值——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的说法。这种区分的根据是物品所定的价格同它的用处并不成比例这一明显的事实。很有用的东西

如果生产起来并不费事就可能非常便宜。因此，如何解释价格和价值看来就必须从商品中的某些同用途完全没有关系的特性里去寻求了。有人说，物品要列为商品，就必须具有“使用价值”，也就是说必须有些用处；但是它的价值或者它的价格并不决定于它是多么有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这种区别使得人们在商品的用处以外去寻求使它们具有不同价格的某些共同性质；既然用处不算原因，于是就只能到生产商品的生产条件中去寻求解答；而最明显的共同因素是：所有的商品，或者说几乎是所有的商品，都耗费了这种或那种劳动。

所谓“最后效用”和“边际效用”的新理论使人们在把用处当成影响价格的因素看待时所遇到的障碍消除了。这种理论解释说，影响价格的并不是商品所具有的任何绝对意义上的用处，而只是“边际”消费者所购买的效用的最后的“量”，消费者最多愿意付价多少决定完全竞争性的市场上同一商品所有其他待售的“量”的售价。有关的因素不是一个面包本身的“效用”，而是市场上脱售的“最后一个”面包的效用。当然，还必须认识到，出售的面包量会受到预计将取得的价格的影响，而生产者则将尽可能只生产预计有利可图的面包量。结合需求的任何特定条件，究竟生产多少则取决于生产成本，但所取决的生产成本也不是任何一个面包本身的生产成本，而是“最后”一家面包房在能获得合理利润的价格上使供求达到平衡的“最后一个”面包的生产成本；因为前一种生产成本会因面包房的不同而不同，而且也会因每个面包房的产量不一样而不一样。 276

这种“边际派”的价格理论虽然受若干条件的限制，但长期以来一直是正统经济学的公认的信条，事实上在马克思生前就普遍为人们所接受。杰文斯在 1871 年出版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在这本书里，他详尽地阐述了这一新理论；在大陆上，列昂·

瓦尔拉和安东·门格尔几乎同时发表了实际上完全相同的理论。不过在新正统派学说取代李嘉图的理论以前很久，马克思就创立了自己的经济理论。对马克思有极大影响的最晚一个著述家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穆勒仍然牢牢固守旧的价值理论的基本概念，他的晚期著作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说明他曾受到正统学说后期发展的丝毫影响。《资本论》中所阐述的整个理论体系是从李嘉图经济学的出发点开始的，而且以全盘接受“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鲜明区别，以及“交换价值”和市场价格之间同样鲜明的区别为基础。此外，马克思的经济学从此以后就保持了这样形成的形式，并且继续使用他从早期古典经济学原理中取得的一套概念和名词；这套概念和名词在其他地方早在 80 多年以前就被取代了。

当然，马克思或李嘉图在断言商品的价格同它所体现的“劳动量”相对应时，都没有荒谬到这般地步，即认为一个人生产一件物品比另一个人生产同样一件物品所花的时间多一倍，他所生产的价值也就多一倍。创造价值的只是“必要劳动时间”；所谓“必要劳动时间”主要是指一个“普通的”工人利用当时一般采用的技术方法完成一项特定工作所需要的时间。马克思毫不犹疑地假定，²⁷⁷ 在生产技术发展的任何特定阶段，对“普通的”工人说来，都有这样一个正常的和必要的劳动时间。当然，他完全知道不论就技术、劳动强度、管理工作的效率的差别来说，还是就工人所能利用的机械助力的差别来说，生产率都将因人而异，因厂而异。某些人和某些厂会比另一些人和另一些厂生产得多一些；但是马克思和同时代的其他经济学家都接受这样的概念：“正常的”——马克思有时称之为“平均的”——产量决定“必要的劳动时间”，从而也决定产品的“价值”。

不过，马克思使用“必要劳动时间”这个名词的时候偶而也具

有根本不同的意义。我们已经谈到,他提出:物品要列为商品就必须具有“使用价值”,因而可以出售(能够无代价而又无限制地取得的物品除外),用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有时说,所生产的超过市场需求量的商品,尽管包含着劳动,也是没有“价值”的,还说这种劳动不是“必要的劳动”。事实上,这就等于是承认,需求条件进入价值的创造过程中来了;这不仅在每一种商品都必须有“使用价值”的意义上说来是如此,而且在数量的意义上说来也是如此。在这种“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中,存在着边际派理论的胚芽,但是马克思既不承认这种胚芽,也没有加以发挥。除了在少数个别的段落中以外,当他说到“必要劳动时间”时,意思就是一个普通工人制造一件物品所需的时间,同需求条件无关。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停留在“古典”价值概念的框框里;就他所认识到的正统经济学理论的后期发展而言,他把这些理论一概斥之为只看到资本主义的外表现象、而没有透过表象深入根本现实的“庸俗经济学”。

当然,这并不证明马克思错了,因为他的目的跟现代正统经济学家不同,不在于研究价格体系的运行,而在于揭发作为一种阶级剥削制度的资本主义。为了这个目的,用“交换价值”这一概念以区别价格的概念,以及撇开市场需求条件,研究生产条件,都可能是 278 有用处的。马克思所说的关于“价值”和“剩余价值”同商品的实际买卖价格完全没有关系这一点,今天看来虽然很明显,但是在《资本论》第一卷问世时,当时的读者却没有、也不可能看得这样清楚;在那一卷中也没有任何迹象说明,马克思本人意识到了这种差距。只有在马克思死后,于 1894 年出版的第三卷中才说明,商品的实际售价同马克思所说明的价值并不相符,而且也没有趋于相符的倾向。即使在第三卷中讨论这一问题的章节里,有关决定价格的实际过程的阐释也只反映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见解,而不

是任何后来的经济学家的见解。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利用李嘉图经济学的概念和名词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即揭发作为一种阶级剥削制度的资本主义。我们已经谈过，马克思一开始就严格地区别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个概念。他接着说，每一种商品都有它的特别用途，而且必须具有这种用途才能成其为商品——因为商品之成为商品的实质就在于它是要拿去出售的，不能设想有人会买完全没有用的东西。在说完这一点以后，“使用价值”实际上就没有再提了，不过我们将会看到，后来在某些问题上这一点又被提起。马克思主义同古典经济学一样，所关怀的是“交换价值”，也就是关心一种商品同另一种商品的交换比率。马克思说，对一切商品来说，必然有某种共同的性质可以据以确定商品之间的交换率，而这一性质就只能是它们同是人类劳动的产物。这并不是马克思独特的见解，而只是重申李嘉图的理论。他还进一步重申李嘉图的理论说，因此不同物品的交换价值决定于所投入的相对劳动量。

马克思主义只是在进一步提出“剩余价值”的概念时，才开始成为一种独特的理论。如果物品的价值相当于它所包含的劳动量，
279 那么劳动者为什么没有得到全部产品呢？或者更确切地说，为什么不能把全部产品拿来分配给生产它的劳动者呢？马克思回答说，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者本身就被看作是一种商品，因此他们所得到的不过是生产他们所消耗的劳动量，也就是说：不过是他们的生活资料，其中包括繁殖其后代以保持劳动者供应所需要的资料，也包括培养其技能所用去的一切特别费用的等值物。劳动力就象其他商品一样，在竞争性的市场上根据取决于生产条件的价格进行买卖。这并不意味着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就被钉死在固定的生活水平上了（这正是马克思和拉萨尔发生争论的问题之一），因为市场上的讨价还价就能使工资高于或低于生产劳动者的成

本。但是大体说来,劳动——或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劳动力”——进行买卖时所根据的“交换价值”往往根本不同于劳动者的产品的交换价值;“劳动力”的价值同产品价值之间的差额就构成了马克思所谓的“剩余价值”。

说到这里应该解释一下,马克思谈这个问题的出发点自始至终是他所说的“未分化的抽象人类劳动”,而不是任何一个工人的以至任何一类工人的产品。正如所有商品(普通意义上的商品)都有一种共有的性质使商品转化为共同的价值标准一样,所有劳动也具有一种共同的性质。“抽象的人类劳动”精确地说来并不是非熟练劳动,虽然意义与之接近。有时候,马克思称它为“平均劳动”;但是更经常的是他认为这种劳动相当于接近非熟练劳动的那种劳动,而这种劳动他认为是发展中的工厂制度的典型,随着机械化的发展注定会越来越多地代替专门技术。他说在发达的工业地区,大部分劳动已经是这种劳动;而且他也显然预计这种过程在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会继续下去。他认为一切其他形式的实际劳动都能用“抽象劳动”的标准单位来衡量,把一小时的熟练劳动算作是一小时的比较简单的劳动的倍数。从这个角度来看,就能把总劳动力看作是在劳动市场上按工资水平出售的性质相同的“劳动力”总体,这种工资水平通常相当于维持劳动者生存并维持劳动力供应的费用。工会能够影响工资,其办法无非是使某些工人集团所得到的工资比工人通过单独协议所得到的来得高,要不就是防止资产阶级压低传统的生活水平,因为这种水平不是绝对固定的。事实上,马克思认为,当资本主义为了避免资本主义企业的“矛盾”而集中力量加紧打击工人时,这种水平就会趋于下降。

因此,“剩余价值”便是任何一定数量的这种抽象“劳动力”的成本同这一数量的劳动所生产的价值之间的差额。资本家买进“劳动力”时所付代价之所以能够低于其产品的价值,是由于他们垄断

了生产资料。在《资本论》第一卷叙述历史的几章中，马克思说明了这种垄断地位是如何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他说，这是从土地私有制上产生的，而初期的发展则主要是通过商业企业和金融企业的利润积累而来的。这一过程的另一方面是圈占土地和驱逐农民使劳动群众越来越多地离开土地，从而使他们丧失一切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或控制权——这一过程产生了人数越来越多、并不得不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阶级。所有权的垄断使得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把生产力的发展所产生的一切利益都攫为己有，或者说把马克思在另一段中称之为“社会合作的经济利益”——即大规模机械化企业的经济利益——攫为己有。资本主义的工资法则不但没有使工人分享技术发展所取得的产量增额，反而把工人所得的一份压低到他们自身的生产成本的水平，或者接近于这个水平；这样一来，随着生产率的增长，工人的份额就会不断趋于下降，而剩余价值量则将不断增加。马克思解释说，工人制止这种越来越大的剥削倾向的方法是进行斗争以减少标准工时，在这方面他们能够取得一些成就——马克思不厌其烦地引证的 1847 年十小时工作日法就是一个明证。但是资本家对这种力图限制他们占有剩余价值的做法的答复是把机器开得更快，以增加劳动过程的强度。马克思运用他的“抽象劳动”的概念，说这种增加劳动强度的做法是把一小时以上的抽象劳动挤到一小时之中去，并把这种做法同改进技术而不增加工人每小时的工作份量所得到的生产率提高区别开来。

马克思把商品出售后不以工资形式付给劳工的一切收入因素统统归到“剩余价值”这个总名称之下。因此，他把地租、利息和利润——这个古典的三位一体——看作是有产阶级的总财源的构成部分。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价值的这两部分——用工资付出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形成了简单的对照，好象全部剩余价值都归于有产阶级，供他们自己享受，或者作为投资，置备新的生产资

料。在后两卷中，马克思主要通过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进一步申论了这一理论。在马克思看来，只有采掘业、制造业或运输业的劳动才能创造价值。所有其他劳动——如文书和行政管理的劳动，一切从事分配而并非运输工作的劳动，以及财务与为个人服务的劳动等——都是非生产性的，其费用必须从剩余价值中支付。归有产阶级所有的可消费收入，是除去为取得剩余价值而支付的费用以后的全部剩余价值，这种费用包括会计、行政管理、分配和财务的一切费用。但是这种差别在马克思生前并没有为人所了解，而且这也没有使他的总观点受到很大的影响。

马克思既把全部“价值”分为“工资”和“剩余价值”，与此相呼应，他还把资本区别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两类。“可变”资本简单地说就是资本家付给生产性劳动者的工资量；“不变”资本则是所有其余的资本。这个区别同正统经济学家所用的、马克思本人偶而也用的“固定”和“流通”资本之间的划分没有关系。“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同他坚信只有劳动（更确切地说某些种劳动）才能创造价值这一点直接有关。因此，他说作为剩余价值而为资本家获得的一切东西，必然完全是从他们用来购买生产性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中得来的。他又说，所有其他资本只不过是把其本身所买来的建筑物、工具或者原材料中已经积蓄的生产性劳动的价值转移到制成品上去罢了。这部分资本本身的价值保持“不变”，而用来购买生产性劳动的资本价值则是“可变的”，因为这种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超过劳动者在工资中所收回的价值。因此，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一切利润、一切利息和一切地租都是因为以低于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买进劳动力而产生的。

批评马克思的人针对第一卷中所阐述的这种观点，指责他荒谬。他们说，如果马克思所说无误，那么尽可能多使用劳力，尽可能少使用机器，对雇主说来该是上算的事了，因为劳力使用得越

多,他们所得的剩余价值也就越多。但是很明显,一般的情况倒是获利最大的资本家都是尽量使用机器代替劳力,或以工资较低的非熟练工人代替熟练工人的资本家。马克思对这个论点的全面回答直到第三卷出版时才提出。他在第三卷里把资本家最初得到的剩余价值量同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允许他为自己保留的量截然分开。他说前者完全是从资本的“可变”部分得来的,但是每个个别的资本家真正到手的利润往往由于竞争性市场上的讨价还价而降低到平均额,而这种平均的利润率必须按企业所使用的全部资本计算而不单单是按“可变”资本计算。因此,个别企业的利润并不决定于它们所能得到的剩余价值量,而是决定于竞争的条件。很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一家厂商“可变”资本对“不变”资本的比率很高,其“剩余价值”率因此也就很高,但却被一家机械化程度较高、其“不变”资本率也较高的公司排挤出市场。但是,马克思认为这种情况对他的理论的正确性毫无影响。

283 我怀疑,任何人要是只念了《资本论》第一卷,就能了解这就是马克思的真意之所在,我也怀疑马克思本人在最初提出这个理论时就已充分认识到这一理论的含义。但是不难看出,为什么人家由于这种显然违反常识的说法而对他进行攻击时他认为无关紧要。在阅读《资本论》的时候,必须永远记住马克思的整个方法的高度“社会化”的性质。我们已经谈过,一开始他就把种类不同的具体商品——在“使用价值”方面不同的商品——一律化为一堆一堆交换价值而纳入一个共同范畴。然后他又用同样方式来对待劳动,把各种具体形式的劳动当作未分化的“抽象劳动”总体中的单位。同样,他直截了当地把一切资本家都看作是从事剥削的单一的资产阶级中的单位。这一步做到以后,他所着手研究的并不是具体商品或具体种类的劳动的价格受什么条件支配的问题,也不是个别资本家得到多少利润的问题,而是资本主义企业的产品一

方面划为生产性劳动的工资，另一方面划为“剩余价值”的总的情况。关于工资差别、利润、利息、地租等他都没有提出特别的理论。对于这些问题他简直不关心；他所关心的是有产阶级和工人之间的总的阶级关系，把两者都分别当作是性质相同的单位的总体。

因此，马克思所讨论的既不是具体资本家所得到的利润，也不是具体工人或者工人集体所得到的工资。诚然，在他讨论工资问题的时候，他关切地说，计时工人和计件工人之间的表面差别不是根本性的，一切工资都具有一种共同的、潜在的性质。马克思的希望在于始终一贯地强调阶级的统一性，即根本的一致性，他所要说明的并不是每个地区都有许多互相冲突的因素在起作用的资本主义的实际情况，而是资本主义的典型局面：整个体系的每一部分都发展到了辑诎的必然结局，并且按照本身特性所规定的法则进行绝对的活动。马克思对现实世界的复杂情况采用这种抽象化的方法，就形式来说，同正统经济学家采用类似的抽象结构一样，是完全正 284
当合理的，实际的差别在于正统经济学家把一切都分析为个别市场关系的原子化现象，而马克思则走另一个极端，把一切都集体化，提出一个经济世界的范式，在其中抽象资本和抽象劳动成了争夺主宰地位的主角。

因此，在关于剩余价值的总的理论中，马克思所要说明的并不是具体资本家对具体工人的剥削，而是整个工人阶级遭到的剥削。但是他没有也不能把他的分析完全放在资产阶级和工人的全盘关系上，因为他需要分析榨取剩余价值的过程，这就促使他去研究剥削的条件在不同企业或不同时间由于不同的“资本结构”而受到的影响。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结构”不过是指一个企业用来付给生产性劳动的工资的全部资本——即“可变”资本——同用在其他方面的资本，即“不变资本”之间的比例。他认为，如果他所说的“可变”资本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来源这句话是正确的，那么当工人或熟练

工人越来越多地被机器取代的时候，剩余价值对整个资本的比率就有下降的趋势。但是，如果机械化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的话，那么剩余价值的量就有增加的倾向，因为满足工人最低生活需要所需的工时减少了。因此，“剥削率”——也就是工人的剩余产品同劳动力成本的比率——的增加就会补偿资本家的资本总额中产生剩余价值的部分的下降。因此，由于机械化的发展使“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比率得到提高而眼看要被拿走的东西，又由于机械化的发展使生产率得到提高而保留了下来。

纳骚·西尼耳曾经发表过一篇臭名远扬的反对减少工时的言论，断言资本家的利润来自“最后一小时”的产品；马克思对这番话进行了探讨，并根据“有偿”劳动时间和“无偿”劳动时间之间的差别提出了自己对工人遭受剥削的看法。所谓“有偿”劳动时间就是工人生产其生存工资的等值物的时间，而“无偿”劳动时间则是工人在这个限度外继续工作，生产出自己得不到报酬的剩余价值的时间。在生产率上升的时候，“有偿”劳动时间的数目就下降；而“无偿”劳动时间的数目就会增加，除非工人能够争取到劳动日总时数的减少，如果他们的确争取到了劳动日总时数的减少，那么他们不再工作的那几小时就降低了资本家所得的剩余价值，而资本家所能采取的唯一有效办法就是增加每个工时所要求的劳动强度。资本家面临着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趋势，这种趋势是不能抗拒的，否则在争取利润的竞争中就会失败；因此他们不得不改变资本的“结构”，使“不变”资本在资本总额中占更大的比例。这使他们得到了好处，尽管榨取剩余价值的那一部分缩小了，因为机械化使生产总额大大增加，并使“有偿”劳动时间缩短。但是机械化也要求大大增加资本总额，这种资本来自资产阶级手中没有花掉的剩余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剩余价值总量增加了，但是马克思却认为：根据资本总额来衡量，利润率仍然有下降的趋势——如

果在缩短劳动日总时数方面取得任何成就，这种趋势就会更加显著。

这个错综复杂的论点全部都是从马克思最初的一个假定脱胎而来的。这个假定说：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因而只有用来为生产性劳动发付工资的资本才能产生剩余价值。但是必须承认一个明显的事实：具体的资本家所得到的利润，来自他们的生产总成本同他们出售产品所得的总收入之间的差额；这一点同任何具体企业的资本“结构”都没有关系，除非是说资本的“结构”通过对单位产品成本的影响而起作用。情形既然如此，如果马克思所谈的问题跟正统经济学家相同，那么整个剩余价值的概念就会没有着落；正统经济学家看到了这一点，就指责马克思的整个理论体系同市场的实际情况毫不相干，完全是胡说。人们无数次地利用这个论点来驳斥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和他的信从者却丝毫不为所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最初在德国，后来在其他国家发展起来的社会民主党运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整套概念作为理论基础。这套概念成了一种信仰，也成了一种经济理论。由于它所根据的某些根本性论断拿来同资本主义市场的实际现象比较时既不能得到证明，也不能被推翻，于是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和正统经济学家就各行其是，互相指责对方的基本假定，但在论点上又交不上锋因为双方所谈的问题根本不是一回事。

如果在这一问题上所使用的“价值”一词象李嘉图所认为的那样同市场价格具有任何关系的话，那么关于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泉源和尺度的说法要么就会得到证实，要么就会被否定，至少部分说来是这样。认为商品中所投入的劳动量是供求平衡时决定其市场价格甚至决定“正常价格”的唯一因素，简直是不真实的。首先，“劳动量”就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因为任何人要圆满地解释如何把不同种类的劳动变成“抽象的、未分化的劳动”单位时，就不得

不用未经证实的假定作论据，而把一种劳动和另一种劳动的实际工资差额作为衡量的基础。其次，正如李嘉图本人所承认的，生产过程中资本被占用的时间会使商品不亏本的售价受到影响，更恰当地说，在任何一种必须为所投入的资本支付利息或为利润而对生产资料进行投资的制度中，就会发生这种影响。这就是说，在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企业中，为使用货币或资本资金而付息的时间因素都对售价有影响。第三，生产成本不过是决定商品售价的一个因素；同这方面有关的成本并不是全部成本，而只是生产“边际”的成本或者接近生产“边际”的成本。

287 但是这些事实中没有任何一项可以用来否定那种同商品的买卖价格毫无关系的“价值”理论。如果说“价值”的意义干脆就是以劳动为其泉源，那么劳动就是价值的唯一泉源这一论点就毫无办法证明，也毫无办法否定。在这种意义下，“价值”是不能衡量的。事实上，马克思本人就否认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条件下，任何劳动者具有自己的可以衡量的产物；大概这一说法既适用于个体工人，也适用于具体企业或工业所雇佣的工人集体。根据马克思的看法，实际上只有整个生产性劳动所产生的单一价值整体的存在，这种价值整体不能加以分割而把其中某些确定的部分划归某些具体的生产单位。

因此，马克思的价值学说的整个庞大结构无非是根据一个总理论而得出的一组变体，这个总理论说：由于工业产品有一部分归于非工人，所以劳动阶级是受剥削的；这批非工人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一部分产品是由于他们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种垄断使得他们剥夺了工人取得生活资料的权利，除非工人接受条件，让有产阶级有所收益。制订这样一种阶级剥削的理论是不需要马克思的经济学的。认真说来，除了一些复杂的论点以外，马克思没有为这一理论增添什么新的内容；他之所以提出这些论点，主要是他想

把自己的剩余价值学说同李嘉图的价值学说联系起来，他发现李嘉图的价值学说是他那个时代（或者说是他创造自己的理论的那个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接受的。马克思的整个价值学说，在剥去李嘉图学说的那套装饰以后，在抛开马克思本人由于想发挥他的反资本主义前辈所得出的结论而搞出的那一套复杂的论点以后，就不过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论断：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产阶级不经劳动就取得工农业产品的一部分，这就是剥削处于从属地位的劳动阶级。除此以外，也许还应该加上一点：随着生产率的提高，有产阶级从总产品中取得的份额就越来越大，因为维持工人的生活 and 再生产所需要的比例越来越小了。

288

虽然马克思价值学说的庞大上层建筑实际上并没有为这些简单的论断增加什么新内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对马克思就没有用。恰恰相反，他的学说是十分有效的。他的学说使得受其影响的国家里的工人阶级领袖一致认为道理和正义都在他们那一边。把社会主义系统地陈述为一种科学理论而不是一种空想愿望，看来满足了马克思的一大部分要求。他的学说构成了一套令人生畏的逻辑严谨的体系，任何否定其基本假定的人提出任何论点都不足以驳倒它。它成功地掩饰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些假定本身并不象科学方法通常所要求的那样，既没有得到证明，也无法加以证明，或付诸客观检验。事实上，它对信仰和行动起了强大的鼓舞作用；从这种实用的观点来看，它具有达到目标所需要的“真实性”。我丝毫也不是说，马克思意识到他的整个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归根到底是以信仰而不是以科学证明为基础的。很明显，他相信自己的理论体系，而且是真心诚意地提出来的，根本没有意识到他的体系虽以“科学”自居，而实际上却是虚假的，甚至都不是一个能经得起事实验证的有用的假说，而只是一个以未经证明的信念为基础的行动号召。

287

说这种理论结构是“科学的”，那实在完全是用词不当。实际上，这是一种庞大的形而上学结构，同任何可以试验或证明的理论与假说都没有关系。关于商品的价值决定于所投入的劳动量的说法，根本就没有办法核对或验证，除非这些“价值”能够用某种其他测验法来衡量。如果商品的价格同商品的“价值”没有既定的关系，整个价值结构就离开了实际交换的范围，而只存在于一种形而上学的真空中。在提出这种理论的时候，马克思本人或者批评他的人都没有看到这一点，因为当时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确有“正常价格”这一真实现象存在，这种价格同物品在供求力量平衡的条件下进行买卖时的正常价值相符。马克思的“价值”论是根据“交换价值”等于“正常价格”这一古典概念而来的。但是这种概念并不符合马克思的分析，因为他不愿意把一切形式的劳动都看成“生产性”的劳动，而且特别否认积蓄的劳动（即不变资本）能够产生“剩余价值”。因此，他在资本论第三卷里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发现自己不得不使商品的销售价格完全脱离商品价值。于是这就使他的价值学说同任何可以在实际经验中加以衡量的东西完全脱了节。这就需要假定“价值”是一种在理论上可以衡量而在实际中却又完全不能衡量的实体。毫无疑问，这一概念可以认为是有道理的，就象马克思主义者历来所认为的那样，但是就这一最不精确的名词现在公认的任何一种用法来说，这种道理肯定不是“科学的”道理。马克思在自己的最后形式的价值学说中，谈的是形而上学而不是科学，但是令人不解的矛盾现象是：他的社会学说中这一最不科学的部分——因为是最无法证实的部分——居然吸引了而且继续吸引着这么多的自然科学家，而这些科学家在本行的实践中是决不会容忍任何与此相类的东西的。

我想起托尼教授曾经称马克思为“最后一位烦琐哲学家”。不幸，马克思决不是最后一位，不过托尼教授的这句话倒是击中要

害的。托尼教授不是也说过这样的话吗？他说：根本用不着剩余价值学说来告诉自己资本家剥削了工人。但实际上这一学说所公之于世的正是这一点，而且除此以外别无其他。不过，当马克思发挥托马斯·霍吉斯金、约翰·弗朗西斯·布雷以及其他几位“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原先所提出的理论，并把它系统地陈述出来的时候，看来这一理论所说明的似乎远不止此。因为这一理论把正统经济学家当时关于“价值”的说法当作出发点，并从这个基础出发证明工人的饮食之源遭到剥削。

但是，《资本论》——我指的是第一卷——除了头几章所详细说明的价值理论以外，当然还有其他许多内容。这几章本身除了系统地阐释剩余价值学说以外，还谈到了其他许多问题。比如第4章“资本的总公式”就体现了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发展来说明这种生产的特有结构的企图。马克思在这一章的开头就说，“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十六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资本在历史上起初到处是以货币形式，作为货币财产，作为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与地产相对立。”^①然后他接着说，这种特性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之下还持续存在，这话的意思是说：所有的新资本继续以货币形式出现，然后货币在用来购买生产性资产时变成实际资本。根据资本主义制度的这种典型的运行过程，马克思得出了自己的“总公式” $M-C-M$ （货币—商品—货币）。对资本主义以前的个体或家庭生产者来说，为交换而生产的过程一开始是制造可以销售的商品，然后商品变成货币，接着再用货币来购买生产者所需要的某种或某些不同的商品。因此，马克思说，资本主义以前为市场生产的公式是 $C-M-C$ （商品—货币—商品）。与此相反的是，资产阶级企业家一开始就用一笔储存的货币来雇佣劳动力制造商品，然后又出售商品换回货币。

^① 见马克思著《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7页。——译注

因此这个公式被颠倒了过来，变成 $M-C-M$ 。但是，如果资本家到头来仅仅是收回他当初付出的货币，那进行这一生产过程就没有什么意义了；除非他预期收回的量比他当初付出的量多，否则他是不会让轮子转动的。因此，资本主义的运行取决于这个公式中的后一个“ M ”，这个“ M ”所代表的钱数比这个过程开始时的“ M ”所代表的为多。真正的资本总公式是 $M-C-M'$ ，这里的 M' 代表 $M+\Delta M$ ——也就是代表着一个增量，这个增量就是资本家的利润。

我之所以举出这个煞费苦心制定出来的公式，是因为马克思常常用到它。马克思的理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的兴起使得生产从一个商品与商品相交换而货币仅仅用作便利的交换媒介的简单过程变成了一个复杂过程；在后一过程中，所生产的商品不再是目的，而仅仅成了赚钱的手段。因此，资本家关心生产主要并不是为了直接满足自己的需要，也不是为了通过交换来取得满足本身需要的资料，他本质上是一个财迷。对他说来，只有在生产有钱可赚时才值得进行生产。这种情况在典型资本家的最初形式——商人身上最为明显。商人从一笔储存的货币开始，把这笔货币投资在货物上，然后设法用高于成本的价格卖出。在工业资本主义的体系中，这个过程更加复杂，因为工业家主要是以实际生产资料——建筑物、机器和原料——的主人的身分出现，他在雇佣劳动的帮助下运用这些生产资料来生产商品。不过基本情况仍然是一样。资本家开始的时候把货币一部分投资在实际生产资料上，一部分投资在雇佣劳动上。他的目的是在一个时期内不仅要收回他所拿出的货币，而且要取得一个增量，也就是利润。然而在某些情况下，货币的所有者并不以上述方式进行投资，而是放债取息，其目的也是为了收回多于借出数额的货币。在这种情况下，商品从过程中完全消失了，生息资本的总公式干脆成了 $M-M'$ ，这就是说

从货币到更多的货币,中间没有任何媒介。

有人说,资本家插进来并没有大大改变C—M—C这个公式所表示的简单交换关系,马克思在这里就是答复这些人的。正统经济学家陈述理论时开头往往是叙述一个乡镇的街头市场中的交换过程。生产者来到市场,把自己的货物摊开,你卖给我,我卖给你,以货币作为物物交换的方便手段。在正常情况下,交换各方都从交换过程中得到了好处,这就是说在一天结束的时候,他所得到的东西对他说来比他为交换而售出的东西更为有用。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从货币的价值着眼,谁也没有得到利润;或者不如说,这种利润及其相应的损失,是由于判断错误或具体产品临时有多有寡之292类的原因而产生的偶然现象。以叙述这种市场为开场白的正统经济学家往往会接着说,资本主义的巨大竞争市场也遵循着同样的法则;除开意外情况,参与各方不仅都能为其所出售的东西取得公平的等价物,而且能从他所获得的效用或使用价值中得到真正的好处。针对这一点,马克思论证说,庞大的资本主义市场是按照完全不同的原理运行的,因为每个商品出售者的目的都不是为了增加使用价值,而是为了增加货币,而且必然是在使他人受损的代价下取得这种增益的。

那么究竟是使谁受到损失呢?马克思一开始就驳斥了这样的见解:资本家的收益是由于以高于成本的价格出售货物而取得的。他说,情况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他们充其量也不过是彼此欺骗,因为每一笔交易都会有人受损有人得益。他说,除了市场上暂时的讨价还价以外,总的说来,商品都是按价值出售的。除了特殊的垄断情况以外,资本家的利得并不是来自向买主要过高的价钱,而是来自某种完全不同的来源。这个来源就是资本家依靠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控制,能够按劳动力的商品价值购买“劳动力”,并且占有“劳动力”价值和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差额。这样,我们就通过另

一条路又回到前面已经谈过的剩余价值学说上来了。

简单的乡镇交换市场和庞大的资本主义市场的基本差别就在于在前一种市场上，个体生产者首先生产出他和他的家庭成员的劳动所能生产的东西，然后取得他用这些东西所能交换到的东西；而在后一种市场上，除非资本家认为有利可图，否则就不会进行生产，也不会雇佣劳动力。个体生产者不生产是没有好处的，然而他对自己所生产的东西能交换到多少货币或者交换到多少为自己所需要的其他货物又是完全没有把握的。资本家如果认为市场上没有获利的希望，可以在一个时期内根本不生产或是削减产量，这对他却可能大有好处。因此，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直接导致失业，导致时断时继的就业和不稳定状态，并且一再引起危机，
293 这些危机使经济雕敝，迫使工人无法得到自己在没有资本家垄断生产资料的障碍时所能生产的互相交换的物资。

但是，马克思并不是一个“消费不足论者”。他并不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不稳定是由于资本主义面临有限的消费市场，从而受到限制而造成的。有人认为，只要维持比较高的工资水平，商业危机就能由于广大群众的消费力提高而被防止，马克思认为这种看法不值一驳。实际上，马克思在列举“资本主义最后的矛盾”时的确提到了生产资料扩大到超过消费市场的吸收能力的趋势，他的确希望用生产社会化的办法来解决这一矛盾，消除生产力发展所受到的限制。但是他反对这样的说法：工资低是发生危机的原因，他说危机事实上常常是在工资特别高的时候发生的。他着重指出，只要资本主义制度继续存在，有利于工人的产品再分配纵能办到，也无法防止危机一再发生。他相信造成危机的真正原因在于有一种以越来越大的规模积累资本的固有趋势。他认为不断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制度避免不了这种积累的趋势。在马克思看来，有产阶级把产品中的一大部分作为“剩余价值”攫为己有就意味着

这些阶级会不断追求有利可图的机会来运用它们不愿意用于个人消费的钱。技术的发展会使这种积累的一部分在提供改良生产工具方面找到一条出路。其结果会是资本的“结构”发生变化，降低“可变”资本对“不变”资本的比例，从而以越来越复杂的机器取代劳动。这个过程也会使生产规模扩大，总产量增加，因为只有利用新机器生产更多的产品才有好处。此外，即使新机器把旧机器的所有者排挤出竞争性市场，稳步取代旧机器，也只有进行规模越来越大的投资（将使总生产力迅速增加）才足以吸收资本家不断寻求有利可图的出路的资金。马克思说，因此，资本主义存在一种特有的趋势：生产资料扩大的速度高于产品市场的扩大可能达到的速度；这样一来，当新工厂或经过改进的工厂的产品充塞市场时，就必然会引起危机。马克思认为，大约每隔十年就发生一次商业大危机，主要原因就在于此。危机发生的后果是迫使许多现有的生产企业破产，只有把这类企业的产品从市场上消除掉，才能痛苦地恢复平衡。这一步走完以后，整个过程又从头开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对于从危机到恢复，然后又发生新危机的一系列事件作了详尽得多的叙述，力图把“周期”的长短同恢复时期所增加的新资本设备对市场产生充分影响所需要的时间联系起来。不过，这只是他的学说的次要方面。他的学说的主要论点是：资本主义就其根本性质来说是一种以剥削“劳动力”为基础的制度，资本资源的积累速度超过市场吸收其产品的速度是必然的趋势。

当然，马克思也指出，增辟新市场能够遏制这种趋势的恶果，并把这一点当作主要原因，说明资本家为什么要坚持出口，要坚持在世界上落后地区开辟通商口岸，在这些口岸先进国家的剩余产品可以出售，用以交换粮食或原料，或是为将来的利润进行投资。他认为，在他那个时代，这种情况正在发生，使得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推迟了原来本会临头的恶运。马克思理论中的整个这一部

分,包括先进资本主义同经济帝国主义的关系的整个问题在内,在他逝世以后才大大发展(特别是通过列宁),如果在这里充分加以讨论,就会颠倒前后年代。

295 可以看出,马克思远远没有强调资本主义的限制主义的一面,而是强调资本主义的扩张主义本质。在他看来,除非是允许资本主义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扩张,否则它就无法存在。事实上,这种看法是从他的下述观点引伸出来的:工资被压低到劳动者本身的“生产成本”所决定的水平,因而生产率的日益提高就必然意味着劳动者在总产品中所分得的份额日益减少。马克思认为即使利润率根据资本总额来衡量必然会随着机械化程度的上升而减少,但是剩余价值总额却倾向于越来越快地增加,工人为减少无偿劳动时间而作的努力并不足以防止这种趋势发生,虽然他们可能使劳动时间缩短到足以在一定程度内遏止这种趋势。

有人认为工会在调节产品分配的任何“铁的规律”面前都是无能为力的,马克思始终激烈反对这种看法。但是他也充分意识到工会的力量由于两个主要原因而受到很大限制:第一,由于上升的资本主义不断用机器代替工人,从而使大批工人无工可做;第二,由于每当危机发生的时候,其后果之一就是削弱工会的力量,使资本家能把就业率很高时被迫作出的让步至少收回一部分。马克思大力强调资本主义必然会建立一支工人“后备军”的趋势,这支后备军在营业景气的时候,它能够加以雇用,而当衰退出现时又能立刻一脚踢开。马克思看到了这些后备工人在就业率很高的时期是怎样从乡下被吸引到工业区来的,他们又是怎样起了阻止工资象生产力一样快速增长的作用的。同时他也看到了工业化国家日益增长的人口是怎样一方面为资本家准备了更多的劳动力供他们剥削,另一方面又妨碍了劳动“垄断”权的任何有效的增长。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当代资本主义运行所作的分析出现

在追述和说明资本主义各个发展阶段的章节的前面。这几章历史性的叙述占去了第一卷的大部分篇幅，无疑是马克思著作中的杰出部分。人们可能对马克思所系统阐释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学说提出批评，认为他这部分理论所依据的是陈旧的李嘉图教条，基础薄弱。姑不论这种批评究竟怎样，今天谁也不能怀疑，第一卷的历史部分在研究历史的观点和方法上是一次影响深远的变革；也没有人能怀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的说明就其全部主要特征来说大体上是正确的。不用说，关于马克思在这些章节中匆匆谈到的那几百年西方世界的社会与经济史，后来的研究工作又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新的线索，但毕竟是马克思首开这些研究的先河，而且这些研究的总收获也只是巩固而不是代替了他所得出的结论。 296

马克思关于十九世纪初叶以前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总结本身就是一篇杰作，我并不打算在本卷中再加以概述。马克思就最初阶段的商业资本主义和伟大的发明时期取而代之的工业资本主义所作的区别今天已普遍为人们所接受；同样，他对作为一种独立的企业力量而日益发挥巨大作用的金融事业的分析，以及出于他的启发而由后来的著述家加以发挥的如下观点，即一个经济力量越来越集中化和集权化的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即将来临的观点，也普遍为人们所承认。

同《资本论》这些章节中的大部分内容相类似的东西在任何较早的时期都是写不出来的。就象恩格斯在马克思以前所做的那样，马克思也充分利用了英国在1826—1850年间——特别是在1832年颁布改革法案以后——发表的数量日益增多的关于经济与社会问题的官方资料。马克思和恩格斯大大得力于象埃德温·查德威克这样既相信“自由资本主义企业”的优点而又无比热衷于揭发其缺点的人。多亏这些工厂监督、矿山监督、各种专员以及那

些不辞辛苦专门搜集和记录事实的工作人员作了这些有官方保证的直接纪述,没有这些材料,资本主义的运行状况就不可能描写得这样令人信服,栩栩如生。正是马克思先于所有其他学者,首先利用了这些不可或缺的材料,即使没有以此创立一门新学问,至少也为探讨老课题开创了一种新方法,从而使老课题具有广泛得无可比拟的意义。当然,正象恩格斯以前的情况一样,启发马克思采取这种方法的是他们两人的历史观。马克思在《资本论》叙述历史的那些章节中有意识地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他所写的是将来的通史必然要以之为依据的根本历史,而不是补充他所涉及的那个时期的通史的经济史。他把经济因素当作西方各国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来的发展中的统一因素,并且举例说明这个因素在决定整个西方的发展道路方面如何发挥了首要作用。即使是那些拒绝把唯物史观当作人类整个发展的正确指南的人也很难否认,在马克思所涉及的时期和范围中,唯物史观的运用对如何看待事态的发展进程提供了意义重大的新线索;他们也很难否认,在这一方面他的贡献是无比重要的。至少在这一方面,唯物史观是无往而不适用的,所谓适用,倒并不是说它解释了一切事物,也不是说它排除了其他原因所起的作用,而是说它为解释正在改变人类生活面貌的历史变化的来龙去脉提供了一把不可缺少的钥匙;没有它,这些变化是无法理解的。单就这一点而论,就必须承认《资本论》是十九世纪非常伟大的著作之一;也许还可以不失公允地说,这部书对历史力量的杰出分析还使得马克思阐释经济学说的那些大有问题的篇章也受到了过分的欢迎。

《资本论》的后两卷就远不那么重要了,迄今我只是在说明第一卷的意义有必要时,才偶尔提到这两卷。事实上,充其量只能说这两卷在一些问题上发挥了马克思的基本学说,而没有增加任何真正具有根本意义的内容。马克思生前没有能出版这两卷中的任

何一卷，人们通常归因于他的健康不佳；这也许是事实。但在第一卷出版以后不久，第二卷就写出了初稿，而且已经修改得差不多了。因此，如果说第二卷之所以没有出版，部分原因可能是马克思自己感到不满意，担心有虎头蛇尾之嫌，这就不能说是凭空杜撰的说法了。至于比第二卷重要得多的第三卷，正如我们已经谈过的，并不是一本已经完成的著作，而只是从大批手稿中收集起来的许多材料，写作的日期也相距很远，这些遗著是恩格斯在他的朋友逝世的时候继承下来的。 298

马克思在第三卷的第一部分讨论了“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关系，因此也就是“价值”和价格的关系。这一部分的确是已经定稿的著作，而且是第一卷的必要补充。在后面的几部分中，关于生息资本和地租的讨论本身就是很有意义的，是马克思的中心理论的重要补充说明。但是把这一卷读到一千多页，读者就会逐渐看出它不是在引向一个结论；事实上它是在逐渐枯竭，而不是走向一个收场。特别是关于经济阶级的十分重要的一章，仅仅开了一个头，问题简直还没有摆明，也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第一卷尽管有种种限制和缺点，却是一本生动的书，有体裁，有明确交代的目的。第二卷是横插一笔，就一个特殊方面写了许多，其中包括对经济危机的起因所作的重要研究。第三卷是一堆没有头的未竟篇的材料。

人们永远无法知道，马克思之所以没有能圆满地完成他的总计划，除了由于健康不佳，由于恩格斯始终慷慨解囊而一直未能排除的经济困难以外，究竟有多少是由于他的整个工作计划从开始时就具有先天的弱点。马克思在动手写《资本论》的时候，除非自己有所发现，否则就无法知道远在他能写完这部著作以前，资本主义经济就要发生变化，将不再是古典经济学所说的那个样子；他同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都理所当然地认为这种学说大体上

正确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的运行情况，以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支配着财富的创造和分配的法则。他无法知道，他的理论体系竟然不象他所打算的那样，不是对一般公认的、指向完全不同结论的正统派学说的批判，而是一套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完全没有关系的理论结构，那时英国与奥地利倡言边际效用概念的人物已经使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具备了新的形式。他也无法知道，有些东西他本是作为自己和对手都会承认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写下来的，但是正统学派却拒不接受，于是便成了显然专属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比如劳动价值说就是这种情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史不一样，前者在正统经济学发生新转变的时候实际上就成了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著作。马克思是用从李嘉图那里拿来的名词陈述自己的总理论的，他发现自己完全无法使自己的学说适应正统经济学说后来的发展，也无法在自己制定的写作范围内来讨论这些发展。因此，他对正统经济学说中不能纳入自己计划的那些发展抱着轻视态度，干脆置之不理。

马克思未能把自己的理论体系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结构，理由还不止于此。看来实际情况似乎是这样：他在极其敏锐地观察了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的资本主义发展情况以后，就不再对事件的实际动态进行任何实事求是的估价了。因此，他继续估计小资产阶级会不断被侵蚀，因为小资产阶级代表陈旧的小规模的生产方式，他从来不考虑新兴的小资产阶级的重要性。随着大规模工业的发展，行政雇员和管理雇员的队伍也越来越壮大，从而形成了一个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我们看到马克思批评李嘉图没有能够注意到“介于一方面是工人，另一方面是资本家和地主之间的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并且指出，这些阶级的壮大“增强了上层一万人的安全和力量”。但是，马克思说社会上这些越来越壮大的成分中的“大部分都直接依靠”社会结构的“劳动基层所提

供的收入来维持”。这就是说,他认为这些人不是对生产有贡献的积极因素,而仅仅是剩余价值的榨取者。当然,这同他否认经营业务的资本家的劳动能创造价值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这种否定态度使马克思看不到新型中产阶级发展的重要性,这个阶级不仅包括股票持有人或食利者,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还包括大规模工业所雇佣的从事实际工作的监督人员、技术人员和经理人员。马克思仍然预言熟练工人会逐渐消失,而根本没有看到以先进的机器技术为基础的新型技术在多大规模上正在代替旧技术。大多数工人的生活水平虽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他仍然在谈论无产阶级的“日益贫困化”;合股公司的发展已经产生了一批新的小额投资者把资金投入最先进的大生产企业,这时,他仍然在预言小资本家将日益被排挤掉。 300

这等于是说,马克思在写完《资本论》第一卷以后,基本上就不再考虑资本主义的发展了;也等于是说,他后期的经济学著作都是他前期著作的赘物,而不是直接研究后来事态发展的心得。总的说来,《资本论》实际上谈的是资本主义在十九世纪中叶前后的发展情况,而基本上忽略了作者生活的后期所发生的情况。等我们讨论到爱德华·伯恩斯坦在九十年代引起“修正主义”大论战以及本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时,我们还要再谈到这个问题。目前我们所要谈的是继第一国际在巴黎公社所引起的反动气焰中消逝之后,《资本论》对马克思主义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复兴所作出的贡献。在这个阶段,马克思的贡献在于把大量早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说重新整理出来,并系统地加以阐述,下笔发人深省,规模之宏大就更不必说;此外还以新颖动人的笔调令人信服地陈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史,从而大大提高了撰写这段历史所根据的历史发展的总理论的威信。

第一国际崩溃以后,马克思在世的最后几年身体越来越坏,工 301

作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尽管他的经济困难由于恩格斯的慷慨接济而得到了解决。他既然不能圆满地完成《资本论》的后两卷，于是便尽可能不断大力累积新知识，特别是关于俄国和东南欧的新知识。他学习塞尔维亚文和俄文，并对土耳其问题深感兴趣。他的著作在俄国的知识分子中受到欢迎，因而他对俄国大为注意；在他明显地看出西方没有很快发生起义的指望以后，便转而把早日发生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俄国身上。马克思晚年的一批著作中有他为《共产党宣言》的一个新俄文译本写的序言，这个译本于1882年在日内瓦出版，译者是维拉·查苏利奇。马克思在这篇序言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象大多数俄国社会主义领袖所说的那样，俄国农村中所遗留的农民共产主义制度的残余能够当作新社会主义结构的基础，这样俄国就无需经过西欧所经历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他的回答虽然很犹豫，但是同他以前任何时期所作出的答复大不相同。他一开始就肯定地说，自从1848年以来，俄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共产党宣言》在叙述欧洲各个地区无产阶级的前途和政策时，甚至不认为有必要提到那个国家。1848年，欧洲的反动派曾宣布沙皇为其首领，并曾依靠他来帮助摆脱无产阶级的革命。但是现在（1882年），马克思却说在加特契纳躲避暗杀者暗算的沙皇已成了革命的俘虏。“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队伍了”^①。然后马克思又谈到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狂热速度，其中包括资本主义形式的土地所有权的迅速发展；他说，在进行这些革新的同时，“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②。

302 那末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所有制形式呢？或者

^{①②} 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1页。——译注

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①

当时认为这些经常被引用的话意味着马克思支持前面的某一章中讨论过的民粹派理论，并认为这也就是赞同把俄国的革命活动主要集中在农民身上的政策，甚至是赞成马克思所谓的已经使沙皇成为“革命的俘虏”的革命恐怖主义。只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他的追随者和民粹派才在俄国发生激烈的斗争，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分裂为西方化社会民主主义派和规模大得多的另一个运动，这个运动是依靠知识分子在农民群众中煽起革命情绪而发起的。

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发表的那一年，马克思深所缱绻的妻子患癌症死去了，马克思本人也得了不治之症，第二年也逝世了，留下恩格斯继续他的未竟事业达 12 年之久。

人们常常争论：恩格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仅仅是马克思的朋友和忠实的学生，在多大程度上对创造举世闻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起了重要作用。恩格斯本人总是推崇马克思为领导，并且把创造他们共同的学说的主要功劳归于马克思。在理论经济学方面，情况显然是这样，尽管马克思着手研究和批判古典经济理论的原动力是恩格斯在 1843 年所写的一篇长文章。是马克思而不是恩格斯从亚当·斯密、李嘉图以及早期的反资本主义批评家那里搜集材料，创造出在三卷《资本论》中占大部分篇幅的庞大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根据早先对于黑格尔派社会发展学说所进行的 303 研究而创立唯物史观看来主要也是马克思；但是在这个领域中，

^① 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31 页。——译注

要评定两人的贡献孰大孰小就困难得多了，因为在这部分共同的学说成形的时期，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每天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总的说来，我们必须以恩格斯的话为准，主要贡献来自马克思，但是至少恩格斯的功劳也很不小，他们澄清思想而共同写出的著作就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不过这方面的理论的最后形式，总是由马克思决定的。1848年以后，他们两人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析导致欧洲革命运动失败的各种力量，并写出了一些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恩格斯无疑起了很大作用。应该认为在这部分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恩格斯的贡献同马克思完全相等。事实上，在研究当代的发展方面，两人显然是无分轩轻的，他们的通信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恩格斯特别喜欢研究军事问题，在这方面马克思总是尊重恩格斯的意见。自然科学以及辩证法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应用无疑是恩格斯居领先地位的主要领域。马克思的总理论是在他自己的头脑中构思成形的，但是关于方法论几乎没有什么著作，只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回顾性序言中说明了自己研究社会和经济问题所采取的方法是怎样得来的。而另一方面，恩格斯则在编印成书的《反杜林论》和其他地方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就方法论写了很多东西，在他逝世以后很久以《自然辩证法》书名出版的未竟篇的著作里尤其如此。在恩格斯生前，他有关这一问题的著作很少受到注意。事实上，《反杜林论》的后半部分在来比锡的《前进报》上发表时也从主刊中被移到一个学术附刊上去了。在此以前，恩格斯的文 章曾经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受到很多批评，主要理由是这些文章超过了大多数读者的水平，没有什么普遍意义，不值得占那么多篇幅。恩格斯关于辩证法及其同自然科学有关的著作过了很久，主要是在1917年俄国革命以后，才受到欢迎。这次革命使获胜的布尔什维克面临怎样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崭新的社

会的问题，并且以直接而实际的方式提出了怎样为整个人类知识领域的新秩序建立理论基础的问题。在俄国以外，科学的迅速发展，尤其是战争艺术的迅速发展，以及科学对于社会生活每个方面的与日俱增的影响，也使得科学家越来越积极地（虽然并不总是很深刻地）从哲学的角度来探讨自然科学同人类的思想和组织的整个结构的关系。倒向社会主义的科学家希望发现一种符合其社会主义信仰的科学哲学，这是很自然的事。马克思主义对于许多自然科学家特别具有吸引力，因为马克思主义宣称赞成把科学方法应用到社会方面；许多科学家最初接触的马克思主义是经济或者政治理论，进而继续探讨马克思主义对于自然科学本身的适用性。于是，恩格斯的长期受忽视的科学著作这时候时髦起来了，同时也把辩证法带了回来。在这以前，如果说西方并没有完全抛弃辩证法，至少辩证法也远远退居在社会主义思想的底层。

《反杜林论》中只有一部分涉及自然科学或者同自然科学相关联的辩证法。这本书里有很长一部分是谈政治经济学的，其中有一章是马克思写的；还有相当长的一部分谈的是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关于谈经济的那部分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很值得一读，其中有一章很重要，在这一章里恩格斯回答了杜林的如下论断：历史的主要动力是政治因素而不是经济因素。关于社会主义的那部分对唯物观点作了一个非常出色的概括。谈自然科学的主要是前面的几章。恩格斯在这里首先对杜林的哲学展开正面攻击，杜林的哲学是形而上学和实证哲学的混合物，同时还带有他并未能很好消化的黑格尔哲学的强烈影响。这些内容在恩格斯答复杜林攻击马克思的辩证法用语和方法的几章中又曾出现。

实际上，恩格斯在这几章中通篇所论证的是：自然科学必然是辩证的，因为它所研究的是运动和交互作用，而不是被看成相互无关的静止的事物。研究事物时，如果把它看成是静止的、而且与其

他事物无关的话,矛盾就被排斥了,为这种研究所涉及的恰恰是抽象事物。只要从力和运动的角度来考虑事物,认为它既影响其他事物,同时也受其他事物影响,或者说它受其他的力和运动的影响,那么恩格斯所说的“矛盾”就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现,因为每一事物都处在其本身的否定过程中。此外,自然科学和数学都提供了“矛盾”的例子,人们就是以这种矛盾为基础,成功地掌握了自然的力量。恩格斯论证说,整个微积分——这是高等数学和数理物理学的基础——所根据的就是一种矛盾,即数量极小的东西——小到可以忽略的量——等于零。他还说,化学分类提供例子说明质的差别的基础被发现是量的差别,因为人们发现十分不同的物质只是在构成它们的不同种类的原子数目方面有所差别而已,而在比例方面则是没有什么差别的。这里又从辩证法的角度,以一壶开水为例,用以支持质的差别通过分析可以化为量的差别的论断,如此等等。

当然,恩格斯并没有宣称他自己、马克思或者是黑格尔发明了辩证法。恰恰相反,他坚持说,在思考现实而不是思考抽象概念的时候,自然而合乎常理的方式是应用辩证的方法,因为这种思想方法是人类必须对付的实际力量加在他们身上的。他说马克思和他自己的贡献是他们从实际事物而不是抽象概念出发,成功地应用辩证法研究了历史和社会,并且同研究这些问题的“形而上学”方法分了家。当然,他们所应用的辩证法是“唯物主义的”,恩格斯这样说的意思主要是他们从事物本身出发,而不象黑格尔和所有
306 唯心论者那样,从事物的观念出发。但是这里所说的“唯物主义”不是以前所说的那种旧“唯物主义”,以前所说的那种“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和思维是两种不同的实体;这里所说的唯物主义是摆脱了这种二元论的唯物主义,不同于“观念”的思维被认为是自然的一部分,并且受自然法则的支配。本书的第一卷曾结合唯物史观

讨论了这种“唯物主义”的意义，这里没有必要再重复。我们所考虑的是恩格斯在谈辩证法的时候说辩证法来自事物，而不是把辩证法安在事物身上。他说，辩证法并不是任何人的思维的自由创造，任何观察者只要没有被唯心论迷住了心窍就能看到这一点，而且只要根据自己通过辩证法所发现的法则来运用自然界的力量，也能自行证实这一点。恩格斯说，“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①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为回答杜林的论断——即政治因素是形成人类历史的主要因素的论断——而写的三章，最出色地说明了他在社会研究方面应用辩证法的情况。恩格斯说，经过分析，这一论断似乎是说，历史发展的线索应该到某些人运用暴力去压迫其他人的方面去寻求。恩格斯说，暴力始终不过是一种手段，使用暴力的目的是经济利益。让我们拿奴隶制来看。在役使战争中的俘虏从事生产性劳动以取得经济利益的情况出现以前，俘虏是被杀害而不是留下当奴隶的。奴隶制曾经是发展生产力所必需的手段。“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慧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为人所公认、同样又为人所必需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深入地研究一下，那我们就一定会说——尽管听起来多么矛盾和离奇——在当时的条件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②

在这里恩格斯是反驳那些想在绝对价值的基础上确立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其中包括欧根·杜林在内。恩格斯说，这样的价值是不存在的：一切价值都是相对于时间和地点的条件而存在的。 307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1页。——译注

② 同上书，第220页。——译注

不仅是奴隶制，以后的农奴制和雇佣劳动在各自的时代里都是很大的进步。同样，破坏土地原始公社所有制也是很大的进步，因为这是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方法。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远远不是由于一个高压的统治阶级对土地的耕作者进行强制，而是由于耕作者本身觉察到，只要摆脱原始集体主义的束缚，他们就能够改善自己的处境。恩格斯说，那种认为反动的经济制度是本国或者外国的政治征服者强加在无可奈何的国民身上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或者更确切地说，这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和经济发展相比，暴力在历史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第一，一切政治权力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随着社会成员由于原始公社的瓦解而变为私人生产者，因而和社会公共职能的执行人更加疏远，这种权力加强了。第二，在政治权力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它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就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就加速了。或者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这少数例外就是个别的征服事件：比较野蛮的征服者杀光或者驱走某个国家的居民，并且由于不会利用而使生产力遭到破坏或衰落下去。”^①

恩格斯说，一般说来，实际发生的情况决不是这样。在社会的内在发展过程中，政治力量通常总是跟随和依靠经济职能；在大多数经济落后的民族征服先进民族的外来征服事例中，胜利者都是被迫采用被征服者的比较发达的方法。经济力量通常总是占上风。这种力量对理解人类历史各个相继发展的阶段说来是唯一的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2页。——译注

总线索。

当然，这也意味着资本主义比起以前的制度来是一个进步，³⁰⁸并且在其本身的时代对增加生活资料起了有利的作用。事实上，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有明确的说明，而且也是其中一个主要部分。姑不论马克思和恩格斯谴责资本主义的压榨是多么激烈，他们之所以攻击资本主义倒不是由于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天生就是坏的，而是由于资本主义过时了，或者快要过时，正在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恩格斯着重指出，这种态度不过是他们对待人和自然的总态度的一部分。他说在知识领域里，不可能得到绝对的真理，一切“真理”都不过是人类知识发展过程某个具体阶段中可能得到的最大近似值。这种真理就是后来所谓的“实用主义的”真理，它们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不论它们多么不完善，毕竟能使人掌握包括人本身在内的自然力量去改善自己的生活。正是由于所有这种真理都是不完善的，所以它们全都包含着“矛盾”的因素，但所幸它们全都是可以修正和改进的，因为每一代都以前一代的成就为基础。

有些社会主义者自称其理论体系所根据的是绝对的道德原则，并且指责人类过去的全部历史不符合他们的理想；恩格斯（马克思也是这样）对这些人表示鄙夷，他认为不论何时何地处理当时问题都有其实际可行的方法，而唯一真正的解决办法就是为当时条件所允许的那种不完善的解决办法。然而恩格斯相信（马克思当然也是这样）工业生产率的提高已经达到了——而且在历史上是第一次——没有必要再进行阶级压迫的地步。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如果把资本主义垄断强加于生产的障碍清除掉，就能够生产足够的东西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就这一点来说，他们本身也是“空想主义者”，但是他们之所以是“空想主义者”并不是因为他们鼓吹普遍的和绝对的权利或要求，而是因为他们过高地估

计了科学革命所能立即实现的生产进展的程度。

309 他们的相对观点说明了他们反对把“平等”作为社会主义的口号,这在《反杜林论》和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显示出来。恩格斯说,人显然是不平等的,他们的生产力显然就不平等。只有在平等意味着没有人为了人为的歧视的意义上要求人类平等才是合理的。阶级就造成这种歧视,现在既然已经无需用阶级来组织生产,而且阶级事实上已经成了生产的障碍,那就应该把它消灭掉。此外,当熟练劳动的训练工作成了社会职能,并且是由社会而不是由个人出资的时候,报酬的差别就可以缩小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受过训练的人就没有理由再提出这样的要求:由于他受过训练,生产率较高,因而应该得到较高的报酬。但是就连这种情况也同平等无关,因为人的能力、勤劳程度和所学得的技术都有差别。

正如我们已经谈过的,当俄国人不得不面对在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管理制的基础上建立新社会的实际问题时,恩格斯著作中这个当时受到忽视的部分,被他们全部如饥似渴地接受下来了。本书以后的某一卷要讨论马克思主义如何解释共产主义,那时我们还要进一步谈到这个问题。那时,我们将会看到恩格斯得到了应得的荣誉,在创造“科学的社会主义”方面,同马克思几乎居于同等的地位。但是在恩格斯那个时代,他是马克思的信从者和解释者,而不是以创造性的思想家的本来面目出现的。当然,每当涉及马克思的时候,他自己的那种谦虚的态度,也加强人们对于他的著作的这种看法。

最后,我们必须问,这一对伟大的孪生兄弟是何等样的人?不论他们是好是坏,毕竟是他们俩把以前所有的社会主义都抛到一边去,并且强使十九世纪后期和本世纪的大部分社会主义都接受了他们的思想。从他们公开的著作和亲切的通信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是傲慢的,对于对立的理论家不是宽宏大量的。他们相

信自己发现了理解人类历史的线索，从而也发现了人类当代斗争的南针，因此他们特别看不起那些好心肠的思想家，这些人在他们眼里都陷在绝望的形而上学的泥沼中而无以自拔，或者仅仅是为一片好心所驱使，对于实际形成社会发展的力量了无所知。此外，³¹⁰他们还动辄骂那些敢于批评他们著作的人不真诚；他们在辩论过程中骂人的习惯是德国的传统作风，而十九世纪在英国以至法国的学术辩论方式中这种作风已经很少见，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俄国弟子们却继承并大大发展了这种作风。特别是马克思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流亡者所特有的弱点，这种顽固的弱点使得贫病交加的处境更加恶化了。尽管他在伦敦住了那么多年，尽管他对英国的状况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他始终没有能进一步了解英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更不要谈接受了。他对法国人倒是了解得多，但是并不喜欢他们。他一直是一个地道的德国人，始终相信德国的思想是唯一真正深刻的思想，德国——新生的社会主义的德国——的使命是在即将来临的社会主义革命中起领导作用。恩格斯对英国人的了解比马克思深刻得多，因为他必须同他们做生意，而且也必须生活在他们之中；此外，他的气质也外向得多。但是每当恩格斯为捍卫马克思而反驳任何敢于批评或反对马克思的人的时候，他在谩骂方面却往往比他的朋友更胜一筹，他动不动就骂人愚不可及，或怀有不可告人的动机。

从气质上说，马克思是一个学者。他确实不喜欢自我吹嘘，除了思想以外，也确实不喜欢宣扬自己的为人。每当恩格斯想要替他捧捧场的时候，他们两人就意见不一致，因为他一方面非常希望自己的著作受到重视，另一方面又不喜欢大肆宣扬自己个人的事迹。恩格斯要老练得多，恢复能力也强得多。恩格斯身体很健康，而马克思虽然身材魁梧，却常常为疾病所苦，难得过几天健康日子。马克思非常钟爱自己的妻子和家人，因此痛恨贫困；恩格斯为

人非常慷慨，虽然不得不多年忍受与性格不合的职业给自己带来的烦恼，但却没有经济拮据的时候。

311 这两个人尽管有种种不同，却建立了非常良好的合作关系。恩格斯费了很大力气使马克思的研究摆脱虚抬身价的抽象概念而走向现实主义。也正是恩格斯为马克思指出如何在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一门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用英国的兰皮书来说明他们共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理论。我们可以肯定，即使不谈金钱方面的帮助，如果没有恩格斯的鼓励，马克思就永远无法写出《资本论》，也永远无法对他那个时代的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他实际已产生的那种影响。

然而，恩格斯是一个活跃而不深刻的思想家。他满脑子思想，但是可能谬以千里，比如他所说的以下一番话就是这样：普法战争时，“武器已经如此完善，以致不能再取得具有任何变革作用的新的进步了……”^①，又说，“往后的一切改进，对于野战说来，都多少是无关紧要的了。”^②（见《反杜林论》）。他轻易地一下子跳到结论上去，而且囫圇吞枣地接受概念，而不去非常仔细地进行观察。在马克思生前，他比他的同伴马克思还马克思主义。只是在马克思死后，他才开始在原先一向尊重这位同伴的判断的那些问题上进行独立思考。于是，比如在历史的形成方面，他才认为非经济因素具有很大的次要影响，此外在实际问题上也使自己的想法适应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实际发展，尽管这个党的实际发展同他和马克思在制定哥达纲领期间希望它具有的形式显然存在差距。恩格斯非常热情，远不象他那位更加渊博的同伴那样感到直接思考是一件困难的事。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作为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科学

^{①②} 恩格斯著《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9页。——译注

——的概念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他们尽管看不起奥古斯特·孔德,但是完全同意他从圣西门那里得来的看法:十九世纪的主要使命就是要把那些在自然领域中创造了那么多奇迹的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类社会中来,创立一门“社会的科学”,为“科学百科全书”作一番润色,并把先验思想从最后一个据点中驱逐出去,使得任何形而上学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他们两人也象孔德一样,认为历史提供了创造这种最后和最高形式的科学材料。但是他们认为孔德是个骗子,因为孔德的“社会科学”建立在心理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实际研究上,同时也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孔德关于“秩序”和“进步”的作用的概念是以错误的反题为基础的。从本质上说,他们是革命者,孔德则肯定不是。孔德认为了解当代社会事件以及解释人类历史的线索是社会的团结,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认为阶级冲突。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阶级”代替了黑格尔学说的“观念”,成为了解历史的主要线索。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形成他们的基本概念的时候,当时经济发展的突出作用显然是大批几乎没有技术的工厂工人(可以单纯看作是劳动力这种商品的没有差别的单位)打垮和取代了个体手工业生产者。各地的早期工厂制度都有这种特点。这是取代个人技术,把工人变成动力机器的附属品从而降低生产成本的一种手段。对工业革命时代的资本家来说,动力机器的主要优点是使他们能够雇用几乎不掌握技术的劳动来进行生产率很高的生产。马克思根据自己的见闻和在关于上升中的工厂制度的兰皮书里所读到的资料作出结论,预料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还会使这种取代人的劳动的过程大大发展,直到所有的工资劳动者都变成一个不分彼此的抽象劳动力整体为止。在马克思逝世以前,事实上在《资本论》出版以前很久,就最先进的工业地区——特别是建设工程和资本商品制造工业中——所发生的情况来说,

马克思的预见已经成了严重谬误的写照，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马克思始终没有对英国不断改变的工业状况进行直接的研究；他原先在恩格斯的敦促下进行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对于比英国晚得多才开始机械化生产的国家来说，有一个时期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能成立的。

可见，马克思始终没有去重新考虑自己最初就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趋势如何影响工人所作出的结论；他仍然主要从非人格化的不熟练的工厂工人整体跟同样非人格化的集中的资本整体相对立的角度去设想工人阶级。他严重地误解了英国工会所发生的情况，而他正是依靠英国工会领袖的帮助建立第一国际的。他认为他们的同业工会主义是一种反动的表现，而实际上这却反映了生产性质的改变，并且预示技术和职业的划分将越来越细，而不是把整个无产阶级降低为一批无分彼此的越来越贫困的牺牲品。恩格斯有比较丰富的工业知识，本应能够纠正马克思在这方面的错误看法，但是他始终没有这样做。事实上，马克思在世时也同他的朋友一样，不了解技术改革所产生的新力量，技术改革使得冶金业，而不是纺织业，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主导。

这些看法上的缺点远远没有使马克思主义受到阻碍，反而使它更容易为人所接受，不过不是在英国，而是在仍然不得不追赶英国的那些国家中。这些缺点使马克思主义尤其适合如下地区的产业工人的心理要求：这些地区遭到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企业的侵入，而又没有经过英国工业发展的中间阶段。马克思主义非常适合十九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的德国的情况，甚至更加适合1917年以前俄国经济中范围很小、但机械化程度很高的工业地区的情况。这些差别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成为大陆社会主义运动主体的理论的时候，并没有能对英国产生类似的影响。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是对处于特定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生

产所作的强有力而又深刻感人的分析；就马克思主义以研究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的资本主义的实际运行情况为依据这一点来说，有 314 几分理由可以说它是“科学的”。但是在马克思不再写经济和社会史，而写起理论经济学来的时候，他就不再象一个研究事实的科学家了，而是用一种非常不科学的、事实上是形而上学的方式，从自己的脑子里编造出一套理论来。李嘉图及其直接继承者的全部古典经济学结构的基础，就是根据抽象的叙述所作出的演绎。这是一种逻辑结构，它之所以言之成理，是由于它同市场经济中的事实看上去类似，但是它不是根据这些事实所作出的归纳为基础的，也不能用这些事实加以证明。马克思全盘接收了这种以演绎推理为基础的体系，根本没有看透它的非科学的本质。然后，他在“批判性的”评价的幌子下，又在这个体系上面另加了一个演绎性的结构，结果是更难用任何以事实为依据的方法加以证明。马克思的理论性的经济学是否正确，也许还是一个争议不下的问题。这套理论的内在连贯性可能是有的，作为一套根据原始假定而作出的演绎来说在逻辑上也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从“科学”一词的任何正确意义来说，却决不是“科学的”。

第十二章

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克鲁泡特金

在 1910 年出版的第 11 版《英国百科全书》上，关于无政府主义的那一条是彼得·克鲁泡特金亲王执笔的。在巴枯宁死后，他便成了后来所谓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克鲁泡特金叙述了作为一种社会理论的无政府主义及其历史发展，并且顺便谈到了暴力问题以及这个问题同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关系。他说一般公众有一种印象，认为暴力是无政府主义的基本要素，其实远远不是这样。无政府主义者采取暴力行动是为了报复依靠暴力的政府对他们所采用的暴力。“一切团体使用暴力的程度是根据其公开行动受到压制的程度，以及非常法使其成为非法的程度而定的。”克鲁泡特金以上这句话当然是暗指 1878 年以后德国和许多其他国家所制定的非常法。这种法所针对的不仅是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是所有各种被认为散布革命思想的运动。

《英国百科全书》的编者在克鲁泡特金所写的这一条下面加了一个很长的脚注。在这个脚注中，编者列举了一长串“无政府主义的暴行”。从 1878 年开始，这种暴行八十年代在西方世界各国政府和警察部门之间造成了普遍的惊恐。后来人们把暗杀当作政治武器的作法叫作“用行动宣传”，当然这种作法在 1878 年就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亚历山大二世始则解放农奴，以改革者的身分登位、继则恢复反动和压制的作法，并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采取坚决行动，铲除俄国知识分子中的激进团体，从此以后，暗杀在俄

国就象时疫一样蔓延开来。从 1866 年卡拉科佐夫的暗杀企图开始,这一期间对沙皇采取了一长串的暗杀行动,同时其他首要反动官员也受到了袭击。1877 年和 1878 年,沙俄当局再次掀起高压浪潮,这又激起了一系列恐怖行动;尽管沙皇随之恢复了比较温和的政策,这些恐怖行动还是到 1881 年因沙皇断送了性命才告终。

在俄国以外的地方,虽然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暴力行动过去很普遍,但是对国王和警察首脑的政治暗杀尝试并没有发生过任何重要的影响。新的发展(对西欧说来是新的发展)开始于 1878 年,这一年几乎同时有人企图暗杀德国皇帝威廉一世,西班牙国王阿尔芳索十二世和意大利国王洪别尔。这些暗杀企图使俾斯麦得以诱使国会通过他要求数年之久的反社会主义者法;这也使得教皇在同年年底发布了反对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通谕——“关于宗座的职能”。

《英国百科全书》的编辑在脚注中解释说,他之所以要在克鲁泡特金所写的那一条下面加注说明“无政府主义者的暴行”是为了“便于读者在估计能找到资料的条目下把事实叙述出来”,不过他也说“一般公众不加区别地看待无政府主义学说从那个角度上说来是混淆名词”——所谓“从那个角度上”意思是指“哲理无政府主义者否定他们同无政府主义暴行的关系”。

1878 年以后使整个无政府主义运动蒙受极坏名声的那些活动,参与其事的无政府主义者人数始终是很少的。企图暗杀沙皇或某一首要暴吏的俄国人大都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民粹派,即激烈反对沙皇压迫的革命者以及相信通过农民起义来发展某种农业社会主义的人。这些人是彼得·拉甫罗夫或流亡中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信从者,而不是涅恰也夫或巴枯宁的信从者。在西方,除了西班牙和意大利以外,即使刺客是无政府主义团体的成员,也完全是以个人身分采取行动的,或者最多也只是几个人结成一伙。而

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如果有人数较多的团体卷入暗杀行动,那也主要317 要是由于这两个国家的悠久传统,而不是由于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一词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一般所了解的意义是“用行动宣传”,把暗杀当作主要手段;就这一意义来说,无政府主义决不是很多人的信念。但是不搞暗杀的无政府主义者又不愿意完全同搞暗杀的无政府主义者脱离关系。一个原因是,他们跟许多并非无政府主义者的人抱有同感,认为在俄国搞暗杀对广大俄国人民和任何反对沙皇警察制度的人所遭受的迫害来说,是一种完全正义词严的报复;而那些为某一国家的暗杀行为辩护的人就很难完全反对另一国家的暗杀行为。另一个原因是,许多从不搞暗杀的无政府主义者愿意在理论上为暗杀辩护,认为这是一种反抗整个专制主义制度的手段,也就是被压迫者唯一可以用来对抗国家暴力的手段。事实上,这正是克鲁泡特金自己的态度,尽管在实践中他极力反对在西方国家采取“用行动宣传”的政策,因为这很可能加重而不是缓和当局的压制。

1878年以后,“无政府主义的犯罪浪潮”继续高涨。那一年在俄国,维拉·查苏利奇(1851—1919)枪杀了反动的沙皇警察总监特列波夫,由于被杀者不得人心,她被无罪开释了,后来她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很出名。两次企图暗杀德皇威廉一世的那些人都同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派有些关系。第一次进行暗杀的埃米尔·海因里希·马克斯·霍德尔是萨克逊的一个薄铁匠,后来成了左翼杂志的报贩。三星期以后步霍德尔后尘,进行暗杀的卡尔·爱德华·诺比林是波森地方上层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但是这两个人看来都是完全独立行动的,没有任何组织背景。几个月以后想暗杀阿尔芳索十二世的胡安·奥利维·蒙卡西是一个流动箍桶匠,他好象也是单独行动的。至于第二年进行类似暗杀活动的奥特罗·伊·冈萨雷兹是否有任何政治背景,还不能肯定,至少没有追查出来。

企图谋杀意大利国王洪别尔的吉奥凡尼·巴萨门特是一个公开参加国际的职业厨师，但是没有发现国际的意大利支部同这一事件有关系。 318

另一方面，俄国的恐怖主义运动则有严密的组织。这个队伍虽然有无政府主义者，但大部分都不是明确的无政府主义者。这个运动是从民粹派的革命传统中产生出来的，同样深受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巴枯宁的影响。其直接来源可以说是 1862 年建立的“土地与自由党”^①。这个团体发表了一个宣言，维护进行革命的权利，要求成立制宪议会为建立自由的俄国社会制定一部新宪法。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解放农奴以后出现的失望情绪越来越强烈；波兰暴动以后，俄国又恢复了高压统治，这时类似上述宣言的文件屡见不鲜。六十年代，发生了零星的农民起义，通常称为“崩塔尔运动”（“bunt”意思就是起义或暴动）。这些起义遭到了残酷的镇压，一时革命运动几乎被摧毁殆尽，不过涅恰也夫和其他鼓动者还在继续小规模地进行宣传，特别是在学生中间。

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到民间去”的运动出现了，这是一个广泛的基本上自发的运动，目的在于跟人民生活在一起，既教育他们，又向他们学习，以便为革命性的变革铺平道路，姑且不考虑这种变革是否需要通过暴力。这个走向人民的运动在 1872 年和 1873 年达到了高潮，但遭到了大规模的逮捕、监禁和西伯利亚流放，几年之内就被摧毁了。这个运动的命运迫使许多以前不愿意采用恐怖方法的人也接受了革命的恐怖主义概念。最初，这种影响表现为单枪匹马地暗杀恶名特别昭著的沙皇官员的行动，其高潮是 1878 年维拉·查苏利奇刺杀特列波夫被无罪开释的事件。此后，凡属于同这类事件有牵连的罪犯都得不到陪审团的审讯。

^① 或称“土地和意志党”，Volya 在俄文中兼有意志和自由两种意思。

在此以前，“土地与自由党”已经恢复起来。最初它并不是一个恐怖主义团体，虽然它并不排斥采取暗杀行为以报复当局处决
319 “鼓动者”的做法。但是到了第二年，这个党就分裂成为两个对立的团体。一派名为土地重分社，主要致力于向农民宣传彻底重新分配土地而不向地主偿付价款的主张。这一派虽然不是在一切情况下都绝对谴责恐怖主义活动，但是本身并不干这种事，格·瓦·普列汉诺夫是这一派的成员。另外一派规模要小得多，组织纪律也严格得多，名为民意党（或人民自由党）。这一派反对当局残酷镇压一切宣传活动的做法，以恐怖运动进行报复，最高目标是刺杀被党员目为反动首脑的亚力山大二世。

在这个新运动中，安德列·伊凡诺维奇·热里雅鲍夫（1850—1881年）很快就成了杰出的领袖。他的主要付手是索菲·彼洛夫斯卡娅，她是一个参加运动的贵族，最初属于土地重分社。热里雅鲍夫本人是农奴的儿子，但是受过高等教育，在学生时代就由于参加温和的革命活动而出过事。他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主张在一切其他方法失败以后通过革命建立制宪议会的人。当局的迫害使他走向极左翼；他从亚力山大·米哈伊洛夫（1857—1883年）——这个组织的主要鼓舞者手里接过了领导权。在运动声势很大的基辅，杰出的人物是凡勒里安·奥辛斯基（1853—1879年），他在民意党的活动达到最高峰以前就被捕而且被处决了。米哈伊洛夫也在1880年被捕入狱，三年以后死于狱中，没有参加民意党短暂而轰动一时的活动的最后阶段。

民意党由热里雅鲍夫所指挥的一个执行委员会领导，这个名震一时的“执行委员会”曾宣布坚决要刺杀沙皇，以报复他一度表示采纳自由原则而后来又予以背弃的做法；从此这个委员会的各项宣言就传遍了整个欧洲。1878年以后，委员会不断组织暗杀亚
320 历山大的行动，另外一些活动本不是委员会策划的，也归到它身上

来了。1879年,教师亚历山大·索洛维约夫(1876—1879年)因暗杀沙皇而被处决;第二年,细木工斯切潘·哈尔士林(1857—1882年)设法爆炸了冬宫的餐厅,沙皇完全出于偶然才得以身免。这两人都不是根据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的命令行事的。事实上,哈尔士林好象是单独行动的,是为了报复破坏他在1878年组成的北方工人协会而采取行动的。他没有被发觉,但是1882年在敖德萨参加刺杀斯特烈耳尼科夫以后,就被逮捕处决了。

在恐怖组织中,唯有民意党公开表示要刺杀亚历山大二世,并一再设法实现其决心,因而为人们所注意。在1881年最后获得成功以前,至少有四次暗杀是由该党直接组织的。其中有一次是由列奥·哈特曼(1850—1913年)和索菲·彼洛夫斯卡娅等人爆炸沙皇从南俄返回圣彼得堡时所乘坐的火车,结果炸毁了皇家专用列车中的一节行李车。哈特曼是德国血统的俄国人,“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后来他逃到了国外,在法国定居下来。俄国政府要求引渡,但是法国政府——弗雷西内的政府——拒绝把他交出来,不过后来还是把他驱逐出境了。这是欧洲著名的案件。哈特曼后来到了伦敦,结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民意党——或者说是民意党的残余力量——驻国外的代表。他始终没有再回俄国去。

热里雅鲍夫集团所组织的哈特曼事件是在哈尔士林的暗杀事件以前进行的。同一年(1879年),还有其他暗杀不得人心的沙皇总督和官员的事件,接着就接二连三地进行逮捕、监禁和西伯利亚流放,同时还处决了一些人。1881年初,出现了一段间歇时间,因为民意党担心被捕者受审时会受到不利影响而把行动推迟了,接着便是断送亚历山大性命的最后一次暗杀行动。事实上,当时采取了两次行动,一次是在估计沙皇要经过的一条道路的路面下埋设炸弹炸掉他所乘的马车,但由于沙皇在最后时刻改变了行车路线而没有成功;另一次是由一个单身革命者在沙皇经过的时候向他

投掷手榴弹，结果成功了。热里雅鲍夫亲自组织了后一次暗杀，但是他在预定进行暗杀的头一天被捕了。索菲·彼洛夫斯卡娅接替他领导这个组织；当时接连迅速地扔出两枚炸弹，头一枚没有命中，扔的人是尼古拉·莱萨科夫(1862—1881年)，他是热里雅鲍夫亲自物色的一名青年工人；第二枚炸弹把扔的人和沙皇一起炸死了，这个人也是工人，名叫伊格纳季·格利涅维茨基(1856—1881年)，在民意党的工人支部中很活跃。

莱萨科夫当场被捕，他同暗杀集团的另一个名叫提摩西·米哈伊洛夫的青年冶金工人由于想保命，招出了同谋，于是警察当局就把当时仍然逍遥法外的活跃的民意党领袖几乎全部捕尽。事前已经入狱的热里雅鲍夫坚持承担自己应负的全部责任，并且坚持要同直接参与暗杀的人一道受审；他、索菲·彼洛夫斯卡娅、莱萨科夫、提摩西·米哈伊洛夫以及准备炸药的尼古拉·基巴尔契奇经过没有陪审团参加的即席审判以后被公开处以绞刑。附带说一句，这个基巴尔契奇留下了一种喷气飞机的图样，这些图样经布尔什维克从警察局的档案中发现以后，使得他在今天的苏联被誉为喷气发动机的真正先驱者。他是一个十分杰出的技术人员，表面上从事无可指责的事业，暗地里则为恐怖分子工作。

民意党幸存的执行委员发表了一份兴高采烈的宣言，主题就是亚历山大二世的遇刺。但是由于莱萨科夫等人的供认，它的领袖相继被捕，这个组织实际上几乎瓦解了。它的工人支部和武装部队中的支部几乎完全遭到破坏；后者是在海军军官尼古拉·苏哈诺夫(1853—1882年)领导下的武装部队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支部。维拉·费格纳(1852—1949年)为复兴这个组织作了一番努力，但由于她在1884年被捕而结束。她同其他未被处决的大多数322人一样，被判处无期徒刑。许多人都死在狱中；只有少数几个民意党领袖活了下来，在1905年的革命中被释放出狱，费格纳就是

其中的一个^①。

1881年，也就是亚历山大二世被暗杀的那一年，美国总统加菲尔德也被暗杀了，但是凶手同任何无政府主义或恐怖主义运动都没有任何联系，尽管曾一再企图建立某种联系。亚历山大被刺以后，民意党宣布暗杀是它搞的，并且扬言，如果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不改正做法，还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亚历山大三世远远没有照办。在亚历山大二世生前，他的首相洛里斯—梅里科夫伯爵曾尽最大努力说服他采取温和的行政措施并改革宪法。亚历山大三世比他的父亲反动得多，掀起一个新的镇压浪潮。在伦敦，德国无政府主义者约翰·莫斯特在自己的杂志《自由》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为刺杀亚历山大二世这一行动辩护，因而坐了16个月的牢。他刑满后移居美国，在那里又重新办起《自由》杂志，在美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莫斯特于1880年在伦敦创办《自由》以前，曾有过一段多事的经历。他出生在德国，曾先后在瑞士和奥地利当装订工人。1869年他以叛国罪在奥地利被判处徒刑，但遇大赦而被递解出境。回到德国后，他因赞扬巴黎公社又被判处徒刑。他曾先后在萨克森的克姆尼兹以及柏林担任《自由新闻报》的编辑，在克姆尼兹时，他曾经支持一次冶金工人的罢工。1874年，他当选为国会的社会民主党议员，但是他成了无政府主义者，1878年失去议席。

莫斯特关于暗杀亚历山大二世的文章是1881年发表的。同年，伦敦举行了一次国际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大会；此后，人们普遍认为这次大会建立了一个秘密的新国际以代替已经解散的国际工人协会，并且相信这个半虚幻的组织是暗中搞出各种“用行动宣传”的花样的幕后指使力量。伦敦代表大会有法国、比利时、瑞士、意大利、323西班牙、德国、奥地利和美国的代表参加，事实上会上出现了很大

^① 本书下一卷将结合俄国社会革命党的发展更加详细地讨论民粹派运动。

的意见分歧,以致不可能成立任何有效的中央指导机构,即使撇开不谈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同大多数与会者的自治观点完全不相容。

事实上,1879年在瑞士拉绍德封举行的一次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大会的确在原则上同意了“用行动宣传”的作法;但是那些赞成这种作法的人——包括克鲁泡特金在内——之所以赞成,大部分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在俄国当时的条件下采取这种行动以回答极端的镇压是合情合理的,再不就是从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基础出发予以赞成的,而不是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出供大家普遍采纳的政策。

1882年,当法国政府开始大肆逮捕无政府主义领袖的时候,这个问题又具有了新的面貌。但是,为了了解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法国无政府主义的情况,必须首先说明一下法国工人阶级运动在巴黎公社崩溃以后的一般情况。有一个时候,这个运动已经几乎不存在了。一切被怀疑抱有战斗性意图的工人组织都遭到了破坏:1872年的一项法律规定,参加任何一种国际性团体都是应受惩处的犯法行为。行业工人联合组织——地方工团联合会——之所以能够朝不保夕地苟延下去,完全是因为他们否认自己有任何战斗性的意图,并且宣布支持和解,支持同保护协会采取联合行动。1872年,地方工团联合会在巴黎以“工会联合会”的名义成立了一个组织,但是这个组织立刻被警察当局勒令解散了。法国政府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来调查劳工状况,这个委员会一直存在到1875年,它从许多资方团体收集证据,但是没有从工人团体收集材料。1873年,依靠私人捐款派了一个工人代表团参加维也纳国际博览会,但政府拒绝给予协助。直到1876年,人们才采取步骤重建全国性的运动。这一年,在巴黎举行了一次全国劳工代表
324 大会,大会是温和派组织的,他们小心翼翼地使大会按照自由派可以接受的路线进行。事实上,大会的基调是互助主义和合作主义

的，它宣布反对阶级斗争，主张采取雇主和工人合作的政策。大会通过的一项进步决议号召推举工人竞选全国议会和市议会议员。大会的领袖、前国际会员沙尔·埃德梅·沙贝(1818—?)和让·约瑟夫·巴布雷特(1838—1920年)都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温和的改革派。巴布雷特后来成了文官机构中的劳工问题专家。

这次代表大会在社会主义者中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反应。爱德华·瓦扬和布朗基派作为一个集团猛烈攻击这次大会企图出卖工人。但是茹尔·盖得(1845—1922年)却为大会辩护，认为它是恢复工会的一次适中的开端。盖得不久以后就成了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杰出领袖，直到这时为止他同国际的无政府主义派保持联系。盖得过去曾由于在蒙彼利埃市自己主编的一个杂志上支持巴黎公社而被放逐；大约就在这次大会前后，他在法国恢复了宣传工作，他新创办的杂志《平等》成了重振社会主义运动的先声。

1877年，法国的“反专制主义者”在瑞士的拉绍德封举行了一次小规模的秘密代表大会，会议重建了国际工人协会的法国支部，这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的支部。这次活动的主要鼓舞人是保罗·布鲁斯(1854—1912年)，他后来成了法国可能派社会党的领袖；他还创办了一个杂志《先锋》作为运动的机关报。路易-让·潘迪担任新支部的通信书记，任务是同法国的地下组织保持联系。潘迪原先在国际工人协会巴黎支部和巴黎公社中都很活跃，公社失败后逃到瑞士。1878年，第二届劳工代表大会在里昂举行，当时有少数社会主义代表参加，但是大多数代表仍然是互助主义的温和派，会上提出的一项赞成集体主义的动议遭到了惨败。这一年，国际博览会在巴黎举行，当时决定在巴黎召开一次国际劳工代表大会，旨在同各国的工人代表团建立联系。但是政府不准举行这次会议，法国筹备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接受了这一禁令。盖得和已经团结在《平等》杂志周围的集团却拒不接受。这个集团决

定不顾禁令仍然举行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就被警察破坏了，盖得和其他领袖被捕入狱。他们在监狱里设法发表了一个宣言，要求重振社会主义运动。这一号召立刻得到了广泛的响应。第二年，身系囹圄的奥古斯特·布朗基当选为波尔多的议员。政府宣布这次选举无效，但是下令把他释放，并准许他再次竞选；他由于拒绝同前次投他的票的激进派妥协而失去了议席。尽管如此，时代的潮流滚滚向前，在麦克马洪元帅破坏共和国的企图失败后，共和形式的政府看来终于稳定了下来。这时当局有意缓和对工人的迫害，要求已久的赦免巴黎公社参与者的大赦令终于在1879年通过了。第二年，被捕的公社成员（那些仍然活着的人）从新喀里多尼亚回来了，公社的流亡者也纷纷从瑞士、英国和其他避难的国家归来，其中有许多人恢复了昔日在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活动。

1879年在马赛举行的全国劳工大会已经显示态度有了巨大改变，参加大会的不仅有许多工会代表，而且有形形色色新组成的团体派来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代表。大会的论调主要是集体主义的，它所通过的决议不仅主张生产资料公有制，而且赞成建立一个工人党。茹尔·盖得控制了大会的议程。大会成立了一个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这个组织在1882年发展成为工人党，这是现代法国的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

这时，盖得的见解已经大大改变。在创办《平等》杂志的时候，他曾经争取威廉·李卜克内西和西萨尔·德·巴普的合作。到了1880年，他已经完全信从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一年，他在伦敦访问了马克思，并且同他商量了新党的处境和纲领，一年以后，英国的海德门也采取了同样作法。在法国，盖得同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密切合作。1880年，在巴黎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会上提出和通过的新党党章和纲领草案在理论上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

依据的，而组织则主要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蓝本。但是盖得并没有能赢得产生他这个党的整个运动的支持。在 1880 年的哈佛尔劳工代表大会上，互助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都脱离了他的党。互助主义者组成了一个对立的法国工团联合会，这个组织不久就瓦解了；无政府主义者也开始建立一个独立的组织。

甚至在盖得的工人党内部不久也产生了严重的争执。盖得的政策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为依据，要求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纪律严明的政党，完全不同资产阶级政党建立联系，并想把工会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在法国，这种政策同那种赞成工会独立于政党控制之外的强烈情绪背道而驰；同时，这也违反许多社会主义者企图联合左翼资产阶级激进派以反对保守派的优势力量的愿望。特别是许多社会主义者认为，如果没有激进派的支持，就很少希望在全国议会或市议会的竞选中获胜，他们希望执行一种承认有必要在选举中建立左翼共和统一阵线的政策。1881 年，前巴黎公社流亡者保尔·布鲁斯提出他所谓的可能主义——即提倡社会立法和进步的市政政策，以便利用一切机会争取走向社会主义的实际进展。在盖得的工人党内部，鼓吹工会自治的人同布鲁斯派联合了起来，于是 1882 年出现了分裂。“可能派”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工人同盟跟盖得派的工人党分庭抗礼。

在这些年里，工会运动迅速发展，联合组织纷纷成立，有的是同一行业的地方工团联合会，有的是不同行业的工团地方联合会。从法律上说，工会的地位仍然没有保障，但是在实践中却已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宽容，不再有严重的障碍。1884 年，结社权利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认，虽然还要经过巨大的斗争这种权利才推广到公务雇员身上。就在这以前，爆发了罢工，特别是采矿业和冶金业中的罢工，这两种工业中的工人组织的战斗性最强，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据说也很大。

这些骚乱的主要中心是里昂周围的地区，这个地区又恢复了旧日的战斗性。1881年，一个名叫《左翼社会党人》的刊物在里昂创刊，它成了法国无政府主义的主要喉舌。第二年，极为反动的资方在蒙索莱明挑起了一次大罢工，有人采取了一些暴力行动。政府认为这些行动是里昂的无政府主义者造成的，于是决定对日益强大的无政府主义运动采取强硬措施。许多无政府主义记者和宣传者被捕，其中有克鲁泡特金，他不久前才从瑞士越境来到法国，同创办《左翼社会党人》的集团进行合作。被捕的其他人中还有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埃米尔·戈蒂耶、图桑·波达、约瑟夫·贝尔纳。他们都以破坏1872年法律的罪名被控，理由是他们参加了据说在1881年伦敦代表大会上成立的无政府主义国际，而且尽管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个组织存在，他们竟都被判了罪。另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安东·西弗从里昂逃到了布鲁塞尔，在那里被比利时政府逮捕并交给了法国人。他被控的罪名是1882年在里昂进行了一次炸弹凶杀案，并被判处死刑，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同这一事件有关。后来，格雷维总统赦免了他。在西弗被捕以后不久，巴黎失业工人在埃米尔·波盖和前巴黎公社社员路易丝·米歇尔(两人都是活跃的无政府主义者)的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他们冲进了几家面包店，路易丝·米歇尔把从面包店里拿出的面包分发给失业工人。她和波盖由于这次事件而被捕入狱，许多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也在巴黎和其他大工业城市被判处徒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监狱里一直关到1886年才由格雷维总统予以释放。那一年，无政府主义者又发动了许多骚乱，“用行动宣传”的运动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又有了新的生命。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尽管遭到镇压却不仅创办了许多鼓吹战斗性政策的刊物，而且写出了相当多的理论性著作。在这十年中，法国主要的无政府主义著述家有埃米尔·

戈蒂耶,他的第一本重要著作《社会达尔文主义》于1880年问世,接着又创办了名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刊物,他的许多著作就发表在这个刊物上。戈蒂耶是一位律师和著名的著述家,他的演说对于鼓舞工会中的无政府主义倾向起了很大作用。影响更大的是让·格拉夫,他的著作《革命以后的社会》于1882年出版。他原来是一个鞋匠,后来当了排字工人,接着又当了新闻记者。他曾经跟从克鲁泡特金在日内瓦的《反抗者报》工作。他赞成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而不赞成单纯的无政府主义的程度远甚于戈蒂耶。沙尔·马拉托是系统叙述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另一个主要人物,他所著的《无政府主义哲学》于1889年问世。此外,还必须提到路易丝·米歇尔,她在1886年发表了《回忆录》,在1888年又出版了主要著作《新世界》。后来成为法国工团主义主要理论家的埃米尔·波盖虽然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就很活跃,但是直到九十年代才成为一个杰出的人物,这时他的刊物《贝纳老爷报》有了相当大的发行量。

在八十年代,工团主义还没有作为一个明确的理论出现,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在反对议会行动的人之中守住了自己的阵地。工会在1884年承认其合法地位的法令颁布以后迅速壮大。1886年在里昂举行的一次全国性的工会代表大会成立了一个全国工团联盟,这个组织立刻就成了对立派别逐鹿的场所。在1887年举行的下一次代表大会上,工团联盟宣布赞成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并且开始讨论总罢工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后一阶段的工团主义理论中占很重要的地位。1888年的代表大会在原则上同意以总罢工作为社会变革的手段,此后几年也都接受了这个决定。1888年的代表大会还针对处于反对派地位的社会主义团体和政党想把工团置于政治控制下的尝试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工团联盟应该完全独立于政党之外。但是尽管作出了这一决定,全国工

团联盟在此后几年内仍然越来越受盖得派的影响，仅仅成了工人党的一个附属物。这促使一个对立的运动得到了发展，这个运动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开始形成，要求建立地方联合组织，即一般所谓的职业介绍所^①，目的是要把它当作工会控制下的劳动介绍所和广泛进行宣传、组织和教育活动的工会理事会。1888年成立的巴黎职业介绍所起了率先作用；1892年成立了介绍所联合会同工团联盟分庭抗礼。不久以后，这个组织就成了所有主张完全独立于争执不休的社会主义派别之外而奉行革命性工业政策的工会主义者的中心。一度追随盖得的斐南·佩洛蒂埃(1867—1901年)不久就成了这个新运动的领导人物；以波盖和保尔·德勒萨尔(1870—1948年)为首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同佩洛蒂埃联合起来创立了法国工团主义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世纪的头十年达到了最高峰。这些发展都将在适当的地方加以探讨，但是它们大部分都超出了本卷所涉及的时期，这里之所以必须提出来，是因为它们是盖得派，可能派和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争夺八十年代不断壮大的工会运动的领导权的直接结果。

在法国以外，无政府主义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始终循着不同的道路发展。在西班牙，特别是在卡塔罗尼亚，巴枯宁派的无政府主义开始发展成为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它第一次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是在1882年举行的全国工人代表大会上。在意大利，北部和南部之间的分裂日益加深。我们已经谈过，伦巴迪总支部在七十年代是怎样同巴枯宁派决裂而根据比较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建立新的国际支部的；我们也谈过，原先在无政府主义方面十分活跃的安德里亚·科斯塔又是怎样在1879年倒向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并成为意大利社会党的创始者的。但是社会民主主义在意大利

^① 组织职业介绍所的运动实际上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比利时开始的。在1868年，西萨尔·德·巴普已提出这个主张。

利南部或西西里都没有得到立足点,在意大利中部基础也很薄弱。在这些地区,无政府主义仍然具有号召力,埃里科·马拉特斯塔赢得了一大批信从者。既然基本队伍分裂成为对立的宗派,意大利的工人阶级运动自然无法取得多大进展。1882年,主要是北部的一些社会主义团体联合起来进行竞选;三年以后这些团体合并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社会党,但是进展很缓慢,直到1892年才根据西欧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的方式进行改组。

在德国,无政府主义始终没有取得稳固的基础,但是俾斯麦的反社会主义者法所起的一个作用是,在社会主义运动被赶入地下的时候,无政府主义倒暂时得到了一批信从者。但是在约翰·莫斯特和威廉·哈塞尔曼离开德国以后,德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就群龙无首,德国人对无政府主义理论也没有作出重大贡献。更有甚者1883年由于一小批印刷工人企图利用德国统一的盛大爱国庆典炸死德皇,无政府主义从此声名狼藉。阴谋分子的领袖是一个名叫莱茵斯道夫的排字工人,他们在皇室要经过的路面下埋设了炸药,但是炸药始终没有爆炸,这可能是由于阴谋分子在最后一刻由于害怕而逃走了。莱茵斯道夫和其他两人被处决;俾斯麦利用这个机会加强了镇压的法律,同时还采取特别措施禁止持有烈性炸药和其他炸药。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奥地利也发现了类似的爆炸阴谋,结果是对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采取了特别措施,许多外国人被驱逐出奥地利领土。主要的社会主义报纸《未来报》被封闭,主要的社会主义者被驱逐出维也纳。一个名叫斯泰尔马赫的无政府主义者因谋杀罪而被处决,其他许多人则被判处不同的徒刑。 331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发生无政府主义恐怖的国家还有一个是美国。七十年代,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和许多社会主义者曾去美国避难,在俾斯麦的反社会主义者法实行以后,又有更多的人特别从德国逃往美国。美国的无政府主义自有其本土传统,这种传

统可以追溯到约西亚·华伦(1799—1874年)。华伦原是欧文派,参加过新和谐移民村的实验,这种实验使他相信,甚至连欧文式的公社也摆脱不了那种破坏个人权利的强制力。他反对共有制,于是创造了一种以劳动时间为依据的成本价格交换论,这显然渊源于欧文的理论,但也预示了蒲鲁东的一些以平等契约作为良好社会基础的思想。华伦最初开了一家商店,把他的理论付诸实践,发行一种劳动券,很象欧文在他的劳动交换所里发行的那种劳动券。1846年,他在所著《真正的文明》一书中阐述了自己的思想。不久以后,他以纯粹的个人主义企业为基础,在俄亥俄州建立了一个公社。极端个人主义派的另一个先驱人物是莱森德·斯波纳(1808—1887年)。华伦的主要信从者斯蒂芬·佩尔·安德鲁斯(1812—1886年)在所著《个人主权的政府宪章》一书(1851年)中进一步发挥了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概念。华伦和安德鲁斯的主要继承者是本杰明·R·塔克尔(1845—?),他在1878年创办了《激进评论》,在1881年创办了更有名的《自由》杂志。他的主要著作《代替一本书》于1893年出版,从个人主义的立场出发攻击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上述美国本土的无政府主义同形形色色的欧洲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没有共同之处,同爆炸暗杀者的“无政府主义”也没有共同之处。当欧洲的无政府主义者到达美国的时候,他们同象安德鲁斯和塔克尔这样的本土无政府主义者立刻发生了冲突。蒲鲁东派——他们的美国代表人是波士顿的W·A·格林——在美国的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两派之间起了某种桥梁作用,但蒲鲁东派人数并不多。1878年在奥尔巴尼和1879年在阿勒格尼城先后举行了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大会,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执;革命派在芝加哥的迈克尔·施瓦布(一个德国移民)的领导下分裂了出去。1883年,在匹兹堡又举行了一次无政府主义

者代表大会，会上拟订了一个纲领，把废除阶级统治的革命要求同合作化生产和非营利性平等交换制的主张结合了起来——这是华伦和蒲鲁东的思想同欧洲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混合体。这个纲领，连同一份要求工人组织起来促其实现的呼吁书，是在芝加哥操德语、捷克语、法语和英语的无政府主义团体的赞助下发表的。当时，芝加哥是一个骚乱迭起的中心，骚乱的来源是要求 8 小时工作日的工人运动以及麦克考米克收割机工厂在工人的组织权利上所发生的争执。工人同警察发生了多次冲突，警察在破坏罢工时横施暴力。1886 年，无政府主义领袖之一奥古斯特·斯皮斯在海马克特召开了一次大会，抗议警察的行为。尽管这次大会是和平性质的，而且得到市长的批准，但仍然遭到了警察的破坏。在警察袭击后发生的冲突中，有人扔了一枚炸弹，死伤者中有一些是警察。接着便对主要的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大规模逮捕：艾伯特·帕森斯、乔治·恩格尔、奥古斯特·斯皮斯和阿道夫·费希尔等 4 人被处决，被判处长期徒刑的人远不止此数，其中包括迈克尔·施瓦布。在审讯中，始终没有证明任何被捕的人同扔炸弹事件有关或同意这样干；他们公开的革命信仰成了他们的罪证。这种不公道的判决不断引起强烈的抗议。在审讯以后 6 年，也就是 1893 年，阿尔特杰尔德州长无条件赦免了还活着的服刑者。

芝加哥的无政府主义者事件，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欧洲也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各地的社会主义者纷纷指责主持审讯的加里法官的行为，并且要求释放还活着的服刑者。但是在美国，尽管阿尔特杰尔德采取了上述措施，这一事件的后果仍然是破坏了以前对宣传革命思想所采取的宽容态度，也破坏了欧洲难民中的许多比较极端的团体。此外，在芝加哥事件继西欧无政府主义暴行发生以后，各地的主要社会主义组织都以前所未有的决心断绝同无政府主义者的一切联系，同时这一事件也促使把无政府主义者团体从

日益强大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断然排斥出去。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除了俄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以外,“用行动宣传”的做法似乎在走下坡路。在这些国家,每年仍然零星地发生这类事件。1887年,亚历山大三世曾分别遭到三次暗算,在马德里,议会和财政部都发生过炸弹爆炸事件。九十年代,特别是在法国,公开持无政府主义见解人犯了许多罪行。当局和一部分公众开始相信,这必然是某个用来历不明的大量经费秘密组成的无政府主义中央组织干的事。事实上,没有丝毫证据支持这一见解,在许多次无政府主义者的审讯中得到的一切证据也否定这一点。

情况说明,在九十年代干这些暴行的人,如弗朗斯瓦·奥古斯特·拉伐科尔、奥古斯特·瓦扬、埃米尔·昂利、桑托·杰罗尼摩·卡塞里奥等,都是完全独立行动的,或者只有很少的同党。有人力图把让·格拉夫、塞巴斯蒂安·福尔和埃米尔·波盖这样的无政府主义领袖牵连在罪案里面,结果只是表明他们完全与罪行无关。刺客不属于任何一种类型——除非是说与当前世界格格不入也可以构成一种类型。他们之中各种人都有,从道地的罪犯如拉伐科尔到狂热的光棍如奥古斯特·瓦扬;前者过去犯下的几次谋杀罪行都完全没有政治动机,而后者——顺便一提——则同布朗基派领袖爱德华·瓦扬毫无关系。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智力非常低,比如1894年在里昂暗杀萨迪·卡尔诺总统的意大利青年工人桑托·杰罗尼摩·卡塞里奥就是这样。其中有一些人当然肯定是无政府主义者团体的成员,但是无政府主义者小团体林立,而且彼此之间很少联系。对九十年代使法国资产阶级胆战心惊的许多扔炸弹者和其他暗杀者进行研究,所发现的主要事实是:促使他们大多数人搞暗杀的动机是复仇,而且与其说是为个人所受的苦难复仇,倒不如说是为受政府迫害的人以及被判刑的暗杀者复仇。不

容置疑，历届法国政府采取极端报复性的手段以镇压无政府主义运动，并把许多人牵连到少数人干的罪行中去的做法非但远没有摧毁这个运动，反而有助于使它继续存在下去。

如果象这几届政府及其警察顾问所设想的那样，有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中央机构在指挥个人采取行动，那么株连无辜的大规模镇压就会产生效果了。正是由于没有这样一个中央机构，因而每一次处决，每一次逮捕和监禁更多的嫌疑犯（所举行的审讯常常是可笑的）只不过更加激起少数狂热的个人进行报复罢了。此外，象杜鲁布伊和卡西米尔—佩里埃这样的反动政客又满心乐意地把无政府主义同一切形式的工人阶级战斗性混为一谈，甚至帮助最反动的雇主以法治的名义来迫害罢工工人，这就使无政府主义者——甚至连那些犯了毫无意义的罪行的人——得到一定程度的同情；如果当局的行为不那么歇斯底里，他们肯定是得不到同情的。这种歇斯底里不仅法国有，而且接二连三地在别的国家出现，耸人听闻的报纸也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1898年，终于在罗马举行了一次各国政府的国际会议，旨在采取一致行动以对付无政府主义危险，尤其是镇压无政府主义团体和报纸，并制订非常法不仅对“用行动宣传”的人，而且对任何公开持无政府主义见解的人进行即席惩办。如果说这次会议没有做出什么事情来，其主要原因是：第一，许多国家已经制定了严厉的非常法，第二，“无政府主义犯罪浪潮”在1900年前后已经明显消退。

为什么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某些西方国家——特别 335
是法国——会突然出现这种犯罪的无政府主义呢？有人说，一个原因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1868年发明了炸药，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由于炸药简易使用法的传播，而且工业中也广泛使用炸药，因而弄到炸药并不是非常困难的事。但是有许多西方无政府主义者并不使用炸药，当然有些人是使用的。用刀用枪的同扔炸弹的

一样多。有些反动派说，法国的骚乱是由于大赦巴黎公社社员以及1880年以来扩大政治结社的自由而造成的。但是无政府主义运动实际上是在1878年开始的，那时巴黎公社社员还没有回来，而且几乎没有任何前巴黎公社社员在运动中起过作用。路易丝·米歇尔算是最近似这种情况的人，但是她并不是暗杀者。她最接近于犯罪的行为是抢劫一家面包店分给失业的人吃。

上述解释是站不住脚的。更大的可能是西方的“用行动宣传”的无政府主义是偶然伴随着规模远为宏大的社会运动而出现的，两者之间只有心理上的联系。在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的整个西欧，社会意识广泛地受到了鼓舞，现代社会主义和民主运动正在形成。大多数受到这种鼓舞的人都认为，问题要靠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工会和社会改革团体的活动来解决，从最革命的到最温和的组织一起包括在内。但是，有少数人不以这些团体为满足，为不平之感和当局的压迫所驱使，挺而走险，纯然以反抗社会为己事。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这种人往往公开持无政府主义见解，尽管他们的无政府主义同克鲁泡特金、莱克留之类的人的无政府主义很少共同之处。如果在二十世纪，他们是会成为法西斯分子或纳粹分子的；其中有一些人的情况就与此近似，因为他们干了一阵无政府主义活动以后，竟又加入镇压无政府主义者的特警队。总的说来，这样的人很少，但是他们能够引起轰动，同时由于他们的人数又少又分散，除了当场捕获以外就很难抓到，因而能搞出不少暴行来。他们的活动在新的世纪中开始消失，这倒不是由于警察查抄他们的技术改进了(虽然也有可能)，而是由于政府的迫害缓和了，给他们的借口减少了，甚至更重要的是他们所得到的同情减少了。因为随着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日益壮大，组织日益完善，在社会中的地位日益得到普遍的承认，动手反对整个社会秩序并且愿意把社会秩序的所有敌人一概当成朋友的工人

就日益减少了。这可能不是无政府主义暴行衰减的全面解释，但是肯定比迄今所提出的任何说法更接近于事实。特别是在法国，随着工团主义的形成，并且把反国家的思潮引向比较建设性的途径，无政府的暴行就消失了。工团主义似乎把“用行动宣传”的动机庄严化了，并且在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的许多概念的时候，抛弃了那些完全脱离实际的因素。这些因素始终只是使极少数的无政府主义者采取暴行，但是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却很难不挺身而出为他们进行辩护，以反对当局同时迫害两种无政府主义者的镇压。

有些人可能认为，本书讨论各种无政府主义的篇幅过多了，因为它们同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几乎没有关系。但是这些政治罪行的出现对于一般的社会主义者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的确都是相当重要的，尽管在公众的心目中，这些罪行是由无政府主义者负主要责任的。有很多无政府主义者——包括一些罪犯——除了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以外，还自称是社会主义者或集体主义者。尽管马克思对巴枯宁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而欧洲大陆上的社会民主党人也始终在强调他们同各种形式的无政府主义都截然不同，无政府主义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仍然普遍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但是这种说法对英国来说，远不如对西方大陆那样切合实际。在英国，搞凶杀的无政府主义者始终没有大规模存在过。只有爱尔兰人把炸弹当作政治武器，但他们肯定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英国发生的唯一无政府主义者炸弹案是 1892 年的沃尔索尔无政府主义者事件，当时炸弹原是打算运往外国去使用的。1894 年格林威治公园发生的炸弹爆炸事件是无意之中造成的；携带炸弹并被炸死的那个人是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同英国没有政治关系。这枚炸弹大概也是打算运往外国的。英国有许多来自大陆的无政府主义者难民，常常有人说，伦敦是指挥暴行的秘密国际的真正中心，在大多数国家通过了反无政府主义者非常法，并驱逐无政府主义者

难民以后尤其是这样。但是没有什么证据支持这种看法。无论如何，无政府主义在英国是一种理论上的流派，而不是一种战斗行动的形式。这些情况使得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斗争不象其他地方那样激烈。我们将要谈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这两种运动并没有鲜明的区别。无政府主义者参加社会民主联盟，甚至参加费边社，而且以更大的规模参加威廉·摩里斯所领导的社会主义联盟；最后，他们把摩里斯从联盟中赶了出去，然而他们的胜利只是破坏了联盟本身。这一事件最好留待我们讨论八十年代英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时再去讨论。

我们现在可以回过头来从总的方面谈谈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论的发展；同时也要谈谈在第一国际解体，以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为一方和以瑞士、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等地的反中央集权和反国家派人物所代表的各种反专制主义倾向为另一方发生严重分裂以后，究竟有哪些运动体现无政府主义理论。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哲学理论的出发点是：从根本上反对以强制权威为基础上的一切形式的社会。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理想，意味着一个没有强制因素的自由社会。这种反对任何强制权威存在的态度是可以同各种完全不同的正面看法相容并存的。泛泛说来，无政府主义者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个人主义者，他们主张尽可能不要社会组织，不要国家；另一类是集体主义者，或称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他们一方面反对国家这个强制机构，同时又深信非强制性的协作制和合作制的优点。并不是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可以干净利落地归入这两大类。葛德文和蒲鲁东就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
338 本书第一卷曾讨论过这两个人的见解。但是宣扬无政府主义的大多数思想家不论其是否具有无政府主义者这个称号，都可以大致不差地归入这两大类中的一类。巴枯宁、克鲁泡特金、莱克留、让·格拉夫和埃米尔·波盖属于运动中的共产主义或集体主义一方，而

德国人马克斯·施蒂纳以及本杰明·塔克尔和大多数美国本土的无政府主义者则属于运动中的个人主义一方。

本书不打算讨论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除非它同另一种无政府主义发生冲突。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显然同社会主义没有关系。另一方面，集体主义无政府主义——后来称为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则肯定是作为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而产生的；我们出于必需已经谈过它同专制主义社会主义在第一国际中的斗争。本章的其余部分主要是想追溯一下在第一国际最后瓦解以后，上述第二类无政府主义的发展情况，特别是谈谈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在彼得·克鲁泡特金亲王手里的发展情况。不过，在本卷里我们不从理论方面去讨论二十世纪初期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作为工团主义或者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在拉丁系国家工人阶级运动中的重新出现。

正如我们在讨论巴枯宁的学说时所看到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把进行协作和采取集体行动的形式截然分为“自然的”和“不自然的”两种。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坚持说，社会对人类来说是自然的；他们最着重强调的是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人类倾向于友好地在一起工作以达到共同的目的。克鲁泡特金有一本最著名的著作，其书名就非常清楚地说明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基本信念。这本书叫做《互助论》，书中指出这种互助不仅是野蛮人、蒙昧人以及文明人的特性，而且也是许多动物的特性。克鲁泡特金说，这种互助属于动物王国，也属于作为动物王国成员的人，它不是文明的产物，而是群居动物的基本生活特性。在这本书里，克鲁泡特金特别攻击了为人们广泛承认的“达尔文主义”概念：自然的领域纯粹 339 是个体生存的竞争场所，只有“适者”才能生存。当然，他并不否认存在这种斗争，但是他坚持，这只是自然的一个方面，到处都能看到与之相对立的“互助”原则在发生作用。

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论证说，进行合作的“自然”倾向在面对面的小集体中作用最强，也最直接，在家庭和扩大的家庭——氏族中尤其是这样。但是随着社会生活规模的扩大和劳动分工的发展，这种倾向在组成社会的各种社会集体的成员中，在集体内部，在集体与集体之间都发生作用。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把集体内部和集体之间互相矛盾的对抗趋向首先归因于私有财产的发展（就象卢梭以前在所著《论不平等的起源》一书中所作的那样），同时也归因于以财产关系为基础的阶级划分的出现。因此，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就象马克思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主张废除私有财产，实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他们同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歧并不在这个问题上，而在于掌握所有权的“集体”的性质上。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集体”是一个大规模的实体，至少象国家那样大，而无政府主义者所设想的“集体”则是指当地的人民，即以合作方式运用生产资料以满足成员需要的小邻里集体。巴枯宁及其信从者在使用“集体主义”这个词的时候；指的是生产合作者和消费合作者面对面的地方集体，同这个词后来的用法没有共同之处；后来这个词的意思成了“国家社会主义”，即以民主化国家为代表的“大集体”的所有制。按照无政府主义的说法，“国家”实质上是一个强制性的机构（马克思也认为是这样），不能代表生来具有“互助”倾向的人民。这是强加在“人民”身上的权威，而不是人民进行合作的意志的自然表现。

因此，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所追求的是一种建立在自然合作基础上的社会。这样，社会才会鼓舞而不会压制人要求“互助”的自然倾向。他们相信，如果能以一种消除经济对立的方式把面对面的集体组织起来，那就不难把同样的行动原则扩大到更广大的范围，而无需借助任何种类的强制性权威。他们希望用自由联合的方法代替从上而下地组成的国家来达到这个目的；通过这种自由

联合,地方性的或者职能性的小单位就会为采取共同行动而团结起来。因此,同一个地方社区中的各种生产集体就会联合起来组成地方公社;而地方公社也会为了具体的共同目的(比如经营公共服务事业等)而在或大或小的地区内组织起来。我们已经看到德·巴普和其他人是怎样力图在提交历次第一国际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拟定按照这个原则经营公共服务事业的计划的。事实上,德·巴普从来就不是一个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但是在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争执中,他非常接近巴枯宁派的观点,而不太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发生分裂的时候,他和他的比利时信从者继续在反马克思的国际中同无政府主义合作。不过比利时人不象瑞士汝拉区人或者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比利时人始终不是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是七十年代后期在汝拉总支部和日内瓦追随巴枯宁的俄国流亡者和其他流亡人士中充分酝酿成熟的,克鲁泡特金和埃利塞·莱克留是其中的中坚人物。《反抗者报》成了这个运动的主要机关刊物,这个刊物从1879年起主要由克鲁泡特金和莱克留在日内瓦编辑,1885年迁往巴黎。^①

1871年以后,瑞士的法语区成了反专制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心,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在法国,一切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活动这时都被禁止了,甚至连工会运动这时也毫无作为,虽然它始终没有完全消失。在德国,1875年以前,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除了同俾斯麦斗争外,彼此也一直争执不休;拉萨尔派还时常同无政 341
府主义者勾勾搭搭,两者都相信有必要发展合作生产。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和拉萨尔派都坚信政治行动,而这又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所反对的。1875年德国的两大派系合并以

^① 1887年这个刊物改名为《反抗报》,并用这个名称一直出版到1894年。1895年它为了让·格拉夫所办的《新时代》所代替,《新时代》一直出版到1914年8月。

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便日益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支配,并致力于确立其政治地位的斗争。以威廉·哈塞尔曼和约翰·莫斯特为首的一些集团则采取了无政府主义路线,但是 1880 年,哈塞尔曼和莫斯特都被开除出党,并被赶出境外。我们已经谈过,莫斯特首先到了伦敦,1880 年在那里创办了《自由》杂志,作为无政府主义的喉舌;两年以后他到了美国,哈塞尔曼则已在他之前到了那里。两人在美国都继续宣传无政府主义,而在德国他们都没有重要的继承者。

当时,法国人既已停止活动,而德国人又在德意志帝国新宪法的范围内基本上按照国家的方针发展自己的运动,于是瑞士便成了大批避难者的家园,特别是法国和俄国避难者的家园,有一个时期它甚至是西欧革命动乱的中心,尽管伦敦也有重要的集团,伦敦当时是布朗基派流亡者的主要集中地。但是随着八十年代反无政府主义的浪潮日益高涨,瑞士政府受到了欧洲各大国越来越大的压力,迫使它对那批利用瑞士作为策划革命阴谋的方便据点的难民采取行动。当德国实施反社会主义者法的时候,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被迫把大部分组织移往国外,而瑞士显然是他们看中的地方。他们在瑞士指导党的工作,并且从这里把爱德华·伯恩施坦主编的报纸《社会民主党人》以及小册子运往德国去发行。被迫离开维也纳的奥地利社会主义者以及匈牙利和捷克的社会主义者也以瑞士领土作为根据地进行活动;此外,瑞士还收容了大批俄国流亡者,意大利人以及巴黎公社失败后逃出来的法国人。总的说来,瑞士人顶住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既没有交出各国“通缉”的难民、也没有阻止难民集体继续活动,不过他们对那些可以扣上“无政府主义者”帽子的人和可以指控为煽动暴力行动的人,态度的确是强硬多了。

因此,当巴黎公社社员得到赦免,回到法国的时候,其他国家

的一些难民，包括克鲁泡特金在内，很快跟随而去，而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法国也就成了理论的和“实践的”无政府主义的主要中心。不过，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法国政府迅速对无政府主义者采取了措施，不仅监禁了那些实际采取暴力行动的人，而且还监禁了一些主要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如戈蒂耶、路易丝·米歇尔等，其中也有克鲁泡特金。克鲁泡特金于1886年被释放，随即把总部迁往伦敦。

彼得·阿列克谢也维奇·克鲁泡特金亲王(1842—1921年)无疑是发展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这种社会理论的主要人物。他生于俄国最高级的贵族家庭，并在直属沙皇的侍从训练团中受教，可望在一个王亲贵胄云集的军团里担任军职。青年时，克鲁泡特金曾和旁人一样热烈庆贺亚历山大二世即位，欢迎他所作出的解放农奴的决定。他常常奉侍在新沙皇左右，不久就觉察到沙皇具有一种理想主义和专制傲慢的气质奇怪地交织在一起的性格，同时也看到他经常为一种恐惧感所困扰。这种恐惧感倒不是出于个人胆小怕事，然而只要一有反对或反抗压迫的风声，这种恐惧感就驱使他投向反动派的怀抱。解放农奴的事业，由于农奴要向地主缴付偿金而不胜其苦，由于当局对任何不满的表现一概进行残酷镇压，基本上化为乌有了，这时克鲁泡特金同俄国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深深感到幻灭。当他离开侍从训练团并选择一个军团任职的时候，他所选的不是可以使他青云直上的第一流军团，而是选了西伯利亚哥萨克团；这就是要把自己埋没在一个边远的省分，而放弃取得功名富贵的机会。他之所以如此选择出于好几个动机。部分是 343
自愿放弃使他感到厌恶的事业；但是其中也有积极的一面。不久前吞并了阿穆尔地区的东西伯利亚省长摩里亚科夫伯爵是一个进步的改革者，他曾大力清洗充斥反动腐化官吏的政府。如果说还有什么地方有志者尚能为沙皇政权效力而不致成为反动派的工具

的话,东西伯利亚在 1862 年似乎就是这样的地方。此外,还有一个令克鲁泡特金神往的原因。他在侍从训练学校所学的主要是数理科学,而他最喜欢的是地理、地质和人种学的研究。从这两个观点来看,东西伯利亚都是一个还没有被触动的地区,他希望能在这 些方面进行工作。事实上,在这些方面他是非常成功的:他漫游了西伯利亚大部分地区,甚至进入中国满洲进行观察。他的著述为俄国远东地区的地理民情的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后来,他在俄国坐牢期间曾写出研究报告,由俄国地理学会出版,他以前曾被邀请担任该学会的秘书。此后,当他为埃利塞·莱克留的伟大著作《世界地理》工作的时候,他把更多的材料用了上去。事实上,克鲁泡特金在地质学方面的名气同他后来在社会思想方面的名气是不相上下的。

直到 1866 年末,克鲁泡特金一直在西伯利亚担任军职,但主要是从事科学考查工作。不过随着反动派在俄国占了上风,而且影响到西伯利亚,他对为沙皇服务也越来越感到厌恶。此外,沙皇对波兰起义的残酷镇压使他极为愤怒,其中有些被流放者送归他管辖。最后,他决定放弃自己的职位,不顾父亲的反对,进了圣彼得堡大学以攻数学和理科学位。在此后的 5 年中,他在校就读之余还从事地理学和地质学的研究,并为地理学会撰写一部分关于西伯利亚的报告。1872 年,他首次访问西欧,大部分时间住在瑞
344 士,先是在苏黎世,然后到日内瓦和汝拉。他在那里首先通过马克思的俄国支持者吴亭同国际发生了接触,但是他几乎立刻就加入了持敌对立场的追随巴枯宁的团体。这两个人始终没有见过面,不过克鲁泡特金同茹科夫斯基成了朋友,加入了巴枯宁派的国际日内瓦支部,这时正是那一场使运动分裂并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支部的大论战进入高潮的时候。克鲁泡特金成功地把大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书籍偷运过边界,回到了俄国,这时他的“自由集体

主义”思想已经完全成熟。回到俄国以后，他发现当局的镇压正进入最严厉阶段，于是便投入革命斗争，主张通过宣传争取农民和工人，而反对热里雅鲍夫那种脱离群众的以知识分子小集团进行革命恐怖活动的政策。克鲁泡特金不久就出了事。他的集团中的成员接二连三被捕；1874年，他成了圣彼得和圣保罗要塞的犯人。但是他不乏有权势的朋友，在科学家中尤其如此，不多时当局就允许他阅读书报，以便继续为地理学会从事科学研究。候审两年以后，他的健康垮了，生了重病，于1876年被移到另一个监狱听候审讯，后来又被送入监狱医院。在朋友的帮助下，他设法从医院逃了出来。在圣彼得堡躲藏一个时候以后，他用一纸假护照通过芬兰逃到了瑞典，从瑞典又到了英国。

这时，克鲁泡特金极想重返俄国继续从事革命工作，不过事实上他直到1917年革命以后才回到俄国去度晚年，后来在失望中死去，因为他直到最后始终保持对无政府主义的信仰和对中央集权的憎恨。克鲁泡特金到达西欧的时候几乎立刻就碰上无政府主义运动。他在伦敦只住了几个月，主要依靠为《自然》杂志撰写科学评论和札记维持生活，这个刊物当时由斯科特·凯尔蒂主编。他在英国觉得很不自在，人地生疏，而且对工人和知识分子中缺乏革命或社会主义感情感到惊奇。他同上次西游时在瑞士结识的朋友取得了联系，特别是跟詹姆斯·吉约姆已经有了很深的友谊。345

1877年，他离开英国，定居于拉绍德封，成为汝拉总支部的会员，这个总支部继承了第一国际巴枯宁派的衣钵。巴枯宁在前一年死去了。在那里，克鲁泡特金不久就结识了一个密友——雅克·埃利塞·莱克留(1830—1905年)。莱克留参加过巴黎公社，是一群巴黎公社社员的中心人物，其中包括路易-让·潘迪、保尔·布鲁斯、古斯塔夫·勒弗朗赛和边诺阿·马隆。在那里还有一批以卡洛·卡菲埃罗和埃里科·马拉特斯塔为首的意大利国际会员以及

一些俄国、西班牙和其他地方的无政府主义难民或者是接近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难民。

克鲁泡特金对瑞士汝拉区人深为向往，非常羡慕他们爱好自由的生活方式。他十分赞同他们那种把家庭工业——特别是制表业——同田地上的工作结合起来的生活方式。当然，他希望铲除那些剥削他们的商人和居间人。他相信，只要解除资本主义重担，他们就能在那小小的社区里大大地兴旺起来。他们在他们中间的生活经历对他的经济与社会思想影响很大，常常在著作中提到他们的生活方式，《田地、工厂和作坊》一书尤其如此，不过正如我们将要谈到的，他并不反对机器和适当的大规模生产。他最深信不疑的想法是：美好的生活取决于产业工人既不切断同土地的关系，也不被迫把一生都消磨在一种职业上，不管这种职业多么需要熟练技术，更不必说非熟练的工厂工作。他赞扬汝拉制表匠抵制工厂产品竞争的斗争，也赞扬他们宁可不干，也不放弃自由的精神。他说他们之所以能够坚持，是由于保持了土地，因而能够在不景气的时候维持生活。不过他也承认，在许多行业中，手工业者对机器的竞争已经招架不住了。他在构思自己的社会哲学时，有一部分就是考虑如何解决这个困难问题。

346 这个问题我们后面还要谈到。当时，克鲁泡特金正忙于奄奄一息的国际的工作，根本无暇以任何全面的形式创立自己的学说。他参加了反马克思主义国际后来举行的几次代表大会，又在1877年参加了在根特举行的那次流产的社会主义者统一代表大会。他在那里险遭比利时警察逮捕，他们是很可能把他移交给俄国人的。他逃到了伦敦，在英国博物馆工作了一个时期，但是不久就到法国去了。当时法国虽然还没有颁布巴黎公社社员的赦免令，不过压制缓和了，恢复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宣传的道路已经打开了。他在巴黎同当时还没有改信马克思主义的茹尔·盖得合作，建立

了小规模的社会主义俱乐部和团体。但是由于他同国际有关系，不久就面临被捕的危险。1878年，他回到瑞士，在那里同埃利塞·莱克留、萨瓦人F·杜马特雷和日内瓦职员赫齐格合作，创办了一个无政府主义刊物《反抗者报》，这个刊物不久就成了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喉舌。克鲁泡特金等人惨淡经营，创刊时缺乏经费，出版了几期以后又找不到印刷商，只得由赞助者设法赊购了一部简陋的印刷机自行印刷。创刊之始——1879年年初——正是十分艰难的时期，因为一年前掀起了“用行动宣传”的浪潮，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呼声越喊越高。但是这家刊物设法维持下来了，而且刊载了克鲁泡特金的许多最优秀的作品，克鲁泡特金在瑞士主编这个刊物，一直到1881年亚历山大第二被暗杀以后，才在沙皇政府的压力下被赶出这个国家。在被驱逐之前，他刚好参加了伦敦1881年的无政府主义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反对“用行动宣传”的政策，认为这样做并不明智。但是外界不明真相，而且由于他在自己的刊物上曾为刺杀沙皇辩护，人们还把他根本没有的看法推在他头上。在俄国别无他途可以抗议残酷迫害开明意见的做法，因而为俄国刺杀沙皇一事辩护，跟赞成实行任何暗杀或扔炸弹的总政策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克鲁泡特金从来没有赞成过这种政策。

克鲁泡特金被赶出瑞士以后，越过边界到了法国的托农。他³⁴⁷很快就同里昂地区迅速发展的工人运动建立了联系，在这个运动中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是强大的。但是他受到沙皇特务暗杀的威胁，于是便在1881年移居伦敦，住了一年左右。这一次英国社会的气氛又使他感到厌恶，就象在他之前的赫尔岑一样。他访问激进派俱乐部，发表关于俄国情况的演说，会见了海德门，海德门不久前刚出版了《人人的英国》一书，并且创办了民主联盟。克鲁泡特金还曾用蹩脚的英文在达勒姆矿工一年一度的庆祝大会上发表演说，但是他没有结交朋友。那一年岁末，他就决定不顾被逮捕的危

险回法国去。到法国以后,他就恢复了同里昂工人的联系,并且继续编辑仍在瑞士出版的《反抗者报》。里昂丝绸工业发生的一次严重经济危机引起了广泛的萧条,工人发动了暴动,在暴动中无政府主义者起了带头作用。克鲁泡特金由于参加了运动而在1882年同埃米尔·戈蒂耶等人一道被捕,并且根据取缔国际会员的1872年法被监禁起来。克鲁泡特金被控以参加1881年伦敦代表大会,伙同建立新无政府主义国际的罪行。我们已经谈过,各国政府和反动派认为这个组织是全欧各种无政府主义暴行的中央指挥所。克鲁泡特金原来是能够逃脱的,但是他情愿受审,而且不象一道受审的其他人那样,他在判决后拒绝上诉。他在法国的监狱里一直呆到1886年格雷维总统释放无政府主义犯人时才出来。随后他离开法国到英国定居下来,一直住到天年将尽的时候才回俄国。这一回他对英国舆情在他1881年—1882年短期居住后所发生的变化深感惊异。现在他发现存在一个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运动,海德门所领导的社会民主同盟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同威廉·摩里斯的社会主义联盟中的自由主义者之间进行着剧烈的斗争,同时他也看到社会主义思想正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酝酿。他很快就结识了朋友,愉快地把活跃的一生的余年用于写作。克鲁泡特金写了一系列的使他成名的著作,其中有一些是用法文写的,如《法国大革命》(1893年出版),这部书时断时续地写了很多年;再如《面包的征服》(1892年出版),这是他阐述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理论的第一本主要著作。他的《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1902年出版)首先也是用法文出版的,本卷前面的大部分叙述就是取材于这一著作。后来他很快就学会用英文写作,为英国杂志撰写了许多文章,此外还出版了许多小册子。他的两本最受欢迎的书《田地、工厂和作坊》(1898年出版)和《互助论》(1902年出版)都是首先用英文出版的。

克鲁泡特金写的小册子不胜枚举。其中有许多首先在《反抗者报》或者其他杂志上发表,或者是由印刷《反抗者报》的出版社出版。其中大多数都一再重版,并被翻译成许多种文字。以各种书名再版次数最多的是《告青年书》,这一著作最初是1881年在日内瓦问世的。在英国,有许多小册子由《自由》出版社出版。《自由》是他在1886年帮助创办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刊物。

前面已经说过,克鲁泡特金曾受科学训练,这对他的思想有深刻影响。他虽然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工业制,并且热烈拥护独立的小生产者,但是他决不反对机器,也不反对运用科学提高生产力。他宣称完全不能同意威廉·摩里斯反对机械化工业的态度,虽然除此以外他在许多问题上都同意摩里斯的意见。他希望人类能从过分沉重的劳动负担下解放出来,而且希望技术发展能提供手段。不过他常说,科学家如果没有直接从事体力劳动的体会,就永远不能利用他们的技术来减轻人的劳动负担。他还说,过去的伟大发明不是来自实验室里的科学家,而是来自能制造、能运用自己所设计的机器的实际劳动者。专门的技术人员和科学家不过是把实际工作者的这些发现拿过来加以改进而已。他预言,除非能结束科学和实践脱节的现象,否则发明的泉源就会枯竭,即使能继续下去,也不会把人的因素考虑进去。他还相信,除了制造标准化的半成品以外,大规模生产实际上并不经济,它的发展大部分是由廉价的非熟练劳动带来的。他说,当这种劳动不能再被剥削的时候,人们就会发现在小企业甚至小作坊里生产大部分成品更加经济,而且从人类福利的观点着眼也好得多。他对电力的问世寄以很大希望,认为这是一种手段,可以把工业所需的动力分布到广大地区,使工业有可能分散到乡下,使小作坊有可能同大规模生产的工厂进行有效的竞争。凡是小作坊站不住脚的地方,他主张建立利用大规模动力设备的工厂,但是他希望把这些工厂迁移到

农村，使工厂里的工人能够把工农业的工作结合起来，他认为任何工人都应该只在一个行业中工作。同傅立叶一样，他相信幸福取决于职业的多样化和职业的选择；也跟傅立叶一样，他认为适当的劳动是乐事，尤其相信人类的满足来自生产优等食物的精耕细作的农业劳动。他对精耕细作方面的进展进行了许多研究，相信只要耕作方法得宜，即使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也能依靠本国土地的产品来满足民食的需要。

克鲁泡特金由于主张把工农业结合起来，因而强烈反对自由放任主义政策，这种政策使得英国这样的国家依靠进口粮食来维持生活。他还主张各国在工业产品和食物方面都大力做到接近于自给自足的水平，因为他相信，作为输出国，工业国必然追求更大的市场并同其他工业国展开竞争，这都是造成战争和加重资本主义剥削的重要原因。他断言（正是因为这样下断语而受到很多批评）³⁵⁰随着各国相继发展自己的制造业，并排除输出国的产品，世界商业就注定要随之萎缩。他敦促英国要认清它在制造工业方面的统治地位必然会结束，应该采取步骤增加农业生产，并使工业制品多样化，以便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从而防止出口下降时必然会降临的灾难。

克鲁泡特金还认为，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大规模生产迫使小规模生产的技艺趋于消灭；这是他那个时代最不时髦的看法。他既着重指出法国和德国的小规模生产者坚持生存的顽强性，也强调了他们创造新形式的小规模生产以代替被工厂生产方法排挤掉的旧形式的程度——其中包括大规模工业需要小企业制造辅助部件和次要产品的趋势。根据这些理由，他反对马克思的如下理论：资本日益集中和技术被取代的过程使“劳动大军”化为不分彼此的“劳动力”集体。他承认这种趋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作用，但是他又断言还有同样强大的力量在起反作用，而且当工人自己作

主的时候,后一种力量就会占上风。

他在西伯利亚、瑞士和他最熟悉的法国地区——里昂与汝拉所见到的情况都对上述全部看法有着深刻的影响。毫无疑问,在很大程度上,愿望是信仰之父;因为克鲁泡特金希望“小人物”能够生存下去,并且希望作为工人合作社的工厂能够参照有效生产的技术条件保持最小的规模。他的基本哲学思想中有一部分认为:人在小集体中生活得最愉快,并且能最好地发展互助和民主生活方式的内在倾向。他大力强调本章开头所讨论的“自然”和“不自然”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区别,同时强调大社会只有以自行组成的小社会为基础才能按自由原则运行。

克鲁泡特金相信这种小社会只要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共同管理,并且通过工农业的配合而使生活“重振”(这是他喜欢用的 351 字),就可以无需任何强制权威而维持下去。他们将进行合作,为自己提供美好的生活所需的资料,并通过合作的纽带而把成员团结在一起;在社会基本单位中培养起来的这种合作精神,不难推广到有必要在较大范围内兴建的共同事业的经营管理方面去。当然,这种见解太简单了,克鲁泡特金并不比其他无政府主义者更深入一步,也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实际困难。就象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他非常强调教育从正确或错误的方面培养生活艺术的影响。他对当代在普通教育和技术教育方面的做法意见很大。他认为在普通教育方面,让儿童通过书本或者背诵而不是通过实践去学习,浪费了大量时间。他认为在技术教育方面,大部分是本末倒置或是方针错误;本末倒置时,则训练青年人干某种特殊的例行工作,而不让他们掌握能够多方面应用的广泛技术知识;方针错误时,则培养一些经理和监督人员,在大规模生产的企业中奴役被剥削的工人。他举了一些例子,说明尽管在恶劣的资本主义环境中,仍有小批技术人员是用较好的方法训练的。每当他发现如下两个条

件得到满足时,他就倍加赞扬:一个条件是重视数学和基本科学的教学,而不强调特殊技术的教学;另一个条件是所学的东西有广泛应用的机会。

克鲁泡特金在谈到上述这类问题时基本上是合情合理的,甚至是温和的,但在比较纯粹的政治性著作中他则抱有一种毫不妥协的态度,这种鲜明的对照一再使阅读他著作的人感到惊异。但是即使在这类政治性著作中,他也很少带有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著作中所特有的那种辛辣的笔调。甚至在盛怒之下,他也不失为一个可爱的人,在他身上丝毫没有巴枯宁的著作不断显示出来的那种神经失常的迹象。巴枯宁既想发号施令,又专门与独裁者为敌; 352 克鲁泡特金则无意支配任何人,他真正赞成自由,认为强制是错误的社会制度的无谓结果。

人们始终无法完全了解,既然在他看来人类天生有互助的倾向,为什么他又认为世界受强制性的政府和个人之间的你争我夺所支配?此外,为什么他认为这些坏事可以根除而不致重演?最好的解释莫过于他在附和许多早期社会主义者时所说的一番话。他说,十九世纪以前,生产力始终太小,不能让人人都获得过美好生活的资料,但是现在人类已经掌握了能使全世界都过富足生活的资料,只要人类以睦邻的精神着手去满足共同的需要,而不是在世界各地寻求市场,争夺国内完全可以制造的产品。在这一点上,甚至在今天我们也认为他太乐观了,因为即使二十世纪的世界完全懂得如何生产出能使人人丰衣足食的产品,我们也十分清楚,如果不为落后国家的发展进行大量投资,如果在文明的艺技方面没有一个规模庞大的基本教育计划,就无法实现丰衣足食的生活。不过,这种过分乐观的态度并不是克鲁泡特金所特有的,这是十九世纪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共有的信念,也是驱使他们进行宣传鼓吹的重要动力。他们把贫乏归罪于资本主义,而我们今天则能看出,虽

然废除资本主义可能是走向普世繁荣的必要条件，但其本身并不能完成必要的大规模建设工作，或是把无知的人变成能够理解和操作以科学为根据的现代化技术的生产者。

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或者不如说是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同极端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是完全对立的，人们常常把两者混为一谈。克鲁泡特金的信仰的根本基础是合作的天性，即人类天赋的“互助”本质比自私心或权力欲更有力量。他始终大力强调这种“天赋”力量，认为这种力量正在等待人们把它从强制权威的约束下解放出来，强制权威使它无法自由地起作用，但是又始终不能完全压制它。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社会改革者的主要任务——就这个词的真正含意来说——是破坏，在进行了必要的破坏以后，就可以踏踏实实地让人们循着天赋的合作倾向去进行新社会的建设工作。因此，为未来社会的组织结构进行策划，甚至预测（除了泛泛一谈以外）其组成情况，都是不必要的和错误的。目前的任务就是破坏；创造不是空想的策划者的事情，而是获得自由的人民的事情。

显然，这种理论就其实际应采取的政策来说，可以作完全不同的解释。既可以把破坏工作看作是主要为改造人的思想，摧毁他把强制权威当作自然之道而接受的态度；也可以认为破坏活动是实际需要，旨在反对各种实际存在的强制机构。这种学说可以导致扔炸弹或鼓吹暴动的事件，也可以引起反专制主义的宣传和有关自由问题的哲学论述。当然，具体的无政府主义者在自己的活动中还可以混合使用这几种方法，至于以何种方法为主，何种方法为次，则因人而异，大不相同。此外，无政府主义者必须自己决定，到什么时候——如果有这样的时候的话——社会组织就不再具有强制性，而开始体现自由结社的原则。个人主义色彩最浓的无政府主义者实际上否认有这样的時候，并且对一切形式的结社即使不是

积极反对,至少也是不信任。前面已经说过,葛德文就抱有这种强烈的不信任的情绪,蒲鲁东在某些场合下也是这样。另一方面,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却相信同强制性组织相对立的自由结社,因而想在两者之间划出分界线。但是就问题的本质来看,这种分界线决不是轻易能够划出的。一般说来,无政府主义不仅反对国家和政府——也就是说反对政治权威,而且也反对压制人类自由和自发性的其他权威。他们既反对政治权威,也同样反对经济权威;他们还反对教会所体现的宗教权威和任何以非正式的方式约束人类的道德权威,例如传统的禁忌和习惯等的约束力。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对需要破坏的是什么制度这一问题,意见是一致的。这些制

354 度包括所有的国家和政府,所有的教会(特别是天主教会),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但不一定是私有制),以及一切形式的阶级或种族特权。但是他们对私有财产制意见是分歧的。大多数人主张废除私有财产,至少是废除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但是有些人——个人主义者——则认为彻底清除了垄断因素的私有财产制是人类自由的根本基石。还有一些人一方面希望建立主要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同时又坚决主张保证小生产者能控制其个人使用的工具,并尽量把工具交给个人组成的小型合作社。蒲鲁东的态度就是如此。大多数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反对把生产资料所有权交给个人或这种小型合作社,理由是只有整个社会有权拥有这些资料;但是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在设法明确集体所有权所应归属的机构时遇到了困难。最常见的是他们把集体所有权赋与直接参加结社的全体公民所组成的地方公社。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又觉得,这种作法不啻把公社变成一种新型的强制权威,并认为在新社会里所有权这一概念本身就会消失。比如克鲁泡特金就把未来的革命社会分成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他说集体主义阶段是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所有制的概念将

继续存在，并且将采取地方公社所有制或自由联合公社所有制的形式。但是这个阶段将过去，当社会走向完全接受“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的时候，整个所有制的概念将会消亡，只有到那个时候才能产生真正的共产主义。我们可以看到，这同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消亡”的概念有些相象，但又有重大的不同。不同在于无政府主义者坚持必须立刻消灭国家，所有制的概念才会逐渐“消亡”。

这并不是唯一的困难。实际上更重要的问题是无政府主义者 355
对工人组成的合作社、其他“互助”团体以及工会等经济机构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除了个人主义者以外，他们大都强调生产合作社的重要性，认为它在未来社会中是组织生产的手段。但是他们对消费合作社却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因为这会造成消费者剥削生产者，并使资本主义形式的资本利息和作为“股息”分配的利润得以保持；同时他们也完全意识到生产合作社有发展成为特殊工人集团所控制的营利机构的危险。为了对付这种危险，他们大都坚持分配应该由公社自己来主持，各行各业的生产合作社只应该是公社的组成部分，只起整个地方公社的代理机构的作用。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又看到，这有使公社成为强制性权威，向生产者集体发号施令的危险。唯一的答案看来只能是：在一个自然组成的社会中，涉及强制性权威的问题事实上不会产生。

同合作社问题相比，工会主义问题更加是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中的一个分界线。以让·格拉夫（1854—1939年）为主要代表的一个流派认为，在未来的社会结构中，工会并不会作为一个组织管理工业的工人合作社的机构而起作用。他在所著《自由的土地》一书中写道：

我看社会无需分成合作社。我不赞成建立专管生产的组织。我认

为消费的需要将成为推动的因素；它将促使个人自动组织起来，或是为自己生产，或是为交换完全不用价值尺度去衡量的劳务，以保证满足大家的需要。请注意，交换的是劳务而不是商品。

格拉夫曾同克鲁泡特金一起办《反抗者报》；这种观点基本上也是克鲁泡特金的。当然，这种观点并不排斥利用工会作为革命斗争的工具，但却否认工会在自由社会中会起任何作用，或者会变成控制和管理工业的组织。正统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同创立革命性工团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之间的区别就在这里。虽然有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倒向工团主义，而另一部分则以克鲁泡特金和格拉夫的思想为根据，对于这种他们目之为把经济自由原则出卖给专制的工会的做法不屑一顾。

但是格拉夫无疑是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纯粹地道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同克鲁泡特金一样，相信互助和自由协作具有基本的重要意义。其他无政府主义者即使拒绝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并且坚持必须建立生产资料的公社所有制，但对协作却深为怀疑。比如毕生持续不懈地在欧洲和美洲进行革命宣传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埃里科·马拉特斯塔（1853—1932年）1906年在《觉醒报》中写道：

关于什么是集体利益以及这一点由什么集体来确定的问题、关于消灭对立的问题、协调对立利益的问题、以及协调个人自由与集体自由的问题，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在那些认为协议既有用而又有必要的人中间取得同意，达成自由的协议……我们坚信，解放和进步的唯一道路就是人人都有自由，人人都有鼓吹和实践他们的思想的手段——那就是无政府状态。这样，少数先进人物就会通过说理和示范的力量说服和带动落后的人。

持这种见解的人显然怀疑工会或者以工会为基础的任何工业控制机构可能成为“落后”成员强制“先进”成员的手段。

从马拉特斯塔的著作中援引的这一段话说明了，十九世纪后期，在某些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中存在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他们深知自己不过是极少数，人民——还有工人——的主体并不抱有他们对现实社会所抱有的那种不可抑制的义愤，也不具备他们那种对自由的狂热信仰；因此他们不得不问问自己究竟是有希望使广大群众接受自己的观点呢，还是不得不始终作为少数菁华人物、为那冷漠甚至敌对的大多数人的真正利益而奔走。总的说来，那些成了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的人相信，在阶级基础上采取行动，事实上就能够用足够的革命精神而不是用他们自己的信仰鼓舞工人的主体去发动群众运动。但是还有一些人没有这种信念，认为革命必然是“有觉悟的少数人”在得不到被压迫者的主体的支持、甚至是遭到他们的反对的情形下所作的工作。这种观点的极端形式导致了“用行动宣传”的做法，把它当作革命恐怖主义的工具；而其较温和的形式则符合布朗基的信念，即相信少数革命中坚派的作用，认为他们在革命过程中既要带动群众，又不能依靠群众的帮助，而必须以革命为己任。不过，布朗基派是极权主义者，而在这一点上同布朗基派见解一致的无政府主义者却是反对专制的自由意志论者。因此，无政府主义者不得不强调革命的少数有必要抓住一切机会影响群众，利用具体的疾苦和不满情诸来煽起暴动，以破坏国家和现存制度中一切其他强制性机构的权威。这就是马拉特斯塔的总的看法；某些法国无政府主义者，比如埃米尔·戈蒂耶、沙尔·马拉托和塞巴斯蒂安·福尔等，也持有这种见解。

自从革命者发现普选权并不一定有利于激进政策，而是可能被用作反对派的有力武器以来，在法国的革命思想中，“有觉悟的少数”的概念就起了很大作用。这个教训是拿破仑第三在 1848

年以后首先使人深刻领会到的,而在 1870 年的灾难以后更得到了加强,当时各选区选出的是反共和派多数,让他们来制定新宪法。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农村”所占的支配地位、巴黎公社委员所遭受的残酷屠杀,以及随之出现的高压政权,看来都使代议民主制成了反动的工具,使人重新想起 1848 年以后的年代以及蒲鲁东就政治代议制的幻想所发表的那番议论。此外,人们也无法忽视俾斯麦有意识地选择了成年男子选举权作为德意志帝国国会的选举制,而选举出来的国会后来又批准了反社会主义者法。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都曾说过,在革命成功以后,摆脱了权威的枷锁的人们会突然学会如何采取合作行动,并以平等友爱的精神去办事,这一点可能是真实的。但是最最明显不过的事实是,他们现在并没有这样做,而且除非革命首先使他们获得自由,否则也不可能指望他们在最近的将来这样做。

因此,有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在尽力鼓动群众采取行动的时候,也认为群众愚蠢并表示瞧不起,同时还把这种愚蠢当作论点来反对政治社会主义者,后者把希望寄托在广泛的选举权和赢得愚民的选票上。既然大多数人一再投票选举反动的候选人,或是选举那些反动程度实际上不下于共和国的公开反对者的资产阶级候选人,那么希望用议会方法取得胜利难道不是愚不可及吗?主张拒不投票的态度发展到了无政府主义者的队伍以外的许多其他人身上;这些人认为,在广大的工人改变看法或者由于宣传而明白事理以前,政治行动是徒劳无益的。他们指出,既然要拉选票,就必须拉拢那些愚昧无知、眼光短浅和自私自利的人,这样,候选人的腰杆子就软了,而且既然破坏了候选人的社会主义纯洁性,从而也就破坏了支持他竞选的政党的纯洁性。在工人阶级的历次代表大会上,弃权的人始终是少数,不过他们虽不能实现自己的方针,但是影响并不小,足以使工会相信,作为有组织的机构,它们最好超然

于政党和竞争之外，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工业领域中进行解放斗争，因为在这个领域中它们可以在“阶级的基础上”展开斗争，而不致卷入不分选民的阶级成分必须争取其选票的竞选运动中去。这种态度后来在革命工团主义的发展中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革命工团主义并不禁止追随者投票，但所强调的完全是“直接行动”，并且轻视政治代议制，认为它不足以成为走向新社会制度的工具。 359

当然，无政府主义者在理论上也有反对代议制政府的理由，这不仅是因为它是他们在原则上就反对的“政府”，同时也是因为从政治意义上说来，他们否认一个人能够代表另一个人。他们说，在某个具体问题或者活动形式上，一个代表还有可能代表一批人，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必须得到详细的指示，而且随时可以把他撤销。然而，政治代议制同这种有具体目的的代表权就完全不同了。政治代议制意味着代表有权在可能产生的任何问题上代表自己的选民，并且以自己的意志代替他们的意志。实际上，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专制主义概念，一个优秀的无政府主义者是不屑理会的。

蒲鲁东曾经在 1861 年的一封信中写道：“你会相信一个走在时代前面的人能够做到既正确而又受人欢喜吗？请你弄清楚，我的朋友，世界上最落后的东西，每个国家最开倒车的因素就是群众——也就是你所谓的民主。”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常常附和这种看法。马拉特斯塔在《无政府主义者》一书中写道：“可以肯定，在社会的最纯粹的状态中，大多数人苦于贫困，并受迷信的危害，他们匍伏在地，卑贱入泥，人类的命运取决于比较少数人的所行所为。”

然而，即使是抱有这种看法的人，也大都相信革命以后的人民会有创造力，并且赞成解放了的群众应该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当然，这要得到他们中间的智者的指导，但是绝不受强制。

那些最强调必须彻底摧毁目前秩序的人，也是最不愿意预言或者计划将来的事情的人。马拉特斯塔在 1876 年巴枯宁派的国际代表大会上曾有这样一段发言：

360 社会将怎样组成呢？我们不知道，也无法知道。毫无疑问，我们也忙于拟定社会的改组计划，但是我们认为这类计划是谈不上什么重要性的。它们必然是错误的，也许完全是异想天开的……首先我们的任务是破坏，破坏现在阻碍社会法则自由发展的一切障碍，并且要防止这些障碍以任何形式重新出现，或是形成新的障碍。要实现人类的命运，就要让社会的自然法则自由而有效地起作用。

由此可见，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认为，他们为人类所要求的自由也包括嘲笑“自然法则”的自由。他们认为这些法则在人类自由的条件下，决定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他们只是在这个范围内是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们不相信无法则的世界。同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相信自己的理论是“科学的”，是同科学的发展合拍的，并且认为，根据“自然法则”，无政府主义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对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说来比对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流派更适用；但是在另一个极端，自由放任主义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基础则同样是坚信“自由市场”的“自然法则”。诚然，在十九世纪，科学的影响是很大的。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美国社会主义—— 亨利·乔治与丹尼尔·德·里昂

美洲大陆始终没有出现过重要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亨利·乔治勉强组织了一个在某些方面同欧洲社会主义运动近似的运动，但是就任何完整的意义来说，他始终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在他不得不问问自己究竟是怎样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时候，他就更加算不上社会主义者了。爱德华·贝拉米写过一本关于社会主义乌托邦的书，很受欢迎，有一个时候他还自己成立了一个政党，但他不是一个创始的思想家，只是普及旁人的思想而已。丹尼尔·德·里昂由于倍受列宁推崇而必须加以考虑，但也够不上标准。在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个人力量最强大的是尤金·德布斯；他是一个领袖和组织者，而不是一个理论家。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傅立叶派的领袖和鼓吹者艾伯特·布里斯班相当重要，但也不过是一个二流人物。罗伯特·欧文的合作者威廉·麦克卢尔也是这样；欧文的儿子罗伯特·戴尔·欧文及其合作者弗朗西丝·赖特同新生的工人阶级运动有重要的联系。持近似于蒲鲁东的平等交换说的约西亚·华伦属于无政府主义和美国货币改革者的漫长行列，而不属于社会主义。

事实上，要论述美国社会主义的情况是特别困难的，因为这方面的理论从国外输入的成分非常之大，虽然其中始终也有本土的因素。来自欧洲的每一股移民浪潮都送来了一批欧洲的社会主义者；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每遭到一次重大的挫折都把一支特殊的政

362 治难民队伍送到大西洋彼岸来。寄寓欧洲的大多数政治流亡者都希望回到自己的祖国，而没有在所寄居的国家受到同化。与此相反，大部分到美国来的流亡者却永远在那里定居下来，成了美国公民，对归化国的政治发生了兴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再是德国人、法国人或意大利人了，也不意味着从此不再跟祖国移居来的同胞频繁往来了。因为在英国或瑞士，流亡者都成了孤立的小团体或个人；而在美国，难民中的每一个活跃的政治家都能找到完全由自己同胞组成的整个社会。他们到美国来不是为了政治原因，而是为了经济原因，只要用他们本国的语言，对他们主要宣传欧洲的思想（只是稍加修改以适应美国的环境），就很容易使他们受到影响。在伦敦或日内瓦，难民是一批领袖人物，已失去旧日的追随者，但仍想在流亡中左右他们。而在美国，难民倒可以把一批批人数不多的门徒聚集在自己的周围，但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既要把形形色色的小团体融合在一起，又要同美国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工人、工人阶级领袖以及特具美国风格的激进运动建立关系。

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一卷中所看到的，十九世纪上半叶，傅立叶和欧文是具有突出影响的人物。他们的创建公社的思想适合于大部分尚未开垦的国家，在这些国家的处女地上新公社不断建立，有的有理论基础，有的则没有。这些条件也很适合那种强调货币在社会正义中的作用的理论流派，因为开拓新土地的公社始终可能受诡诈的金融家和银行家的欺骗，而且经常缺乏现金作生产和交换之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不仅是约西亚·华伦的交换银行，而且连许多后来的“无息货币”计划都能抓住人心，并通过七十年代的绿背劳工党和1896年威廉·詹宁斯·布赖恩著名的总统竞选等在整个世纪中发生影响。但是这些货币计划大都同社会主义很少关系或者毫无关系；除了极个别的情况以外，本章不打算加以讨论。

在傅立叶派和欧文派的影响盛极而衰以后，以社会主义为基础建立公社的运动在美国又继续了一个时期。卡贝及其追随者1848年在得克萨斯州建立了一个伊加利亚移民区，两年以后搬到了伊利诺斯州的旧摩门教中心瑙武。卡贝本人在1856年离开这个移民区，并在那一年死去，此后这个移民组织又迁移了几次。美国最后一个伊加利亚到1895年才结束。傅立叶的法国大弟子孔西得朗同艾伯特·布里斯班合作，于1852年在得克萨斯州建立了一个法伦斯泰尔，但不久就垮台了。不过，孔西得朗仍留在美国，一直呆到1869年才离去，对美国傅立叶主义后期的发展十分关切。这两次尝试——卡贝和孔西得朗的尝试——必须看作是1848年欧洲革命对美国的第一次冲击；欧洲革命的失败不仅把公社创建者送到了美国，而且还送来了其他社会主义者难民，其中包括跟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同盟有关系的德国人。这一批人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同马克思有书信往还的朋友约瑟夫·魏德迈(1818—1866年)，他成了美国第一个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物。1853年，他在纽约建立了美国工人联盟，会员大部分是德国人，用德文出版了一个社会主义刊物《改革》，但不久就停刊了。流亡者大都投入了反奴隶制运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他们有许多人在南北战争中为北部作战。这次战争对把他们同化为美国人起了很大作用；这次战争有一个时期也打断了社会主义的宣传。战争结束时，美国的劳工运动开始采取新的形式。一个英国出生的机械匠艾拉·斯图尔德(1831—1883年)，在北部各州掀起了一个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广泛骚动。各大城市在原已林立的同业工会的基础上建立了八小时工作日同盟，于是规模相当强大的劳工运动第一次出现了。斯图尔德鼓吹八小时工作日，不仅是把它当作减轻劳动负担的手段，而且把它当作彻底改变工业制度的起点。他相信其影响所及将迫使工资增加，而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不仅能通过机械化程度的提

364 高来推动已经大大增涨的生产，同时还可以使工人积累资本并借资本的力量自己当家作主，摧毁资本主义制度。斯图尔德掀起的骚动使得纽约州、威斯康星州以及其他各州为公职雇员制定了八小时工作日法，并且成立了一些劳工统计局来研究劳资关系状况。斯图尔德同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合作，并跟他们中的一批人一道设法在第一国际美国支部瓦解后建立了一个国际劳工联盟。

就在同一时期，全国劳工联盟成立，这个组织是在威廉·H·锡耳维斯（1828—1869年）的领导下于1866年在巴尔的摩组成的。原先他已经建立了一个国际铸工联盟。全国劳工联盟开始时也提出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但不久就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建立生产合作社，并推行有利于小生产者和工资工作者的货币改革计划。它宣布了自己的国际目标，并同伦敦的国际工人协会建立了联系。它的一位活跃的领袖兼《工人的拥护者》编辑安·卡·凯麦隆参加了1869年在巴塞尔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第二年，全国劳工联盟宣布拥护“国际工人协会的各项原则”，同时表示打算参加协会。但愿望始终没有实现，因为实际上它已经开始分裂，它的实际推动者锡耳维斯死于1869年，此后联盟就越来越注意货币改革。联盟一直维持了下来，1872年还提出一个独立的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但后来就瓦解了。联盟的大多数领袖都转入到绿背劳工党，该党在1876年提出彼得·库柏为总统候选人。

正当这两个运动迅速展开的时候，马克思的信从者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27—1906年）1867年在纽约成立了德籍工人总协会，两年以后这个组织加入了第一国际。左尔格曾经参加1849年的巴登革命，在他从瑞士和比利时被驱逐出境以后，于1852年在美国定居下来。他在美国反对威廉·魏特林，1867年成了纽约共产主义俱乐部的主要人物。美国南北战争以后，左尔格有一个时期主要在自由思想运动中进行活动；到了1867年这一年，

365

他认为复兴马克思主义的时机已经成熟。当第一国际总部于 1872 年迁到美国的时候,他无可奈何地担任了国际的书记。两年以后,面对着使国际美国支部陷于分裂的纷争,他辞职了。支部瓦解以后,他相信首先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工会运动,他是塞缪尔·冈珀斯建立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顾问之一。左尔格是一个音乐教师,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就不大过问政治,但仍保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并且相当犀利地撰写了一些关于美国劳工状况和政策的著作。

全国劳工联盟使国际工人协会失望以后,第一国际美国支部就主要以移民团体为基础,每个团体都按自己的语言划分,七十年代严重干扰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切纷争这里都发生了。巴黎公社的失败以及紧接着在欧洲进行的镇压,又把一批新的流亡者送到了美国,于是马克思主义者、布朗基派、巴枯宁派、蒲鲁东派以及所有其他集团又在他们所归化的国家中再次争吵起来。主要由于这一原因,他们对美国工人的主体并没有发生什么影响;不久以后,美国工人就接受了完全不同的领导。

然而有一个时候,似乎有可能通过流亡者的努力而组成某种美国社会主义政党。1869 年,一批拉萨尔的信从者在芝加哥成立了一个世界德籍工人联合会;1874 年,这个组织发展成为伊利诺斯州劳工党,信从者很多。它的宗旨是促进城市工人和农民的联合行动。同年,马克思主义者在纽约成立了北美社会民主工人党;两年以后,这两个党和第一国际所属各团体的残余合并成为美国工人党,由菲利浦·范帕顿担任书记。1877 年,这个党改为社会主义工党;下面我们将要谈到,十九世纪最后十年,这个党 366 在德·里昂的领导下,成了美国主要的社会主义组织。开始时,这个党主要是一批民族团体的联合组织,德国人占支配地位。它的组成一部分是 1875 年马克思主义者和拉萨尔派在德国合并的结果;它的纲领明显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时代的第一国际的纲领,其

中说,“工人在工业方面的解放是……伟大的目标,必须由工人阶级自己来实现,除本身的政党以外,不借助于任何政党;每个政治运动都应服从这一目标,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

社会主义工党在开始阶段决定不提出总统候选人,而首先在工人中间建立自己的力量,但不久就改变了主意,因为地方支部在一些州里提出了候选人,并取得了一些胜利。然而在此期间,党又同工会闹分裂,党原先曾希望对工会发生巨大影响。参加建党的工会主义者要求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劳资关系问题上,而不要注意政治宣传;但是在1877年的代表大会上,他们在表决中失败了,党决定集中主要精力从事社会主义教育。

这次分裂主要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工会主义和农民运动迅速发展的结果。奥利佛·H·凯利所领导的一个名叫格兰奇的独立农民运动,已经使农民信仰社会主义的希望减少。格兰奇运动组成于1866年,直到1873年商业危机以后的萧条年代才吸引了大批信从者。此后它非常迅速地在南部和中西部发展,并且由于它为农业社会的利益而施加压力,要求调整铁路运输费用和采取其他措施,因而在某些州中成了政治上的重要因素。格兰奇运动还组织了许多各种类型的合作社,从事销售、集体购买农业必需品和生产农业机械等活动,但是由于农产品价格长期疲滞,这些事业大都遭到了惨败。到了七十年代末,格兰奇运动丧失了大部分成员,只是在一些受萧条影响最小的州里保存了下来,因为367 为在这些地区,它主要是作为社会组织发展的,没有过问政治,也没有实行大规模的合作计划。当这个运动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重新抬头的时候,它已不再是一支政治力量了,它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北部各州,而早期它在这些州里并不占重要地位。它在农业地区仍然存在,并且进行相当多的社会活动和一些合作社事业。

当农民纷纷参加格兰奇运动的时候,美国工会运动也在循着

新的方针发展。1869年，作为费拉德尔菲亚服装工人大罢工的余波，尤赖亚·史密斯·斯蒂芬斯(1821—1882年)成立了一个秘密会社，取名劳动骑士团。在这个活动中他的主要助手一个是J.L.赖特，另一个是弗雷德里克·特纳，前者是爱尔兰裁缝，后者是英国欧文主义者，职业是金箔匠。这两个人拟定了骑士团的详细议事程序。这个程序同共济会和十九世纪初期英国同业工会所用的程序非常相似。创始人斯蒂芬斯原受牧师训练，后来成了裁缝，原在一些地方同业工会中活动。他认识到面对着越来越强大的资本主义力量，他们这种人无能为力，于是便有了成立秘密会社的念头。在这个组织中，一切工人运动中的活跃人物都是个人成员，各自率领一批群众。劳动骑士团始终不是由独立的工会所组成的联合会，它是一个只吸收个人成员的单一组织。事实上，它在同业工会运动力量薄弱或者根本不存在的行业里成就最大，比如矿山、铁路以及雇用大批不熟练工人的工厂。斯蒂芬斯认为“人类的身体、智力和道德状况完全受生产性劳动者周围的条件支配，而人类在这些方面的状况既能造成一个民族的进步，也能丝毫不爽地说明一个国家的衰亡。”他说，这个论断对“任何时代和任何国家”都是适用的。他号召组织一个无所不包的工人运动，以合理利用生产资料以促进工人的共同利益为基础。斯蒂芬斯虽然愿意同社会 368
主义者合作，而且后来在那场使劳动骑士团陷于分裂的斗争中实际上也站在社会主义者一边，但是很难说他是社会主义者。他同艾拉·斯图尔德有很多共同之处，相信提高工资水平是改组社会的关键。但是在实现工业方面的目标这一点上，他所信赖的是在工业方面直接采取行动，而不是信赖立法。1878年以后，斯蒂芬斯加入了绿背劳工党，这个党前面已经提到了。

在1873年商业危机以后的若干年中，劳动骑士团并不占重要地位，它在1877年的矿工和铁路工人大罢工中只起了次要作用。

1878年，它不再是一个秘密会社。它指责同业工会，并决定以行业为基础把本身改组为若干个分组织。第二年，特伦斯·文森特·鲍德莱（1849—1924年）接替斯蒂芬斯担任领导。鲍德莱是爱尔兰移民，此后就主持这个组织，不过他不得不进行一系列内部斗争才巩固了自己的地位。鲍德莱虽然同斯蒂芬斯一样相信“无所不包的工会主义”——那就是说，相信“一个统一的大工会”，然而他却反对采取进攻性的罢工行动，主张协商和建立有秩序的集体协商形式。他更加强调利用组织作为对国会和各州政府施加压力的“压力集团”，在这一点上他是比斯蒂芬斯高明的“政治家”。但是大规模工业中的大多数美国雇主根本不准备承认工会运动，也无意签订集体合同。尽管鲍德莱愿意奉行和平政策，劳动骑士团却一再被迫采取罢工行动；而且由于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动用军队或者民兵来破坏罢工，或者制定法令来镇压工会活动，骑士团又被迫同政府发生冲突。

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劳动骑士团是美国最重要的工会组织。此后，它的影响就江河日下，这一方面是由于铁路工人大罢工遭到了严重失败，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芝加哥无政府主义者事件以后反动浪潮席卷了整个美国，关于这个事件前一章已加论述。

369 鲍德莱及其主要助手由于希望保持自己的高位，断然采取过火措施，支持处决艾伯特·帕森斯及其一伙无政府主义者，尽管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足以证明他们应对海马克特的炸弹案负责。为了抗拒这种态度，左翼方面有人退出骑士团；而右翼方面也有人慑于芝加哥事件以及这一事件对舆论的影响而退了出去。此外，当时已经开始了一个强大的运动，要求在各种行业中建立组织统一的全国性工会，而劳动骑士团中有许多团体又反对该团所依据的集中指导的政策。塞缪尔·冈珀斯（1850—1924年）已经投身到运动中来，组织了后来形成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新联合工会运动。由

于退出组织的人越来越多，劳动骑士团有一个时期转向了政治。1893年，丹尼尔·德·里昂力图取得这个组织的控制权，鲍德莱被撵走；但是德·里昂的尝试也失败了，于是德·里昂派退出组织，而骑士团也随之瓦解。

我们从头到尾叙述了劳动骑士团的情况，因而超出了正文的范围。现在我们必须回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谈谈1873年危机对政治性劳工运动的影响。当东部各州和伊利诺斯州的社会主义者在后来称为社会主义工党的组织中联合起来的时候，有一个对立的运动主要在西部、中西部和南部壮大起来，运动的主要直接目标是币制改革。开始时，运动是六十年代后期的“绿背”纸币运动，攻击的矛头是一些银行家和金融界人物，他们用很高的贴现率购进南北战争时期的绿背纸币，然后又设法制定法律收回全部票面价值。这个运动后来发展成为一种要求建立新币制的运动，主张币制不受金融家控制，维持农产品价格，并保证向生产者提供充分的信贷。这个运动首先在农民中取得了进展，后来又扩大到那批工资被降低或因经济萧条而失业的产业工人中去。1878年在俄亥俄州托莱多举行的绿背劳工党代表大会，组织了一个农民和工人的联合运动，提出了绿背劳工党候选人，竞选国会议员和总统。这个新的运动得到了100万张以上选票，把14名支持者选入了国会。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运动一直存在，但是随着各州的支持者相继被拉进民主党，运动的势力也逐渐衰减。不过在一个时期内它毕竟取得了很大成就，阻止了任何有效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在西部各州尤其如此。

1879年，亨利·乔治出版了《进步与贫困》一书，立时声誉鹊起，大受欢迎，这正是绿背劳工党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亨利·乔治(1839—1897年)生于费拉德尔菲亚，后来移居西部，在加利福尼亚州成了一个颇有成就的编辑和报纸业主。《进步与贫困》不是

他的第一部著作。早在 1871 年,他就在《我们的土地与土地政策》一书中提出了大致相同的概念,但未引起多大注意,从此以后,他就不断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表文章。《进步与贫困》一书问世时正是欧美两洲的舆论都愿意接受它的时候;书的文体和圣经引文深深打中了许多困惑和不满的人的心灵,他们都希望弄清楚为什么资本主义的发展给经济问题带来了这么多弊端,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动荡。

关于《进步与贫困》一书最令人难解的是,虽然它对大西洋两岸的舆论有很大影响,但是作者在书里根本没有谈出什么新东西。事实上,自从奥吉耳维和华莱士发表著作以来,土地垄断权就在整整一个世纪中遭到非难,而从托马斯·斯宾士和汤姆·潘恩的著作发表以后,它在大半个世纪中也遭到了猛烈攻击。非仅如此,乔治关于通过地租的社会化以补偿地价税的主张,也本是斯宾士的“计划”的一部分,而且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由苏格兰土地改革者帕特里克·爱德华·达夫(1815—1873 年)在所著《政治科学原理》一书(1854 年)中详细拟定,这本书是达夫的主要著作《政治学》的第二部。达夫主张国家应该把地主的土地买尽,价款以征收赋税的方式筹集,地主也在被征之列,然后把土地出租给出价最高的人。他所依据的理由是这样一个历史论点:私有土地不管在历史的早期有什么理由存在,在现代的条件下,毕竟已经成了一种弊端,而且阻碍生产的发展,现代已经不再有任何可以不向地主缴纳地租的无主土地让个人耕种。正象乔治一样,他的论点所根据的也是李嘉图的地租说,即由于人口越来越多,需求越来越大,地租就成了地主不劳而获的剩余。但是即使在英国,读过达夫著作的人也寥寥无几,在美国就更是绝无仅有了。乔治本人大概也完全不知道前人已经发表过同样的意见。事实上,他的见解显然是独创的,没有参考过以前任何著述家的意见,甚至也没有参

考过英国土地所有权改革协会这类当代机构的意见。我们将要谈在这个机构中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起了主要作用。

亨利·乔治的主要论点很简单。美国的情况使他看到，随着城市在新开拓的地区建立起来，城市的地价迅速上涨，随着适于耕种的无主土地越来越不容易找到，地租也有日益上涨的趋势。就象人口比较稠密的旧世界国家很早以前的情况一样，在美国也显然可以看出，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使土地所有者能够不劳而获，收入大增，使他能够对各种生产者和房客收取越来越多的租额。乔治问道，这种制度难道不显然严重违反自然公道，同时又起了极大的限制作用吗？它使土地所有者不仅能因他人使用其土地而收租，而且还可以把土地搁置不用，造成人为的匮乏，以增加自己的报酬。乔治认为补救的办法很简单。上帝是把土地当作共同的占有物赐给人民的，让人民把土地从非法占有者的手里夺回来吧。做到这一点的最好办法并不是让人民共同耕地（乔治大力主张个体企业），而是由国家每年向每块土地征收相当于经济地租的赋税，也就是说赋税的数额相当于未经改良的土地的价值，不包括投入的资本或劳动所增加的任何价值，但包括土地的位置、同市场邻近的优越条件以及天然肥力所产生的价值。乔治认为这种赋税制最好分阶段实行，以避免造成困难；但是跟达夫不同，乔治反对给予地主以任何偿金。如果他们仅仅是地主（即除提供土地以外，不提供资本资产），他们的收入就要逐步取消；如果他们自己使用土地，则其收入要降低到相当于他们在土地上所投入的劳动和资本的价值。

亨利·乔治并没有把劳动和资本区别开来。他认为这两种生产因素的拥有者同样有权得到收益，把他们一律看作是受土地垄断者剥削的牺牲者。他认为如果经济地租归代表全体人民的国家所有，那就不必再征收其他赋税了——这就是“单一税”这个名称

的由来，后来他在叙述自己的建议时就用这个名词。除了这种使所有生产者受惠的免税措施以外，还会有更多的好处。对于那些能够以最高效率利用土地、因而愿意付出最高地租的人来说，土地总是能够得到的。土地所有者为个人享受而不把土地用于生产的情况不会再出现；他们为索取高额地租或售价而把土地搁置不用的情况也不会再出现。这样，地主制给生产带来的种种限制就会消除；影响生产率达到最高限度的全部障碍也会扫清。我们将要谈到乔治对竞争性经济的好处是坚信不疑的，他根本不主张国家插手组织或者控制生产。实际上，他后来在所著《保护还是自由贸易？》（1886年）一书中大力鼓吹以最正统的自由放任主义理论为基础的自由贸易。

但是，亨利·乔治是真诚关怀工人福利的，他所著的《社会问题》（1883年）和《劳工条件》（1891年）都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后者是对教皇在同一个问题上所发布的著名通谕的答复。从他在美国以及在英国各地作旅行演说的时候起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他始终是工人的盟友，支持他们的反剥削斗争。大西洋两岸的资本家和地主都指责他是颠覆分子，说他攻击“财产权”，企图彻底推翻社会秩序，而他全心全意地相信私人企业的优点这一事实竟被置于不顾，或者说没有得到注意。他同社会主义者和激进派有往来，这些人曾力图使他相信，他所主张的那套土地所有权的理论在发达的社会里也同样适用于资本资源的所有权，但是没有成功。此外，他在早期不仅被看作是土地国有化的鼓吹者，而且他本人也十分愿意接受这个称号。只是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他才开始把他的补偿办法叫作“单一税”，或者设法把自己同鼓吹土地国有化的社会主义者区别开来。

关于亨利·乔治在英国的活动及其影响看来最好还是留待下一章去讨论，下一章我们将谈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英国社会主义

的发展。不容置疑,乔治的著作在这些发展中起了重大作用,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也能利用他的思想作为自己进行宣传的最方便的起点。但是,乔治在英国所作的一切对于他在美国的影响是没有作用的,尽管他在《爱尔兰土地问题》(1881年)一书中支持爱尔兰的要求的确使他在美籍爱尔兰人中受到欢迎。乔治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主要影响在于他能对基督教教义作民主性解释,并以此为根据用伦理道德的说法去阐述自己的反地主制的简单论点。这种说法使大批自认是不公道的经济制度的受害者——不论他们是工人、农民、店员,还是任何一类的小业主——都产生了同情的共鸣。实际上,乔治的信徒中还有少数有钱佬,这些人是实业家或商业企业家,他们没有理由喜欢地主或金融投机家,并且向往圣西门那样的古老概念:社会中的一切生产因素结成联盟去反对“非生产者”,即反对那些本身毫无贡献,但其他人和整个社会每使生产率提高一步都能从中得到好处的游惰者。

亨利·乔治在加利福尼亚州酝酿自己的主张,并把它第一次公之于世。但是他看中了纽约而不是旧金山,认为纽约是最便于宣传自己的理论的中心;1880年他在纽约设立了总部,并开始宣传。1886年,纽约中央劳工联盟和德·里昂派的社会主义工党一同敦促他出来竞选纽约市长;在随后举行的竞选中,他几乎当选 374 为统一劳工党的候选人。但是这次竞选的一个后果是明确了乔治的反社会主义立场。他愿意作出一定的迁就以迎合社会主义者,比如主张铁路以及其他需要以垄断方式经营的公用事业的国有化等,但他却不愿超出这个范围。1887年,提名他为候选人的统一劳工党瓦解了;选举中支持他的社会主义者被排斥了出去,但在这一过程中这个党也同归于尽了。

在1886年的竞选中,丹尼尔·德·里昂(1852—1914年)是支持乔治的人之一。分裂发生后,里昂有一个时期同爱德华·贝拉

米(1850—1898年)携手;后者在1887年出版了一部社会主义乌托邦著作——《回顾》。贝拉米是一个小说家和记者,他的社会思想是在同工人阶级运动脱节的情况下形成的,但他是一些以“国家主义”为名的俱乐部的鼓舞者,因为他主张以国有化作为建立平等社会的基础。仅次于《回顾》一书的最知名之作是一本小册子——《水槽的寓言》,这本小册子曾一再重版。继《回顾》以后,他在1897年出版了第二本乌托邦小说《平等》;在这书问世以前,他先后主编杂志《国家主义者》(1889—1891年)和《新民族》(1891—1894年)。在这些年里,追随贝拉米的人相当多,但是他所主持的运动却逐渐衰竭。最有势力的支持者德·里昂在1890年背弃了这个运动而参加了社会主义工党。此后,运动的追随者主要是中产阶级,大多数支持者都加入了人民党,该党提名韦弗将军参加1892年的总统竞选,后来在1896年的布赖恩的竞选运动中同民主党合并。但是有一部分人民党人拒绝同民主党人合并,在1900年的总统竞选运动中自己提出候选人华顿·巴克参加竞选,但所得票数无几,后来这个党实际上就消失了。

爱德华·贝拉米的理论是,在彻底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实现完全的经济平等。他完全承认高度机械化的大规模生产的必要性,因此他主张以全面的国家所有制和全面的国家规划作为经济活动的基础。他说应该把劳动力组成一支“产业大军”,共同为全体人民服务。“建立一支维持社会的产业大军的观念,恰恰同维持一支保护社会的军队完全一样,这一概念提醒我们最好看一看,把在破坏方面使用十分有效的计划应用到现在处于惊人混乱状态的生产方面是否有好处。”威廉·摩里斯在《公益报》上评论《回顾》一书说,他看到贝拉米的乌托邦中关于劳工地位的那种卑贱概念时,深有反感。但是这本书在英国和美国销路很广,并且被翻译成许多种文字。它主张实行最极端的国家社会主义,但由于

它主张经济完全平等,因而颇受许多社会主义者的欢迎,特别是受那些认为社会主义主要是道德理论而不是经济理论的中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欢迎。

在同一时期,原籍丹麦的美国社会主义者劳伦斯·格朗伦德(1848—1899年)有相当大的影响。他的最著名的著作《合作国家》(1884年)被译成许多种文字,英文版由萧伯纳编订。格朗伦德跟贝拉米不同,始终没有成为一个运动的领袖。他的伦理社会主义对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的许多社会主义团体都有贡献,但并没有完全为任何一个特殊流派所接受。

1890年,一个新人物丹尼尔·德·里昂参加了社会主义工党,不久就成了这个党的领袖。德·里昂生于库拉索,二十岁多一点就来到美国,当上了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讲师。1886年,他在纽约支持亨利·乔治,然后参加了劳动骑士团和贝拉米的国家主义运动。1891年,担任社会主义工党机关报《人民报》的编辑,并在这家报纸上发挥了他独特的社会主义思想,后来倍受列宁赞扬。在社会主义工党内部,他主张在社会主义者的领导下重新组织工人运动,以便同取代前劳动骑士团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对抗。1895 376年,他推行这一政策,说服社会主义工党把行业与劳工联盟建成工会与社会主义团体的联合组织,提出一个以产业工会主义的战斗性概念为基础的先进社会主义纲领。德·里昂强烈反对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认为富于战斗性的工人阶级组织是推翻资本主义的必要工具。他接受马克思关于国家实质上是阶级强制工具的看法,认为政治行动仅仅是便利进行鼓动的手段,而不是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实现有效改革的方法。他以唯物史观作为理论基础,强调政治制度的经济性质,并强调政治制度必须用一种以产业工人阶级运动为基础的新型社会组织来代替。他在许多小册子里毫不妥协地阐释了左翼马克思主义,这种理论同欧洲社会民主党实际

奉行的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对塞缪尔·冈珀斯和美国劳工联合会所代表的那种工会主义展开了无情的斗争，这种工会主义并不想推翻资本主义，而只是设法从资本主义中取得最好的条件。德·里昂在他最著名的小册子《罗马史上的两页》（1903年）中引证了革拉古兄弟的话来支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概念。在《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1901年）一书中，他反对无政府主义者摈斥政治行动的观点，并坚持说应该永远把政治行动仅仅看作是一种革命宣传的形式。在《这次罢工意味着什么？》（1898年）中，他着重指出罢工的作用是为采取革命行动作准备，而不是改善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命运的手段。在《工会运动的迫切问题》（1904年）中，他宣传革命的产业工会运动的理论，并把这种理论带到第二年建立的世界产业工人协会中去。面对着美国劳工联合会所占据的支配地位，德·里昂在九十年代中成了“工会运动二元论”政策的主要鼓吹者，这就是说革命的工会主义者应该同心协力把改良主义工会夺过来，掀起自己的战斗性工会运动。

377 1895年以后，德·里昂派有一个时期控制了纽约中央劳工联合会，但是这个组织1898年退出了行业与劳工联盟。此后，德·里昂派在工会运动中的影响就逐渐衰退了，不过在某些部分的矿工中和大工业的移民工人中仍然有影响。1899年，社会主义工党内部的争执明朗化。相当大一部分党员在摩里斯·希尔奎特和亨利·斯洛波丁的领导下退出了党，另外成立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发展成为美国社会党，它的纲领同西欧的社会民主党很相似。留下来的德·里昂派控制了社会主义工党，并在1900年的代表大会上把党纲中的全部当前要求取消，同时宣布了一个彻底的革命政策。在那一年的总统竞选中，他们同尤金·维克托·戴布斯（1855—1926年）对抗，得到的票数不到35,000张，后者是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得到了将近100,000票。此后，德·里昂派就同产业工会

主义运动共命运,直到后来在政治行动问题上发生分歧,才引起了进一步的分裂,于是世界产业工人协会分裂成为对立的两派。一派的总部设在底特律,仍然由德·里昂派领导;另一派人数较多,以芝加哥为中心,由威廉·达·海伍德(1869—1928年)领导,其根本态度是完全反对把政治行动当作工人阶级的斗争武器。不过,这些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本卷所涉及的时期,我们将在适当的地方加以讨论,也就是等我们讨论二十世纪产业工会运动和工团主义运动的发展时再加以讨论。到那时,我们将看到,德·里昂派运动虽然在美国走上了下坡路,但在英国的支派却形成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左翼,特别是在克莱德流域,此外,1914—1918年世界大战以后,英国共产主义的第一批领袖,有很大一部分也来自这个支派。

1886年以后,即德·里昂派支持亨利·乔治竞选纽约市长以后,主持这次竞选的统一劳工党瓦解了。亨利·乔治更加有意识地反对社会主义,他的信从者有的在政治上同民主党的激进派合 378并,有的则在政党以外组成宣传团体以鼓吹“单一税”。事实上,“单一税论者”在美国和英国都越来越强调他们同社会主义的分歧。乔治的理论中的那些个人主义成分暴露得越来越清楚,特别是在他毫不妥协地为自由贸易辩护,反对国家管理经济事务的时候,暴露得更加清楚。美国的社会主义,如果用总统和国会选举中所得的票数来衡量,虽然又继续发展了一个时期,但是它依然是一种大体上只有欧洲移民接受的理论,同美国的特殊环境所造成的普遍不满情绪不再有任何密切的关系,也不再同那些对农民、小业主以及工资劳动者具有号召力的“人民”运动共进退。只是在少数几个州里,尤其是在德国人很多的威斯康星州,社会主义运动才设法保持了广泛的吸引力,足以使它在选举中取得具体的成就。关于美国社会主义在1898年戴布斯领导成立美国社会民主党以后的发展史,必须留待本书的下一卷去讨论。

第十四章

英国社会主义的复兴——威廉·摩里斯

人们常说，从 1858 年最后一次宪章派会议到 1881 年民主联盟成立，在这一段时期，英国的社会主义是无声无息的。即使就“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狭意来说，不把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算在内，这种说法也不是完全正确的。这个时期，社会主义者一直存在，这并没有把那些外国难民算在内，他们的俱乐部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的整个时期都存在，七十年代巴黎公社失败以后还大大地充实了。这些俱乐部始终有少数英国会员，并同那些对国际主义有兴趣的英国团体有些联系。此外，老宪章派始终是有的，其中有一些人肯定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即使他们并不习惯于用这个名称。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八十年代的民主联盟中又露面了，比如鞋匠查尔斯·默里就是其中的一个；还有更多的人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很活跃。1866 年领导伦敦工人协会的罗伯特·哈特韦尔就是一个老宪章派。此外还有欧文派：劳埃德·琼斯一直活到 1886 年，在工会和合作事业中一直到行将去世时都很活跃。在七十年代初期，还有约翰·黑尔斯等组成国际工人协会英国支部的那些人。在第一国际瓦解以后，黑尔斯继续活动，并代表伦敦国民俱乐部参加 1877 年在根特召开的社会主义者统一代表大会。

尽管如此，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即从厄内斯特·琼斯终于放弃把宪章运动当作社会主义骚动坚持下去的时候起，一直到八十年代初期，英国确实没有社会主义运动，不论是马克思主义

的、欧文派的或者任何其他种类的一概没有。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很活跃,但是他们几乎已经不再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了,他们已经同合作运动共命运,为了使这个运动转向生产合作社方面,他们曾作出艰苦努力,但没有获得持久的成就。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特别是在托马斯·布兰福德(1861—1899年)的领导下,这种活动又重新抬头。布兰福德1893年担任合作生产联合会书记,但是人们并不认为布兰福德是社会主义者,而且这个复活的运动始终没有用社会主义名称。老资格的教育与宗教分离论者和合作主义者乔治·雅各布·霍利约克(1817—1906年)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极力反对新社会主义的人,虽然他一直热心鼓吹合作生产。在罗契台尔先驱者合作社兴起后,尽管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作了努力,合作运动仍然明确地形成消费者的运动,背弃了欧文派的社会主义。当然,这种坚持消费者控制的态度不一定妨碍运动具有社会主义思想。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运动具有浓烈的自愿主义性质,反对国家干涉。它自称是“国中之国”,反对——或者不如说其中大多数领导人反对——国有化之类的主张。如果说运动仍然在口头上侈谈在遥远的将来总有一天会实现“合作国家”的理想,而在实践中它已经安心于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开展工作,以按股取息和“买货分红”作为它的突出方法。合作运动之所以几乎完全转向这种消费者控制的概念并以自愿原则作为吸收会员的基础,主要是由于这些方法非常适合当时情况,使运动得以扩大和蓬勃发展;也有几分是由于约翰·托马斯·怀特黑德·米切尔(1828—1895年)的强烈个性,他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消费合作运动中几乎是无与抗争的领袖。米切尔奋力捍卫其消费者控制和以自愿为原则的信念,并且严肃认真地把合作运动当作一种实业运动开展下去。他力求在消费合作社联合组织的控制下扩大合作生产,而不是搞生产者合作。他在同霍

利约克和爱德华·范西塔特·尼尔的斗争中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后者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作为合作联合会的书记，毕身致力于合作运动。尼尔和霍利约克，还有其他一些人——比如一直活到二十世纪并参加了基尔特社会主义运动的爱德华·欧文·格林(1836—1923年)等——则相信较老的合作思想，至少是希望合作工厂雇用的工人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欧文的奎因伍德公社的前秘书和欧文遗作保管人亨利·特拉维斯博士想在自己的著作《社会的合作制度》(1871年)和《英国社会主义》(1880年)里继续保存欧文派的社会主义，但是没有人追随他。米切尔把这些理想主义者推向一边；毫无疑问，他得到各地消费合作社大多数活跃的委员的支持。

因此，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当大型批发合作社成立，而消费者运动又获得具体的营业成就而稳定下来的时候，合作运动就割断了它同社会主义的联系。工会运动的情况却不这样容易说明，因为它远远不是那么一致。但是可以肯定，在1860年到1880年之间，没有一个著名的工会领袖愿意自称为社会主义者，那些参加马克思领导下的第一国际的人也不例外。毫无疑问，有少数积极的工会主义者是有觉悟的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是定居在英国的外国人，比如约·格·埃卡留斯(1818—1889年)就是一个德国裁缝，他担任第一国际书记，在1872年那场使第一国际瓦解的纷争中同马克思决裂；再如亚当·韦勒也是一个德国国家俱木匠，他在八小时工作日同盟中很活跃，在职工大会上提出社会主义动议；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人。毫无疑问，有些英国人是同情社会主义的，比如木工工会领袖罗伯特·阿帕尔加尔特(1834—1924年)就是一个，他留在第一国际的时间比大多数人都长，但是这些人都认为社会主义运动是一个外来的运动，根本不是一种适合七十年代英国情况的理论。

堪称社会主义而又有些实力的团体是土地与劳动同盟，马克

思在六十年代末期所写的一些信里曾热情地谈到它。由于那个在 382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中同马克思合作的集团的鼓动，土地与劳动同盟于 1869 年成立，由埃卡留斯和机械工人马丁·丁·布恩联合担任秘书，约翰·韦斯顿担任司库，马克思对它的前途曾寄以很大的希望。同盟的委员会委员有考威尔·斯特普尼、托马斯·摩特尔希阿德和其他一些活跃的“国际会员”。看来同盟最初曾得到工会的大力支持。同盟的纲领是由伦敦各个工人阶级组织的 40 名代表所组成的委员会拟定的，一开始就直接提出土地国有化的要求。接着又提出以下八点要求：(1) 实行国内移民；(2) 实行非宗教性国民免费义务教育；(3) 禁止私营银行发行纸币，只有国家有权发行纸币；(4) 征课直接累进财产税，以代替所有其他税收；(5) 取消国债；(6) 撤销常备军；(7) 减少劳动时间；(8) 实现平等选举权并为议员支薪。这个纲领使人回想起欧文主义和宪章主义，它是在失业严重的时候拟定的，建议把失业者安置在国有化的土地上，在军队最后解散以前，利用军队作为“一支先遣力量去除草、排水和平整荒地以便耕种”。有一个时期，土地与劳动同盟看来很可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宣传组织。但是对大多数工会领袖来说，它所开的药方很快就证明药力太猛了；马克思原打算同他们合作。他们中的一些人很快就转而支持土地所有权改革协会。这个协会要温和得多，主要是受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影响而于 1870 年成立的。协会的支持者，除了乔治·奥德加、鲁克拉夫特和克里默等工会主义者以外，还有一些激进政治家和著名的经济学家：其中有查尔斯·迪尔克、彼得·泰勒、约翰·莫利以及亨利·福西特教授、约·埃·凯恩斯教授和经济史学家詹姆斯·索罗尔德·罗杰斯等。这两个组织的倡导人之间曾有激烈的争执；当马克思 1871 年不能再控制工会领袖的时候，土地与劳动同盟就失去了作用而逐渐衰亡。

土地所有权改革协会同土地与劳动同盟都认为，土地价值中 383

所出现的不劳而获的增益应该属于创造这种价值的整个社会，地主无权占有。土地所有权改革协会的倡导者打算通过税收把这种增益收回，但却不愿意走到土地国有化的地步。他们的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制定租借土地的办法，把更多的工人安置在租借的土地上作为业主。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虽然晚年在理论上越来越同情社会主义，但是绝对无意支持土地与劳动同盟的反资本主义建议，这个建议毫无分寸地指责地主、高利贷者和工业剥削者，使得同盟的宣言几乎具有革命的音调。实际上，穆勒仍在设法改革资本主义而不是推翻它。穆勒在各版《政治经济学原理》中讨论空想社会主义者时所发表的早期见解，本书第一卷已加讨论。他晚期的见解受他的继女海伦·泰勒(1831—1907年)的影响不小，她是社会民主联盟的活跃盟员。

当然，土地与劳动同盟关于土地归整个社会所有的主张毫无新奇之处。托马斯·斯宾士^①在十八世纪结束以前，布朗特里·奥勃莱恩的全国改革联盟在四十年代，都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土地国有化的方式，而帕特里克·达夫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也发表了自己的“单一税”理论。至少是在当前的政策上，土地所有权改革协会的意见远不象这些组织中任何一个那样直截了当。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仍然存在着一个生气勃勃的敌视地主制的传统，爱尔兰人对征租特高的离地地主所进行的斗争使这种传统不断得到加强。反地主宣传在奥杜诺万·罗萨所领导的芬尼亚运动中起了很大作用，这个运动的活动年代与第一国际相同；迈克尔·达维特(1846—1906年)在1877年出狱以后也持同样的理论。

达维特出狱两年后成立爱尔兰土地同盟，一反耕者有其田的传统要求，而以土地国有化的要求为基础。达维特的运动对英格

^① 海德门在1882年重印了斯宾士的小册子。

兰的舆论有很大影响,那里成立了英格兰土地同盟给予声援,海德门就属于这个同盟。成立民主联盟的那一年,经过著名科学家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1823—1913年)的大力活动,成立了土地国有化协会,它的要求之一就是土地国有化。1882年,华莱士出版了所著《土地国有化》一书。在苏格兰的小农场佃农中间也有一个活跃的运动;这个运动是由苏格兰土地与劳动同盟组织的。这个同盟在组成以后不久就同社会民主联盟合并,但在1884年又同社会主义联盟盟员一道退出,并一直维持到1888年参加苏格兰工党。苏格兰小农场佃农的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有:G·B·克拉克博士(1846—1930年)和罗伯特·鲍丁·肯宁汉·格雷姆等人;前者同第一国际英国委员会有关系,从1885年到1900年是代表小农场佃农的议员;后者后来在苏格兰工党和社会民主联盟中很活跃,从1886年到1892年是激进派议员。

因此,当亨利·乔治所著《进步与贫困》一书在大西洋此岸闻名以前,爱尔兰的反地主制运动已经全面展开,而在英格兰等地区也很活跃。特别是华莱士,在他发展自己的土地国有化计划时,看来完全没有受到亨利·乔治的影响。即使《进步与贫困》一书没有写出,华莱士的计划肯定也会列入民主联盟的纲领。但是两者之间通过爱尔兰却有间接联系。迈克尔·达维特的思想是在那倍受虐待的几年监狱生活中形成的;他被释放以后立刻前往美国,在《进步与贫困》出版前不久,会见了亨利·乔治。毫无疑问,乔治的理论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成了乔治思想的热烈宣传者。1882年乔治访问爱尔兰,大概也是由于他的缘故。达维特虽然欢迎乔治,推为盟友,但他自己却无疑主张土地国有化,是社会主义者,绝不接受乔治关于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主义的优点的看法。华莱士也是社会主义者和主张土地国有化的人,虽然他很少参加任何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运动。

385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除了土地改革的鼓动以外,还有四个团体代表激进趋势,为社会主义的复兴铺平道路,因而值得注意。这些团体之间的差别很大。有两个团体人数很少,但由于其主要支持者个人的素质而见重要。其中一个团体是实证论者,主要代表人物是比斯利教授和弗雷德里克·哈里森(1831—1923年);另一个是以斯图尔特·赫德兰姆牧师为首的新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其他两个集团是群众运动,在激进的工人中拥有大量信徒:一个是以约瑟夫·张伯伦为首的伯明汉激进派,这一派同追随查尔斯·迪尔克的伦敦激进派是密切的盟友;另一个集团是查尔斯·布莱德洛领导的共和激进教育宗教分离论者。除了斯图尔特·赫德兰姆所领导的运动以外,这些运动没有一个是接受社会主义的,事实上,布莱德洛还宣称自己坚决反对社会主义。尽管如此,这些运动都在几个方面对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英国社会主义的复兴作出了贡献。

爱德华·斯宾塞·比斯利(1831—1915年)是伦敦大学学院历史学教授,奥古斯特·孔德所著《实证政治体系》的翻译者。他是一个道地的激进派,热烈同情工人阶级运动,始终愿意为之效力。他主持了第一国际的成立大会,后来又主持了海德门和亨利·乔治关于“单一税论与社会主义”问题的著名辩论,此外还主持过许多其他聚讼纷纭的工人阶级问题的讨论会。他为乔治·波特尔主编的《蜂房报》撰过稿,并同弗雷德里克·哈里森一道帮助工会进行1867年至1875年的大规模合法斗争。比斯利支持一切需要支持的进步运动,敢于说话。但他是坚定的实证论者,因而不相信社会主义。因为孔德的政治理论是一种国家和教会的二元论,孔德所说的教会不是一般神学家的教会,而是实证主义的人道教会。根据孔德的这种二元论,一种新的牧师制不是作为世俗权力机构来统治世界,而是要控制一切教育,并且要作为统一的力量把人类引

向“科学”的治理。比斯利在主持社会主义者与反社会主义者彼此把对方的思想驳斥得体无完肤的辩论时，总是可以说他不同意辩论双方的意见。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或者他的盟友哈里森在工会有需要的时候为它们大力效劳，这也不妨碍比斯利同海德门和新社会主义运动的其他领袖保持非常友好的关系。 386

另一方面，斯图尔特·达克沃思·赫德兰姆（1847—1924年）则是社会主义者，他先后在社会民主联盟和费边社中积极从事新社会主义的鼓动工作。赫德兰姆是高教会教士，在伦敦东区布莱德洛影响很强的贝思纳尔·格林区担任副牧师。他反对教育宗教分离论者，大力阐述主要取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基督教社会理论，但表述方式要激烈得多。1877年，赫德兰姆建立了圣马太基尔特，这是一个由圣公会牧师和活跃的世俗人物组成的团体，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观点。当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出版的时候，赫德兰姆表示热烈欢迎，但又越出其范围，除了把这种理论应用于土地以外，还应用于资本。赫德兰姆的活动最初限于伦敦，其方式是参加教育宗教分离论者和共和派的集会，一方面赞同其倡导者的社会要求或予以增饰扩充，同时又号召他们承认基督是消灭贫困和压迫的十字军的真正领袖。赫德兰姆写了许多小册子，但他不是一个理论家，而是一个实际的“福音传布者”；在十九世纪的晚期，他推动了一个人数众多的社会主义牧师团体的活动，其中大多数是圣公会高教派教士。正象摩里斯及其集团进行活动的时候一样，基督教社会主义对低教会派教士很少吸引力，而在后来称为“英国天主教徒”的人士中以及在“现代派”人士中则得到了响应。低教会派的强烈“出世思想”和一些非国教团体的强烈个人主义使基督教社会主义深入不进去。

实证哲学和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都是几乎完全只限于知识分子的小规模运动。至于对社会主义的复兴起了扫清道路的作用的

387 群众运动，我们就必须转过来讨论约瑟夫·张伯伦和查尔斯·迪尔克的激进主义以及查尔斯·布莱德洛的无神论的共和激进主义，安妮·贝赞有一个时候曾同布莱德洛密切合作。

约瑟夫·张伯伦(1836—1914年)在1874年带着一笔财富退出了商界，完全致力于政治。他以激进派身份于1869年选进伯明翰市政委员会，因而在该市早已出了名，不仅如此，他担任全国教育联盟的主席，在争夺学校控制权的斗争中成了教会的死对头，因而在全国也很出名。1873年，他出任具有强烈激进传统的伯明翰市市长；以后几年，他领导激进派多数，执行了广泛的市政改革计划。他把煤气和自来水收归市政府所有，开始清理贫民窟，并着手搞卫生管理示范。1875年，张伯伦在伯明翰召开了一次市卫生会议，这就是后来称为“市政”社会主义或“煤气和自来水”社会主义的实际开端。第二年，他当选为议会议员；再过一年，他开始同弗朗西斯·施纳德霍斯特(1840—1900年)组织全国自由联盟，旨在使各地的自由和激进派协会拥护激进主义，并把它们团结起来发动一次反对党内辉格分子的运动。1880年，正是由于这个集团的组织工作，自由党在选举中获胜。这项工作的一个结果是把张伯伦送进了内阁，担任贸易大臣，而查尔斯·迪尔克爵士(1843—1911年)则最初担任外交次官，从1882年起改任地方政府大臣。他们两人还是一个选举法案的主要倡议者，根据这个法案在1884年和1885年使郡的投票权自由化，同时重新分配了议会议席，使大城市和矿区得到了更多的席位。

从上面可以看出，民主联盟的建立是同自由党明显向左转同时发生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前半叶，社会主义者同张伯伦的激进派进行了一场艰苦的斗争。张伯伦的政策还有另一面：他是强烈的帝国主义者，接受不了任何可能危害帝国统一的爱尔兰自治的主张。自由党1880年的胜利同迈克尔·达维特的土地联盟

恰好同时出现,这个联盟早期曾得到帕涅尔的支持,帕涅尔于1878年成了国家主义者的领袖。面对着达维特的“免租”运动,自由党政府采取了加紧压制的政策,这使政府同英国大部分激进舆论发生了激烈冲突。张伯伦由于参与其事,丧失了很大一部分激进派的支持。我们将要谈到,民主联盟在成立的最初几年,曾把爱尔兰问题放在首要地位上。当格莱斯顿终于相信爱尔兰自治是唯一的解决途径时,张伯伦和迪尔克退出了政府,并根据加强激进主义的国内政策和以帝国统一为主旨的对外政策,着手组织自己的信从者。张伯伦1885年提出的“尚未批准的计划”是他用来争取自由党并制止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出现的一张牌。但是这种“国内激进主义”是同压制爱尔兰和发展帝国主义的政策一并向选民提出的。

在“尚未批准的计划”中,张伯伦和迪尔克所提出的目标是很高的。计划采纳了社会主义者和亨利·乔治所提论点的一大部分;但为弥补许多人因丧失共同遗产中的一份而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所采取的办法,不是国有化或“单一税”,而是由富者以高额赋税的形式支付“补偿金”。全体人民从这种“补偿金”的收入中所将得到的好处是免费教育、改善住宅、增加社会服务——即现在所谓的“福利国家”的标志。农户的土地所有权得到保障,并将得到租价公道的院子,改良土地时将得到充分的补偿费;农业劳动者则将有机会得到一小块自有的耕地(3英亩土地和一头牛);但政府有权为公共用途强行征购土地。此外,“尚未批准的计划”还提出,对教会将实行非国教化,将废除复投票权,并将实行议员付薪办法。同张伯伦早先提出的各项激进建议相比,现在没有重提的唯一因素是共和主义,因为对一位主张帝国主义的政治家来说,这种政策是很不相称的。但是,即使在1885年,张伯伦仍然表明,国王只应该是帝国的名义元首,如果插手干涉激进民主主义的进展,王位就要遭

到危险。

389 在提出这份挑战性的计划时（所谓挑战性是对他自己的党来说的），张伯伦明确地谈到了社会主义，他说不应该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坏事，它是要求得到承认的一种现代趋势”。他又说，“多年来，英国立法的发展道路就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性质，今后必然还是这样。”

必须记住，这份计划是在民主联盟采取全面社会主义纲领两年以后（1885年）公布的，当时选民刚刚大量增加，大不列颠从不到300万人增加到将近500万人，爱尔兰还不计算在内。在爱尔兰，郡选举权的扩大使得国民党增加了许多议席；在苏格兰高地，它使得相当强大的小农场佃农运动有可能组成；在英格兰，它虽然加强了保守党对农村选区的控制，但也鼓舞了英格兰土地归还同盟和其他团体为土地改革大力进行鼓动。

当然，“尚未批准的计划”并不意味着张伯伦相信了社会主义，他依旧是野心勃勃的帝国主义者，同时也是坚信私人企业的人。在后一个问题上，亨利·乔治和许多土地改革者同他的见解相同。张伯伦的社会理论更接近亨利·乔治，而不接近马克思。但是张伯伦又不同于乔治，不相信自由放任主义，这是因为——至少基本上因为他坚信帝国主义。他希望国家作为资本主义企业的盟友积极进行干涉，而不光是站一旁，不加过问。10年以后，正是这种资本主义积极性驱使他在保守党政府任职，并领导一个主张帝国经济统一的运动。

在“尚未批准的计划”发表以后，张伯伦并没有立刻同自由党决裂。他在格莱斯顿的新内阁里担任地方政府大臣；但是差不多就在格莱斯顿提出自治法案的同时，他又一次辞职。此后有9年，张伯伦领导一个独立的但越来越倾向于保守党的统一自由党。在此
390 期间，查尔斯·迪尔克并没有追随他的伙伴转向托利主义，他已经

由于一次离婚案件于 1885 年暂时退出了政治舞台。力图使自由党接受先进的激进主义的巨大尝试肯定是失败了；这次运动留下的大批激进分子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自由主义和张伯伦主义都使他们的希望遭到破灭，他们已经多半愿意接受新的理论。这时，而且也只有到这时，社会主义运动在英国发展的条件才真正成熟——只要提出社会主义的方式能使激进分子认为社会主义正是他们的自由主义激进思想的体现。

1881 年，当亨利·迈尔斯·海德门(1842—1921 年)率先建立民主联盟的时候，社会主义运动作为一种议会力量的条件还没有成熟；这个事实，正如下面将要谈到的，基本上说明了海德门所创始的运动以后的历史是怎样形成的。反对对爱尔兰采取压制政策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口号，土地改革也是这样。但是这两点都没有提供充分的理由，足以掀起一个政治运动向整个自由主义或张伯伦的激进派自由主义挑战。只要在自由党内部有一个强大的激进派左翼在进行活动，并且有希望使自由党采纳张伯伦的国内政策，就不大有可能说服工会领袖或他们的积极追随者拥护社会主义事业，甚至连组织一个独立的劳工政治运动都很少可能。只有在张伯伦主义同格莱斯顿的自由主义肯定已经分道扬镳的时候，只有在张伯伦的支持者发现不得不全盘接受他的帝国主义和社会改革政策的时候，这种机会才会出现。

1886 年正是这样一个关键性的年头；从这时起舆论的潮流才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送入后院，把英国工人阶级左翼的主要力量送进 1889 年的新工会运动和九十年代争取工人独立代表权的运动。1886 年以前，社会主义者是逆潮流而动的；而这一年以后，由于我们下面将要谈到的各种原因，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则没有能顺应潮流，错过了时机。

在讨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前，我们还

391 必须先谈谈推动这个运动发展的前述四种优势力量中的最后一种。这支力量就是查尔斯·布莱德洛(1833—1891年)所领导的激进共和运动,它的基本态度是积极反对宗教和贵族特权。理性主义和教育宗教分离主义是同进步的政治和社会舆论有关系的学说,在布莱德洛的时代以前已经有了悠久的历史。从潘恩的自然神论到理查·卡莱尔的教育宗教分离论的共和主义,然后到罗伯特·欧文的理性宗教和从中发展出来的乔治·雅各布·霍利约克的教育宗教分离论,已经有了一连串的反神学激进运动。这种运动往往同共和主义有关系,而共和主义则特别能吸引比较老式的手工艺中的大部分熟练工人,并能在他们的带领下吸引城市工业区的一部分无产阶级。这类运动并不总是“极端主义的”,欧文派的运动就肯定不是。但是这一派人在十九世纪英国那种宗教气氛极浓的环境中往往成为脱离社会的人;他们的追随者往往同外国的社会主义流亡者来往,因为大多数流亡者也同样持反宗教观点。但是宪章运动以后,激进共和主义在教育宗教分离论方面已经大体上发展成为一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运动,强烈反对集体管理,而且在这一点上更接近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虽然它的大多数追随者并没有走向这个极端。

布莱德洛肯定是一个个人主义激进派,而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反对当时的社会是从怀疑宗教开始的,他15岁在一个煤商手下当店员时就强烈地表现了这种怀疑。他16岁的时候被迫离开家庭,到教育宗教分离论者(其中有理查·卡莱尔的孀妇)中间去找托身之所。然后他设法一面经营煤业一面进行宣传,但没有成功。他17岁参加军队,3年后,由他的家庭出钱让他退了伍,在伦敦一个律师手下当文书。不久以后,他又到另一个法律事务所工作,这种职业使他获得了丰富的法律知识,后来对他很有用。在此期间,他恢复了反宗教宣传。为了不致丢掉职业,他用了一个“偶像崇拜

反对者”的假名。1858年,他到各地去发表演说,不久就以举行暴乱性集会,同警察发生冲突而闻名。他那雄辩滔滔而打动人的演说,使他在访问过的城市里很快得到大批的追随者,并被看作是一个持有战斗性无神论观点的共和党的自然领袖。1860年,谢菲尔德的一批主张自由思想的激进派创办了《全国改革者》杂志;两年以后,布莱德洛接办这家杂志,使它成为极左派的很有影响的机关刊物。1867年改革法案以前,他作为全国改革联盟的成员在工人阶级中积极从事鼓动工作。1866年,他组织全国教育与宗教分离协会,自任主席;协会成了他所领导的运动的主要机构,虽然他在马尔萨斯联盟中也很活跃。1870年,他担任了英国激进派派往西班牙共和党的代表;第二年,他想去巴黎公社同法国国民议会之间进行调解,但是他没有获准进入法国。在此以前,他曾在1868年改革法案以后的选举中竞选北安普敦郡议员,但没有成功。1874年,他又竞选了两次,也没有成功;不过他在1880年进行第四次竞选的时候,却作为中产阶级激进派、《真理》杂志的创办人亨利·拉布谢尔的伙伴当选了。他拒绝宣誓,并要求不经宣誓而发表正式证词的权利;下院拒绝给他席位,但是后来又准许他在“一切由自己负责”的条件下发表正式证词。于是他就任了议员并投了票;但是法院对他的权利提出了异议,他的议席被取消了。他曾不顾这一裁决,继续出席下院会议,但被武力驱逐出去。1881年,他又参加竞选,并再次当选。下院又把他驱逐出去。第二年,再次参加北安普敦的竞选,又一次被选中。于是,他前往下院,打算自己宣誓就职。不过下院又把他驱逐出来。这时,他已因竞选多次涉讼而有破产的危险,这样就肯定会被赶出议会大门。但是他继续斗争,再一次被选入下院,并再一次被赶了出来。1883年,一项规定可以用正式证词代替宣誓的议案仅以两票之差未获下院通过。1884年,布莱德洛再次在北安普敦当选,但是一直到第二年才去就任,这一次

又被下院赶了出来。1885年，他仍同拉布谢尔一道当选为下院议员，最后到1886年年初议会开会时，他才得到准许就任议员。那一年，他最后一次当选，直到1891年去世时始终是北安普顿郡的代表。

在这些斗争的年代里，布莱德洛一直在进行其他一些运动，特别是争取出版自由的运动。他极力反对各项严禁渎神的法律以及限制节育宣传的规定。他也是公众集会权利的热心拥护者。在这些斗争中，从1874年到1887年，他同安妮·贝赞（1847—1933年）密切合作，但是由于他的反社会主义立场，贝赞终于同他决裂而投向社会主义方面。布莱德洛在议会内外也是印度民族主义要求的主要辩护人，在这一方面，安妮·贝赞也是同他积极合作的。在获准出席下院以后，布莱德洛成功地使一些重要的立法改革议案得以通过，其中包括1888年终于正式通过的未经宣誓发表正式证词的权利。

布莱德洛的反社会主义立场，对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犹如芒刺在背。他的宣传对工人阶级的某些部分是很有吸引力的，要是没有其他同样激进的运动存在，这些部分本来是极可能拥护社会主义事业的。他同下院的长期斗争为他赢得了很大同情，并且使他的意见更有分量。他死于1891年，这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一个因素，因为他的许多追随者此后就加入了这个或那个社会主义团体。尽管布莱德洛反对社会主义，但是仍然应该认为，他所领导的运动对社会主义起了铺平道路的作用。他反对偶像崇拜，他既攻击英国非国教教派的反动立场，也同样攻击英国国教逆潮流而动的态度，这一切都有助于同资产阶级的非国教政治领导决裂，而这种决裂正是掀起独立的强大工人阶级政治运动的必要条件。

布莱德洛之所以反对社会主义，主要是由于他反对社会民主

联盟中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从气质上说,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根本不相信权威,即使这种权威号称是工人阶级的权威也不例外。如果他活到九十年代后期的话,他很可能不那么反对 1889 年新工会运动兴起后发展起来的新社会主义。但是看来他永远不可能成为任何流派的社会主义者。他太关心维护个人自由行动的权利,因而不怎么注意其他事业。然而无论如何,他同社会主义者有一项事业是共同的:保卫言论自由以及公共集会和示威的权利。下面我们将要看到,布莱德洛的信从者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争取特拉法加广场集会权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887 年成立的法律与自由同盟主要是由布莱德洛和查尔斯·迪尔克的共和派信从者组成的,他们共同掌握了伦敦地区左翼激进派俱乐部的主要支配权。

在我们讨论海德门和 1881 年的民主联盟以前,还必须谈到一个运动——更确切地说,一个组织运动的尝试。1879 年,老资格的约翰·斯凯奇莱(1822—1907 年)在伯明翰出版了一本名叫《社会民主主义原理》的小册子,呼吁以德国为蓝本建立英国的社会民主党。然后他就着手组织英格兰中部地区社会民主党,作为一个大组织的核心;但是这一尝试没有结果,因为它或是半途而废,或是很快被并入海德门所领导的全国性运动。此后有一个时期,斯凯奇莱曾为组织英格兰中部地区的民主联盟而奔走,后来又以社会主义者的面貌在赫尔活动。但是他的工作很快就被别人遗忘了,他并没有发挥主要的作用。

在上述背景下,我们现在可以考虑海德门在建立民主联盟时有何打算。正如他在一开始向卡尔·马克思所说明的那样,他的计划是重振宪章运动。他把希望集中在激进派俱乐部以及它们对自由党政府政策的不满情绪上,特别是寄托在它们对自由党在爱尔兰采取压制政策的不满情绪上。在这个阶段,海德门并不打算

建立一个旗帜鲜明的社会主义团体。他的目标倒是掀起一个以工人阶级不满情绪为基础的群众运动，利用激进工人俱乐部作为主要机构，这种俱乐部在工人阶级集中的地区——特别是伦敦——大量存在，是在张伯伦的激进主义宣传的鼓舞下产生的。在伦敦，迪尔克在这些俱乐部里有强大的影响，布莱德洛也是这样。海德门打算使他们两人同自由党激进派和教育与宗教分离论者脱离关系，同他们组成一个类似宪章运动而社会纲领更加明确的运动。事实上，这时海德门只是刚刚开始自己的社会主义事业，他刚刚读完了卡尔·马克思的法文本《资本论》而改信仰社会主义。这本书是一个非正统派友人H·A·巴特勒—约翰斯东送给海德门的；从1862年到1878年，巴特勒—约翰斯东先以托利党员身份，后来又以无党派人士身份代表坎特伯雷郡任议员。海德门是在1880年乘船赴美途中读《资本论》的，抵美国以后还读了一年前问世的《进步与贫困》。这两本书使他的思想有了转变，他没有接受亨利·乔治的理论，而是信仰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并毕生为之进行热心的宣传。海德门回国以后结识了马克思，并常常登门拜访，讨论自己的计划。马克思对复兴宪章运动的前景不抱希望，但是海德门没有动摇，继续干下去。他所写的小册子《人人的英国》称赞了马克思的理论，但是在他表示希望《资本论》不久能出英文版时却没有提马克思的名字。这种略而不提的做法使恩格斯大为恼火。恩格斯不欢喜海德门，反对马克思同他交往，并劝马克思同他决裂。海德门为什么略而不提马克思的名字始终没有弄清楚。马克思在写给左尔格的一封信里说，海德门曾经告诉他，不愿意使自己的计划在一开头就同第一国际的领袖和巴黎公社的辩护者连在一起，以免损害计划获得成功的希望。这一点对海德门也许有影响，但并不是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解释，因为他所说的一位“德国思想家”人们必然知道指的是马克思。如果他真正希望在自己的宣传中不涉

及马克思的名字,那他就根本不会提到他,哪怕是用这种遮遮掩掩的方式。且不谈是如何解释的,后果却是英国的社会主义复兴运动并没有得到马克思的赞助,而且由于恩格斯在马克思 1883 年逝世以后极力反对,海德门的运动更受到了阻挠。

从上面可以看出,海德门在着手重振宪章派运动时,不过刚刚 396
开始信仰社会主义。他力图首先在伦敦然后在其他地方使激进派俱乐部放弃对张伯伦派或布莱德洛派的信任,建立一个新的工人阶级政党,并希望及时使这个政党接受自己新发现的社会主义信仰。激进派反对压制爱尔兰人的政策并普遍支持达维特的爱尔兰土地同盟,这就直接提供了机会。为考虑海德门的计划,曾私下举行了若干次准备会议,参加的人有巴特勒—约翰斯东(已经提到过)、爱·斯·比斯利、太恩河畔纽卡斯尔著名的激进派议员约瑟夫·科温,和 J·洛德。洛德是玫瑰街民主俱乐部的书记,这个俱乐部是外国社会主义流亡人士的主要聚会所,1880 年成立了一个英国支部。在讨论海德门的计划的第一次集会上,主持会议的是约瑟夫·科温;科温 1867 年成了北部改革联盟的领袖,曾支持北部矿工的多次斗争,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都表现了激进主义观点。但是科温不久就退出了,海德门本人主持了后来的会议。大多数激进派俱乐部没有参加会议——迪尔克和布莱德洛的影响仍然太强大了。但是民主联盟毕竟以较小的规模开始了,它的第一个重要行动是应达维特所领导的土地联盟的邀请,派一个代表团到爱尔兰去。代表团回来以后,就爱尔兰普遍存在的赤贫和受压制的情况提出了一份令人震惊的报告;民主联盟会同土地联盟的一个英国附属机构(海德门也参与这个机构的活动),在海德公园举行了一系列露天集会,抗议政府的政策,并派人到各个激进派俱乐部主要就这一问题发表演说。正当这些努力取得一些进展的时候,弗雷德里克·卡文迪什勋爵和 F·H·伯克于 1882 年 5 月在都柏

林的凤凰公园被暗杀了。暗杀事件在大不列颠引起了一股反爱尔兰浪潮。原先在民主联盟发表反自由党政府的“泰隆宣言”时，已经有许多激进派俱乐部退出联盟，在凤凰公园事件以后，退出的俱乐部就更多了。但是，联盟坚持自己的立场，谴责政府所采取的新高压措施，同时说爱尔兰的暴力行动是暴政和压制的必然后果。

397 这些发展对海德门原有计划的成功产生了致命的影响——如果说它当初确有任何成功的希望的话。海德门并没有能建立以伦敦的激进派俱乐部为基础的联盟，而只是组织了一个小会社，其成员或是同自由主义运动没有联系，或是愿意同它彻底决裂，并且随时准备不仅支持激进主义见解，而且也准备拥护真正的革命主张，同时也赞成以暴力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在那些把采取这种态度视为当然而不感困难的人当中，有许多是外国难民，他们很容易把自己对本国革命的信念转移到大不列颠身上来。这些支持者大部分已经是这个或那个流派的社会主义者；他们的影响有助于把联盟变成一个旗帜鲜明的社会主义团体。在联盟原来的纲领中，达维特所鼓吹的土地国有化政策是唯一具有鲜明社会主义性质的项目。不过，联盟在 1882 年会议所宣布的原则中却把“地主和资产阶级政党”斥之为工人的敌人，并且宣布“以劳动创造英伦三岛的财富的人们必须完全依靠自己”。联盟接着又说：“民主联盟的目的在于设法组织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工人，使之能保障广大人民的利益。由于富有者的贪婪和自私，人民的利益目前正不断受到侵害”。第二年，联盟在一本名叫《社会主义浅释》的销路颇广的小册子中发表了一个明确拥护社会主义的宣言。宣言要求实行土地和资本的公有制，指责工业生产资料私有制中的垄断因素完全同土地垄断制一样，是剥削的来源。“只要原料或制成品的生产资料为一个阶级所垄断，田地上、矿山里和工厂中的工人就不得不出卖劳动

398 力，以换取维持最低生活的工资……。财富的创造已经成为社会

性的事业了，每个人都必须同旁人合作。产品的交换也应该是社会性的，不受个人贪婪和个人利润的支配，现在已经是实现这一点的时候了。”

1883年1月，正当民主联盟从激进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著名的诗人、艺术手工艺者威廉·摩里斯加入了联盟；在以后的两年中，他和海德门合作，成了联盟最著名的领袖。在促使联盟向明确的社会主义团体过渡的工作中，以及支持联盟1884年改名为社会民主联盟的工作中，他们两人都起了突出的作用。事实上，摩里斯改信社会主义就象海德门一样彻底，只是不完全象海德门那样突然，因为摩里斯信奉某种社会主义已有相当时期，尽管他没有参加社会主义鼓动工作。从1883年年初开始，他坚决投入了斗争，虽然他对此道并不感兴趣。事实上，他的立场很快就比海德门左得多，因为他根本不是政治家，而且非常不信任政治策略和妥协。但是有一个时期，两人尚能密切合作。他们合写了一本篇幅颇长的小册子《社会主义原理概述》，对创办运动的机关刊物《正义》也都起了很大作用。这是1884年的事情，这一年还通过了改革法案，使工人在各郡选区中获得了选举权，同时也使城市的选举权得到扩大。也正是在这一年，失业人数激增，总数在1886年达到顶峰。但是，社会民主联盟这时已深深陷入内部纠纷，除本身事务外，无暇他顾。

如前所述，民主联盟开始时并没有明确的纲领，成份也非常复杂。即使在大多数不愿意同自由主义割断联系的激进派退出以后，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足以阻碍“社会主义者”和谐共事。1884年，社会民主联盟内部至少有五个主要集团，每个集团都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作为领袖。第一个集团是海德门自己的亲信，其中大多数399人认为应该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楷模建立政党，同时认为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一个采取政治行动的问题。第二个集团是一批工会

主义者,他们也具有政治头脑,但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较小。这个集团同海德门派一道谴责自由党一劳工派工会的领袖,而且已经在摸索一种新工会主义,主张吸收非熟练工人,以便打破熟练技工行会的垄断地位。这个集团跟海德门派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它更加注意劳资纠纷问题,并且认为产业工人运动不能象德国那样从属于政治运动。这个集团的杰出人物是约翰·伯恩士(1858-1943年),他在伦敦的激进派市政政治活动中也很活跃。第三个集团主要以伦敦东区的某些激进派俱乐部和社团——特别是斯特拉特福德激进派俱乐部为主,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很深。这个集团的领袖约瑟夫·兰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一直在伦敦东区活动,主要是同成年男子选举权协会中的老宪章派查尔斯·墨里和 J·F·墨里有联系,并同外国的无政府主义集团往来密切。差不多就在成立民主联盟的同时,兰恩在东区成立了一个叫作劳工解放同盟的组织,这个组织在从事露天宣传方面非常积极,并且设立了一些支部。1884年以前,劳工解放同盟跟民主联盟是各立门户的,但是就在这一年的前一年,它参加了旨在统一各左翼社团的讨论会,并以民主联盟,劳工解放同盟以及伦敦的各个外国社会主义团体的名义联合发表了一个社会主义宣言,宣布它们有志继续已经解散的第一国际的工作。此后,劳工解放同盟在不损害其本身存在的情况下同意参加民主联盟,条件是联盟必须公开彻底地拥护社会主义。于是联盟不仅改换了名称,而且采纳了劳工解放同盟的大部分纲领,包括声明联盟的宗旨是:“以政治平等的原则为基础创建自由的社会环境,使人人享有平等的社会权利,并彻底解放劳工。”这句话中藏有日后滋事的种子,因为“自由的社会环境”一词同无政府主义的宣传有密切关系。事实上,控制劳工解放同盟的集团主要是由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组成的,他们同海德门的政治性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严重分歧。

1884年社会民主联盟中的第四个集团——如果能够称为集团的话——是由一些个人组成的，其中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他们改信社会主义，但还没有明确自己的观点。这一派人中还有一部分人同时参加了那个忙于成立费边社的团体。此外，这个集团还包括威廉·摩里斯和厄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1854—1926年)等从激进主义方面转过来的人。这些人在前进过程中认识了社会主义，巴克斯主要是从德国认识的，后来常常撰写有关德国社会主义的著作。这个集团中的许多人是由于读了《进步与贫困》，并看到其论点在英国的条件下，同样适用于资本和土地，才倒向社会主义的。但是除开巴克斯以外，其中很少人了解马克思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因而在听到对立的思想流派进行激烈辩论的时候，往往感到摸不着头脑。最后，主要在亨利·乔治和爱尔兰土地同盟的宣传的影响下，苏格兰的小农场佃农中间也发生了颇具声势的骚动。这个集团在1884年组织了一个同社会民主联盟有泛泛关系的苏格兰土地与劳动同盟。

1884年年底，社会民主联盟分裂为二，其具体原因何在，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这主要是由于问题牵涉的方面很多，始终没有得到澄清。不管原因是什么，1884年12月，社会民主联盟多数执行委员以威廉·摩里斯为首宣告辞职，并决定另行成立一个名为社会主义联盟的新团体。这些退盟的人是宣告辞职，而没有利用其多数票要求联盟召开会议，给予沿用名称和进行控制的权利。这是根据摩里斯的意见而采取的行动，因为他认为最好不在报界面前争夺组织的控制权，报界会借此大肆渲染，污蔑社会主义；此外他也希望通过这一步摆脱社会民主联盟中的某些著名成员，这些人的诚意他不信任；他还希望同一批在原则上和自己更接近的人重打鼓另开张。这批退盟的人对海德门及其追随者实际提出的指责是 401
对盟务进行非民主的独裁控制，而且犯了“政治机会主义”的错误。

这些指责的起因非止一端，但首先有一部分是因为有关新成立的苏格兰土地与劳动同盟的争执而引起的。社会民主联盟执行委员会委员、奥地利流亡者安德里阿斯·施尤(1844—1927年)赞成这样一个决定：苏格兰人不应该成为联盟的一般支部，而应该象劳工解放同盟一样，同联盟发生不大密切的关系。海德门则从中央集权和有纪律的政党的角度考虑问题，强烈反对这种安排，并指责施尤的行动。他还指责施尤和执行委员会的另一个委员W·J·克拉克是无政府主义者，并且要求开除他们。

看来，这是牵涉到劳工解放同盟和苏格兰人的纠纷的直接原因。但是在幕后，纠纷还有深一层的原因。社会民主联盟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在任何情况下都反对采取议会行动，而海德门派则肯定要建立一个有进入议会野心的政党。在这两个集团之间还有第三个集团。它在原则上不反对政治行动，不过认为采取政治行动的时机还不成熟，同时认为社会主义者如果不事先多多进行教育工作，使工人阶级中的积极分子信仰社会主义，就提出候选人，那会使自己的事业为人所笑。在执行委员会上投票反对海德门的多数，就是由这个集团中的人在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的支持下形成的；奇怪的是，他们还得到恩格斯从外界给予的支持。因为正如我们已经谈过的，尽管海德门赞成马克思主义，恩格斯却根本不相信他，认为他是企图利用社会主义营一己之私的政客。

据说威廉·摩里斯多年以后得出结论说：1884年他怀疑海德门动机不纯并退出社会民主联盟是错误的。在这以前，他同社会主义联盟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合作已使他深感失望，实际上已被排挤掉《公益报》编辑的职务，这个杂志是1885年联盟用他的钱创办的，此后也主要依靠他的金钱和稿件的支持。据海德门说，摩里斯是在支持海德门的演说中承认自己的错误的，但是摩里斯实际

上说了什么无记录可查。我认为,如果海德门的说法确实可靠,摩里斯的话就包含三个意义:第一,他错误地怀疑了海德门的正直;第二,他和他的支持者应该留在社会民主联盟内,把斗争进行到底;第三,他让自己过分地听任无政府主义者和接近无政府主义的人摆布,若干年后才更看清了这些人。

无论如何,分裂发生了。从1885年年初起,一共有三个对立的社会主义组织在彼此交手。这并没有把无政府主义者本身算在内,他们有自己的组织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也没有算上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他们不久以后就在《自由》杂志周围成立了一个团体,这家杂志是1886年他们在克鲁泡特金的帮助下创办的。上述三个集团中一个是海德门领导的社会民主联盟,但约翰·伯恩士在其中越来越活跃;另一个是社会主义联盟,它以勉为其难的威廉·摩里斯为领导,以退出社会民主联盟的劳工解放同盟为争吵不休的盟友;还有一个是费边社,它在1884年已经成立,但却仍在摸索中,不大出名。同这三个集团并存的还有几个集团:一个是土地国有化协会,它由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任主席;另一个是土地归还同盟,它1883年初成立时原名为土地改革联盟,接受亨利·乔治的理论,同基督教社会主义小团体有密切的个人联系;还有一个是苏格兰土地与劳动同盟,它后来成了社会主义同盟的苏格兰独立支部;此外还有一些次要的团体,它们相继兴起,又相继消失。实际上,左翼方面的思想正处于激烈动荡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尤其如此。但是大型工会暂时基本上还平静无事,工会的大多数领袖仍然相信自由党激进派。

张伯伦的“尚未批准的计划”几乎是在社会主义联盟宣布成立的同时发表的;同年年底,根据新近扩大的选举权举行的第一次大选使许多自由党—劳工派候选人当选为下院议员,其中大多数是 403 矿工。这次选举也使社会民主联盟投入竞选,约翰·伯恩士在诺丁

汉得票相当多，而伦敦的两名候选人得票之少却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并成了怒骂的对象。毫无疑问，他们两人都接受了“托利党黄金”的钱财支持，这是出于希望分裂自由党的选票而提供给社会民主联盟的。看来这笔钱实际上是通过亨利·海德·钱皮恩（1859—1928年）给予社会民主联盟的，当时钱皮恩是联盟的一个主要支持者，他是从一度同第一国际有联系的托利党记者马尔特曼·巴里手中接到的。社会民主联盟执行委员会并没有正式与闻此事，但是必然非常清楚这笔钱是从哪里来的。既然联盟企图把工人从自由党身边拉过来，对于危害自由党议席的事是不会客气的；而且可以公道地说，“托利党黄金”并不比资助某些“自由党一劳工派”的“自由党黄金”更坏。但是这不过是一种以牙还牙的话，工会听起来不会觉得入耳，那些确实在自由党一激进派和托利党之间划清界线并支持自由党左派的社会主义者听起来也不会觉得入耳。这是费边社的态度，它的社员严厉谴责社会民主联盟的行为。大多数加入社会民主联盟的费边社社员退了盟，并集中精力把费边社建成一支独立的力量。1885年，费边社不过是一个只有40名社员的小团体，并没有出版什么重要的东西。它公开作为一个决策机构出现是从关于“失业劳工的官方组织”的报告开始的，这是在第二年商业萧条最严重的时候发表的。^①

社会主义联盟也指责社会民主联盟的行为，虽然社会主义同盟并不偏向自由党而反对托利党。如前所述，联盟中有一部分人彻底反对议会行动，另一部分则认为采取议会行动时机还没有成熟。404 联盟在分裂前就一直在讨论议会竞选的问题，“托利党黄金”之类的事件，很可能就是在那时提出来的。退盟分子在宣言中说海德门的罪行之一是“勾结他党竞选”。至于这句话究竟是指他同托利党

^① 本书下一卷将较详尽地讨论费边社，因为它是后来才日见重要的，最好是在讨论凯尔·哈迪的独立工党时一并讨论费边社。

勾结还是同自由党勾结,就不明确了。

人们通常认为“托利党黄金”的丑闻给社会民主联盟造成了很大损害。但是真正造成损害的是社会民主联盟甚至在肯宁顿这样一个工人阶级的选区中都暴露了弱点,在这个选区,它的候选人只得了 32 票,而托利党却得到了 3,351 票,自由党得到了 2,991 票。毫无疑问,“托利党黄金”事件给反社会主义者增加了一个用来很方便的把柄,但是社会民主联盟同自由党一劳工派早已纠缠不清,关系坏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费边社成员和其他中产阶级分子的退出也是关系重大的事,因为这批人能力很强,已把精力用来组织对立的运动——费边社和后来掀起的争取劳工独立代表权的运动。后一运动导致 1893 年独立工党的成立。但是当时社会民主联盟从其他方面的胜利中所得到的好处却远远超过由于选举惨败而遭到的损失。在整个 1885 年,失业人数不断增加,社会民主联盟主要在约翰·伯恩士的主持下,卓著成效地领导了失业者的骚动,尤其是在伦敦地区。与此同时,伦敦和各地的一些城市展开了斗争,争取公开集会和示威游行的权利,这一点无疑是同失业者为了本身的失业而举行的日益增多的示威活动有密切关系的。在这方面,社会民主联盟虽然没有能由自己的人来领导,却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社会民主联盟为失业者掀起骚动的基础是要求“劳动权”,这是大陆社会主义运动早就熟悉的问题。联盟宣称,政府有义务保证每个公民都能得到生产资料,有义务兴建公共工程,雇用那些为资本主义工业所摒弃的人。在这个运动中,进行“国内移民”照例也是特别强调的一项要求——这又回到了罗伯特·欧文在拿破仑战争结束时首次提出的建议。联盟敦促政府从地主手里接管未用于生 405
产的土地,把失业者安置在这些土地上的合作移民区里,移民区应该充分利用现代化生产技术。联盟的这一要求很容易同土地归还同盟、土地国有化协会以及其他一些团体在土地问题上所进行的

鼓动联系起来。当然联盟要求国家既过问农业，也过问工业，而且往往同克鲁泡特金的如下建议发生共鸣：在新移民区中，工农业应该“重新统一”起来，居民应该把工农业生产结合在一起。联盟的第一项要求是工作，同时坚持，如果国家不能为失业者安排工作，就应该按适当的水平发给生活维持费。社会民主联盟的大多数盟员，不管对国内移民的计划多么热心，同时也相信，只要资本主义制度继续存在，要防止大规模失业现象的重复出现是不可能的。海德门及其信从者非常强调马克思关于“劳动后备军”的概念，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必须用这支后备军来保证繁荣时期的工人供应，并使工资由于谋求职业的竞争而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上。因此，他们在宣传时，既强调工业和土地的社会化，又要求现存国家提供工作或生活维持费。他们采用了示威游行的骚动形式，要求立时给予救济，并采取长远措施；他们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带领失业者队伍在星期日前往教堂。这个特殊的运动主要是由约翰·伯恩士组织的，运动的高潮是1887年初前往圣保罗教堂的声势浩大的游行，接着在教堂外面发表公开演说，表示不同意牧师对会众所说的贫富必须共存的说法。

注意一下仍在摸索道路的费边社对这次骚动的态度是很有意思的。费边社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就公然为失业者提供职业整个问题草拟了一项报告，其主要成员是悉尼·韦伯、弗朗克·波德莫尔和赫伯特·布兰德；今天再读读这项主要由韦伯和波德莫尔拟定的报告，会使人感到很奇怪。执笔者显然认为建立国内移民区的整个设想是荒唐的；他们还轻蔑地否定了那种指望通过兴建公共工程获得补救的主张。他们宣称，政府雇工劳动效率不高是尽人皆知的事，因为政府不能象私营企业的老板那样强迫或压榨它的雇员。公共工程只有在大体上可以由非熟练工人来完成，而且不必投入大量资本设备的时候，才能勉强有些效率。报告建议，在

上述限度内采取某种行动，其中包括建立一支全国性的壮工队伍来进行非技术性的重劳动以及——不禁令人惊讶——由国家利用荒地种植烟草。报告还建议煤气和自来水、铁路和运河运输以及酒精饮料的分配应收归公营，但是没有针对国有化问题提出进一步建议。更加令人惊奇的是，除了这些建议以外，报告还建议实行义务兵役制以减少失业人数，并训练工人为公众服务的思想。诚然，在发表这份报告的时候，费边社就在序言中说明，报告中的全部建议只应看作是权宜之计，目的是在现存经济制度的条件下解决失业问题；这个说明的措词还暗示，费边社的某些社员对这份报告可能是深为怀疑的。但报告毕竟是发表了，它实际上是悉尼·韦伯为费边社撰写的第一篇著作。

1887年以后，随着商业的复苏，失业者的骚动也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条件的斗争，从这场斗争中产生了“新工会主义”。但是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还在继续；在这个问题上，社会主义者是同查尔斯·布莱德洛的信从者和工人阶级激进派的主体联合采取行动的。纠纷从1885年的所谓“多德街事件”开始。在莱姆豪斯的多德街是一个举行室外集会的老地方，多年来在那里举行的集会一直没有受到警察干涉；但是1885年，面对着日益激烈的失业者骚动，警察就力图制止集会，并且接连逮捕了一些发言者。于是社会主义者和激进派俱乐部就组织了一系列大规模示威游行，向多德街汇合，警察让步了。接着闹事的中心又转移到了特拉法加广场，这也是一个举行各种示威游行的老集合地。1886年，一小批工会主义者，违抗工会的官方领导，但得到托利党的支持，组织了一次“公平贸易”运动，要求驱逐外国制造商以解决失业问题；社会主义者同激进派一致，强烈反对这个集团。伦敦的各个爱尔兰社团也非常活跃，抗议政府的压制政策；所有这些集团——社会主义者、激进派、爱尔兰人和“公平贸易论者”——都认为

特拉法加广场是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最理想的场所，特别是因为这个广场邻近下院和白厅。1886年2月，“公平贸易论者”宣布打算在广场举行一次示威游行，于是社会民主联盟以及同它联合一致的失业者决定在同时同地举行一次反示威。这样一来，特拉法加广场上便汇集了对立的游行队伍，举行了对立的集会，但并没有发生严重的事故。接着就产生了如何使群众离开广场而不发生冲突的问题；社会主义者显然在同警察商量以后，决定整队向海德公园进发，让“公平贸易论者”走另一条路。在前往海德公园途中，帕尔美尔街上的一些俱乐部的许多窗户被打破了，据说曾经有人在俱乐部的窗口侮辱游行群众；群众的愤怒既已爆发，圣詹姆斯街和皮卡迪利的店铺就遭到了抢劫，这主要是在社会主义者的游行队伍走过以后的事。抢劫的实际责任始终没有确定下来，看来是一次自发的流氓行为，肯定同社会民主联盟的领袖没有关系。但是这一事件的影响是很大的。救济失业者的伦敦市长基金会突然关闭了；伦敦警察局长辞职了，接替他的的是一个军人——查尔斯·华伦爵士，他宣布决心坚决镇压示威。于是，一些社会民主联盟的领袖，包括海德门、伯恩士和钱皮恩以煽动暴乱罪受审。陪审团在伯恩士发表了一篇演说以后，无罪开释了他们，这是社会民主联盟的一次重大胜利。这篇演说后来重印成一本小册子，名叫《拿红旗的人》。但是，这并没有阻碍查尔斯·华伦爵士继续他的“坚定”政策。他禁止在特拉法加广场举行集会或游行，但是人们没有理会警察当局，照样举行集会和游行。有一次，一个名叫阿尔弗雷德·林内尔的示威者被杀。威廉·摩里斯为他写了《挽歌》——这是分裂前最初在《正义》杂志上连载的《社会主义者之歌》中的一篇。

在这些斗争中，布莱德洛派也起了作用。为此，这个派成立了法律与自由同盟，同盟中最积极的工作者是安妮·贝赞。但是到

了 1887 年，安妮·贝赞同布莱德洛的长期合作告一段落。最初，她同他一样反对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者的论点使她改变了信仰，有一个时候，她加入了社会民主联盟。她脱离了布莱德洛所办的《全国改革者》——她是这个刊物的联合编辑，自己办了一家报纸《连锁》，力图使社会主义者和激进派团体联合起来，进行争取言论和集会自由的斗争。完全出人意外，由于她所进行的工作，1888 年暴发了布莱恩特和梅火柴厂女工的罢工。这些女工的代表团到《连锁》编辑部访问了她，宣布她们打算罢工，要求她为她们申诉。于是她就帮助进行罢工的组织工作，并争取公众的支持，从而为“新工会运动”打响了第一炮，这个运动很快就把社会民主联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推向一边，使联盟处于狼狈境地，并为独立工党的“新社会主义”铺平道路。这时，安妮·贝赞本人已退出了联盟，参加了费边社的活动。她是 1889 年的费边社论文撰稿人之一，但是不久以后，她又有了转变，脱离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实际工作，而致力于见神学和印度民族主义。

“新工会主义”以及随之一起发展的“新社会主义”不在本卷讨论范围之内。这些问题将在本书下一卷中加以讨论，下一卷将论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到 1917 年俄国革命这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思想。因此，在本章中我们只讨论八十年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思想——费边社除外，因为它在 1889 年出版《费边论文集》以后才 409 重要起来。这也就是说，我们在本章中主要只需要谈三个人：社会民主联盟领袖海德门，从社会主义立场出发积极组织失业工人的、在凯尔·哈迪以前担任工会社会主义派领袖的约翰·伯恩士，以及三人中间唯一对社会主义思想作出重要创造性贡献的威廉·摩里斯。关于分裂以后的社会主义联盟的情况，只有威廉·摩里斯跟联盟发生关系的那部分与本章有关。

从某方面来说，海德门可谓时运太不济。如果他晚 10 年——

也就是在新工会主义出现以后——开始他的社会主义事业，他对工会和普遍的劳工行动就不大可能象当初那样不予重视。由于他的思想对议会深有好感，因而很难会喜欢工会和劳工行动，但是他毕竟会认识到它们的重要性，而且会找到能够与之合作以争取工会主义者信仰社会主义的人，也就是会找到既能帮助他也能影响他的人。因此，他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就很可能完成他在八十年代不可能完成的事业：使宪章运动重新抬头，作为建立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政党的起点。但在八十年代，只要自由党有可能吞下张伯伦和迪尔克的那剂激进主义苦药，要建立这样的党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当然，这样的党不大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党，因为在大多数工会主义者中间，宗教情绪太强了，不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但是，只要他不准备强迫其信从者接受马克思的那些不那么易于接受的部分，还是可以在一个不妨碍马克思主义者担任领导的基础上建立这样的党的，实际上独立工党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1881年，海德门本来肯定愿意这样干，事实上他也正是这样考虑的。在那个阶段，他非但不是教条主义者，甚至还是一个机会主义很强烈的人。但是在他有心争取的激进工人没有争取到或者退出运动的时候，他就成了一个宗派性运动的头头了。在这个运动中，

410 除了有能力支持他的约翰·伯恩士以外，他没有同道。而伯恩士在尽了最大努力，把失业者组织起来，给予社会民主联盟真正的工人阶级支持以后，也退了回去。他已经在新工会运动中找到了一个他可以大有作为而不受阻挠的领域。海德门成了社会民主联盟中唯我独尊的领袖，但是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自鸣得意的东西了。社会主义联盟离去和费边社社员退出以后，他只剩下了一批第二流的同事，其中大多数倒也可以说是非常诚实和优秀的人，但是都具有少数派思想，而且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既反对激进派，又反对其他流派的社会主义者。分裂使他们的宗派主义更加深了，他

们恪守德国社会民主党类型的政治马克思主义，并且坚决相信应该按照德国的方式组成英国的社会党，尽管他们的工作条件有很大差别——我的意思是说政府制度差别很大，人民的气质也很不同。自由党或保守党政府对社会民主联盟既没有实施反社会主义者法，也没有哪怕是采取高度的压制措施，因为在特拉法加广场的斗争中，最后让步的是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海德门生就的独裁气质没有碰到什么钉子，他的思想硬化成为一种跟马克思完全不同的死板的马克思主义。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马克思曾尽最大努力实事求是地看待工会领袖，虽然后来巴黎公社以及同巴枯宁派的争执破坏了他的努力。而海德门则一味怒斥工会和激进派，指责他们为什么不是另一个样子。

结果是海德门和社会民主联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特别枯燥无味的发挥，主要侧重价值学说，几乎毫不重视马克思理论的历史方面。社会民主联盟的优秀盟员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术语，当时海德门逢人就摆弄这些术语，使听者感到莫明其妙。至关重要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抛弃了伦理的感染力，而利用“科学的”吸引力，从而也就抛弃了足以鼓动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强有力的伦理力量，使自己成为宣扬外国理论的代表人物而无法自脱。从这个角度批评他们，并不是说马克思的经济学是错误的（虽然我认为它是错误的），而只是说他们对待问题的态度完全不能适合人民的情绪。为了使运动成为一支全国性的力量，人民正是他们所必须争取的。当然，他们的呼吁的确也打动了少数人，但是他们完全没有能够了解当时正在英国发展的巨大的社会力量。这至少部分是由于他们急于求成，而且很快又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人民群众的愚蠢，而不是归咎于本身的自以为是的态度。

海德门著作很多，而且就风格和表达方式而论，大多数写得很好。但是他不是一个创造性的思想家，他对于从马克思那里学来

的东西并没有作出任何实质性的发挥。他的最优秀的社会主义著作是《英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但所著《十九世纪的商业危机》则失之于肤浅。他是一个有才干的辩论家。记载他同亨利·乔治以及查尔斯·布莱德洛进行公开辩论的报导性小册子销路很广。在同乔治的辩论中，他巧妙地运用社会主义理论驳斥对手的论点，而取得了巨大胜利。就天赋条件来说，他应该成为政治家，而不是著述家，但是他从来没有得到丝毫机会去干他真正希望去干的事。如果他能进入议会，而且有一个党由他领导，他很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议会领袖。事实上，他毕生忠于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但是他所领导的那个宗派根本没有让他发挥所长的余地，其实力又不足以选出哪怕是一个议员，因而他的一生一事无成。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才有了顺利进行活动的机会，当时他在战时工人非常委员会作为他大半生所反对的工党人士的同事积极而热情地进行工作。但是，1914年的战争也使他和他的旧组织——社会民主联盟完全分裂，这个时候社会民主联盟已经变为英国社会党，而且不久就成为英国共产党的核心。海德门是战争的积极支持者，他被他的大多数追随者所抛弃，退出了英国社会党，另外成立了一个新的国家社会党，后来又恢复了旧名称社会民主联盟，但是它再也没有任何力量或重要性。他一生忠于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而没有得到任何报偿，这一点足以回答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人们常常对他提出的追求个人名利的指责。他不是一个追求自身名利的人，但却是一个热衷权力的人，有对人发号施令的强烈倾向。这些特性对于处顺境可能是有价值的，但是对于处逆境则是很有危害的。海德门的事业与其说是“冒险生涯”——借用他的自传的书名——的纪录，倒不如说是基本上——不是完全——并非由于自己的过错而白白糟踏才能的纪录。

分裂以后，社会民主联盟中仅次于海德门的杰出人物是约翰·

伯恩士。当时，他被称为“拿红旗的人”，他也以此为荣。伯恩士并不以思想家自诩，他基本上是一个演说家和组织者，具有使自己及自己所参与的活动成为新闻的巨大才能。他是熟练的机器技师，是一个老式的同业工会——机器工人联合会的会员，他没有技术工人的那种排外习气，每当他能够领导一批比较容易被他的滔滔口才所打动、也比较听从领导的不熟练工人的时候，他感到最高兴。伯恩士对于“压在底层的人”具有完全真诚的感情，也有表达这种感情的真正口才。他有把自己变成领袖，并使听从感到他同大伙亲如一人那份本领。他利己，有野心，热衷于取得成就；他总是按自己的主意办事，因而很难跟人共事；由于他的优点，同时也由于他的缺点，他为他那个时代的某些需要效了力而为人们所赞许。正是他把失业者组成资本主义社会不得不重视的运动；正是他从远方意识到 1889 年码头工人罢工所带来的机会和所具有的意义，因而尽管罢工同他毫不相干，他也投身进去，自许为工人的领袖，使罢工取得了极其良好的结果。实际上可以肯定，如果没有伯恩士的领导，码头工人原会被压下去，因为只有他能够使工人团结在一起，等待英格兰和澳大利亚的同情者给予支援。大概也只有他能够防止罢工被暴力所压服，被警察的干涉所破坏；大概也只有他能够使罢工开始后成立的临时组织免于瓦解。伯恩士总是戴着一顶引人注目的白草帽，意在使人容易认出他；他似乎有一种本领，不论哪里出事，他都能立刻在哪里出现，并能当机立断，防止骚乱。他是非技术工人的出色的罢工领袖：他知道怎样同工人谈话，怎样在工人眼里使自己具有神妙的代表性。他永远不会成为一名工会领袖，因为他对单调的日常行政工作一无所能，他也绝不能作为集体中的一员把工作做好。但是 1886 年和 1889 年正是他充分发挥所长的年头，从此他就成了一个全国知名的人物。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伯恩士是热诚的社会主义者，但是他的社

会主义没有理论根据,甚至也没有稳固的思想基础。正如他后期的事业所证明的,他本质上是一个激进派,而远远不是社会主义者。1889年以后,他作为新伦敦郡议会委员,为伦敦政府做了出色的工作;1892年,他当选为代表巴特西的议员,他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唯我独尊的地方王国。但是在议会中,他不愿意同表示愿意接受他的领导的凯尔·哈迪合作。虽然他已经完全不同情社会民主联盟的教条主义社会主义,他仍然拒绝同新独立工党的政治运动妥协,这个运动之所以出现部分得力于他在鼓舞1889年新工会运动时所作的工作。他情愿单干,或者等待时机,希望激进主义重新抬头,能够利用自由党作为它的工具。由于他拒绝同新工党运动共命运,他终于回到了他初期激烈谴责的自由主义。但是他身上有某种品质在他担任自由党内阁大臣以后仍然存在,并使他大大开罪于他在地方政府委员会时的大多数老朋友。也正是这种品质——一种深刻的激进主义国际主义——使他在1914年宁愿辞职,也不同意英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姑不论这一行动是否正确,这证明了他诚实刚正,因为他这样作肯定一无所得。他真正退休过平民生活,把时光消磨在研究伦敦历史这一爱好上,或是在全国自由党俱乐部对听众大谈自己的往事以自娱。利己主义和诚实并不是互不相容的品质:伯恩士就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他的利己主义始终是看得见的,而他的诚实则不那么明显。然而,他毕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有自己的地位,因为他是那次非技术工人起义的领袖,领导他们取得了第一次胜利,尽管他后来拒绝接着干下去。

威廉·摩里斯(1834—1896年)是一个同伯恩士或海德门都大不相同的人,因为他根本没有利己主义,而且对担任领导也不感兴趣,甚至还有强烈的反感。摩里斯并不愿意加入民主联盟或者是建立社会主义联盟。他真正不希望参与政治,有许多其他事情

等着他去干，他觉得干这些事情自己更擅长一些。在他为社会主义奔走的整个期间，他的良心驱使他义无反顾地前进，他不辞疲劳地在露天或全国各地的小演讲厅里发表演说（他完全不适合作露天讲演），他知道他的大多数听众对于他所要说的话，几乎一无所知。他参加无穷无休的委员会会议和大型会议，会上总是为了在他看来是最琐碎、最不值得认真注意的问题发生争吵。他天生脾气暴躁，没有耐性，但是他把自己锻炼成为和事老——常常徒劳一场。他干了所有这些工作，但是在最初的热情消失以后，就越来越感到短期不会有效果，而且肯定会遭到失败，尽管他对社会主义在将来某个时候实现丝毫不怀疑。

分裂以后，摩里斯为社会主义联盟辛勤工作，就象他两年前为社会民主联盟工作一样。但是社会主义联盟的人数始终很少，而且始终没有任何明显的共同目标把他们团结起来。它在伦敦的力量最强大，但是在这里，无政府主义的因素也始终相当强大，而且一直是麻烦的源泉。社会主义联盟的第二个最强的据点是约克郡，而约克郡主要受分裂分子领导；兰开夏郡则主要追随社会民主联盟。在格拉斯哥以及苏格兰土地与劳动同盟有势力的那些苏格兰地区，社会主义联盟也相当强大。它在东北海岸也有信从者，但是苏格兰和东北海岸都各行其是，不十分注意伦敦来的指示。诺里奇是社会主义联盟的另一个强大的中心，在若干其他地方，还有一些零星的组织。但是联盟始终不是一个具有任何真正重要性的全国性运动；联盟的《公益报》尽管文笔很出色，也始终没有很大销路，摩里斯非常勉强地担任该报编辑，并且为它出钱。摩里斯根本没有作新闻记者的条件；虽然他的一些文章写得很好，但是这些文章大概也是原定读者看得最少的文章。 415

社会主义联盟由于人数少，资金缺乏，因而不得不靠主要由伦敦成员组成的执行委员会来领导；随着这些委员的减少，无政府主

义者也越来越得势，最后竟把摩里斯赶出《公益报》的编辑部，但又希望他继续出钱。1890年底，摩里斯退出了社会主义联盟（其实是联盟的残余部分），他本身的经历使他深感幻灭。他同一小批忠诚的信从者退出联盟以后，就以联盟的铁匠支部为基础组成了铁匠社会主义协会，有一个时期就在他交给协会使用的凯尔姆斯科特大厦的长房间里举行会议。但是铁匠社会主义协会所做的始终只是确认对社会主义抱有不可动摇的信念而已。它没有真正的职能，因而就逐渐消散了。在此期间，社会主义联盟的残余苟延残喘，最后于1895年被并入克鲁泡特金的自由协会。

既然摩里斯本人看来就不止是半个无政府主义者，那么他同最后把他赶出社会主义联盟的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争执究竟是什么？必须记住，在联盟存在的那些年里，无政府主义正在经历前一章所叙述的“用行动宣传”的年头。在整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报纸始终极力指控无政府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舆情激愤，因为虽然在俄国以外的地方，只有少数人使用扔炸弹和暗杀的方法，虽然在西方甚至连同意这种做法的人也寥寥无几，但是在扔炸弹者被资产阶级司法当局逮捕的时候，认为有责任公开为之辩护的却大有人在，只有少数无政府主义者愿意公开抛弃他们。摩里斯对玩炸药的人始终没有丝毫同情，也许俄国的情况除外；他也不觉得有责任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但是他确曾支持他认为被不公正地判决的无政府主义者，比如芝加哥的殉难者，而且在政府和舆论借口扔炸弹事件来攻击言论自由或鼓吹革命思想的权利的时候，他也的确提出过强烈的抗议。从思想上说，摩里斯最同情的无政府主义者是以克鲁泡特金和夏洛蒂·威尔逊夫人为中心（很长时期，她既是无政府主义者，又是费边社社员）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但是摩里斯在社会主义联盟中不得不对付的无政府主义者——弗兰克·基茨、戴维·尼科耳、C·W·莫布雷等人——并不

属于这个持超然态度的集团。联盟内部的无政府主义者属于约翰·莫斯特派,其中包括许多德国的流亡者,他们的两个据点是:本章前一部分提到的古老的玫瑰街国际俱乐部,以及追随约瑟夫·兰恩和劳工解放同盟的东区集团。这些集团中的大多数人主张革命暴力,虽然不一定主张暗杀。他们要求彻底摧毁现存的社会制度,为建立他们拒绝加以预言的新结构作好准备。摩里斯虽然具有革命性,但对这种彻底摧毁一切的主张深有反感。他同意文明已经腐烂透顶,需要连根铲除这种文明所产生的制度。但是他不相信,从破坏的情绪出发,或者对代替旧社会的新社会毫无预见和了解,就能很好地完成这项工作。在他看来,教育工作不可或缺,头一项工作是物色和训练一批人数足够的有建设性思想的社会主义者,由他们来逐渐减少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卑贱的劳动。他厌恶在时机没有成熟时采取暴力和玩弄政治,因为他不认为通过没有明确目的的骚乱和议会妥协,能够创造理想的新世界。由于议会派构成了相信某种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和工人中的最大集团,而摩里斯又反对他们,这就使他同对立面的极端主义者(他同这些人同样存在分歧)站在一起了。因此,他虽然得到几乎是每个人的尊敬,却越来越孤立了。事实上,他所信仰的社会主义并不是那种能够普及的社会主义,因为他的社会主义是从一个他不断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出发的,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不得不为了面包而被迫过象大多数人那样的生活,我会有什么想法?”他的答案主要并不在于指出大多数工人都极端贫困,而在于认定他们被迫把生命消磨在既得不到快乐又得不到满足的工作上。之所以没有快乐,是因为这种劳动多半很艰苦,一个人不可能以这种劳动为荣;之所以得不到满足,是因为这是为追求利润的老板干活,只有现金交易关系才把整个工作班子联合在一起。事实上,摩里斯以为自己的这一想法是人人所共有的,或者说,他为了公道起见,认为应该

说自己的想法是人人所共有的。他从自己的工作中得到极大的愉快，以致他永远不能休息。为什么其他人得不到这种快乐呢？他不是为一个老板工作，而是为自己的理想工作。为什么其他人就不能作同样的工作呢？他完全了解，大多数人并不象自己这样看待这些问题，但是他认为他们之所以没有能够这样想是由于他们长期受奴役，并且相信在一个不追逐利润和没有剥削的井然有序的社会里，大多数人都会有这种想法。如果有任何别的想法，在他看来那都是不公正的，因为这等于否定他所相信的人类天赋的基本准则以及社会平等的理想。

摩里斯在脱离社会主义联盟以前的那些年里，随着他越来越反对他的无政府主义者同事，政治见解也逐渐发生变化。但是他一直到最后始终坚信不移，在一个组织完善的社会里，一切正常的人都能够、而且应该有跟他相同的看法。直到 1890 年同联盟决裂的前夕，他仍然表示完全不相信把议会行动当作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具有任何价值。他只愿意承认，“在革命的最后阶段，社会主义者也许不得不利用议会形式来使反动派的地位正式非法化，从而瘫痪它的抵抗”，但是他又说，只有在“社会主义者强大到足以夺取议会以结束议会的时候”，才能这样做。与此同时，他否认有可能“诱使议会接受社会主义”。事实上，他认为如果进行这样尝试，结果只会“挫败”社会主义者，使社会主义者非但不能利用议会，而且会被议会所用。他说社会主义者不应卷入议会的斗争中去，而应该进行自己的适当的教育工作：加深“对今天的罪恶的奴隶制的不满”，向不满的人指出“他们自己能够摧毁自己头上奴隶制”。他向那些认为这是一种绝望的政策的人问道，“难道向他们指出斗争时期以后的情况是没有意义的吗？”

然而，摩里斯晚年的政治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他仍然象以往一样讨厌议会制度，也象以往一样深信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正

发生错误的转折。他所看到的事态发展是独立工党和费边社社员的“新社会主义”把社会民主联盟和无政府主义者推向一边，并开始组织一个政治运动，这个运动同加入各种新工会的煤气工人、码头工人以及其他非技术工人的实际要求和利益关系比较密切。他渐渐相信，要是不能用宪法手段建立他所了解的那种社会主义，那么除了经过一个采取这种作法的阶段以外，绝无其他选择。但是他认为，通过这条途径产生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国家社会主义，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集体主义官僚主义”。他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可取的制度，而认为它也许是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使人对“革命”有所准备，而且实际上它也可能比纯属破坏性的直接革命主义要好一些。此外，他认为这种杂牌“社会主义”丝毫也不能实现他的理想，而是一种人们在看到它的后果时会起而反抗的东西。在摩里斯的态度中，唯一真正的转变是他愿意承认，以工会为基础建立一个强大的政治运动，即使不排除把议会当作手段，也可能有助于教育工人为承担真正的“革命”任务作好准备。他自始至终以厌恶的心情看待“自由党劳工派”类型的纯改良主义议会政治。 419

这种摩里斯式的社会主义不是同道道地地的无政府主义，而是同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有许多共同之处。《虚无乡消息》所描写的摩里斯的乌托邦是一个政府机构完全消失的社会；仅有的组织从自由组成团体的自发活动中产生。这是克鲁泡特金和他以前的葛德文所相信的东西。但是，摩里斯跟克鲁泡特金不同，摩里斯不主张在人们还没有为那种没有国家的生活方式做好准备以前，就消灭国家。摩里斯对教育的热忱也根本不在于正规教育，他对正规教育很不信任，因为他认为正规教育灌输给人们的是错误的准则。他所主张的教育是关于友爱生活的艺术和信仰的教育，他对那种似乎把宣传仇恨当作一种目的而宣传仇恨的做法始终有反感。象列宁一样，他希望国家“自行消亡”，而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如下见

解：人们应该直截了当地消灭国家，而不必建立任何代替的机构以引导人们通过过渡阶段进入没有阶级的社会。同列宁完全不同，他把所谓的国家“自行消亡”的希望寄托在人们思想的转变上——希望他们人数之多足以指导群众在革命以前、而不是以后具备自由结社的精神。

常有人说，摩里斯的社会主义渊源于他的艺术和他对艺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堕落所产生的反抗。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他的社会主义也来自他对友爱和社会平等的深厚感情——他通过《梦见约翰·保尔》一书中约翰·保尔在十字架旁布道所表达的那种感情。他对友爱的向往就象他对创造性技术的热爱一样在他身上深深扎了根。事实上，在他的思想里，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因为就一个人从日常的工作中得到正当的快乐这个意义来说，他不能设想一个人能够不是一个工匠而过美好的友爱生活。克鲁泡特金在这一点上跟他的意见部分相同，但是所不同的是，克鲁泡特金认为除了手艺以外，从操纵和管理庞大而复杂的机器中也能够得到真正的工艺上的快乐，但是克鲁泡特金也相信，为了得到幸福，大
420 多数人需要在小到可以管理的团体中工作，因为在小团体里，他们能够看到自己工作的成果，并能得到一种作出有价值的成就的感觉。另一方面，摩里斯倒不是痛恨机器，而是痛恨机器会使产品非人格化这一点，并且痛恨走向大规模生产的整个趋势，因为这必然会使一些工人——很可能是绝大多数工人——变成仅仅是他们自己甚至都不能安装的机器的附属品。但是，从气质和修养上说，克鲁泡特金都是一个搞科学的人，他是无法反对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发展的，他只能设法证明，如果组织得当并供以动力，个体的和小规模的生产就能在大工厂的拿手好戏中击败大工厂。摩里斯是多种工艺的老手，根本不是科学家——除非对许多材料和工序有渊博的知识也算是科学，因而能够否定——而且事实上也否定

——工艺进展的现实；同时他坚持说，由于大规模生产商品的生产条件，大多数商品是而且必然是质量低劣和不讨人喜欢的。

事实上，根据摩里斯的基本信念，他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看法。在他看来，如果计划者和操作者是彼此之间没有人情联系的两个不同的人，那么，事物的这种状态就同友爱和平等的精神不相协调。他希望人人都能自由地设计，自由地操作，因为只有一人兼做这两项工作，他才能真正在自己的产品中表现出自己的个性，从而得到创造性工作的充分满足。摩里斯说，每一件制成品“对于制造者和使用者说来都应该是一种乐趣”，它应该既美观又适用，它应该把制造者在生产过程中所得到的乐趣传达给使用者。当他对不久的将来越来越感到幻灭时，他终于说，必须先有更多的机器，然后才能减少。这就是说，人们在走向那个他们会要求更好的工作和更好的产品的社会的道路上，必须经过一个大规模生产的国家社会主义阶段。但是他始终以厌恶的心情来看待这个过渡阶段，因为这会使作为生产者的人成为机器的奴隶，而向作为消费者的人提供更多的劣等商品。

当然，摩里斯所说的话，约翰·腊斯金(1819—1900年)以前 421 已经大部分说过了；腊斯金对摩里斯的思想的影响是很深的。《今日的结局》(1862年)一书在反对当时的利己主义经济理论时就曾主张过摩里斯理论中的平等主义那一部分；《威尼斯城的石头》一书中关于“哥特式建筑”的著名的一章也曾宣称，有必要把设计和操作重新结合起来，以此作为恢复人民中间的大众艺术和艺术感的必要基础。摩里斯从腊斯金那里接过了这些理论，并通过切身的体验，使之成为一种腊斯金所没有的革命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腊斯金在《大权在握》一书中向愿意倾听他的意见的工人进行宣传，主要是呼吁进行自愿的个人努力，而不是呼吁建立承认阶级斗争是必要方法的社会主义运动。但是，关于友爱和美满生

活的基本思想则是同样的。

当任何流派的社会主义在英国都几乎被人遗忘的时候，摩里斯改信了革命的社会主义，这一改变使得他的许多崇拜者感到震惊和不满，他们本已准备接受他的艺术理论，但是他把这一理论变成阶级行动，并把某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嫁接上去。责备玷污了艺术并用古老而被人遗忘的方法为少数出得起钱的阔佬制造美丽东西的重商主义，是一回事。宣布现代文明的整个厄运，并把它同缺乏一切审美感和高尚价值感的破坏成性的暴民联系起来，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大体上说来，摩里斯承认人民大众缺乏这种感觉。他在私人信件中就常常谈到英国工人阶级极为堕落的情况，谈到他们的无知以及缺乏崇尚美或者任何一种美好事物的愿望。但是跟他的大多数艺术信从者不同，他把普通人民的缺点不是归之于人性，而是归之于除非完全改变社会和经济秩序否则就无法根除的资本主义制度中根深蒂固的重商主义。他热爱自己的工作，他痛恨自己的许多美好产品不得不仅仅作为有钱顾客的玩物而生产的情况，而没有这些人，他又根本不可能进行生产；他愿意看到这些人被消灭，深信人只要有个新的开始，就会恢复他们对艺术的自然爱好。他认为这种爱好在原始人民中是普遍存在的，因此是“自然的”。摩里斯属于风尚改革家之林，他们最后诉诸的是他们认为同“文明”回异的“自然”。在摩里斯身上，这种“自然主义”出自他的本性要求，在他的本性中，创造性的艺术冲动压倒一切。他不可能看到——如果他承认，他会感到那简直是背叛——大多数人既没有、也永远不会有这种巨大的创造意愿，他甚至也不可能看到创造力可能具有非艺术性的形式。对他来说，艺术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艺术——，否则，一切事物就毫无价值了。

但是，即使摩里斯误把自己的冲动当作自然人的冲动，他的理论还是有内容的。感到在创造方面有所成就，确实予人以巨大的

快乐，而且大多数人是能够感受到这种快乐的。但是，在其中的大部分人看来，产生这种极大快乐的创造，就现代世界对艺术一词的一般理解来衡量，都是没有艺术性的。这种快乐能够从多种多样的活动中产生——从创办一种企业，管理一个社团，一直到培植自己的花园或者是精于一种竞技。我就很清楚，这种快乐能够从没有艺术性的精神活动中产生；特别妇女，我认为她们能够从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或者从妥善处理困难的个人问题中得到快乐。即使作为理想，自由社会也不必使人人都成为艺术工匠。它必须追求的是使人人都有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才能以造福社会的机会，或者说至少不给社会造成危害。

但是，我们要谈的还不仅限于此，因为摩里斯认为每天从事强迫性劳动，毫无乐趣可言，使人意志消沉，并迫使人丢下创造性活动而去追求纯消极性的满足。难道他的这种高见不是正确的吗？我认为他是正确的，而且我认为这是他对社会主义思想的贡献的一个主要部分。

已故和在世的人对于摩里斯作为一个作家和多种技艺的能手，有非常不同的评价。人们常说，他干许多事情都很出色，以致没有一样事情干得特别出色；又说他的全部工作归根结蒂不过是技艺，而不是艺术想象力的产物。但是这种评价的论据断然否定了他最深信不移的信念：艺术家不应该超然于普通人之外，而应该是一个在人民生活中深深扎根的熟习传统技艺的代表人物，并应随时反映人民的需要。他承认，在一个受重商主义支配的世界上，他不可能是这样一个手艺人；他也不胜惋惜地承认，他自己的工作没有在人民目前的生活中扎根。但是在他所做的每一件东西上，他都没法恢复已经失传的从建筑算起的一切技艺的古老传统；在中古时期的城市，即使说不是在乡村，这种古老的技艺在普通人的生活中非常重要。在他发现艺术同社会主义有任何联系以前很

久，他的中古精神就是以上述思想为基础的。同样的思想启发他写出他的最早期的散文之一，即他在学生时代所写的《无名教堂的故事》；同样的思想也启发他产生社会主义。他在这篇散文中描写了一个中世纪的石雕匠，这个石雕匠为一个教堂雕刻装饰品，从对集体努力作出个人创造性贡献的意识中得到了很大的满足。他的全部作品都贯穿着相同的通过个人的创造和友好的合作建立美满生活的精神。

在摩里斯的社会主义著作中，最受欢迎的著作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虚无乡消息》，这是他的乌托邦。他明确地说，这不是预言，而是描写一个他身居其间会感到无比自在的社会。他在评论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顾》时说，一个写乌托邦的人所写的应该是他个人对一个美好社会的理想，而不是去预言未来。这本书描写了一个完全计划好了的社会制度，在那里根本没有摩里斯最珍视的东西存在的余地，因而使他感到厌恶。他在《虚无乡消息》一书中正是说出了他个人对美好社会的理想，书中首先说明了他对于单纯的友谊所感到的愉快，同时说明了他深信美好的社会不可能建立在任何其他基础上，尽管在这方面别人对这个社会的看法可以跟他自己的看法有很大出入。摩里斯所有著作中写得最美的《梦见约翰·保尔》贯穿着同样的互助友爱的理论。在他没有竟篇的革命长诗《希望的祈求者》中，也出现了这种理论，这首诗最初发表在《公益报》上，但是始终没有按照他的原订计划进行修订。他的一些小册子，特别是《为什么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和《可能出现的工厂》，还有他的演说选集《改变的迹象》和《对艺术的希望和恐惧》，都体现了同样的精神。他渴望生活在一个友好的世界里，摆脱那些同他为社会主义所做的工作如此不相称的一切争吵和仇恨。他根本没有取得权势的野心，他从来不希望当领导，而只希望有助于人。这本身就意味着他不可能把领导工作做好。争吵使他太伤心

了；在他发脾气以前，他不会对任何人哪怕是头号傻瓜表示粗暴；而在他怒气消除以后，他又如此懊恼后悔，以致往往使自己的出色工作付诸东流。这类人未必是创造天国的能手，但是他们却是天国中人。而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即使他们没有在他们那个时代掀起运动，他们的记载毕竟保存了下来，使人对这项事业感到亲切。

第十五章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社会主义

结 束 语

1891年,俾斯麦下台,反社会主义者法废除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爱尔福特举行会议以制定新的纲领。在遭受压制的年代里,党不可能举行正式会议,因而1875年马克思主义者和拉萨尔派合并时在哥达通过的纲领仍然保持未变。但是到了1891年,拉萨尔派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制定新纲领的目的就是要清除马克思所竭力反对的保留在1875年妥协中的拉萨尔派因素,并全盘接受马克思主义。1892年,卡尔·考茨基发表了他的《工人的纲领》一书,这是党责成他为党员写的一本说明和进一步阐释党的纲领的教科书。此后,这本书就成了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性著作,不仅在德国是这样,而且在以德国党为楷模建立社会民主党的其他许多国家也是这样。因此,值得我们比较慎重地研究爱尔福特纲领和考茨基对这个纲领的解释,因为其中最明确地说明了欧洲的各个社会民主党在1914年以前的整个时期公开宣布拥护的政策。

到爱尔福特纲领通过的时候,在相当多的国家内已经成立了宣布奉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民主党。帕布罗·伊格列西亚斯(1850—1925年)在1879年建立了西班牙社会民主党,同年丹麦社会民主党也成立了。茹尔·盖得的法国工人党到1882年时已经具有了明确的形式;海德门的民主联盟1883年通过了一个社会主义纲领,1884年改称社会民主联盟。1883年,格·瓦·普列汉

诺夫(1857—1918年)和巴·波·阿克雪里罗得(1850—1928年)在俄国建立了形成俄国社会民主党核心的劳动解放社。挪威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87年,奥地利和瑞士的党成立于1888年,瑞典的党成立于1889年。在意大利,形势仍然混乱:工党成立于1885年,其中既有社会主义集团,也有无政府主义集团,它第二年就被政府解散,直到1892年,它的继承者——具有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纲领的工党才正式成立。在荷兰,斐迪南·多美拉·尼文海斯(1846—1919年)于1878年组成了社会党,但此后走向了无政府主义,后来又发生了分裂;1889年,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成立了一个叫作社会民主联盟的新团体。波兰和芬兰的党当时正在组织过程中,直到1892年才具有明确的形式。

在比利时,我们将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并不一帆风顺。比利时工党于1885年在西萨尔·德·巴普的影响下正式成立,它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同明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多少有些距离,而且同那些跟它有有机联系的工会和合作社的关系也不同。比利时工党保持了德·巴普向第一国际汇报的一些特色,比起以德国为楷模建立的社会民主党来,它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性质要少得多。但是,分歧并不巨大,不妨碍它同具有更明确的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社会民主党进行密切的合作。

当然,即使在比利时以外的地方,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事事如意的。如前所述,在法国,奉行马克思主义的盖得派同保尔·布鲁斯领导的可能派之间存在很大分歧;布朗基派还保持着自己的组织;与此同时,边诺阿·马隆(1841—1893年)则在自己的周围团结了一批后来成为独立社会党人的知识分子。在西班牙和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不过是同对立的集团发生激烈冲突的一个派别;在荷兰、瑞士、甚至丹麦,也有类似的分歧。波兰是对立宗派的战场,俄国当然也是这样。在英国,社会主义联盟正在衰亡,社会民

427 主联盟则受到费边社和独立劳工运动的挑战，这个运动很快在1893年正式成为凯尔·哈迪所领导的独立工党。在美国，丹尼尔·德·里昂1890年参加的社会主义工党后来拥护左翼马克思主义，结果造成分裂，于1900年成立了更正统的社会民主党。

德国社会民主党所阐释的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是1891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主力。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反社会主义者法的迫害下坚持了下来，后来又不顾这些法律的阻扰参加竞选，这些成就使他们的党获得了巨大的威信。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真正在全国规模上组成的、并以诉诸民主选民的方式取得胜利的第一个社会党，因而它成了其他许多国家的榜样，只有在拉丁民族国家，英国以及民粹派和类似运动仍然占优势的东欧，它的思想才遭到严重的抵制。在象沙皇俄国(包括俄属波兰)这样的国家，政治条件根本不允许进行议会活动，社会主义团体和政党必须采取地下的革命形式；但是到了1891年，西方各个主要社会主义政党采用如下做法已经成了规律：把它们的社会主义愿望同估计很可能受广大选民欢迎并能直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的改革主张结合起来，接受议会竞选所要求的各项条件，投入竞选斗争。以1891年的爱尔福特纲领为例，它除了从总的方面阐述各项社会主义目标以外，还有一节不仅要求在政治结构方面进行改革，而且要求扩大社会服务，制定法律以保护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权利和利益。在所有社会党的都有这样的集团：它们反对在纲领内列入这些“缓和剂”，同时指出只应该根据一个完全的社会主义纲领参加竞选，

428 目的并不在于争取议席或者促进改革，而在于使工人信仰社会主义。但是在实践中，议会竞选的迫切需要使得社会党有必要在工人完全取得政权以前大力要求进行眼前的改革。一个社会党如果死抱住这样一条原则，即一定要在“革命”成功以后或在议会中取得多数以后，才能开始建设性工作，那要想不招致失败是

办不到的。

尽管如此,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各个社会民主党在要求进行眼前改革的同时,仍然以倡导社会主义本身为主,而把这些要求放在从属地位上。保尔·布鲁斯的可能主义强调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进行改革的重要性,这肯定是一种非正统的理论。爱德华·伯恩斯坦(1850—1932年)所主张的德国修正主义直到九十年代后期——当它在德国和其他地方引起激烈争执的时候——才得到明确的系统说明。1892年,卡尔·考茨基(1854—1938年)在阐述爱尔福特纲领的那本书的序言中仍然感谢伯恩斯坦的帮助,丝毫没有露出他们之间存在分歧。

下面我们就来谈谈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对欧洲社会主义影响如此巨大的爱尔福特纲领究竟说了些什么。纲领开宗明义就从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出发叙述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纲领着重强调了资本集中和大联合企业粉碎小企业的趋势,也同样强调了同一种趋势在乡村起作用,小农户为资本主义的大规模耕作制所粉碎和代替。纲领毫不含糊地说:“无产者的人数越多,过剩的工人大军就越庞大,剥削者同被剥削者之间的对立就越尖锐,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就越激烈,这种斗争使现代社会分裂成为两个敌对的阵营,并且是一切工业国家的共同特点。”

这就是1848年的纯正的马克思主义,它在40多年以后又得到重申。纲领一开头就说,“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发展出于天生的需要,必然导致小工业的破产,因为小工业的基础是工人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所形成的。小工业的破产使得工人丧失自己的生产资料,沦为没有产业的无产者,与此同时,生产资料则为人数比较少的资本家和大地主所垄断。”考茨基在阐述这个纲领的著作的后几版中不得不同意说,就地主来说,现有的统计数字并不能证明这一点;又说农民所有制看来正在发展,而不是削弱。但是,他认为这

只是发展趋势的暂时偏向，他仍然断言，就工业而论，这一分析是正确的。伯恩斯坦在其修正主义著作中否认这一论断，他论证说小企业并不是在绝对地或相对地丧失地盘，而是在改变它的领域和性质考茨基和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领袖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就曾经是小型工匠生产的重要中心的德国来说，有一点倒的确是真实的，即个体手工艺工人被工厂所排挤，鲁尔、西里西亚以及萨克森的一些部分的重工业发展最为惊人。1890年，德国的小型工业以很高的速度被取代，大型工业发展迅速。但是，德国的工业发展还没有达到出现新兴的小资产阶级的阶段，到这个阶段，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将以现代化生产方法为基础极其迅速发展，以致会形成一种强大的反趋势；此外，德国大型工业中的工会也还没有建立任何强大的组织或取得任何强大的谈判力量。

因此，纲领的起草人就可以仍然用1848年的方式继续断言，尽管“人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这种改变的一切利益都被资本家和大地主垄断了”，而且“生存的没有保障、苦难、压迫、奴役、沉沦和剥削也日益严重地”降临到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头上。英国社会主义者也发表大致同样的言论，尽管有一点在英国要比在德国明显得多，即相当一部分工人自1850年以来实际工资几乎不断在增加，一些基本商品的按人计算的消费数字就证实了这一点。关于1890年的德国，可供利用的数字不多，但是已有的数字说明，实际工资也增加得相当快，当然，这主要是由于自大约1875年以来物价下降，而不是由于货币工资增加。社会主义者对于那些在批评他们时提出这些趋势的人回答说，生活的改善只限于人数有限的熟练工人集团，而人数在不断增加的不熟练工人是没有份的；又说随着危机的严重性增加和时间拖长，失业情况也越来越恶化了。社会主义者对大萧条记忆犹新，而且相信更坏的事情就要来到。

爱尔福特纲领为纠正这种形势而提出的办法是社会化。纲领勾去了拉萨尔派提出的由国家采取行动发展生产合作的全部要求。“只有把生产资料——土地、矿山、原料、工具、机器和交通工具——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变成社会所有制，只有把商品的生产变成社会生产并由社会经营的社会主义事业，才能使大规模工业以及社会性劳动的日益提高的生产能力成为最大福利的源泉，而不再是昔日被剥削阶级饱经忧患和倍受压迫的泉源。”

纲领接着宣称，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社会的改变不仅会解放无产阶级，而且会解放整个受压迫的人类。但是，这只能是工人自己的工作，因为“所有其他阶级尽管彼此之间有利害冲突，它们采取立场的基础却都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纲领然后断言工人阶级的斗争必然具有政治性质，因为“没有政治权利，工人阶级就不能成功地进行它的经济斗争，也不能成功地发展它的经济组织”。“不取得政权，就不能使生产资料变成公有。”

这是从马克思主义出发，明确断言政治行动的必要性。这句话是针对无政府主义者和那些希望把工会斗争放在首要地位的人说的，但是它也语意含混，因为它并没有说清楚工人的政治行动是革命性的还是议会性的，如果说兼而有之，那又没有说明两者的关系如何。马克思在 1848 年，后来又在第一国际时期，曾经认为有必要采取议会行动，但是他把议会行动仅仅看作是加强工人革命斗争的手段。他曾经肯定象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和议会改革法案的积极价值。但是他认为这种行动只是举行革命建立新社会以前的准备行动。然而，他在同英国工会主义者和改革者打交道时，曾把自己学说的这一方面放在很不引人注目的地位；事实上他还曾表示在英国和美国的特殊情况下，有可能不通过暴力就完成革命。另一方面，爱尔福特纲领丝毫没有提到暴力革命。纲领接着提出如下各项改革作为当前的要求：普遍、平等和直接的男女选举权，秘

密投票，比例代表制，两年改选一次议会，通过创制权和公民投票直接制定法律，由选举产生的代表组织省和地方自治政府，以及政府体制中其他若干项改革。不错，所有这些都称为“当前的要求”，并且同关于社会和经济立法的多项其他建议结合起来。可以说，纲领只字不提法律以外的行动完全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因为如果提到，就很可能重新招致对党的迫害措施。诚然，如果社会民主党人公开宣布有革命意图，政府采取这种措施当然是可能的。这里我并不是暗示社会民主党人有意识地放弃了革命信念。但是新纲领的整个语调毕竟是这样一个政党的语调：它打算采取合乎宪法的行动，通过广泛的改革来实现它的社会主义理想。事实上，党的发展情况也正是这样，尽管它在10年以后反对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建议。我们不妨说，爱尔福特纲领在强调工人阶级有必要采取政治行动的时候，并没有规定长期的行动方法，只是明确地考虑了在当前专门使用议会方法；我们还不妨说，纲领也没有暗示准备在任何阶段实行任何种类的无产阶级专政。

432 纲领从总的方面宣称有必要采取政治行动以后，接着就着重强调国际主义。“在所有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国家，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随着世界交通的扩展，随着供应世界市场的产量的增加，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人的处境就越来越取决于其他国家的工人的处境……。德国社会民主党认为——同时也宣布——它同世界各国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团结一致。”

纲领接着宣布，党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党致力于消灭“各种剥削与压迫，不管它是针对一个阶级、一个党、一个性别，还是一个种族。”

爱尔福特纲领的宣言部分到此结束。其余部分则列举了各项当前的要求，我们已经举出其中特别具有政治性的要求。在所有各项要求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要求充分的言论、集会和结社自

由。在社会方面,则要求给予所有人非宗教性的义务教育,免费医疗,废除一切歧视妇女的法律,承认宗教完全是私人问题,听凭教会管理自己的事务,国家不加干涉,由人民选举法官,进行法律改革和废除死刑。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人人接受军事教育;以全国皆兵来代替常备军;由人民代表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问题;通过仲裁解决一切国际争端”。

下面是赋税改革要求:实施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废除一切间接税,“按照遗产的多寡和亲疏的程度征收累进遗产税”。接着是制定劳工法律的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废除童工和夜班,星期六休假半天和星期日休假全天,废除实物工作制,实行工厂检查制,改善卫生条件,废除使农业工人和仆人处于低下地位的特别法律,结社自由,在工人参加管理的条件下实行全面的工人保险制度,此外还有一些不必在这里列举的更具体的要求。 433

所有这一切汇成一个有待采取议会行动去实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完整纲领。应该注意到,在当前的措施中没有关于社会化的建议。土地或资本的社会化显然被列入下一个阶段,即工人取得政权以后的阶段。至于这项建议究竟是作为一系列要求中的一项,留待下一步采取议会行动呢,还是把它推迟到“革命”以后,纲领未予说明。但是,纲领倒是相当清楚地指出,当社会化真正到来的时候,它意味着“为社会生产并由社会经营”。这至少是强烈暗示由国家经营管理。纲领没有提到通过合作社或者特别组成的团体进行“工人管理”。

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到考茨基的评论中去寻求启发,是不会得到什么东西的。考茨基用了许多篇幅首先揭露通过自愿组成的合作社来改变社会经济结构的建议是徒劳无益的,然后说明管理生产的单位会越来越大的必然趋势。他说,总的说来,可以认为国家是最小的合适单位,甚至连国家在有些方面也可能是太小

了。他热情地叙述了生产管理会完全成为国家——变成全体人民的民主代理机构的国家——的职能的必然趋势；他也说明了国家拥有和管理一切主要生产资料的必要性。然后，他在下一章里讨论了将出现公有制的未来社会的组织。实际上，这一章在于指出不可能预言在未来的社会中是怎样管理工业或各种生产的，而只能说在国家的控制下，它将是集体的和统一的。任何想在这个问题上进行预言的企图都被说成是“空想”。这一章明确地说，社会民主党在这一方面没有表示态度，也没有纲领。考茨基认为，社会主义者个人对未来的工业组织进行思考，把自己的想法而不是预言提出来供讨论是合理的。但是他断然驳斥社会民主党作为一个政党应该在这个问题上表明态度。因此，这就给读者留下了这样一个有强烈偏向的印象：至少要在全国基础上大规模地组织和规划工业，由国家担任工业政策的指导者，但是对于可能出现的工业组织形式，没有作进一步说明，对于工人在所从事的工业的管理方面应起的作用则根本没有提到。

在考茨基强调必须对工业作全国性和国际性规划的时候，他同意克鲁泡特金的意见，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际贸易不会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那样广泛。他之所以有这种看法，是因为他估计到生产是根据消费而不是产品的销售来计划的，同时也由于他认为，资本主义为了寻求市场以销售它的日益增加的产品，才越来越走入歧途，而社会主义则把满足国内消费者需要的生产放在首位，往往只是为了取得国内不能生产的供应品才进行交换。他说，为集体消费而进行的生产，是原始共产主义和大多数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组织形式的标志；他期望在一个摆脱了资本主义贸易和追逐利润的帝国主义扩张的社会中，会再一次出现这种“合作”制度。

以上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反社会主义者法废除以后恢复

宣传自由的时候，很快制定出来的爱尔福特纲领，他们相信自己是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拟定纲领的时候曾经得到恩格斯的帮助，纲领制定出来以后，恩格斯曾经表示热烈赞成。1895年，恩格斯在几乎是他的最后一篇著作中，即在为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一个新版本所写的一篇长序中写道，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它的二百万选民是“最广大、最密集的人群，构成为国际无产阶级军的决定性的突击队”。^①他热情地写到党出色地利用了普选权，并且满怀希望地期待有朝一日不仅得到四分之一选民的支持而且得到绝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在同一段里，他着重指出了自从1848年以来在起义成功的可能性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他说，所有这些变化都有利于军队，而不利起义者，除了极特殊的情况，人民起义不再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他还说，社会民主党人的实践已经证明，可以更多地利用资产阶级立宪政府的制度来推进工人的事业，而这在1848年是办不到的。他说反社会主义者法的废除表明，专制统治和武力没有能力压制一个真正依靠工人阶级支持的运动。实际上，在这篇序言的已问世的版本中，恩格斯似乎完全放弃了社会主义必须通过革命行动来实现的思想。

435

但是，恩格斯不是这个意思。在解释了兵役的发展如何不利于起义以后，他接着写道：

“这是不是说，街巷斗争在将来就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呢？决不是。这只是说，自从一八四八年起，各种条件对于民间战士已变得不利得多，而对于军队则已变得有利得多了。这样，将来的街巷斗争，只有当这种不利的对比关系有其他的因素来抵销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因此，街巷斗争在大革命初期将比在大革命继续发展进程中发生得较少，并且必须要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1954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第112页。——译注

用更大的力量来举行。”^①

436

德国的编辑们从恩格斯的序言中删去了这一段文字以及在这里没有必要引证的某些其他段落，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段落可能损害社会民主党。恩格斯仍然认为，社会主义需要在某个阶段发动革命起义，但是他也得出这样的看法：暂时强调合乎宪法的政治行动是正确的。删改他的文章的编辑之所以这样作，可能完全出于策略上的原因，但是我认为他们不喜欢他所说的话还另有原因在。甚至在189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一个采取合乎宪法的政治行动的政党了。事实上，如果不是由于在厉行反社会主义者法时期遭到取缔，大概它早就走上这条道路了。1891年，社会民主党领袖为从他们的新纲领中一笔勾销拉萨尔派的词句而感到庆幸。词句倒是被勾销了，但是根本思想依然存在。正如爱尔福特纲领所表明的，国家具有马克思在批判1875年哥达纲领时所极力反对的全部属性，而且有过之无不及。而爱尔福特纲领的正式解说者考茨基则走得更远，写了一本实质上是国家社会主义理论的教科书。

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这个新纲领同仅仅两年以后的比利时工党的纲领作一比较，是饶有兴味和教益的。比利时工党是爱都阿·安西尔、路易·贝特朗和1890年逝世的著名比利时理论家西萨尔·德·巴普于1885年建立的。1893年，也就是拟定纲领的那一年，比利时人经过了一系列政治性总罢工，终于取得了改革极其有限的选举权的胜利。新制度实行成年男子选举权，同时有广泛的多选区投票的机会。改革后举行的选举把30名社会主义者送进了众议院，原先众议院是没有社会主义议员的。因此，比利时工党面临一个崭新的局面，它第一次有了有效利用议会的手段。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1954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第110页。——译注

在新条件的影下，它脱离了由于得不到选票而被迫处于的半无政府主义状态，而变成了一个参加选举斗争的政党，既有当前的纲领，又有一套长远的目标。它的布鲁塞尔纲领，就象德国的爱尔福特纲领一样，首先宣布了各项原则，然后列举了若干项当前的改革要求。但是这两个文件之间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更多地表现在当前的建议里而不是在原则的宣言中，不过即使在两个宣言中，态度也是不同的。两个宣言都要求生产资料公有制，但是比利时人用“集体占有”来说明他们的目标，强调集体占有的目的在于“为人人取得最大可能的自由感和幸福感”，同时提到“个人或集体”有⁴³⁷权利享受共同遗产。我们下面要讨论比利时工党的当前要求，那时这些词句的意义会更明确地显示出来。

此外，德国人十分强调政治行动，而比利时人则采取不同的方针。“社会主义必须同时追求无产阶级的经济、道德和政治解放。然而，经济观点必须高于一切，因为资本集中在一个阶级手里的情况构成了所有其他统治形式的基础。”应该指出，比利时资本主义显示出一种在当时说来是非常先进的集中形式，比利时资本家在政府的帮助下，对工会进行了极其残暴的迫害。就本质而言，比利时是一个资本家和金融家横行的社会，而不是地主横行的社会。比利时工人的主要敌人是资产阶级，而不是封建地主或军国主义者。

两种态度之间的另一个差别是比利时人提出了道德在社会转变过程中的明确作用。他们说，在资本主义向“集体主义”转变的同时，“道德必须有相应的转变，必须发展利他主义的精神和实行团结的原则”。马克思会嘲笑这种诉诸利他主义的做法是小资产阶级的胡闹，同“科学的社会主义”的任何声明格格不入。比利时人不同意这一点。从柯林斯的时代起，经过德西雷·布里斯梅和西萨尔·德·巴普的时代，道德改革和人类团结或友爱的思想在向比利时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宣传时起了很大作用。

最后,比利时的原则宣言规定,“工人在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时,必须利用自己所掌握的一切手段,特别是要通过政治行动、发展自由结社和永不停止地宣传社会主义原则来进行斗争。”这种坚持“自由结社”的原则、把这一原则置于与政治行动同等地位的做法,使比利时的纲领具有鲜明的特性。

438 现在我们来谈谈比利时工党纲领的当前要求,虽然“当前”一词不是比利时人用的。他们称这一文件的第二部分为“纲领”,以区别于前面的一部分——“宣言”。在政治方面,只有一个显著的差别。比利时人象德国人一样,要求男女普选权,比例代表制、直接立法以及地方和区域自治政府,但是比利时人还要求“成立代表社会不同职业——工业、商业、农业、教育等等——的立法委员会。各立法委员会在本身的职权范围内实行自治,但议会有权否决之;各立法委员会得联合起来研究和保卫它们的共同利益。”在下一节中,纲领特别谈到应由学校委员会选举产生“最高教育委员会”,而学校委员会则应通过普选产生。纲领的经济部分要求由自治的专门委员会在国家的监督下管理公用事业。纲领进一步要求“成立由公用事业的工人和雇员选出的委员会同中央政府讨论劳动的报酬和组织的条件”。在另一节,纲领要求“工会组织参与确定工资率和工业的全盘管理工作”,在另一部分纲领要求给予工会集体承包公共工程的权利。

最后,比利时的纲领不同于德国的纲领,对公用事业未来的管理——也就是对那些将在地方或者区域的基础上经营的公用事业的管理——有所陈述。这段是这样说的:

(一) 交通工具——电车、公共汽车、马车、地方铁路等应由区或者包括一个居民中心的若干个区的联合组织进行管理。

(二) 目前根据特许权由各公司经营的涉及大众利益的事业——电

灯、自来水、市场、公路、供暖、保险和保健，应由区或若干个区的联合组织来经营。

应该解释一下，在比利时，地方行政单位现在和过去都是区，⁴³⁹但是较大的城市则被分成好几个单独的区。在（一）项中所说的“若干个区的联合组织”就是指的这种划分，而在（二）项中则具有更广泛的意义。

显然，比利时人对管理工业问题的态度同德国人大不相同，它的特色可以追溯到以前某一章所叙述的、西萨尔·德·巴普在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分裂以前和以后的历届大会上提出的一些规划。1892年，比利时工党已经丝毫没有无政府主义的痕迹，对于取得政权，它同德国人一样坚决。但是它对社会结构的想法远不象德国人那样主张中央集权，它既不愿意以大型工业发展的必然结果为理由，把大权集中在国家身上，也不愿意一语带过，说什么未来社会的结构无法事先决定或者说这不是社会主义者应该表示任何集体意见的问题。比利时人希望把管理权尽可能交给地方，或者叫作地方分权；他们希望由某种职能机构来管理需要在全国规模上加以管理的工业和服务事业。他们对“工人管理”问题很敏感，至少要求工人不仅参加磋商，而且参加某种形式的管理。他们强调区的作用，而不是国家的作用。他们既强调工人——作为一个阶级——的解放，也强调个人和集体的自由，而德国人则不然。以上都是非常重要的差别；既重视道德力量，又重视经济的必要性，也同样是重要的差别。比利时人的态度肯定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虽然他们吸收了马克思的一些理论。这种态度渊源于第一国际中的“工联主义”倾向，而不是专制主义倾向。

有许多问题两个纲领没有重大分歧，因而略而未提。两个纲领都是国际主义的，都主张男女平等，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以及实

行集体所有制。两个纲领都要求教会和国家分离，普及非宗教性教育，给予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实行司法改革，自由组织工会，推行社会保险、累进税和废除间接税总计划，禁止雇用童工以及若
440 干项其他具体改革。比利时人在继承权方面不象德国人那样激进，只是要求除近亲外，禁止无遗嘱继承。关于土地问题，比利时人也很谨慎。他们要求把森林收归国有和发展公地，但是除此以外，只是说“国家或区应逐步收回土地”。同德国人不同，比利时人公开宣布赞成建立共和国。

因此，从这两个纲领中，我们看到了当时的局势可能要求建立一个不是以革命为主而是以接受投入竞选和参加议会政府的条件为主的政党，直接诉诸广大选民；我们也看到了对待这种局势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态度是高度集权主义的，它同走向德意志帝国的统一，制止各成员邦退出的趋势相符合。另一种态度则反对集权化，符合佛兰芒族和瓦龙族不能愉快相处（至少没有广泛的地方自治，就不能愉快相处）的社会条件。但是这种差异还另有深意，不仅仅是国家形势的不同而已，虽然这个因素无疑是很重要的。比利时人的态度远比德国人富于自由主义，也远比德国人认识到有必要使组织多样化：既有必要建立某种职能机构，也有必要给予地方自由；既有必要把工人看作是一个阶级，也有必要把他们看作是个人和各个不同团体的成员。

在本书的下一卷，我们必须考虑，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形成的新“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这些和其他一些倾向是怎样在各党和第二国际的政治中发挥作用的。第一国际的后继组织实际上成立于1889年，当时有两个对立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在巴黎举行：一个是马克思的法国信从者盖得派发起的，另一个是以保尔·布鲁斯为首的法国可能派发起的。说也奇怪，社会民主联盟中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参加的是可能派的代表大会，而英国的温和派

社会主义者倒参加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大会。但是，这两个代表大会的情况必须留待下一卷去叙述，因为必须联系以后发生的 441 事情，而不是联系导致这两个大会的事情去考虑。

只要强调一下在 1850 年到 1890 年之间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所经过的历程，本卷就可以结束了。1848 年，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号召工人阶级把握住一场据信即将席卷整个欧洲的社会革命，但是除了法国以外，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发生革命的哪怕是渺茫的可能性，即使在法国，那也只是巴黎存在这种可能性，而且事态发展迅即表明，即使在巴黎实际上也不可能获得成功。在 1848 年和以后几年，革命遭到失败（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此后有整整 12 个年头，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工人阶级运动消沉了，至少在政治上是这样，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在经济上也是这样。接着就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迅速到来的重振旗鼓的时期，第一国际就是这种振兴的象征，不过与其说它是振兴的原因，倒不如说是振兴的后果。普法战争破坏了这个运动（巴黎公社只是这场战争的次要后果），因为如果拿破仑第三的帝国不是经过战争而是经过革命而被推翻（事实上这是很可能的）的，革命就会具有资产阶级的共和形式，而不是无产阶级的形式。1870 年和 1871 年的事态发展暂时破坏了法国工人阶级的运动；因此，在思想上和实践上，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先地位已从法国转移到了德国。尽管有反社会主义者法，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杰出代表，并且成了许多其他国家效法的榜样。德国社会民主党有对手，即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法国的布朗基派以及后来的可能派、德·巴普所领导的比利时人，还有独立行动而同其他国家的情况没有多大关系的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但是，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逐渐成了劳工世界的一支统一的国际力量；这支力量必然是在它的身居德国的领袖的支配之下形成的，而不是在外国的马克思

或后来的恩格斯的支配之下形成的。当俾斯麦当权，反社会主义者
442 法仍然有效的时候，这些领袖过分忙于为生存而进行的日常战斗，
而无暇考虑制定纲领的工作，他们受到的迫害也必然使他们反对
成为“立宪主义者”。但是在俾斯麦倒台，迫害刚刚取消以后，他
们立刻又面对他们在坚决抵抗这种迫害方面的成就所带来的后
果。经过最初的挫折，他们重建了自己的党，尽管它曾经被取缔，但
它又成了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党本身遭受的迫害使它的候选人
得到了不仅是工人阶级，而且还有其他阶级心怀不满的人的越来
越大的支持。1890年以后，社会民主党人不得不在以下两种抉择
中任选其一：或则继续作为具有彻底革命性的工人党而失去温和
派的支持；或则改变策略，以便在改变了的条件下，保持和增加他
们在作为俾斯麦的最不可轻侮的政敌时所得到的小资产阶级和农
民的支持。他们企图兼行并施，一方面重申他们完全忠于马克思主
义，把它当作长远的目标，同时又采用一项适于在小资产阶级中进
行宣传的当前的纲领。但是不论在长远的目标方面，还是在眼前的
要求方面，他们都表明他们实质上是集权主义者。他们这样作对他
们的宣传是有利的，因为集权主义使他们站在帝国统一的一边，不
仅反对分裂主义的趋势，而且也反对普鲁士，普鲁士的选举制极不
民主，同选举帝国议会时实行的成年男子选举权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此期间，英国的新社会主义运动仅仅有一个缓慢而不稳定的
开始。海德门运气不佳，他同马克思发生了争执，这倒不是因为
马克思在英国有多大影响，而是因为马克思——更重要是恩格斯
——的敌视使社会民主联盟失去了国际承认，特别是失去了它正
在竭力效法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支持。此外在英国，社会民主党
人同无政府主义者（或者说工联主义者）之间的斗争在十九世纪六
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还未见分晓，因而在八十年代还不得不面对这
场斗争，这期间，这场斗争是以社会民主联盟同社会主义联盟之间

的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场斗争是一个因素，它推迟了英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直到新工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基本上改变了英国的形势为止。因此，大体说来，社会主义思想首先是通过工会而不是以 443 任何政治借口同大部分工人见面的。这就造成一个关系重大的后果：跟大多数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在决定工会运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情况不同，英国的工会则支配政治运动，把运动组成一个主要以工会的组织关系为基础的、工会的表决权在会上起决定作用的工党。

在法国，事态是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的，因为在那里，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社会民主主义所面临的不是一个对社会主义思想毫无所知的工人阶级，而是一个在整个十九世纪受到各种对立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呼吁的影响的工人阶级。在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只能以许多社会主义团体之一的面貌出现，早在他们为人所知以前，布朗基派已经很活跃，而且巴贝夫与平等派密谋的传统把布朗基派同 1789 年的大革命联系起来。虽然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由于它的领袖四处分散，有的系狱，有的流亡，因而几乎不复成为一个有组织的运动，但是在大多数工人的思想中，社会主义传统仍然是很鲜明的。然而在重振旗鼓的时候，昔日的分歧也就随之而来了。通过改组后的工会，蒲鲁东主义重新抬头，它采取了新的形式，要求无产阶级团结一致，这在政治领域中似乎是无法实现的，然而通过不附属于任何对立的社会主义团体或政党的工会，在阶级的领域中——即在工业领域中——则可能实现。面对这重障碍，茹尔·盖得打算把工会变成工人党的从属同盟者的尝试白费了力气，而在德国，类似的策略却非常成功。法国的许多第一国际会员的反马克思主义在斐南·佩洛蒂埃的劳工介绍所联合会以及后来的总工会的革命工团主义中重新抬头。法国的社会主义始终不是纯粹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法国的工会主义始终没

有在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下、或者任何对立的理论的领导下走向议会政治。

意大利和西班牙也仍然是纷争不已的地方，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人同形形色色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战场。在美国，丹尼尔·德·里昂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异端的提倡者，这个异端完全拒绝缓和的策略，丧失了一切可能获得选举胜利的机会，为创建世界产业工人协会的纯工业主义——工团主义的美国变种——铺平了道路。在俄国，马克思主义在少数大型工厂的产业工人中生了根，但是在农村，面对民粹派及其继承者社会革命党人的抵制，它无法取得进展，因此在沙皇制度本身崩溃以前，了无成就。沙皇制度由于战败的压力，自 1905 年开始崩溃，1914 年以后的几年，压力更大，终于完全崩溃。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条件跟实行议会制的西方完全不同，因而虽然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它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颇为相象，但 1890 年以后，它就发生了完全不同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转变。实际上，孟什维克的立场和政策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是以发展中的德国形式的社会民主主义为基础的，但是布尔什维克在列宁的指导下，则回到《共产党宣言》中去寻求启示，成为现代共产主义的缔造者，把马克思关于党和专政的作用的思想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的彻底革命的理论。这种从新的角度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种子在 1890 年以前——即本卷所述内容结束的年代就播下了，但是直到后来才发芽，因此现在要加以讨论就不是时候了。

THE PRINCIPAL CHARACTERS

主要人物表

	出现章次
Colins, 1783—1859 柯林斯	4
Warren, 1798—1874 华伦	13
Rodbertus, 1805—1875 洛贝尔图斯	2
[Blanqui, 1805—1881]① [布朗基]	—
[Proudhon, 1809—1865]① [蒲鲁东]	—
Delescluze, 1809—1871 德勒克吕兹	7
Marlo, 1810—1865 马洛	2
Belinsky, 1811—1848 别林斯基	3
Ketteler, 1811—1877 凯特勒	10
Herzen, 1812—1870 赫尔岑	3
Bakunin, 1814—1876 巴枯宁	6,8,9
Marx, 1818—1883 马克思	6,8,10,11
Ruskin, 1819—1900 腊斯金	14
Engels, 1820—1895 恩格斯	6,8,10,11
Stephens, U. 1821—1882 斯蒂芬斯, 乌	13
Lavrov, 1823—1900 拉甫罗夫	13
Lassalle, 1825—1864 拉萨尔	5
Lieb knecht, W. 1826—1900 李卜克内西, 威廉	10
Sorge, 1827—1906 左尔格	8

① 第一卷已谈到。

Sylvis, 1828—1869	锡耳维斯	13
Dietzgen, 1828—1888	狄慈根	11
Chernyshevsky, 1828—1889	车尔尼雪夫斯基	3
Réclus, Élisée, 1830—1905	莱克留, 埃利塞	12
Schweitzer, 1833—1875	施韦泽	10
Dühring, 1833—1921	杜林	11
Morris, 1834—1896	摩里斯	14
Applegarth, 1834—1924	阿帕尔加尔特	6
Varlin, 1839—1871	瓦尔兰	7
George, Henry, 1839—1897	乔治, 亨利	13
Bebel, 1840—1913	倍倍尔	10
Malon, 1841—1893	马隆	7, 12
De Paepe, 1842—1890	德·巴普	6, 8
Kropotkin, 1842—1921	克鲁泡特金	12
Hyndman, 1842—1921	海德门	14
Brousse, 1844—1912	布鲁斯	12
Guillaume, 1844—1916	吉约姆	6, 8
Guesde, 1845—1922	盖得	12
Most, 1846—1906	莫斯特	12
Nechaiev, 1848—1882	涅恰也夫	8, 9
Powderly, 1849—1924	鲍德莱	13
Bellamy, 1850—1898	贝拉米	13
Zhelyabov, 1850—1881	热里雅鲍夫	12
Bernstein, 1850—1932	伯恩施坦	15
De Leon, 1852—1914	德里昂	13
Cunninghame Graham, 1852—1936	肯宁汉·格雷姆	14
Malatesta, 1853—1932	马拉特斯塔	12

Bax, 1854—1926	巴克斯	14
Kautsky, 1854-1938	考茨基	15
Debs, 1855—1926	戴布斯	13
[Hardie, 1856—1915]②	[哈迪]	—
[Mann, 1856—1941]②	[曼恩]	—
[Shaw, 1856—1950]②	[肖伯纳]	—
[Plekhanov, 1857—1918]②	[普列汉诺夫]	—
[Webb, Beatrice, 1858—1958]②	[韦伯,比阿特里斯]	—
[Jaurès, 1859—1914]②	[饶勒斯]	—
Champion, 1859—1928	香比翁	14
Burns, J. 1859—1941	伯恩士,约	14
[Webb, Sidney] 1859—1947②	[韦伯,悉尼]	—

② 将在第三卷中谈到。